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梁启超与护国战争

董方奎 编著

辛亥百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梁启超与护国战争

董方奎 编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与护国战争/董方奎 编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

ISBN 978-7-5622-5359-4

I. ①梁… II. ①董… III. ①梁启超(1873~1929)—人物研究
②护国运动—史料 IV. ①B259.1 ②K258.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7502 号

梁启超与护国战争

编著:董方奎 ©

责任编辑:肖颖

责任校对:易雯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9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19.5

字数:300 千字

版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200

定价:54.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 20 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自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 1920 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 (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 (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 30 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 1978 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 2000 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民主宪政的追求者	(1)
一、走了一段曲折的路	(1)
仁矣哉破坏	(1)
与革命党舌战	(4)
请愿失败	(5)
二、拥护共和	(7)
政变计划破产	(7)
抛弃虚君共和	(9)
拥护民主共和	(12)
三、投奔袁世凯	(13)
弃嫌相携	(13)
筹组大党	(15)
攻击“二次革命”	(18)
四、“人才内阁”的下场	(20)
妄图左右天下	(20)
没有实权的“人才内阁”	(21)
在退让中被踢开	(22)
进步党遭镇压	(24)
五、宪政破产	(25)
矢志追求宪政	(25)
希望再次破灭	(28)

第二章 揭开反帝制序幕	(30)
一、反对“二十一条”	(30)
政治质问案	(30)
痛斥日本侵略谬论	(32)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36)
二、丑剧不能同演	(38)
失望与检讨	(38)
丑剧难于同演	(40)
复古思潮评议	(42)
三、丑剧公演以后	(44)
帝制筹安与登场	(44)
揭开反帝制序幕	(47)
四、海外的号角	(51)
孙中山讨袁	(51)
黄兴与孙中山携手	(56)
讨袁联合战线形成	(57)
第三章 咨受大计 部署略定	(59)
一、蔡锷投了“拥护帝制”的票	(59)
师生之间	(59)
受骗入京	(61)
“忠于”职守	(62)
投了“拥护帝制”的票	(63)
二、策划西南发难	(65)
秘密策划	(65)
巧计脱逃	(68)
一去不返	(70)
第四章 举起讨袁护国的旗帜	(72)
一、动员起来、组织起来	(72)
动员起来	(72)
联合发动	(74)
唐继尧的矛盾	(76)
李、蔡入滇	(80)
组织起来	(83)

二、通电宣誓讨袁	(87)
警告与最后通牒	(87)
檄告全国	(91)
对外方针	(92)
军师的运筹	(94)
盛大的节日	(101)
第五章 指陈方略 川湘告捷	(107)
一、蔡锷进军泸州、纳溪	(107)
首取叙府	(107)
刘存厚响应及占领纳溪	(109)
二、贵州独立	(111)
三、泸纳血战	(113)
袁世凯的妄想及北洋军之残暴	(113)
反围攻叙府鏖战	(115)
泸纳血战总攻受挫	(117)
湘西及川东战场	(120)
蜀道崎岖	(121)
指陈方略，反攻获捷	(124)
四、叙泸停战	(128)
冯玉祥倒戈	(128)
泸纳停战	(131)
第六章 从军广西	(134)
一、偷渡入桂	(134)
策动陆荣廷	(134)
离沪赴港	(137)
蛰伏横滨丸	(140)
在军中敬告国人	(141)
偷渡入桂	(143)
二、歼灭龙觐光犯滇军	(144)
龙觐光犯滇	(144)
剥隘、百色之捷	(146)
三、广西独立	(148)
四、帝制丑剧收场	(150)

丑剧收场·····	(150)
民意耶？帝意耶？·····	(153)
第七章 迫龙独立 ·····	(157)
一、中华革命军兵临城下·····	(157)
龙济光及“济军”·····	(157)
在港澳的策动·····	(158)
朱执信讨袁·····	(160)
陈炯明攻惠州·····	(161)
民军蜂起·····	(163)
兵临城下·····	(164)
二、留龙与逐龙之争·····	(167)
停战待议·····	(167)
海珠惨案·····	(169)
两广都司令部成立·····	(170)
留龙与逐龙之争·····	(172)
第八章 逼袁退位 ·····	(176)
一、坚持逼袁退位的方针·····	(176)
舍袁退位外无调停余地·····	(176)
袁世凯之解剖·····	(180)
和平保障惟恃武力·····	(182)
二、军务院成立·····	(183)
筹组军务院·····	(183)
对袁世凯之宣判·····	(185)
斥筹安新派·····	(186)
三、争取冯国璋，促段反袁·····	(188)
争取冯国璋·····	(188)
冯国璋之“调停”·····	(191)
促段反袁·····	(192)
南京会议·····	(195)
离粤返沪·····	(198)
四、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气急暴死·····	(200)
浙、陕独立·····	(200)
孙中山第二次讨袁宣言及中华革命军之进攻·····	(203)

黄兴及海外华侨讨袁之声·····	(206)
促陈叛袁，逼汤独立·····	(209)
第九章 民国安在 ·····	(213)
一、胜利与妥协·····	(213)
坚持恢复《临时约法》·····	(213)
惩凶及对段祺瑞妥协·····	(216)
撤废军务院及中华革命军改编·····	(219)
善后·····	(224)
二、护国战争与梁启超·····	(229)
三、民国安在·····	(233)
附录1 护国战争大事日志 ·····	(237)
附录2 人物注释索引（按姓氏笔画排序） ·····	(284)
后 记 ·····	(289)

第一章 民主宪政的追求者

一、走了一段曲折的路

仁矣哉破坏

戊戌维新时期的政论家、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梁启超^①以变法图强、追求君主立宪而闻名中外。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可是他追求立宪政治的理想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来愈坚决。

实现立宪政体，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共同要求。但是如何实现立宪政体呢？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用暴力推翻清朝封建政府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在摸索实现立宪政体的过程中，却走了一段曲折的路。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孙中山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②等人的协助下，力谋与康、梁合作，“共同实行革

①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现属广东省江门市。少有神童之称，十二岁考取秀才，十七岁中举人。次年拜康有为为师，协助其进行变法理论的著述和编校工作，深受其影响。1895年赴北京参加会试，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8月参加强学会，任书记员，旋任上海《时事报》总编辑、长沙时务学堂中学总教习，大力宣传维新变法理论，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时人合称康梁。1898年春入京参加变法。

② 宫崎寅藏（1871—1922），又名虎藏，别号白浪庵滔天，也作宫崎滔天，日本熊本县人。清末结识孙中山，为兴中会的反清革命活动而奔走。1900年参加惠州之役，失败后回国。1904年结识黄兴，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创办《沪上评论》，并参与策划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支持“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

命大业”，但遭到康有为^①的断然拒绝。1899年3月，康离日本去加拿大后，孙中山、陈少白等继续争取梁启超。梁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从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中体会到不破坏旧势力就不能使历史求得进步，夏秋之间，“与孙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孙中山“有联合两党进行革命之计划。旅日康徒半赞成之。两党有志者协议公推孙总理为两党合并后之会长，梁为副会长”^②。

孙、梁联合达成初步协议后，由梁启超草拟致康有为书，略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革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将继续往开来，以报恩师”。由梁启超、韩文举^③、欧榘甲^④等重要弟子十三人签名^⑤，劝康有为退出政治舞台，长期休养。同时，梁启超还发表《国权与民权》、《祈死战》、《中国魂安在》、《破坏主义》等文章，宣传革命思想，追求民权政治。他说：“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也”，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因为保守势力的“恋旧”，“实阻碍进步之一大根源也”，“使之数十年数百年不能进，盖其可畏可恨至于如此”，必须用“快刀断乱麻，一拳碎黄鹤”的办法，“使千百万亿蠕蠕恋旧之徒，瞠目结舌，一旦尽丧根据之地，虽欲恋而无可恋，然后驱之以上进步之途，与天下万国驰

①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博通经史，今文学学家。1879年游香港，注意学习西方文化。由于民族危机严重，自1888年后多次向皇帝上书改革。1890—1893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为变法作准备。1895年5月，发起“公车上书”，同年中进士，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成为维新派的领袖。

②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89页。

③ 韩文举（生卒年不详），字树园，广东番禺人。迭任上海《时务报》、澳门《知新报》、神户《东亚报》、横滨《清议报》、横滨《新民丛报》各报主笔，自号扈虱谈虎客，鼓吹民族主义暴力。民国后，隐居乡井，以教书自给。

④ 欧榘甲（1869—1912），字云樵，广东惠阳人。青年时代与会党关系密切，曾在《清议报》痛论汤武革命，被康斥为大逆不道，勒令赴美洪门致公堂创设《大同日报》，后来又攻击孙中山，受到立宪、革命两派之批评。遂匿居不出，郁郁而终。

⑤ 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见《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9页。

骤于大剧场”^①。这年秋天，梁启超至香港，“尝访陈少白^②，殷殷谈两党合作事”，并推陈与徐勤^③起草联合章程。但徐勤与麦孟华^④坚决反对，他们分别“驰函新加坡，向康有为告变”，说梁启超已渐入孙中山之“圈套”，非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初得十三人的劝退书，已怒不可遏，及得徐、麦二函，乃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启超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稍延^⑤。至此，孙、梁合作之局流产。

在此后的三四年间，梁启超虽然被康有为强迫从事保皇会事宜，但他却违背康有为的旨意，发表许多文章，如1900年的《立宪法议》、《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01年的《卢梭学案》，1902年的《新民说》、《释革》等，大力宣扬暴力革命和民权学说。他说，处今日腐败之中国，若行渐进的部分的枝枝节节的改革，“更阅十年，更阅百年，亦若是则已耳”，不会求得真正的进步，“我国民将被天然淘汰之祸”，“万劫不复耳”。他在指出“改革论”不可行的同时，大声疾呼，我们不能“毒蛇在手而惮断腕，豺狼当道而

① 梁启超：《破坏主义》，见《饮冰室文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25页。

② 陈少白（1869—1934），号夔石，广东新会人。1895年与孙中山、杨衢云等成立香港兴中会，此后一直紧跟孙中山革命，1899年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又联络会党，接济惠州三洲田起义，又组织“振天声剧社”，提倡民族主义。1905年香港同盟会成立，被举为会长。1911年广东光复后，任广东都督府外交司长，组织粤航公司，谋收回航权。晚年全力于其家乡建设。著有由陈少白口述、许师慎记录的《兴中会革命史要》及《兴中会革命史别录》等书。

③ 徐勤（生卒年不详），字君勉，广东三水人。康有为弟子，1896年为广州万木草堂学长，曾任澳门《知新报》撰述，为《时务报》撰文，1898年任日本横滨大同学校校长。戊戌政变后，他对孙、梁合作，阳为赞成，阴为反对。嗣后追随康有为。1905年，在香港办《商报》，次年在新加坡办《南洋总汇报》，活动于南洋、美、墨等地十余年。

④ 麦孟华（1875—1915），字孺博，广东顺德人。举人，康有为门生，与梁启超齐名。1895年春与梁启超同寓北京，参与“公车上书”。1897年与梁启超、汪康年等创不缠足会于上海，并为《时务报》撰文，主张“尊君权抑民权”。1898年春与梁启超等联合两广、云、贵、陕、浙等省举人，反对租让旅顺、大连给俄国。旋又列名保国会，戊戌政变后，在日本帮助梁启超办《清议报》。1907年政闻社成立时，被推为常务员，以后紧随梁启超。1915年初病逝。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9页。

问狐狸”，必须“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①，建设一个像卢梭所提倡的没有君主的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国家^②。他特别强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③。立法权必须属于“多数之国民”，若君主不给立法权予人民，“而民终必有知此权为彼所应有之一日，及其自知之而自求之，则法王路易第十六之覆辙，可为寒心矣”^④。梁启超的上述宣传，对当时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和使立宪派向革命派转化，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与革命党舌战

1903年正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请，游历了加拿大及美国等地。他发现处于君主立宪的英国统治下的加拿大人民所享自由权利相当完备。游美期间，看到美国选举总统的种种弊病，遂对共和政体发生怀疑。他说：“吾游美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如中南美诸国，“每当选举时，必杀人流血”^⑤，因此他认为，美国国民文化知水平较高，在民主选举中尚动乱不堪，更何况中国。他认为中国国民尚无“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这是他复持君主立宪论的主要依据。从此，他思想上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又回到康有为的怀抱，成为立宪派的旗手及号手。

1904年秋至1907年秋，以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反对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反对建立民主共和国，与革命派展开激烈的舌战。正当论战达到高峰时，1906年9月1日，清廷下诏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欣喜若狂，以为“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耳”^⑥。他认为在此预备立宪之过渡时代，在民选议员尚未成立之时代，当行开明专

① 梁启超：《释革》，见《饮冰室文集》（以下凡梁启超之文章，作者姓名从略）之九，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40～44页。

② 《卢梭学案》，见《饮冰室文集》之六，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97～108页。

③ 《立宪法议》，见《饮冰室文集》之五，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页。

④ 《论立法议》，见《饮冰室文集》之九，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06～107页。

⑤ 《新大陆游记》，载《新民丛报》临时增刊，1904年2月，第100页。

⑥ 光绪三十二年梁启超《致蒋观云先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215页。

制。清政府试图通过预备立宪、官制改革、设立内阁来加强封建皇族的专制统治；而梁启超成立了政闻社，试图在“秩序的行动”、“正当之要求”和“尊重皇室”的口号下，实行“改造政府”、“废止”专制^①，使他们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跻身于政权机关，实现责任内阁、司法独立及地方自治等资产阶级民主。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政府加强集权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要求“改造政府”，是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坚持封建专制与反封建专制的斗争，其中也包括急于实行民主宪政和逐步实行民主宪政之争。这种矛盾斗争的尖锐发展，使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逐渐降为次要地位，至1907年夏秋之后，两派的论战基本结束，梁启超决定“以全力对付政府”^②，争取立即实行民主宪政。

1908年2月，政闻社本部由东京迁至上海，又在各省设立支部，并联合预备立宪公会发起“速开国会”的大规模请愿运动，给清政府以严重的威胁。清政府已经宣布预备立宪，当然不能同意速开国会。8月，慈禧以政闻社内有梁启超等“悖逆要犯”为口实，宣布解散政闻社，给梁启超等立宪派当头一棒。

请愿失败

11月，光绪与慈禧先后死去，不满三岁的溥仪继位，并由其父载沣摄政，使清末政局发生一些变化。光绪的逝世，使梁启超等人失去依托，无皇可保，感到不安，但慈禧的死亡，他们的头号政敌没有了，不能不为之雀跃。此后，梁启超曾歌颂载沣，对摄政王抱有很大希望，积极活动开放党禁，自信“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拯救”，梦想由他组织责任内阁左右大局。但是，经过半年的努力，载沣毫不提及康、梁的赦免问题，给梁启超满腔的政治热情浇上了一桶冷水。此后，梁启超在立宪请愿运动中对载沣发动了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的攻击，揭露预备立宪的骗局，“颁布自颁布，违反自违反。要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排专制以成立宪

① 《政闻社宣言书》，见《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28～29页。

②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八日梁启超《与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245页。

也”^①。从1905年的开明专制论发展到要求即开国会，实行责任内阁，说明梁启超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又前进了一步。在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中，梁启超的上述言论，使立宪派欧榘甲等倾向革命。因此，康有为愤责梁启超是“一人叛变，全党皆动”的罪魁祸首^②。

1910年冬，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遭到镇压后，梁启超对载沣完全失望。黄花岗起义之后，他在《粤事感言》中，认识到现政府“多存留一日，则元气多斫丧一分”，“今日外交当局者，日以卖国为专业，日敦请外人之干涉我”，“虽无革命，而埃及覆辙，其终不免。无宁革命焉而犹可以冀免干涉于万一”^③。在中国不得不行革命的事实面前，他开始认输了，又宣传起革命破坏论来。今日“我国民不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无论建何政策立何法制，徒以益敝而自取荼毒。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④。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经过痛苦的周折和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以后，终于承认革命是“应乎时代之要求，合乎人人心理之所同然”^⑤的事业。

清末的十年，急风暴雨，各种矛盾十分尖锐，梁启超既受到封建专制的打击和革命派的影响，也受到康有为的牵制和光绪的吸引。因此，他在革命和保皇的问题上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虽然如此，他猛烈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热忱追求立宪政治的斗志却坚定不移，日甚一日。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少白曾说：“革命和保皇”，是救国的不同手段，其目的却是相同的。梁启超曾保皇，并不是他的宗旨，“救国才是他的宗旨”^⑥。郭沫若曾经说，在清末与封建残垒作

① 《台谏近事感言》，见《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91页。

② 康有为《致梁启超书》（1910年），见《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2~363页。

③ 《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七，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65~67页。

④ 《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见《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六，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39页。

⑤ 《中国立国大方针》，见《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八，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9~79页。

⑥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4页。

战中，在梁启超那种“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到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人”，“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

二、拥护共和

政变计划破产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席卷全国的革命斗争，汇合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在这个革命洪流中，反动的清王朝土崩瓦解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各个阶级都要在它的面前决定取舍。在清王朝垂死挣扎和革命派奋勇猛进的形势下，立宪派在立宪请愿和保路运动中遭到清政府的打击以后，逐渐转到反对清王朝和赞助革命的方面来。国内以汤化龙^①为首的立宪派率先响应了武昌起义，而江浙立宪派首领张謇^②起初反对武昌起义，大叫派兵镇压，但经过一个多月革命风暴的洗礼后，感到共和政体已为大势所趋，终于转到拥护共和方面来。身居海外的梁启超，经过一段努力以后，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武昌起义爆发前，梁启超积极推行早已筹划的推翻载沣统治的

①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清末赴日留学，入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回国后，被举为湖北谘议局副议长、议长。武昌起义后任湖北都督府政事部长。1912年4月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副议长。后参加梁启超的民主党及进步党，拥护袁世凯专制独裁。1918年9月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遇刺身亡。

②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1894年中状元。1899年开办大生纱厂，从1900年起，又相继开办通海垦牧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等企业。又创办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南通学院等多所学校，1911年被学部任为中央教育会会长。1906年拥护清廷预备立宪，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任江苏谘议局议长，成为国内立宪派领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被委为实业总长，但未就职。1912年组织共和党，1913年为进步党理事，拥护袁世凯，任熊希龄内阁之农林、工商总长。至1915年，袁世凯推行帝制，辞职南下，继续兴办实业及教育。

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的宫廷政变计划。早在1908年春，梁启超即派汤觉顿去北京，活动于肃亲王善耆和军谘府军谘使良弼之间，又联络禁卫军统领载涛与海军大臣载洵，试图利用宫廷矛盾，去掉度支大臣载泽、庆亲王奕劻，立开国会，实行立宪，组织新的内阁。把清政府“暂借为过渡，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国势既定，存之废之，无关大计，岂虑其长能为虐哉？”故辛亥夏秋以来，梁启超等人“多布吾党入禁卫军，而外之复抚第六镇（驻保定）之统制吴禄贞^①为我用，一切布置皆略备矣”。但是，武昌起义的爆发，打乱了梁启超宫廷政变的计划，于是他迅速制定应变措施，决心亲自回国指挥战斗，试图利用张绍曾^②的第二十镇、蓝天蔚^③驻奉天（今辽宁）的混成协 and 吴禄贞的军队夹击北京，推倒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立开国会”，对南方革命派采取安抚政策，“运动各督抚暂倡自立，以杀革党之势，声称不接济北军军饷，如是则革党引以为友，无所用其煽动，而北京益危，自不得不俯从吾策”^④，组织以梁启超为首的责

① 吴禄贞（1880—1911），字绶卿，湖北云梦人。1902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在日本期间，受孙中山及梁启超的影响。归国后任武昌武普通学堂教习，曾加入兴中会、日知会，一面支持革命，一面又倾向君主立宪，与革命、立宪两派均有秘密联系。1904年奉调入京，历任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延吉边务帮办、督办。1910年派赴法国、德国考察军务。同年冬回国，调任第六镇统制。武昌起义后，赴滦州约张绍曾等筹组“立宪军”，准备进攻北京，立即实现立宪政治。但为清政府新任内阁总理袁世凯所忌，被暗杀于石家庄。

② 张绍曾（1879—1928），字敬舆，直隶大城（今属河北）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归国后历任北洋督练公所教练处总办，陆军贵胄学堂监督。1911年2月任新军第二十镇统制，武昌起义后，在滦州通电清廷，要求立宪，并与吴禄贞、蓝天蔚等谋联合进兵北京。吴禄贞被刺后，张亦被解职。1913年被袁世凯任为绥远将军。1916年后任北洋政府陆军训练总监、陆军部总长、国务总理等职。1928年被人刺死。

③ 蓝天蔚（1878—1921），字秀豪，湖北黄陂人。早年以湖北武备学生资送日本留学，入士官学校。1903年在东京组织拒俄义勇队，任队长。旋回武昌，任统带官等职，不久考入日本陆军大学。1910年归国后，任陆军第二混成协统领，驻奉天。武昌起义后，与张绍曾等实行“滦州兵谏”。吴禄贞被刺后，张被解职。他赴沪后，任北伐军总司令。南北议和后，出国游历。归国后助护法军政府。1920年任鄂西联军总司令，次年兵败入四川被害。

④ 宣统三年九月八日梁启超《致雷公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341～342页。

任内阁，即达到挽救清廷以实现君主立宪之目的。此即梁所谓“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大方针”^①。

11月6日，梁启超由日本乘天草丸轮船奔向阔别十三载的祖国，9日到大连，10日往旅顺，当夜即乘汽车匆匆抵达奉天郊外，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进入日驻奉天领事馆。当时袁世凯^②虽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但“观望不进”，尚未入都，新内阁未成立，“亲贵互相斗”，北京呈现一片混乱状态。梁启超准备12日赶往北京。在去京途中，先往滦州一行，“拟即往见吴禄贞”，以实现改造北京政府的计划。不料梁启超抵大连后，得知吴禄贞已于6日遇害，大失所望。于是，把“一线希望”寄托在张绍曾、蓝天蔚身上^③。可是，当梁启超抵奉天郊外时，梁在北京的活动分子汤觉顿、罗惇颉急忙专程由北京过奉天来大连，向梁报告张、蓝“滦州兵谏”已于11日失败。13日袁世凯抵京组阁。处处情况对梁不利，他在汤觉顿、熊希龄等人的催促下，不得不慌忙逃回日本。至此，梁启超策划的政变计划彻底破产。

抛弃虚君共和

11月中旬起，独立各省代表集于上海，共商民国政府的筹组。在此同时，康有为、梁启超先后抛出了“虚君共和”的方案。康有为写了《救亡论》，对辛亥革命抱着“惴惴恐惧，惧中国之亡”的心情，对革命进行了攻击，说革命是根本不应该的，它的爆发“一则易煽动于感情也，一则无通达之深识也”，革命会带来动乱、民生惨状和外国干涉，坚持“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只有保存皇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8页。

^②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也作慰廷或慰庭，河南项城人。早年任驻朝鲜通商大臣，后以道员衔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1899年任山东巡抚，残酷镇压义和团，1901年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及练兵处会办大臣。从此扩编北洋军，成为北洋军阀的首领。1909年1月被罢官。武昌起义后任湖广总督，借词拒绝受命。荫昌被召北京，任袁为钦差大臣，指挥水陆各军，旋又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出兵向革命党要挟议和，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一面挟制清帝退位，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务，建立北洋军阀政权。

^③ 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梁启超《与嗣儿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344～345页。

位，建“虚君之共和国”，才是最好的方案^①。当时该文寄至上海，由于其内容诋毁革命，未能发表。梁启超秉承康有为的旨意，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亦推销“虚君共和论”，但其对革命的感情及文章的语调与其师却有很大的区别。梁启超在该文的“序言”中首先肯定了革命的必要性，他说：“十年来之中国，若支破屋于淖泽之上，非大乱后不能大治，此五尺之童所能知也。武汉事起，举国云集响应，此实应于时势之要求，冥契乎全国心理之所同然，是故声气所感，不期而洽乎中外也。”“今者破坏之功，已愈半矣”，“今后新中国之当采共和政体，殆已成为多数之舆论”，但共和政体之种类很多，究竟采用何种政体最适合中国之国情呢？首先，他不同意在中国实行“联邦国体”，更不同意“旧朝使之加入”联邦共和国，“而使旧朝拥片土为普鲁士，谓我国民能承认之乎”，“直幻想耳”。关于政体问题，他列举了美国、法国、瑞士等六种不同的共和政体，并且加以比较分析。他说：第一，人民选举终身大统领之共和政体，实际上是共和专制政体，必然导致君主专制政体，是“最可恶者也”；第二，不置首长之共和政体如瑞士，适于小国，不适于大国；第三，人民共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掌行政实权之共和政体如美国，此“共和政体中之最劣者，只可行诸联邦国，而万不能行诸单一国”，否则，每当竞选总统，“必至于酿乱”；第四，国会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实无责任之共和政体如法国，此制优于美制，因为选举大统领，不用全国投票，纷争之范围较狭，统领无责任故无权力，人不乐争之，故纷扰之程度减；第五，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如英国，此制又优于法制，英王与法总统都居政府与国会之外，但英王不加入政党，法总统借政党之力以得选，常以党见滥用职权，或明或暗，牵制总理大臣，造成政界起伏不定，内阁更替频繁。梁启超最后的结论是，比较起来以英国式的虚君共和制较为“圆妙”，这种制度虽“有一世袭君主”，并无实权，“而政无大小皆自内阁出，内阁则必得国会多数信任于始成立也，国会则由人民公举，代

^①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652～678页。

表国民总意者也，其实际与美、法等国之主权在民者丝毫无异”。君主既无权，似若一木偶，为什么要设此“虚君”呢？他说：最高统治者不用经常竞选，“可以息内争而定民志”。因此，梁启超结论说，以“虚君共和制”最适于中国。然而选谁为此君主呢？他说，现在的皇室“饮鸩以祈速死，甘自取亡”，“始终不寤，直至人心尽去，举国皆敌”，“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旧皇室是不行的。那么从何处去寻找有威望的可以维系人心的皇帝呢？或者把孔子的后裔“衍圣公”请出来，或者“熏穴以求君，则将公爵加二级，即为皇帝”。如果在国内找不到，就仿照比利时、布（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办法，“迎一异国异族之人而立之，但使之宣誓入籍而已”。又说，若清室宣誓立宪，也可以给予虚位。他还认为“京师久为首恶之区”，为了避免旧朝廷之死灰复燃，建议都城南迁，“则民权之确立，庶可期也”^①。

从梁启超提出“虚君共和制”的全部内容来看，其目的在介绍人们选择一种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共和政体，并不坚持保护清室的皇位，它不过是“暂借过渡”而已。他肯定了革命的必要性，不论美国式的共和国或英国式的共和国，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所以说，他是拥护共和政体的，与康有为坚持维护清室统治的“虚君共和”有原则性的区别。虽然如此，梁启超后来也承认了他的“虚君共和论”中有许多“无聊之极思”，“滑稽之谈”^②。梁启超的“虚君共和”主张发表后，遥控国事，曾派人赴上海、北京等地，欲使清室“改中华国，从汉姓”^③，与各方面联络，但未被人们所接受。“革命派方面，因为主张和立场的不同，未能采纳，而袁世凯方面，则别有所图，虚与委蛇。”^④ 原立宪派中也大都主张民主共和，及南北议和成功，“虚君共和”的计划宣告失败^⑤。

① 《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七，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27～46页。

②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58页。

③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364页。

④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349页。

⑤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366页。

拥护民主共和

1912年元月，南京临时政府组成，宣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胜利及清朝封建政府的彻底崩溃，中华民国的五色旗代替了封建帝国的龙旗。这是中国历史千百年来伟大变化，从法律上确定共和制度代替了封建制度。为了维护共和制度，先进的人们浴血奋战，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艰苦斗争。维护还是破坏共和，赞成还是反对共和，成了当时进步与反动的试金石。在这个赞成和反对共和的斗争中，康、梁师徒反目，已无法弥合了。

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康有为在日本箱根听到这个消息后致书梁启超，哀叹“一百日之倒戈，风云惨黥；三百年之王业，宗社忽焉”，“莽莽河山，对新亭而下泪”，“宗国濒危”，“能无哀乎”？“仁人志士，其能忍乎？”要他“联轳骖靳，同拯堕日于虞渊”^①，以挽救清朝之灭亡。康有为的这种“偏僻迂谬，不切时势”之主张，早已遭到立宪派大多数人的反对。当时张浩、梁炳光、冯翼年、何天柱等致书梁启超，反对康有为的主张，要梁“随时势而变迁”赞成共和，若康“不以为然，出其专制之力来相阻格，则各树一帜，各行其是，万不可再屈以求和”^②。因此，梁启超在答复康有为的信中说：“十年以来，人咸思汉；百日之内，运转亡胡”，过去“怀投鼠忌器之忧”已属失策，如今更没有必要“留此虚器”了。他表示不愿为救清室而去与袁世凯和北洋诸将相周旋，更不屑与虎狼狼贪的“满洲妖孽”合作，反而劝康改变态度，拥护共和，“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如其不然，“趋舍异路，怵恨何言”，表示各走各的路，互不干涉，这无异于向康下了一道绝交的最后通牒。从上述康、梁来往的信件来看，他们的政治主张已发生了根本的分歧。民国元年四五月间，梁干脆请康宣布“退隐”。此议康有为虽未接受，但康、梁的分道扬镳，“就从这时开始了”^③。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梁启超很快抛弃了“虚君”的主张，拥护

① 《辛亥腊游箱根与梁任甫书》（1912年2月），见《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695～697页。

② 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张浩、梁炳光、冯翼年、何天柱《致孟远先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370～371页。

③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384页。

民主共和政体。他能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进步，是十分可贵的。3月，临时总统孙中山于南京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梁启超眼见他所追求的立宪政治已经实现，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之意义，“易数千年之帝制以共和，其造端之宏大，非一姓兴亡所能拟也”^①。4月，他发表《中国立国大方针》，肯定了前清时所说“欲行政治革命，而不先以种族革命”是不行的，明确宣布拥护共和，并批判了“共和之祸，烈于洪水猛兽”的消极悲观论和共和告成可“晏坐以待黄金世界之涌现”的盲目乐观论，主张在共和实践中“输进国民政治常识”，“引起国民政治兴趣”，“激励人民政治道德”，实行政党政治，建设责任内阁，把政治革命进行到底，革除封建“僵死之信条”，以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将“国民打成一丸，以竞于外”，建设一个在国际上“占一位置”^②的国家。梁启超因与康有为决裂，明确表明拥护共和制度，受到包括革命派在内的各方面的欢迎。1912年11月他从日本回国，21日在袁世凯的军警保护下进入北京。梁启超归国后，又多次发表演说，称颂共和国体是“神圣高尚”的，“故在今日，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自理论上必然之结果”^③。

时代潮流的发展，促成梁启超最终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有了宪政思想这一基础，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梁启超放弃了君主立宪，接受了民主共和制，完全符合他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从此，他也不再是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不再是史家所称的“立宪派”，而是原立宪派，说得更确切些，是民主共和的积极捍卫者。

三、投奔袁世凯

弃嫌相携

在清朝即将灭亡之际，袁世凯东山再起，随着清帝的逊位和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以袁记封建势力代替了清记封建势力，辛亥革命失败了。

① 《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89页。

② 《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八，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9~78页。

③ 《初归国演说辞》，见《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5页。

然而，袁世凯窃取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是在“拥护”共和的面纱下进行的，其目的在复辟封建专制制度。可是，当时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都没有认清他的真面目，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人，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都试图在袁世凯的领导下，利用政党政治，组织责任内阁，以左右天下。这样，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三四年间，出现了异常激烈、尖锐、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在专制与反专制、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内部的两党即革命派国民党与原立宪派进步党之间又充满了党派之间的搏斗。在这个斗争中，梁启超投奔袁世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关系，也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既有反对独裁和坚持专制的矛盾，又有反对民主革命派的某些共同之处。他们之间时而激烈搏斗，时而握手言欢。他们之间的相互斗争和相互利用，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阶级关系变化的一个侧面。

袁世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叛卖，使梁、袁之间挟嫌颇深。1907年，袁世凯在北洋派的势力壮大，又在天津推行宪政，梁感到袁“为今日重要人物，将来必须提携者”，准备与袁和解，并求其资助政闻社^①。袁不仅不予相助，反而向慈禧面控政闻社系梁启超等人发起。清廷即以政闻社“内多悖逆要犯”“阴谋煽乱”为名，于8月13日勒令解散。因此，梁对袁恨之入骨，急谋抵制。适光绪与慈禧先后死去，载沣上台，且光绪死因不明，康、梁乘此“四处飞电告变，谓实出于袁氏之毒死”^②，并离间载沣与袁世凯的关系，全力攻袁。当1909年初载沣将袁革职后，梁拍手称快，亲自上书摄政王，又致函善耆、载泽，列举袁“包藏祸心，离间宫廷”，“植党营私，招权纳贿”等罪状，建议清政府将袁“加以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③。

① 梁启超《致蒋观云、徐佛苏两先生书》（光绪三十三年春），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241页。

② 去非：《袁世凯之落职与保皇派之谣言》，载新加坡《中兴日报》，1909年1月7日。

③ 《任公先生致某君》，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291～294页。

武昌起义爆发后，梁、袁在北方争先控制北京政权的斗争中，袁抢先入都，成为梁前进路上的一大“魔障”，梁、袁怨恨更深。但清廷被推翻，革命派势力大盛，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要借助高涨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派的力量压迫袁世凯开放政权；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立宪派具有更浓的封建性，在革命高潮时期，它要寻找新的依靠来压制革命派的势力。梁企图站在二者之间，左右逢源，争夺内阁实权，妄想与封建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建立联合的资产阶级立宪政权。而袁世凯则要靠和利用原立宪派，实现自己独裁专制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梁、袁矛盾迅速下降，经过一年多的疏通与讨价还价，终于弃嫌相携，结成相互利用的暂时联合。

筹组大党

1911年底，当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并表示“赞成”共和以后，原立宪派张浩等人即建议梁启超“必须早与本初携手，方能达到目的”^①。将来筹组大党，“必以项城为中枢，吾辈亦不能不挾引此公以弥补各种之危机”^②。而袁世凯东山再起，“奇窘万状”，希望梁启超能帮他“收罗人才，挽回舆论”，“整理财政”，给他以内阁“副大臣”之职，如“副大臣不愿，则以大臣与之”^③，又月俸三千^④。在袁世凯频频招手及利禄引诱下，梁启超感到投袁将大有作为，于是欣然担当筹组大党的任务，以与国民党争高低。早在他回国之前，他就与汤化龙、林长民^⑤等于1912年8月组成民主党。

① 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张浩、梁炳光、冯翼年、何天柱《致孟远先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370~371页。

② 宣统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徐佛苏《致任公、荷广两先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370页。

③ 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蓝公武《致南海、任公两先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357页。

④ 民国元年十月十八日梁启超《与瀚儿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07页。

⑤ 林长民（1876—1925），字宗孟，福建闽侯人。立宪派，辛亥革命前任福建谘议局书记长，积极参与立宪请愿运动，宪友会福建支部负责人之一。辛亥革命时，在福建响应起义，任福建都督府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被黄兴任命为陆军部秘书。民主党人，以后参加进步党。

1913年，国内固有的阶级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伏火四延”。以白朗为首的农民起义军高举打倒袁世凯军阀的旗帜，转战中原，直接威胁袁世凯的统治。昔日的宗社党成员张勋^①、升允^②以及康有为等人图谋宣统复辟，又从右面攻击袁世凯。财政危机、边疆危机严重，并且帝国主义对其政权尚不予正式承认。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虽然交出了政权，但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多数的392席，直接威胁袁世凯。他为了缓和危机，既要出卖主权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贷款，又要通过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以便帝国主义承认他的走狗地位。因此，袁世凯急需梁启超筹组一个大党以供他利用，并解除国民党的威胁。

当时，由于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只得到24个席位，梁启超极为悲观，“吾党败矣！吾心力俱瘁，无如此社会何，吾甚悔吾归也”，准备退隐不干了^③。袁世凯“闻此仓皇失色”，派数十人到天津哀求^④，又答应大党组成后，给予二十万。而梁启超要价更高，“然吾非五十万不办”^⑤。但是，梁启超并不是真心退隐，只是为了激发党人的团结和向袁索取更高的代价。政治斗争的风浪把他推到了前台，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活动家，他也不会退隐。他说：“然势相迫不能休，真有风刮不得泊之感也”，“生为今日之中国人，

① 张勋（1854—1923），字绍轩，也作少轩，江西奉新人。行伍出身，投靠袁世凯，派充新建陆军营统带，后为行营中军。历充副将、总兵等职。1911年升任江南提督，驻守南京。武昌起义后，顽固对抗革命。后败退至兖州一带，所部禁剪辫子，以示效忠清朝，被称为“辫子军”。1913年“二次革命”时，他奉袁世凯之命进攻江苏讨袁军，重占南京，纵兵抢掠，无所不为。后调任长江巡阅使驻徐州。支持清室复辟。

② 升允（1858—1931），字吉甫，蒙古镶蓝旗人。举人出身。清末历任山西及陕西布政使、江西巡抚、陕甘总督。宣统元年，因反对立宪被革职。武昌起义爆发后，任陕西巡抚。1912年起，反对清帝退位，并起兵欲攻长安，企图迎溥仪建立偏安西北的小朝廷。后因清帝退位，才匆匆西退。以后累欲勤王复辟，均失败。

③ 民国二年四月十八日梁启超《与娴儿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18页。

④ 民国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梁启超《与娴儿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18页。

⑤ 民国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梁启超《致梁思顺》，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12页。

安得有泰适之望；如我者更无所逃避矣”^①。不久，在一些人的“劝进”下，在所谓内界外界之相逼下，他于2月列名以黎元洪^②、张謇、程德全^③为首的共和党，经过数月的酝酿，又将民主、统一^④、共和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于1913年5月29日成立于北京。进步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⑤、那彦图、孙武^⑥、汤化龙、蒲殿俊^⑦等为理事。梁启超成为进步党的实际领导人。《进步党宣言书》宣称，它成立的目的是由于“人民公行暴乱，其势力勃兴，广被而莫敢抗”，“危急存亡，千钧一发”，系中华五

① 民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梁启超《与娴儿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19页。

②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在湖北训练新军，由管带、统带擢升为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武昌起义后被革命党迫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称帝后，封他为武义亲王，未接受。袁世凯死后，他继任大总统，主张维持旧约法，被段祺瑞驱走。1922年复任总统，次年被直系排走，避居天津。

③ 程德全（1860—1930），字雪楼，四川云阳人。清末历任黑龙江、奉天巡抚，1910年调江苏巡抚。1911年11月上海光复后，与立宪派在苏州宣布独立，称江苏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内务总长，后任江苏都督，与张謇等先后组织统一党、共和党。又任进步党名誉理事，1913年抗拒讨袁，从此在上海闭门隐居。

④ 统一党，1912年1月由中华民国联合会与预备立宪公会等立宪团体合并而成，以章炳麟、张謇、汤寿潜、熊希龄为理事。

⑤ 伍廷芳（1842—1922），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曾留学英国伦敦，学法律，后入李鸿章幕府，协助办理洋务。清政府特命他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古巴大臣，又历充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等职。武昌起义时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上海光复后，被南方光复各省推为临时外交代表，驻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司法总长，1916年任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后参与孙中山护法，任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等职。

⑥ 孙武（1879—1939），原名葆仁，字尧卿，号梦飞，湖北夏口（治今汉口）人。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历任湖南新军教练官等职，在湖北组织共进会。1911年加入同盟会，策划革命，1911年共进会与文学社合并，在武汉部署新军起义，被举为参谋长。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军政府成立，任军务部长。1912年1月组织民社，与同盟会分离，拥护黎元洪。进步党党员。晚年寄寓京沪间，不问政治。

⑦ 蒲殿俊（1875—1935），字伯英，四川广安人。光绪进士，留学日本。1909年任四川谘议局议长，创办《蜀报》，鼓吹君主立宪，坚持立即召开国会。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武昌起义后，自任都督。1913年任进步党理事，与梁启超关系密切。袁世凯死后，曾任段祺瑞内阁内务次长四个月，即被排斥下台。曾任北京《晨报》社社长。

千年来所未有，决“不能袖手旁观”，要“去亡而之存”，作国家的中坚，“一新壁垒而作天下之气”，“制多数于国会”，以防“横流之祸”，把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革命派。

攻击“二次革命”

进步党是在袁世凯的政治危机中筹建起来的。国民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多数的席位后，宋教仁^①遍游长江中下游各省，到处演说，批评时政，准备以国会多数席位政党的身份组织责任内阁^②。袁世凯曾企图以重金收买宋教仁，也愿借重他担任内阁总理，但条件是要他放弃责任内阁制。宋教仁拒绝了这个无理的要求，于是，袁世凯采取卑鄙手段，派武士英在上海火车站开枪刺杀宋教仁。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含恨死去。“宋案”是民国成立以来震动全国的一次政治谋杀案，袁世凯不得不命令江苏地方政府查明主犯，而“穷究”主犯的结果，其幕后策划者正是袁世凯，一时全国舆论大哗，南方报刊纷纷揭露袁世凯阴谋颠覆共和制度的罪行。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在味莼园举行宋教仁追悼大会，与会者四万人，愤怒痛斥反动残暴的“官僚派”。“宋案”发生后不久，袁世凯不惜将中国盐税征收权出卖给外国，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借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

本来，梁启超认为宋教仁“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规复之损失”，斥责“暗杀者如驯狐如鬼蜮，

① 宋教仁（1882—1913），字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华兴会发起人之一。留学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同盟会创始人之一，任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等职，积极领导革命运动。1911年7月与谭人凤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同时被推为同盟会干事。1912年8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任理事，后代理理事长，努力追求议会政治。

② 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宣布参议院议决《临时约法》规定行责任内阁制。《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须得参议院之同意”，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内阁对议会负责，总统不能直接解散议会。《临时约法》还规定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结社等各种自由权利，由参议院立法，法官独立审判等。

乘人不备而逞其凶，壮夫耻之”^①，同时认为善后大借款合同丧失主权，“为有史以来所未闻之奇耻大辱”。但是，他为了讨好袁世凯，换取进步党组织内阁的机会，力主“宋案由法庭解决”，对大借款也只是“监督借款用途”而已，并提出先定宪法，后举袁世凯为总统^②。

袁世凯获得大借款以后，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孙中山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从日本回国，力主武装讨袁，但因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未能及时发动。1913年6月，袁世凯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③、安徽都督柏文蔚^④、广东都督胡汉民^⑤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是不服从中央，下令免职，并派兵南下，进驻江西，发动内战。国民党人被迫起兵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发出讨袁檄文。接着国民党人在南京、上海、湖南、四川等地响应，发动“二次革命”。但因国民党缺乏明确的纲领，内部涣散，“二次革命”失败。“二次革命”是革命党人为保卫民主共和、反对袁世凯专制政治而发动的，而梁启超乘此机会发表文章，既图排除“莠民社会之暴动的势力”，又欲革除“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⑥，一方面攻击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

① 《暗杀之罪恶》，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7～10页。

② 《民权报》，1913年6月19日。

③ 李烈钧（1882—1946），原名烈训，字侠如，号侠黄，江西武宁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同盟会员。1910年毕业归国，任江西新军管带，宣传革命，事泄赴云南。先后任讲武堂教官、陆军小学堂总办。辛亥革命时在九江宣布独立，被推为安徽都督。次年任江西都督。“二次革命”中积极反袁，失败后逃往日本、新加坡。

④ 柏文蔚（1876—1945），字烈武，安徽寿州人。1899年考入安徽大学堂，次年投入武备学堂练军充学兵。1904年应赵声之召，任南洋第九镇三十三标二营队官，随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出任安徽都督，1913年6月被袁世凯免职。

⑤ 胡汉民（1879—1936），原名衍鸿，字展堂，广东番禺人。清末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加入同盟会，任南方支部支部长。辛亥革命时被推为广东都督，旋即随孙中山去南京，任总统府秘书长。袁世凯窃权后，胡回广州，复任广东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免职。以后历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及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立法院院长等职。

⑥ 《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8页。

是“破坏”行为，是“头脑简单、办事盲动”的幼稚行为^①，另一方面又说“二次革命”之爆发是由于“白昼杀人”，“庸才”治世带来的必然结果^②。梁启超还认为，当时面临“暴乱派”与“腐败派”两个敌人，“欲同时战胜两个敌人，实为吾力之所不能逮，于是不得不急其所急”，“暂时稍为假借”腐败派以敌暴乱派^③，然后团结国民党中之温和派以对付腐败派^④。因此，在一个时期内，梁启超使尽政治家之手腕，极力讨好袁世凯，为袁世凯设计一个略施民主的“开明专制”方案。当时，袁世凯也并非不知道梁启超之策略，他在利用梁启超和进步党人为其效劳的同时，对梁启超又加以限制，遂于7月31日任命立宪派中颇具阴谋权术而又在热河盗宝案中涉嫌的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龄出来组阁。同时，袁又下令国民党三日内宣布将黄兴、陈其美、柏文蔚、李烈钧等除名。熊希龄于8月26日入京就职，27日又有国民党八议员被捕之事。至此，国民党在议会内外的优势被打破。

四、“人才内阁”的下场

妄图左右天下

梁启超以为改组内阁非我莫属，“非进步党国家无以保存”^⑤。袁世凯却只要进步党出来充当为他摇旗呐喊的配角。这样，梁、袁之间，即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地主买办阶级之间在分享政权问题上

① 《说幼稚》，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45页。

② 《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51页。

③ 《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8~27页。

④ 1913年4月14日在共和党参众两院议员大会上作《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的演说。梁谓为了在国会中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对于主义相远之党宜取协商态度”，假如“共和国民两党，惟相对抗，而绝无协商之余地，则在国会两院中，终无道以解决此诸大问题”。“国民党中固不乏爱国识大体之人，其所持论，当不致与本党绝对不相容。本党于其必须坚持者自当坚持，于其可以交让者亦宜交让。如是，然后可以先国后党之诚意，可以风示天下也。”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23页。

⑤ 梁启超：《在进步党特别大会上的讲话》（1913年6月14日），载《民立报》，1913年6月21日。

发生了矛盾。

袁世凯任命熊希龄^①为内阁总理后，随即提出自己的一份内阁名单，由袁世凯的亲信掌握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大权，只给进步党以司法、教育、农工商三个闲职。与此相反，进步党则要求组成由他们掌握要职的内阁。梁启超甚至想要进步党的名誉理事蔡锷入阁掌军事，企图打破袁世凯的限制，遭到袁世凯的坚决反对。梁本人原想就任内阁总理或退就财政总长，而袁却认为梁乃一书生，“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②，只肯把梁放在无关大局的教育总长闲职上。梁坚辞不就，几使内阁筹组破产。但是，此时此刻的袁世凯尚未拼成自己的御用党，还必须利用现成的工具，不得不作些无关大局的让步，于是让熊希龄兼财政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梁启超、汤化龙等进步党人认为，虽未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梁任司法总长“虽属闲曹”，但机会难得，弃之可惜，终于接受了司法总长的位置。

因为进步党人担任总理，并占有财政、教育（汪大燮）、司法、农工商（张謇）四席，这个内阁称为“进步党内阁”。同时，梁启超、张謇等人又自誉为“第一流人才”，当时，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周学熙等人为了恭维与嘲弄他们，赠了一个“人才内阁”的徽号。其实，“第一流人才内阁”是以进步党为名，北洋军阀实际控制了内政、外交及军事大权。“人才内阁”的组成，并未满足梁启超妄图“左右天下”的欲望。

没有实权的“人才内阁”

“第一流人才内阁”组成后，在梁启超的具体筹划下，制定了内阁大政方针，宣布对外“爱重和平”，“开诚布公以敦睦谊”，“以和平之精神行之，以期速结悬案”，“尊重主权”。在财政方面，其治标之策为发行内债，“澄吏治，核名实”，减汰军费，“求勿以外债充经常政费”；其治本之策为“略参以国家社会主义，添设新

^①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光绪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参加戊戌变法被革职。后得端方援引，充当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参赞，又调奉天盐运使。辛亥革命后，拥护袁世凯窃国，任财政总长和热河都统。进步党名誉理事，并出任国务总理，组织“人才内阁”。1928年任蒋介石政府财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

^② 《梁任公之入阁问题》，载《时报》，1913年9月8日。

税”，以求增加收入，发行银元，整理币制及金融。在军政方面，主张“减政”、“裁兵”，实行“军政民政”分治，考试授官，以杜幸进。在实业交通方面，实行“保护主义”及“开放主义”并举，“外商投资于我境内，所生之利，彼得其三四，而我恒得其六七”，特别要“指导奖励”私人农工商之发展。在内治方面，按立宪国之要求，实行司法独立，“整饬纪纲，使人人遵纪守法”，“养成法治国家”^①。从这个《大政方针宣言书》的内容来看，梁启超等人试图建立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上层参与政权的立宪政治，而袁世凯却决心复辟封建法西斯专政，一点民主不给，半点民主也不给。梁启超视内阁方针为生命，袁世凯却把进步党的生命当儿戏。熊希龄内阁组成后，梁启超感到力量不足，回过头来又拉拢国民党妥协分子，“互相提携”，企图利用议会控制袁世凯，实现他们的内阁方针。袁世凯对梁启超不放心由来已久，见进步党组成后，梁启超其势汹汹，“袁因窃知梁之野心，于心不喜”^②。目前，他要变临时总统为正式总统，演总统为皇帝的戏法，目睹进步党“恐将不便于己之政策，乃嘱其秘书长梁士诒组织公民党以便压抑之”。于是公民党于1913年9月8日成立，袁世凯有了御用打手。梁、袁斗争的结果，是没有实权的“人才”被袁世凯压得步步退让。

在退让中被踢开

公民党成立后，立即威协议会“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本来，在当时国会中，先定宪法后举总统的意见占优势。进步党不仅在6月15日的会议中作出过这类决议，而且9月上旬熊希龄在与外国记者的谈话中又宣言：“与其先订总统选举法而后订宪法，无宁先订宪法而后订选举法，盖以宪法为选举法根本之所在也。”^③可是，袁世凯却迫不及待，急于要做一个没有宪法的总统。经过公民党的短期活动及公民请愿团的威胁，梁启超等人为了讨好袁世凯，也就迅速妥协低头。于是，法律的秩序被颠倒过来，先选总

① 进步党《大政方针宣言书》，见《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09～124页。

② 《袁政府乱国志》，载《民权报》，1913年6月29日。

③ 《熊总理与外报记者之谈话》，载《民立报》，1913年9月8日。

统，后定宪法。

“人才内阁”在政纲中宣称，要以“和平之精神”“速结悬案”，以求国家之“独立”。进步党能有多大的能耐求得国家之独立呢？在总统选举的前一天，1913年10月15日，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承认和支持，与日本政府秘密交换了一个照会，承认日本修筑“满蒙五路”的要求及其苛刻条件。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为袁世凯拟定了一个“对外宣言”的底稿，要求袁世凯在10月10日宣誓就职大总统时公开发表，要袁保证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保证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日本提出这个宣言的底稿后，内阁总理熊希龄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很快给予圆满答复，声称总统就职时，愿意按照这个宣言发表公开演说。进步党“人才内阁”在对外关系上也不得不屈从袁世凯的意志。

梁启超在议会及共和政治处处碰壁的情况下，又放弃内阁制退而主张总统制或开明专制。他又重弹目前人民程度不够，不宜行共和政治的老调，建议实行开明专制以为之过渡。他说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开明专制则是可贵的，这样，可以“整齐严肃于内”，亦可“竞胜于外”，从开明专制再过渡到民主立宪。梁启超试图通过这种理论来讨好袁世凯，望袁世凯步拿破仑^①之后，求得国家之富强，然后进入“完全粹美之宪政”时代^②。因此，梁启超在《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提案中，把国会中的许多重大权力，都给予拟议中新设的总统御用机构“总统顾问院”，规定经过所谓顾问院的同意，得以解散国会两院或一院，可以随意任免官吏及国务总理^③。这是总统制或开明专制的具体方案。但是，袁世凯并不以此为满足，当他被选为总统以后，再也不需要什么政党、国会、宪法

①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著名的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1796年统兵击溃反法同盟意大利、奥地利等。1799年发动政变上台执政。1804年称帝。强化中央集权，镇压王党复辟，并颁布《拿破仑法典》，将法国大革命成果民主、自由、平等、私有制及自由买卖原则用法律形式巩固下来，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促进经济大发展，受到法国人民拥护。1812年因对外战争失败加速帝国崩溃。1821年病死。

② 《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9～45页。

③ 《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59～82页。

和顾问院了，统统一脚踢开。于是，他借口国会“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竟于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随即以政治会议代替两院议会，又弄出一个约法会议等虚伪骗人的东西，说什么行将产生新的国会。正当进步党“对此不胜为国家庆幸”，希望政府从此“刷新”政治，“振衰扶微”的时候，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竟于1914年2月初公布热河盗宝案，使曾任热河都统的熊希龄一时难以自处，把“第一流人才内阁”赶下了台。

进步党遭镇压

当然，进步党人对袁世凯亦不无攻击之处。1913年6月，进步党议案以质问赵秉钧为由，质问当局执政以来之问题：（一）“未尝从事于整理财政，惟一以借外债为挹注之方”，“以致人民负担日重，国家将至破产”；（二）“政府外交着着失败”，将遣往蒙古之兵“移驻南方，以致俄人得乘机生出种种无理要求”；（三）军队如林，政府“日日扬言解散，即日日增募新兵”；（四）“干涉报馆，压制言论”。“五国借款及奥国借款，实为违法之最甚者，尤无可恕余地云云。”^①而梁启超本人也指责当时上流社会之人，所谓国家之中坚者，“其人格之卑污下贱，则举国无出此辈之右”，“以最下流之人当一国之中坚”^②，其国家之不兴，当可想而知。袁世凯在遭到进步党及梁启超的种种指责之后，怀恨在心，深知进步党为他实现个人野心之一大障碍。当“人才内阁”被踢开以后，他接着又对进步党要人及各地支部进行清洗和镇压。如1914年6月，政事研究社陈尚朴写信给段祺瑞，揭露前国务秘书长进步党人陈汉第“本属神奸，素多鬼蜮”，且更“族其同党陆军少将陈毅（现改名仪）持南北畛域之谈，游说鄂浙两省军官，欲使激起恶感，联电抗争”，“事虽不成，心犹不死，望段对此人加以消弭”^③。同时，江西赣南镇守使李廷玉诬指进步党各支部为“乱党机关”，下令密拿赣宁等府24县进步党分部^④，对进步党实行镇压。

① 《民权报》，1913年6月29日。

② 《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44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字“机关代号—00—（2）35”。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字“机关代号—00—（2）981”。

五、宪政破产

矢志追求宪政

在风云变幻的清末民初，梁启超时而激昂慷慨盛倡革命，时而摩拳擦掌反对“暴乱”，其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①。但他追求立宪政治的宗旨始终没有变。他认为立宪政治是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在为中国实行立宪政治而呐喊而奔忙而奋斗。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他投靠袁世凯，就是妄图利用袁世凯的实力统治中国，实现立宪政治。梁启超曾说：“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②他的这种思想是符合实际的。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梁启超首先关心宪法起草机构之设置问题。他认为“制定宪法，为民国建设第一大业”，应该仿照美国设立专门机构进行起草，其人员之组成，建议由大总统副总统指定三人，由参议院在本院选举三或五人，各省荐选每省二人，各大政党每党选一人，约以四五十名委员组成“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这样代表较为广泛，其中又有专门学识专门技术之人参加，可以集思广益，在短期内制定出宪法，备国会尽快讨论通过，早日选出正式大总统，以便友邦承认^③。

在清末的立宪请愿运动中，梁启超即为实现责任内阁而奋斗。民国元年，他在《中国立国大方针》中又详尽地论述了“政党内阁”的优越性，并介绍了英国式的政党内阁为“政党政治之极轨”。非国会议员，不能为内阁阁员；内阁必由国会下院多数党之领袖组织之；内阁失多数于下院，得解散下院，但再选举若仍失多数，则例即辞职。他说，政党内阁有许多优点，内阁由国会之多数党组成，可代表全国过半数之民意；议员任期一定，内阁如有失政，则改选之时，政府党势力必坠，而受多数人民拥护之政党上台，故政

① 王寅十月“原序”，见《饮冰室文集》卷首，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

② 《护国之役回顾谈》，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88页。

③ 《专设宪法起草机关议》，见《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八，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27~30页。

权可操在多数国民之手；政党内阁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两党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可以不断增进国利民福等，“故政党内阁者，民权之极轨也”。他说“种族革命，不过为政治革命之一手段”，只有实现了政党内阁，才是理想的共和政治。他号召大家不要“放弃责任”，尽心尽力地担负起“中国建设事业”之责任，“毋谓力单，滴滴可以穿石，毋谓途远，微禽可以填海”^①，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共和政治一定能够实现。

袁世凯执政后，政府机关中“惟狡黠私曲乃能生存，而奇才异能终无至表见”。国民痛苦万状不能一日安于此等政治状态之下，必然会再度发生革命。梁启超认为，“人民惟厌晚清政治之腐败，乃共缔造此民国而托诸政府诸公之手，诸公亦即受任不辞”，而今日政令不出国门，政府诸公应负主要责任^②。当时，另一部分人认为，政象之乱主要是由共和政治带来的，因而认为治大国必用专制，要求恢复旧制度。梁启超则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旧制度是不可能的，他说：“旧制度为旧社会之产物，旧社会有固有之要素，故能产彼制度而维系之，使适于用。今此种要素，或已亡失，或已减杀，其维系固有制度之力，或已消灭，或虽未消灭而已甚薄弱，今后试验复旧之困衡，与前此试验作新之困衡正相等。”^③梁启超在驳斥那种“谓人民程度幼稚，不能运用共和政体”，只能行君主立宪制的谬论后说，如果认为人民程度不够，“以不能运用共和制之人民”，亦不能运用君主立宪制。他也认为目前真正懂得共和制的人的确不多，但是可以设法增进人民之程度。他说，为政在人，“善谋国者，外揆时势，内审国情，而求建设一与己国现实最适之政体，所谓不朽之盛业，于是乎在焉”。只要制定一部完善的宪法，就可以巩固国基。然后依据宪法之精神，使国人“导政治习惯于轨道”。

① 《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八，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63~78页。

② 《政府与政治机关》，见《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八，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21~25页。

③ 《述归国后一年来所感》，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一，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25页。

依据什么原则来制定宪法呢？梁启超认为根据我国当时的情况应采取下列之精神：第一，“国权与民权调和”，稍偏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发达。极端的民权主义只是一种空想，是不可能的。第二，“立法权与行政权之调和”，如行政权过重，则立宪难以成立，健全之政党亦不可得见；如立法部之权过重，致使政府交迭频繁，政治家动怀偷安容悦之思。第三，“中央权与地方权调和”^①。

梁启超任“人才内阁”司法总长以后，上书袁世凯谈司法问题，要求袁按照《临时约法》的精神，确保司法独立，“在使审判之际，专凭法律为准绳，不受他力之牵制”，对外废弃领事裁判权，企图建立一个模范的法治国^②。民国成立以后，许多省、县都成立了新法院，但由于初办，弊病自不能免。如法官，“朝出学校，暮为法官，学理既未深明，经验尤非宏富，故论事多无常识，判决每缺公平”，“服官本籍，接近乡邻，法律有所难施，亲故因而请托，里胥讼师，朋比为奸，法庭莫保尊严，官吏日隳威信”。又如法律不符实际，“违反本国习俗”，或无确定之准则，“法规不善”^③。袁世凯抓住这些缺点，“遂貽旧派人口实”，攻击新法院，“欲尽废新立法院，恢复旧制”。梁启超反对废除新法院^④，建议用改革方法，改善法院。梁认为国之所以立者在法，而法之所以行者在人，苟不得人，无论如何良法，而弊未有不随其后者。关键在用人，要求进行司法改革。其改革方案为：“（一）励行考试，以杜幸进。（二）严定考绩，以汰不职。（三）回避本籍，以免瞻徇。（四）约束律师，以防朋比。（五）委任县知事兼理司法，以期变通宜民。（六）速行编布各种司法法规，以期完善适用。”袁世凯虽然不同意这个司法独立的方案，仍于1913年12月28日予以批准，“命令鉴

① 《宪法之三大精神》，见《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93~102页。

② 《任公对于司法之政见》，载民国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申报》，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32页。

③ 《呈总统文司法问题》，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一，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21~23页。

④ 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余绍宋《致丁在君先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32页。

准施行”^①。同时，梁还主张普及法律知识，将法律的内容、诉讼程序印成通俗简明的布告，在城厢乡集到处张贴，每月一次，使人民易从，识法守法。梁启超依照上述各项进行司法改革，在司法次长江翔云的协助下，将各省筹备处及审核所裁并，任命了一些地方法官，制定了“捕盗专律”等。梁认为，如此改革次第施行，数年之内，惟日孜孜，社会不加摧残，政治必趋正轨。

梁启超入阁以后，颇有一番改革的雄心，“排日到总统府、国务院、司法部三处，日接客数十，夜则拟法案”^②，筹划废省及财政、司法之改革等。妄想使政象有所好转，“若改革之后，疾苦将一如畴昔，国家将何辞以谢吾民者。甚则改制之后，而疾苦反加畴昔，国家将何辞以谢吾民者”^③。梁启超忙碌奔波，一心为实现立宪政治而奋斗。

希望再次破灭

梁启超追求宪法、国会、责任内阁及司法独立，反对专制，而袁世凯却对梁启超拟定的一些条文不感兴趣，认为梁只会舞文弄墨，系一介书生，不仅不予重视，反而对梁之言行公开拆台。且进步党内部有人对“人才内阁”及梁启超附从袁世凯打击国民党极为不满，对梁启超提出尖锐批评与质问。袁世凯被举为大总统后不久，1913年11月4日，经熊希龄内阁加以副署，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该党之国会议员。这是消灭国会的第一步。当国民党被解散后，全国舆论颇多归罪于梁启超，进步党议员刘伟写信给梁启超，指出他“入佐国务，以救亡为大政方针”，实“争权而攘利，图私而害公”，是使国家“致亡速亡”的主要根源。刘伟亦以国民党为政敌，但认为“其中岂乏忠愤瑰玮之人”，提醒梁启超“螳螂捕蝉，尚有黄雀在后”，要他不必“甘为竖子之孤注”^④，不要再为袁世凯卖命。梁虽有同感，但责有攸归，有苦难言，有口莫辩。自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87页。

② 民国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27页。

③ 《令京外各级审判所》，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一，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9页。

④ 民国二年十二月七日刘伟《致任公先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21~422页。

从11月15日袁世凯逼令国会停会以后，梁启超深感“司法独立之运命危若累卵”^①。12月初，袁世凯操纵成立的政治会议“反对司法制度最烈”，梁启超“防其肆志破坏”，“往与辩论，不知费多少唇舌，终以其口众我寡，未能贯彻主张”^②，“各省几至全然办不动”^③，司法改革宣告失败。1914年2月12日，袁世凯准熊希龄内阁辞免本官后，18日梁启超以“一介书生，未谙从政”为由坚决辞去司法总长职务。

此后，袁世凯为了安抚进步党人，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后又为参议院参政，这都是一些有职无权的空头衔。严酷的现实告诉梁启超，尽管进步党为袁世凯出了不少力，但在袁的独裁专制下，他的宪政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对此，梁启超也有所认识。早在1913年3月，梁在写给他女儿的信中就多次流露，“在此日与妖魔周旋，此何可耐”，“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运动皆如击空也”，“吾性质与现社会不相容，愈入愈觉其苦处”^④。1915年初，他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中，总结两年来他依附袁世凯的情况说：“其间不自揣，亦颇有所规划，思效铅刀之一割。然大半与现在之情形相阂。稍入其中，而知吾之所主张，在今日万难贯彻。而反乎此者，又恒觉与心有所未安。”既然依附袁世凯不能贯彻自己的理想，且袁世凯专制复辟之淫威日益逼人，他深知“将来之奇剧难于同演”^⑤，于是干脆宣布脱离政治，“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⑥。

① 民国二年十二月七日梁启超《致江西检察所所长潘学海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33页。

② 民国十八年余绍宋《致丁在君先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32~433页。

③ 《梁任公辞职后之谈话会》，载民国三年三月一日《津报》，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30页。

④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15~416页。

⑤ 民国三年陈叔通《致任公先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35页。

⑥ 《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三，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52~53页。

第二章 揭开反帝制序幕

一、反对“二十一条”

政治质问案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了临时总统、正式总统，解散国会，废弃责任内阁，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大权。可是，这些都没有满足他的野心，他竟然利令智昏地违背历史潮流，做起复辟皇帝的美梦来。正当他着手实行帝制计划的时候，1914年7月28日，奥国对塞尔维亚宣战，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各国重新瓜分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乘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妄想实现独占中国的狂妄野心。袁世凯看到欧洲列强在华势力相对减弱，最有力量的是日本，只有取得日本的支持才能进行复辟帝制活动，因此对日本的侵略一味容忍、妥协、退让，不惜出卖主权，以致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上海、沈阳、汉口、北京、厦门、福州等城市及海外华侨一致反对，掀起了巨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袁世凯出卖主权的爱国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先锋、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亦挺身而出，与日本帝国主义及袁世凯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在华掀起了强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1898年3月，德国强租胶州湾并以山东为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加入英、法、俄一方，也向德、奥宣战。1914年8月3日，袁世凯政府外交部曾通告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及英、法、俄、德、日等租借地交战，宣布对欧战中立，不久，又分别向日、美询问，盼共同劝告交战国限制战区，勿及远

东。8月8日，日本拒绝中国限制战区之建议，并欲进攻青岛。8月9日，外交部次长曹汝霖^①告日本方面代使小幡西吉，如日本对中国“亡命日本乱党断然处置”，使退离日本，愿以许可日军登陆青岛为交换条件。日本政府则答应如中国发生内乱，愿助中国平定。日本政府在得到袁世凯的默契后，8月15日，以“日英同盟”及“确保东亚和平”为借口，向德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完全解除武装，胶州湾租借地限于9月15日以前无条件地交与日本，以便将来交还中国。9月2日，日军即在中国山东半岛北部的龙口及莱州之间登陆，向德国侵占下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进兵，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袁世凯政府宣布“局外中立”，划定潍县以东的地区为交战区。9月23日，英军在崂山登陆，助日军进攻青岛。9月25日，日军占领潍县车站后继续西进，不久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全线。当时，梁启超和蔡锷几次去见袁世凯，要求中国派兵对青岛德军作战，收回胶州湾。可是袁世凯始终不肯采纳^②。

1914年10月2日，由议长黎元洪主持参议院代行立法院第十五次会议，梁启超经蔡锷、徐绍桢、赵惟熙、王揖唐^③等附议，在会上就日本侵占山东问题激昂慷慨地向总统袁世凯尖锐地提出政治质间案，要求答复：（一）“外交部最初通告将战争区域划定”，“宣布完全中立，及日、德宣战，不能不宣布局外中立，已而日兵登陆，不得已展长战线，指定龙口、莱州”。政府听任日人步步深入我国土，“究竟有无凭据，想外交部于划定区域之后，决不能无文书或口头之通告于交战国也”。（二）日、德交战区业已划定在潍县

① 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上海人。1900年留学日本。1904年归国。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等职。辛亥革命后，改任律师。1913年被袁世凯起用，历任外交次长、外交总长、交通总长和交通银行总理等职。1915年与外交总长陆徵祥一起和日本公使日置益谈判“二十一条”，多次私访日使，密议成交，并起草有关文件。

② 祝鸿基：《护国战争》，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2～63页。

③ 王揖唐（1877—1948），原名赓，安徽合肥人。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回国后任东三省督练处参议，奉天全省警务处会办兼代参谋处总办、代理总参议，军咨府咨使，袁世凯称帝后封一等男爵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以东，今日本不仅占领潍县，而且继续“向西行不止。诚闻潍县以西无一德兵，日本不向目的地胶州进行，乃向潍县以西，究何道理”？现在看来，日本“注意决非只胶州一地，盖将以山东全省为其军队根据地，为第二之东三省也”。日本任意扩大侵略范围，其野心则路人共见，“政府已通告于先，日本竟有此等行动，亦曾与之交涉否耶”？（三）英、日结成同盟，日本出兵山东，“英国当然不能不分担责任”。英国在欧洲参战，宣称是为了“尊重人道”，而“在东方则以联军在我山东作种种破坏我中立举动”，与人道“适相反对，究系何道理”？政府对英国“曾一问讯”否？（四）日本军队在山东危害地方和人民生命财产，显系“不认我为国家”，不以“平等国相待”，是何居心？人民哀哀呈诉，情形凿凿，“我政府究竟已有所闻否耶”？“我政府果有保护人民之责任”，对于日本不“尊重中国国家之心”的举动，“即不能坐视”，曾想有办法否？（五）日本声称在山东只是“暂时假道”，为何已在此发行许多军用票，“究竟彼有何权利将此种纸币强制发行”，侵我主权，造成我国“物价腾贵，生计恐慌”，“试问我国民尚有知觉，能否承认，政府又能否袖手旁观”？

梁启超正义词严地指出，以上种种，不仅是个人的怀疑，“想国民全体亦当同此怀疑，同此愤激。若谓任人蹂躏无法抵抗，在他人可作此语，在政府当局诸人绝对不能作此言以卸责任。本席意见一面责问政府，请其将怀疑之点明白答复，一面由本院斟酌建议，催促政府进行”。梁启超的发言，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及残暴罪行，严肃追究袁世凯屈辱退让的责任，充分表达了伟大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和不畏强暴的勇敢精神，代表了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呼声，得到与会爱国人士的一致赞同。10月5日，参议院全体通过了梁启超向袁世凯提出的政治质问案，并请向日、英政府抗议。10月7日，袁世凯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为日军侵占胶济铁路沿线再向日使抗议，谓日侵犯中国中立已达极点。

痛斥日本侵略谬论

日本帝国主义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进一步扩大侵略，11月6日占领济南车站，7日占领青岛。袁世凯命令中国军队不许抵抗。日本占领青岛后，立即策划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15年1月

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破例直接向袁世凯面递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说：“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① 后来他又对负责交涉的曹汝霖说：“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② 这就是说，袁世凯如承认“二十一条”，日本就赞助袁世凯当皇帝。日置益说：“日本臣民，大半以贵总统反对日本，若不开诚交涉，是反对日本之证，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③ 袁世凯微笑接受。而且双方协定，在谈判期间对谈判内容严守秘密。

日本想独占中国，袁世凯想出卖中国以换取日本支持他登上皇帝宝座，这不仅是关系中国而且是关系全世界的大事，是无法完全保守秘密的。阴风嗖嗖，震惊了中国人民，激怒了中国人民，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二十一条”。当时，梁启超避居天津，探悉“二十一条”内容后，为“义愤所迫，遂不能多所瞻顾”，奋然通过《京报》、《国民报》、《亚细亚报》等各报，接连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轨道外之外交》等文章，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二十一条”第一号中说，条约之提出是为了“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梁启超指出，目前“美国无意扰乱和平”，“德国在东方战斗力已尽”，“英、俄、法则方与日本同袍泽者也。故在欧战期间内，但使日本不扰乱此和平，且不许人扰乱此和平，则谁得而扰乱之者”？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揭露日本借口所谓“保持东亚和平”以进兵中国，是乘欧美“无暇东顾”之时，“攫取优越之权，使彼等他日立于不能竞争之地位”，是为了“谋蹙我于死地”。当时日本报纸“千篇一律之论调，皆曰中国待日本无诚意，中国侮慢日本”，故日本出兵加以“膺惩”。梁启超则针锋相对地驳斥说：“我国今日所处何时所处何地，而敢侮人耶”，此从何谈起。若说中国人不相信日本，对日本人“无诚意”，那或许有之。常人说“惟以诚感人者，人始以诚应，假膺惩之手段以致人之诚”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数十年来，遭难深重，受侮不少，教训可鉴，“警戒之感觉”甚敏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册，三联书店，1979年，第91页。

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38～139页。

③ 参见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238页。

锐，从来“不轻推信于人”。日本借口“保全中国领土”，出兵攻占青岛，怎么能令人相信其为“保全”中国领土而不是侵占呢？“日本苟欲表示其绝无侵略之心”，则其攻陷青岛后即应“交还中国”。而日本又借口“日德今方在交战中，吾留兵以防德人，安能遽撤”？梁启超进一步揭露说，此乃“门面语”而已，严厉责问日本当局，难道日本不知道“德国在远东之战斗力已扫荡无余，难道德人在欧战期间能有力以复攻青岛，有力以复夺胶济铁路，五尺之童，知其不然也，防德既为门面语，则兵之不撤，意欲何在”？不是侵略又是什么呢？“日本人责吾侪以妄事猜疑”，希望日本拿出实际行动来消除中国人之“猜疑”。

梁启超又十分明确地指出中日关系的前途：“夫日本既无翦灭中国之心，而中国积弱，又常足以贻日本之累，然则为日本者，无论自为计及为中国计，惟有希望中国人自处理其国，而常引日本为良师益友，以改进其今日之地位斯则两国无疆之福耳。”如谓中国积弱，可以任人欺侮，那就打错了主意。我国人民有数千年传统之反侵略之“国民性”，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日本如欲求中日“合邦”，同化我国，灭亡中国，那只是痴心妄想。“试回想日本戡定台湾，其所耗血汗几许，若欲戡定中国全国”，是根本办不到的。“若必逼吾国使出于铤而走险之一途乎，则吾国必为玉碎，而无复丝毫瓦全之希冀，自无论矣。”日本如欲统治中国，必自取灭亡。

梁启超对日本侵略者的严厉驳斥，揭开了侵略者的画皮。最后，梁启超正告日本当局：“日本既无吞灭中国之心，且深察吞灭中国非日本之利，则无论如何，终须两国善意提携，始能挽斯危局，若日日以伤害感情之事相加，则是北行而南其辕。”“闻所提条件，行将开议矣，吾侪深望其条件皆为双方利益可以交换者，吾政府则开心见诚以议之，期能得圆满之良果，万一其中有伤害我主权为我所不能堪者乎，则吾望日本撤回之。”^①梁对日本的正告，使其大为恐慌，日本人开始络绎不绝地前去天津对梁进行“种种运动”，妄图收买。梁则称“可笑可愤”，严词拒绝。于是日本报纸大肆造谣，捏称德国人以金钱运动梁启超等，购买某报馆，又掀拾梁

^① 《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二，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89~94页。

启超著书中的只言片语，指为梁启超“袒德之实证”。梁启超十分幽默地说：“小鬼含沙之射，我固不能禁其不射，彼亦终不能禁我不言也。”^①梁又写《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对日本之无耻造谣诬蔑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梁说，我是否袒德、亲德，“何必致辩”，众人皆知，“乃不能不惊日本人举动可笑一至于此也”。“吾本中立国人民”，“吾于各国皆有知友，惟德乃适无之。在北京外交团中，亦惟德使馆往返最少”，与日本人往返并不少，说我亲德“适与彼所揣度者相反也”。梁启超在参议院提出质问案后，日本报纸指责他“忘恩负义”，“受人嗾使，议论纷纷耳出”。梁启超理直气壮地驳斥日本说：我本于爱国之良心，处此国家灾难之际，在立法机关质问当局，难道不是我的权利和责任吗？“若谓吾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即当放弃其对于国家之责任耶？试问日本，保护鄙人之初心，岂非鄙人为一爱国者，循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义耶？使鄙人而非爱国者，则日本昔时保护之不当也。使鄙人为爱国者，则日本今日之责备不当也。”难道日本人欲使我“日思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耶”？“吾甚为日本人不取耳，于鄙人则何伤者。”当时日本著名报纸以特大消息报道：“德国散二十余万打拉购买中国各报”，“北京报馆二十余家，尽为德使所教唆”，并指刊登梁启超文章的北京某报为“德国机关报”。梁启超十分气愤地说，这是对中国人人格的极大侮辱，是毫无根据的无耻澜言，不值深辩。“且二十余万打拉，为数非巨也。日本人既认我国舆论为可以金钱操纵之，何妨试以此数或倍蓰此数一为操纵，看其效力何如者。”那些无稽谰言，乃“妾妇之道”，十分可卑。最后，梁启超严正地警告日本，不要“以第二之朝鲜视我中国”，“我国虽积弱已甚，而国民常自觉其国必能岿然立于大地，历劫不磨，此殆成为一种信仰，深铭刻于人人心中，而未由拔”。“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②当灭亡中国之“二十一条”内容逐渐透露后，日本之军事、外交咄咄逼人，梁启超愤怒地指出，日本欲以炮舰外交“吞灭中国”，只是痴心妄想，

①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50页。

② 《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二，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94~97页。

在中国当局可能屈服，而人民不可屈，“若欲并其不可屈者而屈之，吾劝日本人亦勿作此妄想也”^①。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共分五号：第一号，承认德国所占山东一切权利让予日本，并加以扩大；第二号，延长租借旅大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为九十九年，并承认日本在内蒙古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以及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第三号，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第四号，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第五号，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政由中日合办，军械半数以上应采自日本或设立中日合办的军械厂，允许给日本建造湖北、江西、广东之间重要铁路权以及日本在福建投资、筑路、开矿的优先权。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吞灭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的罪恶条件，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而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和日本代表日置益秘密谈判。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不敢贸然全盘接受。而日本又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逼迫袁世凯接受。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终于在1915年5月9日答应日本，除了第五号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各条全部接受。5月25日，袁世凯与日本正式签订了这个卖国条约。他厚颜无耻地通电各省文武官员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即日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希飭属晓谕通知。”

“二十一条”的谈判和签订，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愤怒和反抗。消息传出，全国人民立即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潮，纷纷指责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孙中山痛斥袁世凯是“祸首罪魁”，揭露他“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并表示决心和人民一起为不使“艰难缔造之民国坐致沉沦”而奋斗。梁启超更发表《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再警告外交当局》、《痛定罪言》等文章，指责袁世凯为了个人私利而不惜出卖国家主权，造成中国国际

^① 《外交轨道外之外交》，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二，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00~102页。

地位之下降，外交当局及袁世凯应负全部责任，此乃“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①。由于全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二十一条”未能付诸实行。

梁启超在《痛定罪言》中首先以讥讽的语调引用了某些人庆幸和平解决的消极言论，他说：“呜呼！中日交涉，今以和平解决矣。我侪试平心静气，就事论事，则雅不欲空以无责任之言，漫集矢于政府。盖当牖户未完之时，遭此风雨飘摇之危，无论何人处此，断末由当机以御侮。樽俎折冲，其技量止于此数。专责政府外交无能，非笃论也。”“吾谓四月以来之交涉，我政府尽瘁国事之诚，良不可诬。其应付之力略，亦不得云大误。”梁启超接着指出，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呜呼，平和之梦，如能久耶，吾侪固乐之，平和之代价，如仅止此耶，吾侪犹将忍之，事势正恐未必尔尔。日本要求条件中最苛刻之诸条”，“未尝撤回”，随时可以提出要求。而欧战之后，假如欧洲诸国其余威尚足东来，将会扩大侵略范围，“则吾之隐忧，或且更大”。他指出“彼以平和解决相庆慰者，愿其一虑其后也”。他还提出，政府结此屈辱条约，不能说没有责任，“数十年来，今举国之兵且数百万矣，国家岁用于军事费者而七八矣，曷为等于无一兵，曷为而实际无一械，且以中国土宇之广物力之厚，而财政曷为日以窘闻，此极显浅之事理，人民不问责于政府而谁问者”。今日政象败坏之原因，是由于少数“学无专长、事无专业”之士大夫，“利用老百姓之爱国以自为进身之径谋食之资”。由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之士大夫掌握政权，此乃国事败坏之根源，因此今日“言整军则谁与整，言理财则谁与理，言劝工则谁与劝，言兴学则谁与兴，言议会则谁为政党，言自治则谁为缙绅。故凡东西各国一切良德美意，一入吾国而无不为可弊之丛。循此以往，岂特今日之耻永无雪期”，终必致亡。今人民又困苦万状，政象日危，“循此不变，则人民怙恃国家之心，安得不日就渐灭”。他没有直接说政府没有希望了，但他用激励的口吻说，“于是乎中国人是否尚有统治自国之能力”，我国“国民皆最善良之国民，以校他邦，略无愧色”。“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我辈革面，然后国

^① 《痛定罪言》，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三，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9页。

事始有所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①。“故中国将来一线之希望，孰维系之，则至劬瘁至质直之老百姓即其人也。”把希望寄托在大多数勤劳朴质的善良的人民身上，催人奋起。

二、丑剧不能同演

失望与检讨

梁启超原想依靠袁世凯之实力统一中国，推行立宪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救中国。可是，两年来的实践使他再次失望了。

梁启超归国不久，就感到“政局危险不可言状，此时投身其中，自谋实拙，惟终不能袖手奈何”^②。历史把这个资产阶级政治家推向前台。在组织进步党之前，他看到在袁世凯的统治下，“今尸国家机关及为各团体成员者，皆借团体机关以为达私目之手段者也”。假公济私，争权夺利，“国中无所谓政治，无所谓政党，但见无数之个人朋比以自营已耳。其稍稍自好者，不忍同流合污，则洁身以去”，消极厌世。在地方上，“人自为政，地自为域”，“内外大小官吏，尽怀五日京兆之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敷衍涂饰，苟以自保而已”，“几无一人能为明日之计者也”^③。进步党组成以后，他妄想通过少数“人才”之努力扭转大局。

在财政上，他鉴于袁世凯依赖外债过日，濒于“破产之祸”^④，曾欲进行一番整顿，提出减政裁军，发行银币及公债，改革税收等，以扩充财源，稳定金融。可是，袁世凯对此不予采纳，一味对人民进行掠夺和榨取，不仅恢复了清末的旧税，还增加了种种新税，仅1914年8月一个月中所拟新税法即达十三种之多。“所谓爱国捐，所谓国民捐，所谓爱国公债及其他某种某种公债”^⑤等等，

① 《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三，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9页。

② 民国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梁启超《与娴儿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14页。

③ 《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6~18页。

④ 《进步党调查政费意见书》，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8页。

⑤ 《痛定罪言》，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三，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6页。

使人民困苦不堪。

在经济上，他们希望在袁世凯统一稳定的政局下，发展实业，“所谓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矣”^①。但是，两年以来，不仅工商业没有发展，原有的工商业也遭到摧残。梁启超指出，清末“遵依公司律注册之公司，无虑数百家，而今皆安在，语其原因，缘政府保护不利，甚则加以摧残”。

在政治上，政党、责任内阁今安在？1913年，梁启超在《国会之自杀》、《述归国后一年来所感》等文中，多次谈到“在今日，断无复活君主之余地”，舍国会外别无他途^②。但到1913年底，袁世凯却下令召集政治会议，篡夺了国会之职权。梁启超曾经设想，即使没有国会，暂时没有立宪政治，只要袁世凯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行“开明专制”亦可。无奈袁世凯不仅不开明，反而恢复封建专制的一切制度。1914年1月，下令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职务。2月，下令停办地方自治会，踢开“人才内阁”，解散各省议会。3月，袁记约法会议开会，不久又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废除了《临时约法》。1915年元旦，发布授卿令，将一些显要人物封为上卿、中卿、少卿，一步步将内外文武官吏都套上了封建皇帝时代的称号，恢复了皇帝的排场。共和立宪的外壳被全部抛掉，一切都是皇帝出现的明显预兆。

梁启超失望了，“各种计划都成空想，没有一件能实行出来”。“习习笼中鸟，举翩触四隅。”^③他一无展布，再也不给袁世凯捧场了。1913年10月他避居西山，专事著述，次年正月，又借口避居天津日本租界。他独居斗室，检讨自己多年来“摇笔弄舌”，“今亦终于笔舌而已”^④，深叹“我国民积年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在“魔鬼”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统治下，“举国沉沉，悉含鬼气也”^⑤。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又遇到了大转折的年头。他没有

① 《民声日报》，1912年2月28日。

② 《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5页。

③ 民国三年十月十二日梁启超《致周印昆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40页。

④ 《余之币制金融政策》，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二，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8页。

⑤ 《大中华杂志发刊辞》，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44~445页。

消沉，丝毫也没有不关心国家大事。他在检讨过去，筹计未来。他说国事闹成现在的局面，自己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惟痛念频年以来，颇不免缘党派偏见，误断事理”，打击了国民党，孤立了自己，“间接以酿国家隐患。中间又尝以悲观弛惰自荒匹夫之责，致国民活力，生一部分之损耗。今以国脉安危，迫于眉睫，不敢不沉痛忏悔，请献此身，以图自赎”^①。他准备消除党派偏见，团结合作，用战争的办法，共同对付袁世凯。他深感“摇笔弄舌”不能解决中国之问题。一贯持“平和”主义，反对战争动乱的梁启超，如今又歌颂起战争来了。他说：“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实在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而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

丑剧难于同演

1914年秋，晚清之官阶爵号纷纷出笼，梁启超“羞与道尹关督等职为伍”^②，深感“奇剧难于同演”，决心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并劝“当世之言论家”，“勿浪费光阴笔墨，以商榷政制，讨论政策耶”^③，不要与袁世凯合作。

1915年初春，帝制复辟的活动已在积极酝酿。这年初，梁启超忽然收到袁克定^④的一张请帖，请他到汤山赴宴。他准时到达，一眼看见只有主人和杨度^⑤一个客人在座，就不免感到惊奇。袁克定、杨度在谈话之中，“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⑥。于是不欢而散，袁克定扫兴而归。3月12日袁世凯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

① 《在军中敬告国人》，见《饮冰室专集》之三《盾鼻集》（以下简称《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17页。

② 民国三年梁启超《致张仲仁先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40页。

③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41页。

④ 袁克定（1878—1955），字云台，河南项城人，袁世凯之长子。历任农工商部右参议、右丞，外交部顾问，开滦矿务局督办。帝制复辟的积极鼓吹者。

⑤ 杨度（1874—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清末举人，留学日本。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鼓吹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与汪精卫等筹组国事共济会。被袁世凯任为参议院参政，与孙毓筠等组织筹安会，拥袁称帝。袁世凯死后被通缉。晚年倾向革命，参加中国互济会，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上海病故。

⑥ 《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43页。

问，3月31日又派梁启超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宜，都遭拒绝。当时，梁启超感到祸之将作，乃移家天津。4月末，梁以返粤省亲为父庆寿为名，南下至广东、上海间，联络反帝制力量。

梁启超在离津南下以前，致书袁世凯，劝他悬崖勒马，急流勇退，不要复辟帝制。信中指責袁世凯对共和制度曾“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今违背誓言，“后此将何以号令天下”。今复辟之声甚嚣尘上，不仅大失民心，而且“水旱频仍，殃灾沓至，天心示警”，“民怨沸腾”，惶惶不可终日，“若大乱之即发于旦夕”。“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要袁世凯“践高洁之成言，谢非义之劝进”，悬崖勒马。“若今日以民国元首之望，而竟不能辍陈桥之谋，则将来虽以帝国元首之威，又岂必能弭渔阳之变”，“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望袁世凯放弃“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若不顾“礼义廉耻”，尽要“妾妇之道，威逼利诱”，“使民志不伸，翻成怨毒”，将来必为“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大总统提倡名节，奖励廉隅，抑贪竞之鄙夫，容骨鲠之善类，则国家元气不尽消磨，而缓急之际犹或有恃矣。”^①梁启超这封似骂似爱，似忠言又似警告的长信，以利剑般的词锋，直刺袁世凯的心窝，痛斥他背信弃义，强奸民意，倒行逆施，无廉无耻，若不放弃复辟恶念，必然被人民所推翻。

冯国璋^②、段祺瑞^③是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干将，袁世凯的当然继承者。现在帝制问题发生了，将来皇位由袁世凯之子孙继承，这

① 民国四年《上袁大总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53～454页；《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20～22页。

② 冯国璋（1859—1919），字华甫，直隶河间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创办新建陆军时，被任为督练营务处总办。与王士珍、段祺瑞并称“北洋三杰”。长期担任军咨使。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任为第一军统，率领北洋军至湖北镇压革命。1913年国民党发动讨袁战争时奉袁命攻下南京，任江苏都督。袁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他为直系首领。1916年当选副总统，1917年代理总统，1918年被段祺瑞胁迫下台，1919年病死在北京。

③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由李鸿章派赴德国学军事。在天津小站新建陆军任炮队统带兼随营学堂监督。1909年调充第六镇统制，次年调任江北提督。1911年11月，袁世凯到北京组阁后，派他署湖北总督，并任第一军军统兼领湖北前线各军。袁世凯窃国后，任陆军总长。袁世凯死后，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控制北京政权。

使冯、段极为不满。同时，袁世凯也担心这些干将今后会危及其子孙后代的皇位，对冯、段亦不放心。1914年5月，袁创设“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把段祺瑞陆军部的权力收归自己直接掌握，因此段大为不满，不理军务。次年5月，段又称病辞职，对袁世凯称帝持消极态度。段祺瑞的遭遇得到冯国璋的同情，这样，冯、段与袁世凯的矛盾日益加深。

梁启超洞察北洋军阀的裂痕，早就和冯国璋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3月25日，梁以省亲为名绕道上海去广东。6月，冯国璋派专人告梁，帝制问题已有发动之兆，梁遂奔向南京。冯国璋约梁一同去北京^①，一以探询袁氏之真意，一以劝阻其复辟帝制。他们在北京住了十多天，“晤袁氏数次”，而袁回答时，“皆矢誓不肯为帝，其言甚恳切”^②，继续隐瞒帝制阴谋，对梁启超及冯国璋进行欺骗。7月6日，袁世凯命梁启超、杨度、严复^③等十数人为宪法起草委员，继续玩弄骗术。梁启超敷衍参加了一两次会议后，“遂以病电公府请假”^④，不再充当这一奇剧中的玩物。

复古思潮评议

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后，即大搞“尊孔读经”的活动，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首先，他发布了一道《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叫嚷中华立国要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要人们以孔子的那套维护封建制的伦理道德作为民国的道德标准。1913年6月22日，他又发布了尊孔令，宣布恢复封建时代的祭孔典礼。10月，他攫取了正式大总统后，又提出“道德为本，法律为用”的口号，要以“忠信孝悌”的伦理道德作为立国的根本。在他炮制的天坛《宪法草案》中，公然规定“国民教育以

① 《护国之役回顾谈》，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88页。

② 《国体战争躬历谈》，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43页。

③ 严复（1854—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留学英国海军学校，归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并任总办。宣传维新变法，译《天演论》等，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辛亥革命后，思想日趋保守。

④ 民国四年八月十九日梁启超《与嫀儿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56页。

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重新规定“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1914年1月，袁世凯指使他的御用机关“政治会议”通过了祭天、祀孔两个议案，下令全国一律施行祀孔典礼。北京文庙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文庙由地方长官主祭。12月23日，他又穿上特制的古怪祭服，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到天坛祭孔。在袁世凯的倡导下，尊孔复古的思潮甚嚣尘上，什么“孔教会”、“宗圣会”、“孔道会”、“尊孔文社”等五花八门的尊孔组织蜂拥而出，掀起了一股复古逆流。

袁世凯尊孔复古的逆流一出笼，就遭到革命人士的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华新报》上发表社论，指出：“所谓祀孔子者，不外历代君主为巩固君权之手段。”还一针见血地揭露袁世凯尊孔只不过是“借祀孔之名，为收拾人心之具，帝制复活之实”，其手段比王莽假托周礼篡汉“更妙十倍”。章太炎、鲁迅等也都积极揭露袁世凯尊孔复古的野心。1915年1月《大中华》杂志创刊，由梁启超任主编，他在发刊词中说，现在“新进者”被排挤，一切立宪、民主等都被抛弃，“凡百欲复辛亥以前之旧”，唯求“一人之福以托数百万人之命”，此乃亡国之象。他希望人们振作精神，“毋偷毋倦，毋躁毋鹜”，报国者“必有其道”^①。

在《大中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进步党人蓝公武的《辟近日复古之谬》，明确指出，“国内复古之声大盛，皇皇策令，无非维系礼教”，“政府既倡之于上，社会复应之于下，孔教会遂遍布于国中，而参议院亦有奖劝忠孝节义之建议，将使新建之邦，复见先代之治”，实与时代之进步背道而驰。蓝公武说，忠孝节义一套封建之信条，与今日之所谓“自尊、独立、自由”等“公德至不能相害也”^②。2月，梁启超又发表《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在筹安会即将出笼的前一个月，梁启超发表了《复古思潮评议》，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批判了“尊孔”、“复古”的种种谬论。他指出，孔子之教义在中国两千年之历史中起了“中坚”的作用。但是“自海通以来”，西方“民主、自由”之理论传入中国，则孔子之教义多所过时。今由国家颁布祀孔典礼，又由

① 《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三，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79～89页。

② 《大中华》杂志，1915年，第一卷第一期。

元首亲自祭天为之倡导，“强国人日日膜拜”，“其卫道之心良苦”，其结果则“无益而有害”。尊孔及旧道德之提倡，“一年以来，则其极端反动力之表现时代也”，假借旧道德以压迫新道德，假借旧制度以全盘否定民主共和制度。梁启超说，民元以来的共和政治在实行中虽有弊短之处，然“只能求其弊之所在而更能补救之耳，若乃并制度其物而根本摧弃之，天下宁有此政猷。例如民选议会制度，既为今世各国所共有，且为共和国体所尤不可缺，前此议会未善，改正其选举法可也，直接间接求政党之良可也，厘定其权限可也，若乃并议会其物而去之，安见其可。例如司法独立，既天下之通议，前此法庭未善，改变其级制可也，改变其程度可也，改变其任用法可也，若乃并法庭其物而去之，安见其可。推之百政，莫不皆然”。梁启超正告那些尊孔复古恋旧之徒，正当今日务新之时，忽而弃新复旧，将来必然“进退失据而一败涂地也”。今日不仅“尽反民国元二年之所为”，约法、议会、政党一扫而光，而且“前清光宣之交，凡所规画所建置，殆无不废变停顿”。梁启超正告当道，前清以守旧而亡，今日若再走清廷之老路，必蹈其覆辙^①。希望袁世凯改弦易辙，不要愈陷愈深。

三、丑剧公演以后

帝制筹安与登场

袁世凯筹备帝制丑剧，是从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进行的。

1915年的春夏之间，袁世凯在军事上作了一系列的布置，通过裁撤各省都督改设将军，将北洋军分派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剥夺与他有矛盾的重要将领的实权，任以闲职，如任命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实为空衔；任命蔡锷为昭威将军，实闲居北京并受到监视。同时，他对最不放心的川滇黔及战略要地湖南、湖北等省也作了专门部署。派何国华^②为云南宣慰特使；派王祖同

① 《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三，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55～74页。

② 何国华（生卒不详），山东人。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辛亥革命前在云南任陆军第十九镇七十四标标统与云南陆军小学堂总办。

为广西巡按使，后来又让他会办广西军务；派龙建章^①为贵州巡按使。这三个北洋官僚都是高级特务，负有监视所在地将军的秘密使命。四川的战略地位对控制西南各省尤为重要，1915年2月，即派参谋次长陈宦^②会办四川军务，率领北洋军伍祥祜^③、冯玉祥^④、李炳之^⑤三个旅入川。陈抵成都后，袁又立即升授他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巡按使，把一省军政大权都交给他。同时，又派曹锟^⑥率领北洋军精锐第三师驻扎湖南岳阳，王占元^⑦的第二师集中武昌，以两个师的兵力作为四川北洋军的后援。

袁世凯在做好军事布置后，在外交上又得到日本、美国、英国的支持，于是在政治上积极筹备帝制登场。1915年8月10日，首

① 龙建章（1872—？），字伯扬，广东顺德人。光绪甲辰科进士，京师大学堂毕业。历任户部主事、吏部员外郎、邮传部郎中、出使各国考察宪政大臣参赞。辛亥革命后，任贵州巡按使。1917年在李经羲内阁任交通总长。

② 陈宦（1870—1939），字二庵，也作二安，湖北安陆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随锡良在川、滇等省办讲武堂，继往东北任北洋新军第二十镇统制。袁世凯窃国后，任参谋部次长。1915年2月，袁派他会办四川军务，5月抵成都，署四川巡按使。

③ 伍祥祜（生卒年不详），云南人，北洋系军阀。曾任陆军第二十师三十九旅旅长、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随陈宦驻防四川，不愿与滇军作战，又经梁启超通过友人疏导，对袁世凯不怀忠心，后被护国军击败解职。

④ 冯玉祥（1882—1948），原名基善，字焕章，安徽巢县人。行伍出身，曾充北洋第六镇队官、第二十镇管带。武昌起义后，与施从云、王金铭在滦州密谋响应，失败解职。1914年随陆建章赴陕，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

⑤ 李炳之（1882—1968），字彪臣，直隶正定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原是袁世凯部属，清末任军咨府科长，民国后历任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第一混成旅旅长、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十四省联军司令部参议及第一军参议。

⑥ 曹锟（1862—1938），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被任为右翼步兵管带。后任北洋陆军第一镇统领，又改任第三镇统领。武昌起义后，奉袁世凯之命南下镇压革命。一贯受袁世凯重用，袁称帝时，封他为一等伯爵，派至四川镇压护国军。

⑦ 王占元（1861—1934），字子春，山东馆陶（今属河北）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累任北洋军军官。辛亥革命前任第二镇第三协统领，武昌起义后，带兵南下镇压革命，升任第二镇统制。民国成立后，任第二师师长，参与镇压“二次革命”及白朗起义，1915年拥护袁世凯称帝。

先由袁世凯的公府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①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借口中国人民知识程度太低，不能行共和制，只宜行君主立宪制。14日，杨度纠合孙毓筠^②、严复、李燮和^③、胡瑛^④、刘师培^⑤等五人发起组织“筹安会”。从此，帝制的丑剧从后台推向前台，公开为皇帝登台鸣锣开道。

袁世凯一面口头否认自己想当皇帝，一面暗地指使筹安会等党徒扩大宣传，假造民意，务必使这一项鬼把戏装扮成“遵天命”、“从民意”、“顺国情”的正当行为。9月初，筹安会纠集大批北京无聊政客，以“各省旅京人士”为名组织起形形色色的“公民请愿团”，所有请愿书一概由筹安会代为起草，于参议院开会前纷纷递进，要求改民主政体为君主政体，公开鼓吹复辟帝制。在中央和地

① 古德诺 (Frank Johnson Goodnow, 1859—1939)，美国人，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1891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行政教授。1916年任美国政治学院代理院长。1913年被袁世凯聘任为总统府顾问。次年回国，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在纽约发表以《中国新约法论》为题的演说，反对中国的《临时约法》，后来又著文鼓吹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等等。

② 孙毓筠 (1872—1924)，字少侯，安徽寿州人。孙家鼐之孙。1906年在东京入同盟会，同年去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浏醴起义，事泄被捕，判刑五年，辛亥革命时获释，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1912年3月任安徽都督，7月赴南京任临时参议院议员。以后投靠袁世凯，充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长、参议院参政，组织“宪政研究会”，以研究国体为名，与杨度等发起筹安会。

③ 李燮和 (1873—1927)，字柱中，湖南安化人。曾就读长沙求实书院，曾入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参加萍浏醴等起义。后往南洋槟港等地华侨学堂教书。辛亥革命时，与陈其美等策划上海光复，任吴淞都督兼光复军总司令。1912年任长沙水师总司令，不久辞职。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由湖南到北京，标榜调和南北关系，投靠袁世凯。

④ 胡瑛 (1886—1933)，原名宗琬，字经武，湖南桃源人。为黄兴的学生，经黄兴介绍入武昌工程营当兵。后来去日本加入同盟会。孙中山派他回国参加萍浏醴起义，在汉口被捕。在狱中参与策划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次日出狱，被推为军政府外交部长。议和期间，以鄂军都督代表名义任民军方面代表。1913年2月，由黄兴推荐任烟台都督。不久被袁世凯排挤，流亡日本，后又投靠袁世凯。

⑤ 刘师培 (1884—1920)，又名光汉，字申叔，号左龠，江苏仪征人。光复会员，1907年赴日本加入同盟会，宣传革命。同年与张继在东京举办“社会主义讲习会”，并与其妻何震创办《天义》等刊物，宣传无政府主义，反对民族革命。1908年为夺取同盟会干事职权，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遭拒绝，遂变节，投入两江总督端方幕府。端方在四川被新军所杀后，他逃往成都，在四川国学院讲学。1913年入太原，充阎锡山高级顾问，后投靠袁世凯，参加发起筹安会。

方的袁记党徒喽啰们，又是“通电”，又是“公函”，纷纷劝进，搞得丑态百出，乌烟瘴气。因为筹安会的活动并不高明，9月9日，肃政厅呈请取消筹安会。袁世凯更换走卒，就像走马灯一样转得非常快。19日，又由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①组成“请愿联合会”代替筹安会，把帝制丑剧演得更加有声有色。10月2日，参政院在梁士诒的催促下拟出一个“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组成“国民会议事务局”，筹备由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是否改行君主政体。袁世凯的亲信操纵选举，指定一些豪绅买办充当代表。在短短的十天内，各省的所谓代表都已选出。因为袁世凯称帝心切，预定要在1916年元旦上殿登基，来不及召开全国国民大会，于是决定于10月28日在各省举行投票。投票前，由梁士诒以“国民会议事务局”名义拟出了统一的票样，即“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11月20日，各省投票完毕，代表票数一千九百九十三张，“全部赞成”，并“一致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向袁世凯恭上推戴书。袁世凯又经过一次假意谦让后，于12月12日接受了推戴。13日，他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并宣布从1916年1月1日起将中华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袁世凯导演的这出复辟帝制的丑剧，至此达到高潮。

揭开反帝制序幕

当帝制丑剧正紧锣密鼓上演之际，袁世凯在奸笑中发出咄咄逼人的淫威，走卒们争功邀宠，一派赞扬声，旁观者随声附和，许多人在利诱威逼之下亦不得不敷衍应允，一派乌烟瘴气。这是封建帝制死灰复燃及民主共和转眼夭折的关键时刻，人们痛恨袁世凯，反对复辟，但或者不敢虎口拔牙，或者敢怒不敢言，“当时全国有权威有声望之人，未有敢冒言其非者”，呈现出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但是沉默只是暂时的，一场反对帝制复辟的风暴即将来临。当

^① 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光绪年间进士。1903年应袁世凯聘，任北洋编书局总办。1907年任京汉、沪宁等三路提调和交通银行帮理。武昌起义后，署袁世凯内阁邮传部大臣。袁窃取临时大总统后，任总统府秘书长，参与机密，深得袁信任。后任交通银行总经理，掌握袁世凯政府之财政，积极支持袁世凯称帝。

时，“无论何派，皆望任公出而与袁氏反对。诚以欲转移舆论，使国民知袁氏之不可托以国事，惟任公之鼓吹最有力也”^①。正在这时，矢志追求立宪，痛感“无法律之国家”无法生存^②的梁启超，“于公于私，旧怨新恨愤慨不已”，“我定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我笔，使我不能属文耳”。他当时身患赤痢，却不顾生命危险^③，一跃而起，与之决斗，在筹安会出现的第七天，连夜草就《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言词激烈，痛斥袁世凯称帝。“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梁某一入断不能赞成也。”当时有人向梁建议，因“袁氏现尚未承认有称帝之意，初次商量政见，不必如此激烈”，遂将原稿“改就和平”^④。文中的激烈语言及论证的逻辑性都有改变，但反对袁世凯复辟这一中心思想丝毫未动。袁世凯得知此消息后，乃先派人贿赂梁启超二十万元，请梁无论如何不要发表此文，被梁婉言谢绝。继之“危词威喝”，要他回顾亡命之苦味，不要再自找苦吃。梁则笑而答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袁世凯派来的走卒哑口无言，狼狈而退。接着各种陷害恐吓的匿名信不断飞来，梁亦不为所动。22日，梁启超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由汤觉顿带到北京发表，同时还有《与英报记者谈话》，以及汪凤瀛《致筹安会书》、徐佛苏《对筹安会之意见书》等在京沪各报刊载，痛斥古德诺、杨度的种种复辟谬论，揭开了反袁的序幕。

梁启超在答英报记者问中，揭露了袁世凯两次就任总统时均宣誓拥护共和，“万国共闻”，且“申令煌煌，何啻三五”，即与人讨论帝制问题亦多次表示“断不肯帝制自为”^⑤。现在袁却要当皇帝

① 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57、492页。

② 《袁世凯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06页。

③ 1914年9月17日，革命党人程家桢撰《袁世凯称帝之梦》被捕，9月25日在北京被杀。

④ 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70页。

⑤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59页。

了，实属背信弃义。今日“谋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勋”之袁世凯为发动者，“天下之怪事，盖莫过是，天下之可哀，又莫过是也”^①。他驳斥古德诺复辟帝制的谬论时说，古德诺的言论“无意中与我十年旧论同其牙慧，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耳”^②。梁说，这些言论早已过时，今日外国博士以“臭腐忽为神奇”^③，实在可笑。在已经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再欲复辟君主制，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是万万不可能的。过去君主之所以能够存在，是依赖“历史上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以保其尊严”，这种尊严，不可亵渎，一经亵渎，“遂复不能维持”。譬如“雕土木偶，名之曰神”，置诸殿堂，供人烧香礼拜，“灵应如响，忽有狂生拽倒而践踏之”，投诸厕所粪坑，然后取回，“重入殿堂，而其灵则已渺矣。自古君主之国，其人民之对于君主，恒视为一种神圣，于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疑议，若经一度共和以后，此种观念遂为断者之不可复续”。更观世界历史，凡推翻君主实行共和之国家，没有一个能复返君主统治的，其中法国虽有帝政之再现，“然皆不转瞬而复也”。所以说经过辛亥革命以后，复望帝制再现是不可能的。梁启超更明确指出，古德诺等人谓改变国体后即可实行君主立宪，完全是骗人的。现袁世凯执政以来，“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宪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今又要尽弃共和，恢复帝制。这种种变换，“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有谁相信复返君主政体后即可实行立宪政治呢？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不过只是一种“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是一种骗人的假立宪。今日你袁世凯“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能为元首谅矣。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前车之覆，是为殷鉴。若不听劝告，仍然

①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88页。

②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87页。

③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谈话》，载《申报》，民国四年九月四日。

“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貽国家以无穷”之灾难，“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

梁启超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虽然谈到不反对君主国体，甚至说大总统在将来内政外交功德巍巍之时，受“亿兆敦迫”，或可复返帝制等，这些话与其说是对遥远未来附有严格政治条件的设想，倒不如说是对袁世凯虚与委蛇的言词。从全文的中心思想看，淋漓尽致地揭开了袁世凯复辟的阴谋，表明了梁启超反对复辟帝制的决心。

梁启超还号召大家不要冷眼旁观，“自宽纵其蠹贼”，更不要同流合污，“笑骂还他笑骂，好官我须为之”。应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①，拿出大丈夫之气概，决不为“梟雄”所利用。

8月9日，古德诺鼓吹帝制的谈话在北京《亚细亚报》上发表后，受梁启超、徐佛苏影响的《国民公报》于11日发表《古德诺氏政体之商榷》，反对古德诺变更国体之谈话，但这只是一种“商榷”之见。从当时北京总的形势来看，自8月13日筹安会出笼以后，“朝野上下，群起而和之，曾无一人敢直揭袁氏之隐恶”^②，“赞成者几于风动全国”^③。而当时北京舆论界亦无敢倡导者，8月17日，独《新中国报》登有林袖湖一文表示反对^④，但该文影响不大。8月15日，贺振雄^⑤请肃政厅代呈大总统诛奸救国书，要求诛杀杨度等乱国之罪犯。18日，有李海（李燮和之弟）告发筹安会呈文，接着有周勋、汤觉顿、徐佛苏^⑥等弹劾筹安会呈文，但肃政厅

① 《伤心之言》，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三，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58～59页。

② 《护国军纪事》后编，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87～188页。

③ 北京《亚细亚报》，1915年8月27日。

④ 北京《天民报》，1915年8月17日。

⑤ 贺振雄，号羽阶，湖南宁乡人。上海广方言馆毕业，游历日本考察警政。1906年在上海主笔《竞业旬报》、《洞庭波杂志》。1912年10月到北京，拥护共和。“二次革命”时反对孙、黄。此后脱离政界，袁称帝时出而反对。

⑥ 徐佛苏（1879—1943），字运奎，也作应奎，湖南长沙人。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原为华兴会员，甲辰长沙起义谋泄事败后，亡命日本，加入保皇会，任《新民丛报》撰述，与梁启超关系密切。1910年创《国民公报》于北京。辛亥革命后，历任总统府顾问、政事堂参议，反对袁世凯称帝。

借口手续不完备，根本不予代呈。据说，当时上书反对筹安会者，不下千百件，效果都不大，也都没有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那样清楚明白地揭露和痛斥袁世凯，更没有梁文影响之巨大。该文在1915年8月20日出版的《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后，自8月31日起，京、津各报争相转载。这篇虎虎有生气的文章，震动中外，“传诵一时”^①，对袁世凯不啻为一颗政治炸弹。8月25日，原国民党人谷钟秀^②、欧阳振声^③、杨永泰^④、徐傅霖联合发表维持共和国体宣言，反对古德诺、杨度之谬论，反对复辟帝制。他们又创办《中华新报》“以促进民气，唤醒迷梦”。国民党人与“袁氏精神上之宣战，可谓自此开始”^⑤。蔡锷曾对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作了高度评价：“先生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⑥从此，揭开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序幕，为发动护国之役作积极的准备。

四、海外的号角

孙中山讨袁

在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各派达到了最大的联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上海人文月刊社，1936年，第207页。

② 谷钟秀（1874—1949），字九峰，直隶定县人。清末曾任保定高等师范学堂教员，后赴日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入浙江巡抚增韞幕，襄办新政。辛亥革命时，任直隶谘议局议员，作为直隶省代表南下，参加各省代表会议。旋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1916年8月，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

③ 欧阳振声（1881—1931），字笃初，号俊民，也作骏民、骏明，湖南宁远人。清末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毕业，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历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北京众议院议员、广州军政府财政部次长、湖南省议会议长。

④ 杨永泰（1880—1936），字畅卿，也作密卿，广东茂名人。1914年在东京与李根源等组织欧事研究会，后为政学系首领。曾任国民党军委会南昌行营秘书长，旋调湖北省政府主席。

⑤ 《上海党人之行动》，见《护国军纪事》后编，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87～191页。

⑥ 蔡锷：《盾鼻集·序》，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1～522页。

合。“二次革命”前后，不仅原立宪派（即进步党人）与原革命派（即国民党人）由于政党的偏见而相互抗争，且国民党内部孙中山与黄兴也发生意见分歧。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①；不久，李烈钧、熊克武^②等革命党人成立欧事研究会^③，奉黄兴为领袖。孙中山以日本为中心，李烈钧、黄兴等以南洋、美国为中心开展活动。

1911年12月，南北议和期间，一片“收拾大局，非袁莫属”的妥协声。孙中山原来对袁世凯的印象并不好，觉得此人“狡猾善变”，可能迟滞革命活动，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巨奸大憨，把建立民国的大任托付给他是靠不住的”，主张革命党人继续战斗，组织北伐，“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④。但是，孙中山和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既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又想早日实现共和与统一。因此，又想利用袁世凯，“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避免流血，结束战争。同时，孙中山还以为袁世凯本系“汉族，人情必恩宗国，而总统复非帝王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⑤，且袁世凯宣誓拥护共和。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将临时总统的大权让与袁世凯，并以在野党的身份，负责筹划全国铁路建设，幻想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建设一个“全球第一强国”。

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以后，孙中山从同志的血泊中惊起，自日本回到了上海。4月26日，上海六万人集会，愤怒声讨袁世凯罪行，要求袁辞职。同日，孙中山联合黄兴发出通电，呼吁各界勇负“巩

① 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8日成立于东京，主要成员有孙中山、陈其美、谢持、居正、田桐、张人杰、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邓铿、吕志伊。

② 熊克武（1885—1970），字锦帆，四川井研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员。辛亥革命后，任川军第五师师长。“二次革命”时，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日本。

③ 欧事研究会，1914年8月成立于东京，参加者一百多人，主要成员有李根源、陈炯明、李烈钧、熊克武、钮永建、彭允彝、殷汝骊、冷遯、林虎、程潜、邹鲁、徐傅霖、陈独秀、张孝准、沈钧儒、谷钟秀、张耀曾、杨永泰、章士钊、但懋辛、余际唐、彭程万、李明杨、杨源浚等。

④ 李书城：《辛亥革命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1981年，第20页。

⑤ 《讨袁檄文》，见《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8页。

固民国，维持人道之责”，对“宋案”“严究主犯，同伸公愤”^①。不久，发动了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并连电袁世凯，敦促其辞职。电文中说，“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若“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②。但是，由于国民党涣散无力，军事上又无充分准备，“二次革命”很快失败。

袁世凯因“宋案”真相大白，遭到孙中山及广大人民的谴责后，凶相毕露，恶毒攻击孙中山和黄兴“左又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捣乱外无本领”^③。9月15日，袁世凯通缉孙中山和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廖仲恺^④、朱执信^⑤、邓铿^⑥、谭人凤^⑦、熊克武等。11月4日，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并肆意加害国民党人。从此，孙中山去日本，黄兴去美国，李烈钧去南洋，各奔东西。

① 《民立报》，1913年4月27日。

② 《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

③ 《上海时报》，1913年5月24日。

④ 廖仲恺（1877—1925），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广东惠州人。出身于美国华侨家庭。1892年回国，1902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1903年结识孙中山，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总部外务部干事，秘密从事革命工作。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兼理财政，旋任南北议和代表。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曾去北京动员国会议员代表反袁。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被举为财政部副部长，后随孙中山反袁、护法及北伐等。

⑤ 朱执信（1885—1920），名大符，广东番禺人。1904年留学日本攻读政法。次年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1906年回国，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参加黄花岗之役。辛亥革命后，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等职，“二次革命”失败后去职，加入中华革命党，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

⑥ 邓铿（1885—1922），字仲元，广东梅县（一说惠阳）人。毕业于广州将弁学堂，充该校步兵科助教，曾任排长、队官。1911年参加黄花岗之役，失败后走香港。武昌起义后，在东江率民军起义响应，任参谋长。广东军政府成立，任陆军司司长及稽勋局局长。1913年出任琼崖镇守使，兼办民政事宜。“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不久返粤讨袁。

⑦ 谭人凤（1860—1920），字有府，号石屏，晚年又自号雪髯，湖南新化人。四十岁以前，在家乡办学，并联络会党，从事反清活动。1906年冬在东京结识黄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武昌防御使兼北伐招讨使。1912年任长江巡阅使，次年补上将军衔，参与“二次革命”，失败后走日本，此后隐居日本。袁死后，居上海。

鉴于国民党的涣散无力，孙中山召集流亡日本的部分革命党人，总结经验，检讨得失，决定重新建党，以便集结革命力量，策划“三次革命”。因此，于1914年7月8日，在东京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当时入会者数百人，设支部于国内外各地。国内支部专事组织武装讨袁，海外支部负责筹款^①。9月20日，孙中山在东京主持制订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揭露袁世凯的复辟野心，“卒以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②。10月，中华革命党又发布《讨袁告同胞书》，痛斥袁世凯“专制魔王”，并历数其毁弃宪法、迫害议员、破坏民主、祸国殃民等罪状，号召全国人民“扫除独夫凶焰”，“重建共和”。

1915年3月，日本与袁世凯“二十一条”之谈判正加紧进行，孙中山指示党务部发布第八号通告，揭露“二十一条”交涉真相，并把袁世凯的卖国勾当与复辟阴谋联系起来，指出“此次交涉之由来，实由夫己氏（按：指袁世凯）欲称帝，要求日本承认，日本政府欲得相当之报酬……夫己氏隐许诺之，故有条件之提出”^③。5月，致函区慎刚、邓泽如等，指出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后必将称帝，“从此中华民国名义亦将消失，内地不平之声甚烈……洵为吾党不可失之时机”，并告以“党内重要人物已冒险深入内地，急思发动，成败在此一举，不能复待”^④，决心武装讨袁。在筹安会出笼以前，1915年夏末，孙中山召集廖仲恺等各部长会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先后派出各省区的军事负责人，并令陈其美^⑤、

① 《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第170页。

② 《讨袁檄文》，见《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8页。

③ 《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第178页。

④ 《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墨迹》，见《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第179页。

⑤ 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吴兴人。清末赴日本学习警务，加入同盟会。1911年7月在上海与谭人凤、宋教仁等组成同盟会中部总会，上海光复后任沪军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孙中山派他在上海组织机关，并暗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2月，发动肇和兵舰起义，受挫，护国讨袁事起，他谋浙江独立，屡起屡败。1916年5月，被冯国璋收买，后被张宗昌部下刺杀于上海寓所。

居正^①、胡汉民、于右任^②分别组成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上海）、东北军（青岛）、西南军（广州）、西北军（陕西三原）四个总司令部，到江浙、山东、广东、陕西等地组织反袁斗争^③。“及筹安会事起，孙中山先生派吕志伊^④回滇秘密运动军队”，策动反袁^⑤。

筹安会宣告成立以后，9月1日，中华革命党千余人在东京集会，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⑥。同时发布《讨袁檄文》指出：“袁贼苦吾国民久矣！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之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也。”孙中山历数袁世凯的种种罪恶，说他“贼性凶顽，谰诈成习，背誓乱常，妄希非分，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奸雄窃国之实。骄兵悍将，骚扰于闾阎；宵小佞壬，比周于左右。甚乃贿收报馆，赂遗议员，清议消沉，监督溺职，而赅杀元勋，滥借外债之祸作矣”。赣、宁之役，“贼兵所至，焚掠为墟，幼女贞孀，供其淫嫖”；犹复恣意株连，任意加害。非法窃取大总统以后，又“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予夺唯私”；“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真是恶贯满盈。“袁贼妄称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作奴隶牛马之时”，值此国家生死存亡

① 居正（1876—1951），字觉生，别号梅川居士，湖北广济人。1905年留学日本习政法，加入同盟会，1907年在东京参加发起共进会，次年赴南洋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返日本，参与筹设中部同盟会，旋回国密谋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任内政部长，二次革命时讨袁，任吴淞要塞司令，失败后逃往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部长，兼《民国》杂志社总理。

② 于右任（1879—1964），字伯循，陕西三原人。光绪举人。1906年赴日本加入同盟会。1907年在上海创刊《神州日报》，任社长。1909年起，相继创刊《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宣传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任交通部次长，“宋案”发生后，致力于反袁斗争。

③ 《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第180～181页；《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

④ 吕志伊（1881—1940），字天民，号革农，云南思茅人。清末留学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和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05年加入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评议。后被推为云南支部长。云南光复后，任参议院参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任司法部次长。1913年被选为国会议员。“二次革命”爆发后，南下上海从事反袁斗争。1915年初回到云南运动滇军讨袁，并赴海外筹款。

⑤ 詹秉忠、孙天霖：《护国之役中的唐继尧及其与蔡锷的关系》，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9页。

⑥ 《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第181页。

之际，“痛宗国之陆沉，愤独夫之肆虐，爰率义师，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孙中山号召：“中原豪俊，望旆来归；草泽英雄，闻风斯起。”宣布优待政策，“诸袁将吏士卒反正及降者，不次擢赏，勿有所问”。警告袁世凯的走卒，“若其弃顺效逆，执迷不复，大兵既至，诛罚必申，虽欲悔之，晚无及也。布告天下，咸使闻之”^①。从此，孙中山积极策划联络国内外反袁势力，再次发动武装倒袁反对帝制复辟的斗争。

黄兴与孙中山携手

1914年3月，孙中山在《致黄兴书》中总结“二次革命”之教训，指出对袁世凯残杀革命元勋，是不能依靠法律解决的，希望与黄兴“同心一致，乘机以起”^②，把革命进行到底。7月，当中华革命党成立时，黄兴已经离开日本去美国，拒绝加入该党。“宋案”发生后，黄兴就主张法律解决。初入美国后，他又宣布：“中国建立共和政府的时机业已成熟……我们过去希望，现在仍然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国问题。”^③1915年春，袁世凯政府与日本谈判“二十一条”时放出谣言，说革命领袖在国外企图借助列强力量来推翻北京政府。黄兴乃与旅居南洋的李烈钧、陈炯明^④、钮永建^⑤往返函商，于2月25日联电上海、北京各报，阐明他们对国内政治的态度。他们申明，自赣宁之役以后，抱定“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更不会假借外力干预国事。“一族以内之事，纵有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依赖他族，国必不保。”至于国内有人“畏避革命”的问题，黄兴说革命是否发生，不由“革命自身”决

① 《讨袁檄文》，见《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8～99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6～97页。

③ 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9页。

④ 陈炯明（1878—1933），字竞存，广东海丰人。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1909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广东副都督、都督等职。“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海外，在新加坡组织“中华水利促成社”。护国运动中组织粤军，自任总司令。

⑤ 钮永建（1870—1965），字惕生，也作铁生，上海人。同盟会员。湖北武备学堂毕业，清末任广西将弁学堂监督、督练公所帮办。辛亥革命后，历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谋部次长、国民党江苏省主席、考试院副院长等职。“二次革命”后，亡命日本。

定，“而当卜之政象良恶”与否，是由全国之人心所向，绝不是由少数人所决定的。今日之政象如何呢？“年来内政荒芜，纪纲坠地，国情愈恶，民困愈滋。一言以蔽之，只知有私，不知有国”，“空尸共和之名，有过专制之实”。“今吾国不见国家，不见国民，而惟见一人。”因此说“外交受迫，虽有时势因缘”，而个人专制，内政不修，是“最易取侮”的根本原因。他正告袁世凯：“夫只知媚外，亦有穷时；专务欺民，何异自杀？”黄兴等人一方面表示今“遇有大事与吾徒有关者，亦惟谨守绳墨，使不危及邦家而已”；另一方面又提出，“吾国经此惩创，实乃迷梦猛醒发愤独立之秋”，生死存亡，“惟视民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①。这一措辞委婉、内容含蓄的通电，似自责“辛丑之非”，更似责袁世凯专制独裁之罪；既自辩未借外力，更斥袁世凯卖国媚外；既表明遇事“谨守绳墨”，更表明绝不会坐视国家之沦亡。

3月，孙中山致黄兴书，要求与黄“同心一致，乘机以起”。“夏间，欧事研究会和中华革命党双方在日本进行磋商，但他们在团结合作方面没有取得显著进展。”^②中华革命党的胡汉民、邓铿和欧事研究会的陈炯明、李烈钧等各派人，都在南洋互争地盘，各自筹款，准备讨袁。形势的发展，急需各派革命势力团结起来，共同反袁。当筹安会出笼变更国体之喧嚣声传到美国时，黄兴致书孙中山，派其子黄一欧面交。信中大意是：袁将帝制自为，发难机会已到，如有所命，亟愿效力^③。至此，黄兴与孙中山又在反对封建专制保卫共和政体的斗争中携起手来，他们各自指挥欧事研究会和中华革命党的成员回国，联合起兵讨袁。

讨袁联合战线形成

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暗流日益高涨之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地主买办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顿时尖锐起来，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在保卫民主共和政治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袁世

① 《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96～399页。

② 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5～176页。

③ 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说》，见《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第182页。

凯复辟帝制的斗争。梁启超检讨了过去由于党派偏见，做了错事；孙中山派吕志伊回国与反袁势力联合，黄兴重新与孙中山携手反袁。一个讨袁护国的联合战线出现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各派把反对封建专制继续进行下去的一个佳兆。所以黄兴说：“兹幸袁逆狡谋已露，忧时爱国之士皆齐其心志，并其智力，奔走于一途，此诚国家之福。”^① 梁启超也说：“盖此次各派皆经淘汰，去莠留良，其良者皆饱受数年来苦痛之教训，客气悉除，误解一扫，人人各自忏悔其前此之所为，温和派有然，激烈派有然，此佳朕也。”^② 当时报刊亦评论说，两党以救国为前提，“已早不存党派意见，凡志在讨袁者，一是推诚结纳，当云南起义前，两党之痕迹，殆已合同而化矣”^③。

在反对袁世凯专制复辟的斗争中，以孙中山的发动最早，态度也极坚决，但他身居日本，以他为首的中华革命党势力不大，在国外与欧事研究会的矛盾仍不能调和，在国内没有多大的影响，无法掌握反袁斗争的领导权。以黄兴为代表的欧事研究会分散在美国及南洋各地，且一度暂停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国内反袁风暴开始以后，他强调要在美国进行外交及筹款工作，不肯回国。在这种情况下，反袁护国的任务就自然落到以梁启超、蔡锷为首的进步党人身上。他们勇敢地挑起了这一重担，顺应了历史潮流，领导了国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非袁系军阀，并利用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袁世凯，从政治上、军事上发动了对袁世凯的全面攻击。

① 《致国内友人书》（1915年12月18日），见《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13页。

② 《从军日记》，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24页。

③ 《护国军纪事》后编，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92页。

第三章 咨受大计 部署略定

一、蔡锷投了“拥护帝制”的票

师生之间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十岁时就读完四书五经，后因家庭贫困无法继续学习，十二岁时由同乡维新派人士樊锥免费收为弟子，十四岁时(1896年)随师樊锥在长沙读书。此时正值甲午战争以后，维新志士掀起了救亡图存的高潮，湖南之变法声势尤盛。1897年，江标、唐才常等人创办《湘学新报》，进行宣传鼓动。同年10月，由谭嗣同等人发起，湖南巡抚陈宝箴在长沙设立湖南时务学堂，以谭嗣同为学堂总监，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宣传民权革命，培养维新人才。时务学堂创办时，蔡锷即考入该校，成为第一届高才生，梁很器重蔡，而蔡也很崇仰梁，视为知己，对梁的主张言听计从。在这里，蔡锷深受梁启超变法思想的影响，从此，梁、蔡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1899年夏，蔡锷去上海，在梁启超的帮助下东渡日本，先后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士官学校学习。1904年末回国后，曾在江西、湖南军事学堂任教习。1905年夏被调至广西，历任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陆军小学堂总办、新军混成协协统等职，训练新式军队，极负时誉。1911年初至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与同盟会革命党人多有联络。是年

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①等在昆明发动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被推为总指挥。不久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声明“铲除专制政体”，“维护共和”^②，并组织援川军一师，以韩建铎^③为师长，协助四川独立。又组织云南北伐军，以云南军都督府军政、参谋两部次长唐继尧^④为北伐军司令，率四千人入贵州，准备经贵阳入湖南，声援湖北，抵御袁世凯军之进攻。唐继尧入黔后，被推为贵州省都督。

1912年初，谷钟秀、吴景濂^⑤等组织统一共和党，推蔡锷、王芝祥^⑥为总干事，“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⑦。这是由原中国同盟会成员联合部分立宪派成员组成的。8月，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四个政团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内部分推蔡锷为云南支部长，李根源为副支部长，但蔡锷声明脱离统一共和党，并坚辞国民党云南支部长职务。1913年5月，梁

①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又字雪生，云南腾冲人。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同盟会员。历充云南讲武堂监督、总办。辛亥革命时为督练处参议官，后任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总长兼参谋部次长。“二次革命”后逃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与黄兴等成立欧事研究会。

② 孙璞：《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6页。

③ 韩建铎，又名韩国饶，字幼泉，河南人。辛亥革命时为炮队十九标统带，后为军务部次长，继任第一师师长。

④ 唐继尧（1883—1927），字蓂赓、蓂耕，云南会泽人。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同盟会员。1911年任云南新军管带，旋在昆明参加起义，任军政府军政部次长兼参谋部次长。后列名进步党名誉理事。

⑤ 吴景濂（1875—1944），字莲伯、莲白、濂伯，奉天宁远人。1907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后，留学日本。1909年任奉天谘议局议员，旋任议长。1912年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后任北京参议院议员、议长，国民党理事，一度担任理事长。国会解散后，于1916年3月率部分议员南下反袁。

⑥ 王芝祥（1858—1930），字铁珊，直隶通县人。清末举人。广西布政使。辛亥革命后出任广西副都督，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任陆军部高等顾问、第三军军长。

⑦ 《统一共和党规约》，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7页。

启超组成进步党，蔡锷任名誉理事。蔡锷和梁启超一样，曾认为“袁是中国的一个人材，能把中国治理好”^①，对袁世凯曾抱有很大的幻想，支持袁世凯的统治。“二次革命”发生后，蔡锷与梁启超持同一态度，他致电袁世凯说：“知赣事已决裂，积年痼毒，趁此一决，未始非福。……惟恳分饬皖、宁，严防分窜，一面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② 蔡锷、唐继尧还秉承袁世凯之命令，派兵入川，打败了革命党人熊克武军，作了袁世凯的工具。

受骗入京

“二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袁世凯于9月任命进步党人熊希龄组织“人才内阁”。此时，蔡锷也想有更大的作为。他认为：云南地处边陲，山川阻塞，交通不便，辛亥革命前是受协饷的省份，地方贫瘠，没有多余的经费练兵，一旦国家有事，不能应付时局的变化。辛亥革命后，清朝虽被推翻了，但以后执掌政权的人野心勃勃，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尚有许多困难，如果不掌握适当的地盘，训练一批军队，就不能问鼎中原，左右全局。希望能在长江下游或黄河一带找个较大的省份，以便施展宏图，应付大局。因此，他一再写信给梁启超，要求调出云南，请梁予以协助。梁启超也乐于在袁世凯面前为蔡出力，促成其事^③。而袁世凯已识破进步党人梁启超、蔡锷的图谋，对蔡十分疑惧，早已有了防范，正欲削弱地方实力派，于是满口答应，并表示说：“可以让蔡松坡来中央组阁，或调到湖南。”梁启超丝毫不怀疑袁会有任何阴谋，即将情况密电蔡锷。袁世凯还怕蔡不会马上就来，又派湘人教育总长范源廉^④的

① 赵钟奇：《云南护国前后回忆》，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5页。

② 《蔡锷致北京政府电》，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7页。

③ 赵钟奇：《云南护国前后回忆》，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④ 范源廉（1879—1927），字静生，湖南湘阴人。湖南时务学堂学生。1898年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后转大同高等学校，倾向保皇会，与同盟会也有往来。辛亥革命后，加入共和党。1916年参加护国之役，任护国军务院驻沪委员，此后历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

弟弟范熙绩（日本士官学校学生）去云南诱蔡离滇^①。蔡既得梁启超的密电，又见范来，对袁亦深信不疑。蔡保举唐继尧继任滇督，也得到袁的同意。于是蔡答应交卸。蔡初得梁电，即作了回湘计划，派其参谋长沈汪度（日本士官学校学生）先回湖南活动联系^②。10月10日，蔡锷交卸云南都督^③后，迟迟未见发表他为湘督，内心颇为不满，且因不能再在云南住下去，乃于11月离滇^④，转赴香港，以观变化。及抵港后，才知道袁世凯已于10月18日令谭延闿入京“待罪”（“二次革命”时湖南宣布独立），任汤芑铭为湖南都督，深感受骗上当，恨袁已极，但又不得不经上海去北京。

“忠于”职守

蔡锷抵北京后，袁世凯派员热情欢迎，赠万元以祝寿，蔡锷谢辞。陆军部次长陈宦来劝说，如果拒绝，是对大总统的不礼貌行为，蔡乃接受。9月，当进步党内阁筹组时，梁启超曾提名蔡锷任陆军总长，遭到袁世凯的拒绝。蔡锷入京后，袁世凯却又大肆羁縻，结之以“恩”，任蔡锷为陆军编译处副总裁，并加昭威将军头衔。随后，又任命为全国经界局督办、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处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这些头衔都不小，却无实权。自从1914年5月9日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王士

① 关于袁世凯派谁去滇诱蔡的问题，众说不一。一、孙永安《云南护国起义的回忆》说，袁“曾派陈宦与蔡商量，允许调蔡为湖南都督”。（《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4页）二、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说，袁“派大员汤某来昆向滇督蔡锷征询意见，蔡表示愿回湘为桑梓尽义务。……”（《云南文史资料选集》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0页）三、赵钟奇《云南护国前后回忆》说，袁氏“又派湘人教育总长范源廉的弟弟范熙绩（日本士官留学生）来云南诱蔡离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6页）

②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6页。

③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18页。

④ 赵钟秀：《云南护国前后回忆》，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7页。

珍^①为坐办后，掌握了军事实权。段祺瑞任陆军编译处总裁，并无实际军权。段祺瑞尚且如此，更何况陆军编译处副总裁蔡锷呢？所谓全国经界局，主管全国土地经界之测量，清丈田亩，确定各类田商之等级及其应纳税额等。以一个享有盛名的武职将领，去负责清丈土地之类的闲差，实际上等于软禁。不仅如此，袁世凯随着对进步党人的压制和帝制丑剧的上演，对拥护共和制度的蔡锷严加防范，防止他与梁启超联系，防止他逃出京师。

但是，蔡锷对袁世凯委以闲职从表面上看来都是十分积极热心的。在军事方面，他与青年军官阎锡山、张绍曾、尹昌衡、蒋方震等十一人组织军事研究会，经常聚会讨论和演讲各种军事问题、军事计划，还请外国军事专家演讲，谋图改进军事教育，提高军事技术，并写成《军事计划》一书^②献给袁世凯，以求富国强兵。他虽任统率办事处处员，出勤却极认真，几乎是“无日不到”，对袁世凯“似甚驯服”^③。对经界局之事务也相当重视，组织力量在短期内整理和编译中外经界图籍，订定关于经界事宜规章数十条，编成《经界法规草案》、《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④等书，准备清丈土地，“厘定田制以利民”。当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时，蔡锷以参议院参政的名义，在参议院会议上发表演说，要求拒绝“二十一条”，主张下定最后付之一战的决心。同时，他还制订了秘密对日作战计划，以防不测，并把这个作战计划向袁世凯作了报告^⑤，俨然以衷心拥护袁大总统的面貌出现。

投了“拥护帝制”的票

筹安会发起以前，杨度几乎每天不间断地访问蔡锷，劝他加入

① 王士珍（1861—1930），原名世珍，字聘卿，直隶正定人。北洋武备学堂肄业。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任工程学堂总办兼工兵营统带，受袁世凯重用，与冯国璋、段祺瑞同为北洋军骨干，即所谓“北洋三杰”。历任步兵第一协协统、第六镇统制。辛亥革命后，隐居正定。1914年，袁世凯授他为陆军上将，请其出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坐办。次年接代段祺瑞陆军总长职。袁死后，以北洋派元老身份调停皖系、直系、奉系的冲突。

②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0～341页。

③ 《蔡松坡出京之历史》，载《民国日报》，1916年2月14日。

④ 刘达武编：《蔡松坡先生遗集》，邵阳亚东印书局，1943年。

⑤ 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1915年条。

筹安会发起人之列。蔡借词推脱。杨又请蔡锷去天津以师生关系劝梁启超不要发表反对帝制的议论^①。其实，蔡锷与梁启超的政治主张和遭遇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息息相通。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天，即8月15日，蔡锷以受杨度之托劝梁停止反对帝制为由，阳奉而阴违之，从北京搭晚车赶到天津，拉梁和另外一位朋友到汤觉顿^②寓处，却连夜共商了反袁对策。他们感到“若是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他们决定，由蔡锷亲自回云南发动。在此举动之前，一方面由蔡锷打电报把重要人物叫来，再派人去云南筹备反袁；另一方面由梁启超著文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蔡锷表面上和梁启超“分道扬镳”。梁对蔡说：“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③因此，当《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后，蔡锷在北京到处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那些袁党的人便问他：“你为什么劝你先生？”他说：“书呆子那里劝得转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④为了避免袁党的猜疑，8月25日，蔡锷在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时，提笔签了头名。此后，他经常和杨度等在八大胡同饮酒看花，与云吉班妓女小凤仙终日作乐，以迷惑袁世凯的特务监视。更有甚者，当筹安会通电各省军政长官及商会派代表到京请愿改变国体，云南将军唐继尧、贵阳护军刘显世^⑤就此向蔡锷请示机宜时，蔡锷多次复电，授意“赞成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149页。

② 汤觉顿（1875—1916），字荷庵，广东番禺人。幼与梁启超同学于万木草堂，戊戌后去日本，治生计学，与梁启超相从十余年。民国元年，任中国银行总裁。进步党骨干，为该党与袁世凯最接近之一人。帝制议兴，先期辞职，隐居天津，与梁启超、蔡锷策划反袁，“夙有梁之智囊之称”，袁氏敬畏之。

③ 《护国之役回顾谈》，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89～90页。

④ 《护国之役回顾谈》，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89～90页。

⑤ 刘显世（1871—1927），字如周，贵州兴义人。历任贵州中西两路统领、新军第四标统等职。辛亥革命时任贵州军政部长、民军总司令。1913年任贵州护军使，督理贵州军务。1916年参加护国战争。

帝制”。8月26日《复刘显世电》说：“筹安会发起后，京外多主张赞同，军界重要诸人亦皆预闻其事。此事关系国家大计，势在必行。该会既有电相嘱，仍以推举代表为宜。”^①当时唐继尧电商蔡锷拟派经界局秘书长云南人周钟岳^②为代表。9月1日，蔡锷复电唐继尧说：“周钟岳已派赴东省调查经界事宜，刻难回京。筹安会代表，请另派替员。”^③9月4日，蔡锷又复电刘显世说：“此事既经发动，允宜迅捷，以各省文武长官合词环请为宜。若待诸公民请愿，或他种机关之决议，手续迂回繁重，反多窒碍也。北方军人已一致赞同，南方军界虽电未到齐，以主峰輿望及数年来之恩威所及，似亦无他。各国态度尚未明了。据当事人云：曾分别疏通，意尚不恶，等语。以大势度之，除东邻外，当无虞也。”^④9月18日，蔡锷又复电刘显世，“国体事现仍进行”，各省将军、巡按使来电，“主张均归一致。尊处尽可电院表示赞同”^⑤。从以上蔡锷与唐、刘之往返电文看，唐继尧、刘显世在云南、贵州不遗余力地推行帝制，与蔡锷当时对袁世凯之策略有一定的关系。

二、策划西南发难

秘密策划

在8月15日晚的天津四人会议上，梁启超、蔡锷、汤觉顿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旧国民党的人，都已逃亡海外，在国内的许多军人文人都被袁世凯收买得干干净净”。蔡锷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动。我们明知力量有限，

①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6页。

② 周钟岳（1876—1955），字惺甫，号惺庵，白族，云南剑川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为云南都督府秘书长。后随蔡锷入京，任经界局秘书长兼评议委员会主任。后来任唐继尧、龙云的秘书长，云南省代省长，国民党中央政府内政部长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

③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9页。

④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1页。

⑤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3页。

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①此后，梁、蔡一文一武分头行动。

当筹安会积极筹组之时，8月20日，蔡锷即电贵阳护军刘显世之弟刘显治，望“能早日来京”^②。9月3日，又复电刚被袁世凯免职的贵州巡按使戴戡^③，“能早来京，甚佳”^④。10月，戴戡及贵州陆军第一团团长王文华^⑤之胞兄王伯群^⑥同到北京经界局^⑦以后，梁启超、蔡锷、戴戡以及进步党活跃分子王伯群、汤觉顿、蹇季常、徐佛苏等在众议院副议长、进步党名誉理事陈国祥家（天津火道口）多次密商，策划倒袁^⑧。在梁启超的领导下，他们决议先从云南发动，“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⑨。此后，他们即积极行动及布置力量，为云南发难作准备。

8月20日，蔡锷即电贵阳巡按使刘显治，拟令韩凤楼^⑩赴滇

① 《护国之役回顾谈》，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89页。

②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5页。

③ 戴戡（1879—1917），字循若，号锡九，贵州人。曾留学日本。1911年贵州光复后，由省绅推举赴昆明，向云南都督蔡锷乞师。1912年冬随唐继尧所部滇军返贵州。唐任贵州都督，他出任都督府参赞。1913年秋为贵州省长，次年改为巡按使。1915年解职入京，被任为参议院参政。此人博学多才，有勇有谋。

④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0页。

⑤ 王文华（1888—1921），字电轮，贵州兴义人，刘显世的外甥，王伯群的兄弟。1904年在美国三藩市（今旧金山）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贵州新军营长，次年升团长，后任黔军第一师师长、护国军第一军右翼东路司令。

⑥ 王伯群（1885—1945），贵州兴义人。留学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报》，任贵州黔中道尹，进步党成员。

⑦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368页。

⑧ 1916年7月15日《通电》，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82页。

⑨ 《国体战争躬历谈》，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44页。

⑩ 韩凤楼，字五峰，河南人。原在云南军界供职，后随蔡锷去北京，充将军事府参军、总统府顾问，与蔡锷、殷承瓚等交往甚密。蔡锷离京后，袁对韩监视极严。后来与张镇芳、袁乃宽极力亲交，每日必至两处吸鸦片，袁渐信他无志，举为国民代表大会中有勋劳于国家之代表。韩投赞成帝制票后，知防范渐疏，星夜便装出京，潜行入滇。

黔，协商一切，希望刘显治在其兄台贵阳护军使面前加以疏通。不久，又电刘显治、刘显世，荐陆军少将赵恒愚、江隼、张承礼入黔任事，为贵州独立作准备。8月23日，蔡锷致电云南唐继尧、贵阳刘显世、南宁陆荣廷^①、蒙自沈汪度^②师长、成都刘存厚^③师长、泸州雷飙^④旅长等，谓“国体问题”“关系国家前途甚巨”，“务望稳静，以靖地方”^⑤。当时蒙自沈汪度公开反对帝制，于赞成君主公电独不签名，被帝制派毒死。9月22日，蔡锷打电报给唐继尧，拟推荐总统府顾问韩凤楼继任蒙自师长，以保滇省南部之安全。当时，唐继尧电商蔡锷，提出以刘祖武^⑥继任蒙自师长，蔡复电表示十分满意。当唐继尧派张骥先赴滇西腾越时，蔡致电祝贺，又荐南海王广龄^⑦任滇省警察处长，对云南反袁势力作了初步安排。同月，蔡锷致电雷飙师长说：“兄在川治军，须处处留心人才，为将来国家用。凡各军队长官尤应时刻留心，与之团结一致。”10月28日，蔡又致电成都将军陈宦说，周钟岳在京“不服水土，拟仍赴川，敬候驱策。该员学识宏通，品行端正，如置之左右，当能仰赞

① 陆荣廷（1865—1927），字干卿，广西武鸣人。游民出身。1907年因镇压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镇南关起义有功，被提升为右江镇总兵。1911年升广西都督。辛亥革命后被推为副都督。沈秉堃督师援鄂，他乘机夺取广西都督职位，后来成为桂系军阀首领。护国战争期间反对袁世凯，响应独立，又任肇庆军务院抚军，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名义率军进入湖南。袁世凯死后，任广东督军。

② 沈汪度（1872—1915），字石荃，湖南长沙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任云南讲武堂教官、讲武堂监督。辛亥革命时与蔡锷等参与“重九起义”。

③ 刘存厚，字积之，四川简州（今简阳）人。举人出身。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任云南武备学堂堂长。民国成立后，任四川陆军第二师师长、重庆镇守使。

④ 雷飙（1866—1960），字时若，湖南邵阳人。湖南武备学堂毕业，同盟会会员。1905年随蔡锷赴广西，任随营学堂教官、陆军小学监督（蔡锷任该校总办）。1909年赴云南，历任管带等职。1915年由蔡锷推荐，任川军旅长。

⑤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6页。

⑥ 刘祖武，字继之，云南昆明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辛亥革命后，历任云南步兵第八团团长、第一旅旅长、第四师师长。

⑦ 王广龄，字懿吉，广东南海人。留学日本，毕业后任广东警务学堂监督等职。辛亥革命时，以警察力促成广东独立。蔡锷督滇，任河口边务帮办。蔡离滇时，王亦同时离滇返粤。帝制起，任广东全省警务处长兼广州警察长。

高深”，希望陈加以调用^①，为将来起义进军四川作准备。又密派杨汝盛、黄实^②等赴滇，名为活动帝制，实则侦察该地将领对袁氏帝制意向如何^③。派毕厚赴广东运动，派彭权、何上林赴广西接洽，派赵恒惕、陈复初回湖南接洽^④。9月底，蔡锷又密电黄兴，告以国内形势及袁世凯密谋称帝情况，并提出拟即赴西南发难，征询黄兴意见^⑤。梁启超、蔡锷在作了上述部署以后，即准备逃离京津，奔赴疆场。

巧计脱逃

黄兴接到蔡锷的信后，即派其长子黄一欧赴日本，与孙中山及各方面加强联系；同时带信给在东京的张孝准^⑥，要他回国与蔡锷密议讨袁方略^⑦。张孝准与蔡锷为日本士官学校老同学，即派了一个姓何的人到北京，将密电码交蔡锷收执。随后又派李小川持张孝准的密函到北京，希望蔡有机会到东京和他们共商讨袁计划^⑧。蔡锷又密派老同学殷承璪^⑨赴东京，和黄兴从美国派回的石陶钧^⑩相晤，告以“不久，将过倭地赴云南，但请设法避去倭新闻记者与袁

① 刘云峰：《护国军纪事》，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8页。

② 黄实，广西籍云南人。北洋军校生，参加过云南“重九起义”，民初曾充云南省会卫戍司令部副官。

③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5～366页。

④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页。

⑤ 《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第182页。

⑥ 张孝准（1881—1925），字云龙，也作闰农、韵农，湖南长沙人。清末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德国陆军大学毕业。1912年任南京留守府军务厅长、湖南军事厅长。1913年7月随黄兴赴南京参加讨袁，事败后亡命日本。欧事研究会成员。

⑦ 参阅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记》，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2页。

⑧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150页。

⑨ 殷承璪（1877—1945），字叙桓，云南陆良人。同盟会员。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辛亥革命前任云南陆军第十九镇正参谋官、参谋处总办，光复后任滇军政府参谋部总长。

⑩ 石陶钧，字醉六，湖南邵阳人。早年就读于长沙校经书院和时务学堂。1903年春赴日本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员。1909年任广西讲武学堂学生队长兼武术教官。武昌起义后到汉阳，随黄兴督战。“二次革命”后随黄兴亡命日本。

探的耳目”^①。

蔡锷在一切公开场合高唱拥护袁世凯称帝，在生活上又经常涉足京中八大胡同妓院，与小凤仙结萍水姻缘，佯装寄情声色，又借口其夫人与小凤仙打闹不休，于9月19日将母亲、夫人送回湖南。他表面不问政治，借以避免袁世凯的怀疑。但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公开反袁及蔡本人的种种举动，毕竟引起了袁世凯及其爪牙们的注意。10月14日^②，袁世凯秘密派人伪装盗匪闯入护国寺棉花胡同蔡宅，翻箱倒柜，搜查信件电报，结果一无所获。对此，蔡锷严词质问，袁世凯故作姿态，下令军警当局缉捕盗犯，并从监狱中提出几名犯人枪决，借以搪塞。

袁世凯从蔡锷那里没有搜查到任何证据，表面上放松了对蔡的监视，实际上仍在加强对蔡的控制。但是，富于政治斗争经验的蔡锷作出了逃离北京的巧妙安排。他以治病为名，不理政事，但自兼统率办事处处员以后，每日上午十一时必到办事处画到。11月11日上午，蔡锷从小凤仙家出来，预先将手表拨到十一点，赶至统率办事处，办公时间尚未到，处内无人。值班人员见蔡，蔡看手表对值班时钟。值班人说：“时钟不错，将军的手表误甚。”蔡锷自言自语地说：“我夜未眠。表或者停。虽然，来太早矣。既来过，则画到可也。”蔡锷画到后机警地溜到东火车站，梁启超早已派了老家人曹福（天津人）买了两张三等票，在车站等候。直到蔡上了火车，曹福才偷偷将车票塞在他的手里。他们两人在车上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火车到了天津站，曹福护送他到意大利租界会见梁。与梁会谈后，又护送他到日租界同仁医院预先订好的房间下榻^③。与此同时，张孝准也到了天津与蔡锷见面，诸事密商妥帖。蔡锷将文件、勋章和多种特任状交张孝准先行带到日本，以便遇险时

① 石陶钧：《六十年的我》。

②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150页。

③ 《蔡锷出京之历史》，载《民国日报》，1916年2月17日；《蔡松坡入滇起义轶闻》，载《中央日报》，1916年2月15日；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151页。关于蔡锷离京情况，记载颇不一致，有说11月19日离京，大抵蔡锷系逃出北京，可无疑义。

设法脱身^①。同时，梁启超、蔡锷派戴戡先由天津启程到香港，派王伯群先去云南，作为蔡锷的开路先锋。12月2日，在梁启超精心安排下，蔡锷晚上三点钟从德义楼来到梁启超家，改穿日本和服，变换姓名，一早便登上日本的运煤船山东丸东渡，在侦察环伺之下安然东游了^②。蔡锷乘船抵日本门司，张孝准、石陶钧、杨源浚^③自东京来迎。蔡锷乃与石改换服装，雇小舟密赴横滨。

一去不返

蔡锷在离天津前夕，给留在北京的周钟岳发一电报，请其代拟请假呈文，向袁世凯报告。周钟岳代蔡所拟请假呈文说：“自今年入秋，复觉脾胃不舒，饮食减少，时作咳嗽，夜不成眠。因夙日尚能耐劳，未加调理。且职务所关，尤不敢稍自暇逸。乃迁延日久，病势加剧。近复感受秋燥，虚火上炎，以致喉痛失音，发热盗汗。诸症并作，迭经延医调治，迄未见痊。据医生诊视，谓操劳过度，心血大亏，且病根本蕴积已久，纯持药力，难收全效。宜择一气候温和之处，静息数月，庶真元一固，药力亦易见功。伏念锷仰荷深知，迭膺重寄，忽膺疾病，有负职司。现在假期已满，病仍未除，惟有仰恳俯赐矜全，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并请派员代理，免旷职务，不胜迫切待命之至。”^④蔡锷到日本后，让石陶钧携带自己的行李去别府箱根，作就医状；他又亲笔书写信件多封，向袁世凯报告他在日本各地游历及就医情况，请张孝准旅行日本各地，每到一处就发出一封信，借以哄骗袁世凯相信他仍在日本。蔡锷事前不经请示而擅自到日本就医，使袁世凯将信将疑。他一面派龚心湛代理经界局督办，派张元奇代理参政院参政，一面仍在蔡的呈文上批准给假，盼望他早日痊愈，回京供职。袁世凯不断收到蔡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152页。

② 祝鸿基：《护国战争》，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4页。

③ 杨源浚（1878—1933），字伯笙，湖南新化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员。武昌起义时，随黄兴参加汉阳保卫战。

④ 周钟岳：《惺庵回顾续录》，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93页。

锷在日本“报告游历的状况，养病的情形”，“见来信笔迹一点不错，邮局的消号一点不错。不由他不信”^①。可是，蔡锷却一去不返，在石陶钧陪同下，迅速乘日轮南下上海、香港，经河内至云南。所以，当袁世凯最初得悉蔡锷潜赴云南时，就不由得大吃一惊。

当蔡锷抵达香港时，巧遇辛亥时在云南的同事和部下李文汉、刘云峰^②等人。刘云峰系唐继尧派往北京的使者，名为觐见，实为了解北京要人之动态。蔡锷对刘说：“你的任务我已代你调查清楚，冯（国璋）、段（祺瑞）对袁此举，均不赞成。段在团城被拘，不能见客；冯在南京不敢多言。你去不但无益，反恐有险，咱们一同回去，预备打仗罢。”^③这样，蔡锷、戴戡、殷承瓚、何鹏翔与刘云峰、李文汉等遂经越南去云南，以云南为基地，发动反袁战争。

蔡锷是梁启超的信徒，蔡对梁执弟子礼，言听计从。梁的政治思想对蔡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关于讨袁的战略策略及蔡锷巧计脱身的经过，先日本，后香港，完全是梁启超帮助策划的^④。后来蔡锷曾经追述说：“当去岁秋冬之交，帝焰炙手可热。锷在京师，间数日辄一诣天津，造先生（指梁启超）之庐，咨受大计。及部署略定，先后南下。”^⑤

梁启超与蔡锷分别时，他们相约发出誓言：“今兹之役若败，则吾侪死之，决不亡命；幸而胜，则吾侪退隐，决不立朝。盖以近年来国中竞争权利之风太盛，吾侪任事者宜以身作则，以矫正之。”梁、蔡的誓言，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决心，也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在近代的政治斗争中缺乏应有的信心，他们不是不欲立朝，而是缺乏足够的力量立足于朝。

① 李文汉：《蔡松坡年谱》，1915年条。

② 刘云峰（生卒年不详），字晓岚，直隶人。保定军官学堂毕业，清末任云南炮队第十九标第二营管带，光复后历任炮队第一标标统、第二师参谋长、第三旅旅长。积极参加护国战争。

③ 李文汉：《护国军起义前蔡锷与唐继尧的关系》；刘云峰：《护国军纪要》，分别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6、88页。

④ 李丕章：《护国军中见闻二三事》，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57～358页。

⑤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2页。

第四章 举起讨袁护国的旗帜

一、动员起来、组织起来

动员起来

在蔡锷离开天津的前夕，11月18日，梁启超写信给在云南、贵州任重要职务的进步党人籍忠寅^①、陈廷策^②、熊范舆^③、刘希陶等，动员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反对袁世凯专制复辟的斗争。他说，对袁世凯不足以“奠定”此共和国，早已感到忧虑，“徒以顾全大局，投鼠忌器之故，甘愿牺牲一切”，与之合作。但一年以来，袁世凯公开破坏一切民权政治，“假面既扬，丑形暴露。凡百政象，众目具瞻”，彻底背叛共和制度。“就令无今兹叛国之举，而听其浸淫脔削，亦终必率全国士夫，皆为禽兽，剥全国之氓庶尽成枯腊，长夜漫漫，亦复何望。”“今更中风狂走，冒天下之大不韪”，愿做一日之天子“虽死无憾”，遂至召11月12

① 籍忠寅，字量济（亮济），河北任邱人。清末举人，宪友会成员。辛亥革命后与梁启超、汤化龙组成民主党。进步党骨干，与梁启超关系甚密。1914年受任可澄之邀入云南，任财政厅厅长。云南起义后，即赴上海、南京，争取冯国璋反袁。

② 陈廷策，字幼苏。清末举人，考中中书，在北京任职。民国成立后，任众议院议员。1914年受任可澄之约到贵州。当时任云南政务厅厅长。进步党员。

③ 熊范舆（1878—1920），字铁崖，贵州贵阳人。清末进士。留日学生，回国后任天津知县、云贵总督李经羲之总文案。民国成立后任贵州省署秘书长、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

日的日、英、法、俄、意五国联合劝告缓办帝制之照会，“使我国民，蒙此奇耻大辱。犹不知悛，强迫劝进，电书旁午，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必欲称帝而后快。如听其发展，四万万人只有死路一条。而今全国士夫，或沉迷利禄，或受其压力，供其蹂躏利用，不敢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吾党“若犹是不自振拔，俯首听命，则天下之大，更复何望”，亡国之责亦不能推卸，“是以义不反顾”，必须起而反袁复辟。今已与蔡锷、戴戡、蹇季常等“反复讨论国家前途及吾侪所以报国之道”，决定反对袁世凯称帝并制订了发难计划，且蔡、戴诸公相继南下，我梁某亦束装待发。在此关键时刻，还必须向诸位说明为什么要发难的道理。

接着，梁启超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状况，具体阐明了必须相见疆场的道理。他说：“第一，吾党夙昔持论，厌畏破坏，常欲维持现状，以图修养，今以四年来试验之结果，此现状多维持一日，则元气多断丧一分，吾辈掷此聪明才力，助人养痍，于心何安，于义何取。”“第二，吾侪自命稳健派者，失败之迹，历历可指也，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而不为人所利用。今根基未覆尽者，只余此区区片土，而人方日甚洞于其旁。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第三，袁世凯“淫威所播，先声夺人”，现在有人乃主张“持重”，不妄动，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不知一年以来，情势已迥异曩昔”。一则袁世凯沉溺于一片劝进声之中，“志满意得，骄盈之气，为众所弃”。彼之心腹大将，对袁氏之作为极度不满，“人各有心”，“同室戈矛”，必将豺虎相斗。二则袁氏“倒行逆施”，“殆近死期”，正待人驱除。第四，有人“持老氏之教，谓不当为”^①，不应反对袁世凯称帝。梁启超指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以今日时势论之，反对袁世凯称帝，“为举天下人人所欢舞以迎”的正义事业，我们必须以“圣贤

① 老子，战国时人。他曾讲“无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最尚自然”等。

之心，豪杰之行”，不为“牛后”，积极领导和投入反袁护国斗争，担当此重任。现在，时势所迫，人心所向，必须进行武装反袁，驱除怪杰。然而在何地发难为最宜呢？梁启超分析当时的形势说：中原处四战之地，如有败衄，“先损声威”，十分不利，故选择进可攻之、退可守之的西南云贵诸省。因此，今日义举之关键，在云南唐继尧和贵州刘显世两将军，梁启超称赞“风义韬略，久为所钦迟”，衷心希望二位将军“见义勇为，当仁不让”，并要求籍忠寅、刘希陶等人积极工作，争取唐、刘二将军，大力赞助义举之成功。

联合发动

梁启超、蔡锷确定以云南为发难之地，除了地利以外，还有人和及其他有利条件。袁世凯镇压了国民党“二次革命”的势力后，北洋军阀的魔爪伸至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及江苏等省，惟云南地处偏远，而唐继尧在“二次革命”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又对袁表示忠诚，故袁对唐未加怀疑，未派北洋军嫡系入滇。唐继尧由于留学日本，毕业于士官学校第六期，又加入过同盟会，后来又成为进步党名誉理事，他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李烈钧等都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利于吸引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高、中级军官及政治活动家投奔到云南。当时，云南两师一旅中的军官，大都为蔡锷部下，具有革命思想，士兵素质较好。且云南军队装备精良，军械也较整齐。蔡锷曾说：“滇军精锐冠于全国。”因此滇军成为云南起义的强大军事基础。

蔡锷从筹安会成立起佯装积极拥护帝制的同时，又派黄永社（蔡锷的学生）、黄实去滇，以“为筹安会活动”为名，秘密策动反袁。黄实，云南人，北洋军校学生，参加过“重九起义”^①，民初曾充云南省会卫戍司令部副官，以后随蔡锷在京做了经界局一员副官。他特别与当时云南掌握实力的少壮派军官即所谓五华山

^① 重九起义：辛亥年武昌起义后，昆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于重阳节（旧历九月九日，公历10月30日）发动起义，击毙统制钟麟同，占领督署，起义成功。11月1日，成立都督府，推蔡锷为都督。史称“重九起义”。

八大队长王秉钧、杨蓁^①、邓泰中、董鸿勋等人私人感情好，他们都是热情饱满、忠诚的革命者。黄永社、黄实除了与滇军高、中级军官接洽外，又在昆明如意巷刘祖武寓所，与唐继尧之胞弟唐继虞会谈蔡锷来滇诸事。所以蔡锷与唐继尧间不仅有函电往来，而且有代表直接联系^②。

1915年初，孙中山先生即派云南同盟会员吕志伊回滇秘密运动军队。吕一到昆明，云南巡按使署即接北京统率办事处电报，拘吕志伊于警察厅。邓泰中、杨蓁得讯，亲到警察厅引吕外出谒唐继尧，因他们都是留学日本之老同盟会员。唐嘱吕暂住邓泰中宅内，以便进一步与孙中山先生取得联系。

董鸿勋，字干臣（干丞），云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及国民党，后又加入中华革命党，原任云南步一团团长，1914年间与杨蓁、邓泰中、黄玉田等合资创办《滇声报》在昆明出版，常登载反袁“社论”，揭露袁世凯丧权辱国的罪恶阴谋，并抨击亲袁派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等甚为激烈。任可澄令地方审判厅拘囚《滇声报》编辑徐虚舟。董不畏强暴，派兵到审判厅迫使释徐。任可澄十分恼火，谓董干涉司法，坚请唐继尧撤免其团长职。董乃出省游说贵州陆军核心人物王文华及上海等地同盟会员以反对袁世凯^③。袁世凯帝制自为，董鸿勋奉孙中山先生委派回滇运动云南军队^④，对发动云南起义起了重要作用。

从一些回忆录的材料看，黄永社、黄实及吕志伊、董鸿勋

① 杨蓁，云南昆明人，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毕业生，时任滇军步兵第七团团长。

② 李丕章：《关于护国之役蔡锷和唐继尧间所出现的分歧》；高蕴华：《护国靖国两役军中遗闻轶事》，分别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45、372页。

③ 杨如轩：《我知道的云南护国起义经过》，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页。

④ 陈天贵：《护国战役亲历记》，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1页。

回滇后，都与杨蓁、邓泰中、罗佩金^①等将领联系，密商讨袁之策。

1915年1月，当日本与袁世凯谈判“二十一条”时，云南步一、步七两团在杨蓁、邓泰中领导下，加紧准备反袁，北京成立筹安会后，更激烈反对帝制。当时滇军中反对帝制最激烈者，上级军官有罗佩金、赵复祥^②、黄毓成^③、叶荃^④、张开儒^⑤、邓泰中^⑥、杨蓁等，中级军官有杜韩甫、马幼伯、李文汉、李植生、田钟谷等。在蔡锷抵达昆明以前，他们与吕志伊、黄实等召开三次会议，决定四项方法：（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送唐到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拥护罗佩金为领袖^⑦。他们热情极高，渴望早日宣布独立，争取和促使唐继尧起兵讨袁。

唐继尧的矛盾

另一方面，帝制派又严重地影响云南政局。当筹安会起，全国一片劝进之声时，云南都督唐继尧参与了劝进。袁世凯为了收买和

① 罗佩金（1878—1922），字镡先、镡轩，云南澄江人。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同盟会员。历充督练处参议官、陆军小学堂总办。辛亥革命时为部队第七十四标统带，后任南征军总统官，继任军政部总长。

② 赵复祥（1881—1920），字凤阶，后更名又新，云南顺宁人。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同盟会员。回滇后历任三十七协管带、三十八协七十五标教练官，驻临安，响应武昌起义，后来去江西，依附李烈钧，任第三旅旅长。“二次革命”后改名回滇，任讲武学校校长。

③ 黄毓成（1884—1958），字斐章，云南镇元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充云南讲武堂教官、马队第十九标教练官。光复后，任马队第一团团长、援川军支队长、贵州第一旅旅长、重庆镇守使，后任滇军第五师师长。

④ 叶荃（1880—1939），字香石，云南云县人。同盟会员。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历任四川教练处帮办、第十七标标统。辛亥革命后，任黔军第一师师长、靖国联军第八军军长。

⑤ 张开儒（1869—1935），字藻林，云南巧家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员。清末任云南讲武堂教官与提调。1911年参加“重九起义”，此后，任援蜀军第一梯团副梯团长兼联队（团）长，率邓泰中等围攻叙府地区“同志军”。1913年被唐继尧命为云南陆军迤南边防第一旅上校旅长，驻防滇东南边境的开化（今文山）。

⑥ 邓泰中，字和卿，云南人。同盟会员。

⑦ 李文汉：《护国军起义前蔡锷与唐继尧的关系》，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38页。

拉拢唐继尧，特派侍卫武官何国华为专使赴云南，授唐一等勋，封开武将军，爵一等毅勇侯。何国华乘海船经海防，转滇越铁路到达昆明时，唐继尧亲自到车站欢迎。自车站至五华山沿途数里，结扎彩绣，夹道欢迎。何国华到昆明把委令交给唐继尧。唐接受后，召集省议会全体议员大会，亲自到省议会宣布，叫议员们投票表示是否赞成袁大总统做皇帝。当时，唐继尧派大量军警宪兵出动，戒备森严，马市口、华山西路一带，架起机关枪。在这种情况下，议员们纷纷写下“赞成”二字。唐继尧又到云南讲武堂宣布后，就正式接受袁世凯的“钦命”，并用开武将军、一等毅勇侯、云南将军的官衔发出布告^①。同时，袁世凯又授任可澄^②子爵，张子贞^③、刘祖武两师长均加男爵，陆军少将黄毓成复职，其他官员逢官加一级。又自十月起，加给滇军薪俸年约三十万元，按月由中央拨给^④。何国华带到昆明的一个说客，到滇军补充队等地去大放厥词，宣传天佑袁氏，必为真命天子，又宣扬袁之德意，封官许愿，叫大家拥护袁世凯称帝^⑤。另外，袁世凯直接派来的盐运使肖坤及阿迷（今开远）县知县张一鯤是袁的心腹，高等审视厅厅长张仁普为袁世凯的内奸，第一师师长张子贞及参谋长路孝忱是亲袁派。以上势力的出现，给反袁势力的发展带来许多威胁及危险。

① 邹若衡：《护国起义前唐继尧的转变和有关蔡锷的二三事》、《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杨如轩：《我知道的云南护国起义经过》，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② 任可澄（1878—1945），字志清，贵州安顺人。清末举人。创办贵州优级师范学堂、法政学堂。唐继尧督黔，与戴戡同任参赞。旋任贵州审计处长、约法会议议员。1914年任云南巡按使。

③ 张子贞，字青圃，云南太和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清末任云南讲武堂教官。辛亥革命后，初任参谋部分部长，旋率部援川，任支队长。后任滇军第一师师长，亲袁派。护国战争爆发后，他从迤西逃跑至北京，做袁世凯将军府之将军。

④ 《云南倡义纪闻》，见《护国军纪事》，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

⑤ 奚济霖：《护国第一军二支队（原步兵七团的回忆）》，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4页。

何国华来滇，除了送委任状，利诱唐继尧及滇军将领外，还负有勘察滇缅边界的任务。他看见唐已受委，议员们都投了赞成袁氏称帝的票，就安然去边疆勘界去了。

从表面上看，辛亥革命后的唐继尧是紧跟袁世凯的，他跟袁世凯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但他也看到，他不是北洋嫡系，如果袁世凯称帝成功，随时都有被袁世凯吃掉的危险，因此，唐与袁之矛盾是主要的。帝制问题发生后，他考虑到“袁世凯拥有全国，兵多将广，粮饷充足，凭借中央政府，发号施令，云南一个边省，地瘠民贫，力量的悬殊，真像以卵击石”，所以他对袁世凯是害怕的^①。在筹安会发起劝进以后，八九月间，他接到蔡锷发来的多次电报，时而要推举代表，拥护帝制，时而告他“国体问题，外交不调”，时而又要他“加意部署震慑，俾免意外”，搞得他依违不定。因此，他曾派刘云峰以覲见为名，试图去北京打听段祺瑞、冯国璋对帝制的态度，以决定对策。唐继尧与蔡锷同为进步党理事，受梁启超的影响较大，且蔡、唐之间关系较为密切。由于梁、蔡的影响，籍忠寅、陈廷策、吕志伊、黄实的进言，滇军反袁将领的敦促，以及袁、唐矛盾之不可调和等，唐继尧决计反袁，这是符合唐继尧的实际情况的。他保护了吕志伊、黄实及邓泰中等人的反袁秘密活动，就是证明。但他又感到力量不足，不敢发动反袁，也是符合真实情况的。正如蔡锷到昆明后即向梁启超报告说：“滇中级军官健者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黄永社等，自筹安会发生后，愤慨异常，屡进于莫督，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莫以未得吾侪之意向所在，且于各方面情形不悉其真相，遂一意稳静。荏苒数月，莫得要领。暨闻敝宅误被搜查，锷引病出京之耗，慷慨激昂之声浪复起。迄王伯群到滇，将锷在津所发一函递到，

① 邹若衡：《护国起义前唐继尧的转变和有关蔡锷的二三事》，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页。

先镬五日抵滇，莫意遂决。”^①

蔡锷与唐继尧都是留日士官生，接受过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辛亥革命时是云南起义的领导人。蔡锷离滇时荐唐继尧继任，又同兼进步党名誉理事。因此，蔡、唐的关系较为密切，但蔡在云南之威信远比唐继尧高，云南军界大都为蔡之旧部，且与国民党人、进步党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唐继尧反袁，希望蔡锷来滇主持，但又怕蔡锷来滇后有碍他的权位。于是蔡锷又设法解释疏通。“蔡松

① 《致梁启超书》，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9页。

考：据周钟岳在《云南护国首义之历史谈》中说，蔡锷在北京时曾密电唐继尧谓：“袁氏变更国体，势在必行。公意旨如何？”唐复电说：“万难屈从。滇中已有计划。请公来南。”这种回忆，不一定准确，要是唐早已有决心，“万难屈从”，蔡锷是不会不知道的，因此，蔡锷也就不会讲自王伯群到滇后，“莫意遂决”。周钟岳在该文中又说，唐继尧早已决心反袁，“唐公已于九月十一日密召军界中坚人物等于混战团本部，宣示宗旨……愿与天下英雄共图之，诸君其有意乎？”“各军官闻之，皆慷慨愿效死命。唐公乃与诸军官先约定三事共同遵守……”“十月初七日召集军界中坚诸人，告以：袁氏窃国已成事实。吾辈与民国共生死，若不急起图之，内何以对吾心，外何以对我民耶？闻者无不感动。乃决定起义之时机……宣告独立。”“唐公复于十一月初三召集各军官为第三次会议。谓：‘袁氏盗国，天下共愤，而吾之布置亦大有头绪。……吾辈军人报国有此时也。’各军官皆唯唯奉命”等等。周钟岳的这段回忆也是不能令人相信的。一、蔡锷于11月11日离开北京，当时周钟岳仍在经界局供职，且周为蔡代拟过请假呈文。因此，11月11日以前唐继尧召开的三次会议，他并非亲身经历，所记亦不真切。二、周钟岳所记唐继尧召开三次军事会议的情况及文字，与董雨苍遗作《云南护国历史资料》中的记载相同。同时，护国战争时唐继尧的秘书何慧青在《护国之役云南起义秘史》（《逸经》第21期）中也有一段说唐继尧曾秘密召开三次会议，其内容与周钟岳之记载亦完全相同。何慧青是在护国战争廿一周年时发表的文章，该文扬唐抑蔡，说护国战争是唐继尧一手发动起来的。但当时云南省秘书长由云龙在《护国史稿》中，却未提到11月11日前唐继尧召开三次反袁会议。三、当时袁世凯在滇有特使、特务及内奸，许多人的态度又不明朗，唐不可能召集军界中坚会议。四、护国军第三军第一梯团长赵钟奇在《护国运动的回忆》中肯定了唐继尧的功绩，但未提到唐继尧11月11日前召集军事会议的事。朱德在《辛亥革命回忆》中说，“唐继尧迫于形势，也宣布云南独立”。邓汉祥（当时在陈宦部下任职）在《滇黔反对袁世凯帝制的经过》一文中，具体指出周钟岳的说法不符合史实。

从一些资料看，滇军中、下级军官确曾于9月11日、10月11日、11月11日分别召开过三次会议，秘谋反袁。但这些会议是否由唐所主持，尚无确证。但唐不仅没有反对这些会议，反而保护了反袁势力，则是无疑的。

坡之入滇起义，乃黄克强所极力疏通。蔡在滇声望甚高，唐继尧敬而惮之，蔡不敢轻入。克强在美，设机关于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黄接到蔡锷将赴西南发难的密信，致函唐继尧说，蔡锷往滇“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①，希望唐继尧与蔡合作。唐继尧对蔡锷的疑心解除后，遂决定对蔡之来滇热忱欢迎。

李、蔡入滇

蔡锷抵日本后，在黄兴所派石陶钧、张孝准的掩护及周密设计下，躲开了日本新闻记者与袁探的耳目，与参谋长石陶钧一道安全地经过香港去河内，准备直奔云南。

李烈钧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忍泪去国”，侨居南洋，“每顾宗邦，忧心如沸。逆贼袁世凯毁弃国宪，剥割弟昆，骄恣之余，竟至称帝，此其恶极祸盈，不义自毙，国人曰杀，奚待撮陈”。希望海内各知友，“化除畛域，各尽所能，以相呼应”^②，同心杀贼。

袁世凯称帝以后，在新加坡活动的欧事研究会诸同志李烈钧、李根源等，在黄兴的指导下积极筹划反袁。李烈钧得黄兴“促其回国起兵讨袁”^③之电后，于11月初，又电熊克武等“约去香港一同去昆明”^④。此时，蔡锷偕戴戡、殷承瓚亦在香港，遂与李烈钧、方声涛^⑤、熊克武、龚振鹏等会，意旨合，相率赴滇^⑥。决定先由

① 《阿嘉会日记》，1937年1月13日条，见毛注青著：《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3页。

② 《李总司令告海内外各知友》，见《护国军纪事》第一册，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88页。

③ 但懋辛：《护国之役回忆录》，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7页。

④ 毛注青著：《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2页。

⑤ 方声涛（1885—1934），字韵松，福建侯官人。同盟会员。清末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历任南京第九镇马标教练官、云南讲武堂教官、广西兵备处帮办、学兵营营长、四川第十七镇正参谋官。辛亥革命后任蜀军政府参谋长、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顾问、江西混成旅旅长等职。

⑥ 邓之诚：《护国军纪实》，载《史学年报》，1935年，第2卷第4期。

方声涛化装成商人，入滇活动。方到昆明后，与唐继尧等晤面洽商，滇省将领罗佩金、李鸿祥^①、顾品珍^②、刘祖武、刘云峰、黄毓成、张开儒、韩凤楼、邓泰中、杨蓁、董鸿勋、何海清^③、盛荣超等，几次密议，一致主张讨袁。蔡锷由北京电唐继尧，谓：“帝制已成，速为筹备。”梁启超、蔡锷派出的王伯群，于12月15日抵昆明，李烈钧于12月17日亦率成桄、杨益谦、张怀信等化装入滇抵达昆明，住黄毓成家，与唐继尧等秘密协商起义^④。不久，井勿幕^⑤、程潜^⑥、熊克武、龚振鹏等亦先后到达昆明。

李烈钧等来昆明之消息，迅速被袁世凯所探知，乃急电训令唐继尧“倘有乱党赴滇，或猝生扰乱，准唐继尧以全权便宜处置，无论何人，但有谋乱行为，立置于法。……所有侦剿出力将弁，均准破格请奖”等语。12月16日，唐继尧接法国领事转来蔡锷由河内

① 李鸿祥（1879—1963），字翼廷，云南新兴人。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为步队第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带，后任旅长。

② 顾品珍（1883—1922），字筱斋，云南昆明人。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云南讲武堂骑兵科教官。辛亥参加云南光复之役，历任滇军第一师师长、陆军中将、云南讲武堂堂长。

③ 何海清（1875—1950），字镜寰，湖南湘乡人。清末留学日本习军事。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归国后调充云南新军七十五标一营队官，后升管带。辛亥云南光复，立有战功。后随唐继尧赴黔，先后担任北伐大队长、联队长。

④ 陈亚波：《护国之役李烈钧等入滇及叛朝龙潭战役见闻》，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1页。

⑤ 井勿幕（1888—1918），字文渊，陕西蒲城人。1903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大成中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旋奉孙中山命回陕西建立支部，奔走于东京陕西间，宣传和组织革命。1911年10月西安光复，任陕西北路安抚招讨使。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陕西副支部长，“二次革命”后避居日本。1915年在上海和康宝忠、李根源、但懋辛等密谋反袁。11月，与熊克武等人经越南赴云南参加护国战争，先后任刘云峰部参谋和熊克武部参谋长，奔走于蔡锷与熊克武军间。1918年被举为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不久，被马凌甫杀害。

⑥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1904年留学日本，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调往四川训练新军。武昌起义后，黄兴派他协助曾继梧指挥炮兵团。1913年任湖南军事厅长。“二次革命”后亡命日本。1915年冬回国讨袁。次年1月到达昆明，护国军政府派他任湖南招讨使，进入湘境后，在靖县被举为护国军湖南总司令。

拍来密电知即将来昆。唐接电后召其弟警卫团团长沙唐继虞^①面授机宜，命其率警卫两连、宪兵一分队，于17日搭滇越火车拟往河内迎接。而袁世凯又急电唐继尧“蔡锷、戴戡偕同乱党入滇，应严密防范”^②等语。袁知唐有变，又密电蒙自道尹周沆^③、阿迷县知县张一鲲，相机暗杀。周、张接电后，在蒙自关道署召开多次会议，决定组织暗杀队，自越至滇捕杀或狙击。倘狙击不成，即在碧色、阿迷两站，借设宴欢迎为名，乘隙毒死或劫杀蔡锷。唐继尧面对这一阴谋，急密电驻蒙自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严加布防。团长唐继虞带亲随二人，并携有唐继尧手书二封，乘车至河内迎蔡。河内梅总督派专车二辆、法国宪兵二班，护送蔡、唐二人到越境老街。在唐继虞及其卫队的严密保护下，机智地闯过周沆、张一鲲设下的重重陷阱，蔡锷于19日^④顺利抵达昆明。

蔡锷与唐继尧早有“密电相商，共同策划反袁的事情。一切都表示同意”^⑤。因此，当蔡锷抵昆明以前，唐已有所布置。蔡锷在留日士官生中资历较早，又是“重九起义”的领袖，曾任广西陆军学校校长，许多中级军官都是他的学生，他抵滇后，凭借他在云南的威信及与进步党、国民党的密切联系，促使各派反袁政治力量冶于一炉，汇聚成一股冲击洪宪帝制的革命洪流，加速了护国战争的爆发。

① 唐继虞（1890—？），字夔虞，云南会泽人。云南讲武学堂毕业。历任贵州军警局长，贵州警察所长，云南混成团长、警卫团长等职。

② 何慧青：《护国之役云南起义秘史》，载《逸经》第21期，第1190页。

③ 周沆，字季员，贵州人。清末进士。在云南做官很久。1912年初，周和戴戡等联合向蔡锷乞师，唐继尧受蔡令入黔，自为都督，周任唐的政务处长，1913年底随唐继尧赴滇，任蒙自道尹。

④ 考察蔡锷抵达昆明的日期，有几种说法：（一）高劳《帝制运动始末记》（《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第十三卷第七号，民国五年7月10日）：“22日，蔡、戴抵滇”；王印源《护国起义前唐继尧迎护蔡锷到昆明亲历记》：“22日，由阿迷开车”，蔡锷“直达昆明”。（二）董雨苍《云南护国历史资料》：“本月18日，蔡锷、李烈钧相继到滇”；李文汉《关于蔡锷的几点回忆》、祝鸿基《护国战争》都说蔡锷12月18日抵昆明。（三）奚济霖《护国第一军二支队（原步七团）的回忆》：“蔡锷在12月19日到云南边境的河口，21日到昆明。”（四）蔡锷《致雷飙电》（1915年12月21日）：“锷十九日抵滇，与莫公暨各将军备极欢洽。”

⑤ 赵钟奇：《护国运动的回忆》，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

组织起来

蔡锷抵达昆明的当天晚上，唐继尧在五华山都督府召集军政师(厅)、团级以上将领会议，热烈欢迎蔡锷、李烈钧等莅滇。此后两三天，日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有关起义方略及组织领导问题。参加会议的成员有各方面的代表：进步党方面，唐继尧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来列名进步党名誉理事，成员有蔡锷、任可澄、戴戡、陈廷策、籍忠寅、王伯群等；欧事研究会有李烈钧、但懋辛^①、熊克武等；同盟会有罗佩金、黄毓成、邓泰中（只参加19日会议）等；国民党有张子贞、顾品珍、赵又新、杨杰、唐继虞、李友勋、赵世铭、庾恩赐^②、杨蓁、由云龙等；中华革命党有董鸿勋等；党籍未详的有成桃、刘法坤、孙永安、段承璫、戡翼翹、叶成林、欧阳沂、何海清、马为麟、吴和宣、盛荣超、邓坝、李沛、徐进、马聪、秦光弟、李修家、李朝阳、李琪、胡道文、李雁宾、周官、李曰垓^③等。参加会议者近五十人^④。

这是民国存亡攸关的重要时刻，资产阶级各个派别达到了有史以来的空前大团结。这是团结的大会，誓师的大会。

19日的会议由唐继尧主持，他首先介绍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并说袁氏背叛民国帝制自为的情形，云南有声罪致讨之责。是以早与蔡公有计划，今蔡公已到，请蔡公将外边的情报谈谈”。接着，

① 但懋辛（1885—1965），字怒刚，四川荣县人。清末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4月参加黄花岗之役，失败被捕，监禁月余后被押送回籍。1912年任重庆蜀军政府北路支队长。

② 庾恩赐（1884—1918），原名恩赐，字泽普，云南墨江人。清末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滇后任炮队第十九标教练官，调该标第一营管带，兼云南讲武堂教官。辛亥革命后组织军政府，任参谋部部长。未几，随唐继尧入黔，任北伐队参谋长兼先遣队支队长。唐继尧督黔时，庾任黔军总参谋长兼讲武学校校长及军务处长等职。1913年调回云南，历任军政厅长兼宪兵司令官、督军署总参谋长兼三师师长。护法战争时任靖国联军第三军司令官兼联军总司令部参赞。1918年2月18日在毕节被刺殒命。

③ 李曰垓（1879—1943），字梓畅，云南腾越人。京师大学堂毕业。历充云南沿边学务局总理、蒙自第二模范中学监督。辛亥革命后，任云南都督府军政部次长、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④ 材料来源：董雨苍：《云南护国历史资料》，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9页；但懋辛：《护国之役回忆录》，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7页。

蔡锷介绍了袁氏阴谋称帝的经过，谈到各省一些督理军务长官之上表称臣，大家都抱“心非”的态度，并不衷心拥护。“至于一般的人，则没有不反对的。”袁氏之心腹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也持反对意见。“所以只要云南起义，闻风响应者必多，袁氏一定被打倒。”蔡锷的讲话，使与会将领更加明确全国反袁的形势，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广大官兵打倒袁世凯的决心和信心。蔡锷接着说，所以“我们必先出其不意，从速发动”，先出兵川边，然后宣布独立，“随即请由戴戡将梁启超所拟的讨袁通电稿拿出来念了一遍，大家都说好”^①。大会通过了梁启超起草的《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等重要文件。

接着讨论了军事组织和立即发动反袁护国战争。会议决定组成护国军。宣布讨逆之初，原用共和军名义，不久，为避免被人疑为共和党之军队，即改称护国军，上冠“中华民国”字样。设三个总司令：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第三军总司令唐继尧。在会议上，对谁留守谁出征的问题，曾有过争议。当时，唐曾要求出川作战，留蔡坐镇，总理一切。李烈钧亦以蔡锷为日本士官第三期毕业，而唐继尧第六期毕业，以蔡之资历最深为由，劝蔡留守。但滇军内部将领反对。蔡说：“当然应由我出外作战，此次战争最重要是四川，只要北洋兵不能取胜，成相持之局，风声所至，四方响应，袁政府就倒了。第一军方面组织较大，拟分三路进攻，正面由我率两个梯团从永宁进攻泸州；由循若（戴戡）回贵州联络刘如舟（显世），驱逐巡按使龙建章后，以第一军右翼总司令名义率黔军由綦江向重庆进攻；左翼总司令暂不设，由第一梯团先行出发迅速占领叙府后再定。”会议多数同意蔡锷的意见，让唐留守，唐亦不再推辞，并说出川军队事先已有准备，以刘云峰为第一梯团长，下设两个支队，邓泰中为第一支队长，杨蓁为第二支队长，邓支队已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① 但懋辛：《护国之役回忆录》，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9页。

云南军部都督府及护国军编制将佐暨其籍贯、党籍表

职务	姓名	别号	籍贯	党籍	备注
军都督	唐继尧	莫庚	云南会泽	同盟会，进步党名誉理事	亲袁派，护国战争爆发后，逃往北京
左参赞	戴戡	循若	贵州	进步党	
右参赞	任可澄	志清	贵州	进步党	
政务厅厅长	陈廷策	幼苏	贵州	进步党	
财政厅厅长	籍忠寅	亮侪	山东	进步党	
参谋厅厅长	张子贞	青圃	云南	国民党	
军务厅厅长	庾恩赐	泽普	云南墨江	同盟会	
秘书厅厅长	由云龙	夔举	云南姚安	国民党	
第一军总司令	蔡锷	松坡	湖南邵阳	进步党	
总参谋长	罗佩金	镕轩	云南澄江	同盟会	
总参议	石陶钧	醉六	湖南邵阳	欧事研究会	中华革命党
第一梯团长	刘云峰	晓岚	直隶	国民党	
第一支队长	邓泰中	和卿	云南	同盟会	
第二支队长	杨蓁	映波	云南	国民党	
第二梯团长	赵又新	凤喈	云南顺宁	国民党	
第三支队长	董鸿勋	千丞	云南	国民党	
第四支队长	何海清	镜寰	湖南	无党籍	
第三梯团长	顾品珍	筱斋	云南昆明	国民党	
第五支队长	禄国藩	介卿	云南	同盟会	
第六支队长	朱德	玉阶	四川仪陇	国民党	
第四梯团长	戴戡	循若	贵州	进步党	后改右翼总司令
第七支队长	熊其勋	克丞	贵州	无党籍	
第八支队长	王文华	电轮	贵州	国民党	

续 表

职务	姓名	别号	籍贯	党籍	备注
第二军总司令	李烈钧	侠如	江西武宁	同盟会	欧事研究会 欧事研究会 派出的联 络人
总参谋长	成 桃				
第一梯团长	张开儒	藻林	云南	同盟会	
第一支队长	钱开甲	鼎三	云南	未详	
第二支队长	盛荣超		湖南	未详	
第二梯团长	方声涛	韵松	福建	同盟会	
第三支队长	黄永社			同盟会	
第四支队长	马为麟	子祥	山西	未详	
第三梯团长	何国钧	干臣	云南宜良	同盟会	
第五支队长	林开武			未详	
第六支队长	王锡吉			未详	
第三军总司令	唐继尧	莫庚	云南会泽	同盟会，进步 党名誉理事	曾充袁世凯 总统府顾问， 1916年9月 抵滇
第一梯团长	赵钟奇	毓衡	云南凤仪	同盟会	
第一支队长	华封歌	咏三	云南呈贡	未详	
第二支队长	李植生		云南	同盟会	
第二梯团长	韩凤楼	五峰	河南	未详	
第三支队长	吴传声	啻鸾	贵州	同盟会	
第四支队长	彭文治	公武	云南	未详	
第三梯团长	黄毓成	斐章	云南	同盟会	
第五支队长	杨 杰	耿光	云南大理	国民党	
第六支队长	叶成林		云南	未详	
第四梯团长	刘祖武	继之	云南昆明	同盟会	后改挺进军 总司令 后改纵队司令 后改纵队司令
第七支队长	杨体震		云南	未详	
第八支队长	李友勋	麟书	四川	国民党	
第五梯团长	庾恩赐	泽普	云南墨江	同盟会	

续 表

职务	姓名	别号	籍贯	党籍	备注
第九支队长	唐继虞	夔庚	云南会泽	国民党	
第十支队长	赵世铭	鼎臣	云南	未详	
第六梯团长	叶 荃	香石	云南	同盟会	
第十一支队长	马 聪	伯安	云南	未详	
第十二支队长	邓 坝	小池	云南	无党籍	
挺进军总司令					
第一纵队司令	杨 杰	耿光	云南大理	国民党	
第二纵队司令	叶成林		云南	未详	

12月20日^①，邓泰中即奉命出发，向四川叙府方向运动。护国战争的一切准备基本就绪，开始敲响埋葬袁世凯的丧钟。

二、通电宣誓讨袁

警告与最后通牒

从10月中下旬起，袁世凯即积极地、公开地筹备皇帝登极大典。12月11日，参议院开会，以总代表的名义汇齐各省国民代表投票的结果，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票赞成帝制。可是，在这种虚假的全体赞成的背后，上自将军下至百姓，隐藏着极大的愤怒与反抗的情绪。12月5日，上海革命党人淞沪司令长官陈其美派杨虎^②夺取肇和军舰，炮击上海制造局，反对袁世凯称帝，预示着

^① 但懋辛：《护国之役回忆录》，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9～60页。

考：关于护国军向川边出兵的时间，众说纷纭：（一）周钟岳《云南护国首义之历史谈》说：“云南于十一月已派两支队逼进川边。”（二）董雨苍《云南护国历史资料》说：邓泰中、杨蓁两支队“以防川匪闯入滇境为名，于四年十二月九日即已奉命先向昭通一带开拔”。本文采但懋辛说。但在《护国之役回忆录》中还谈到12月19日，杨蓁、邓泰中还参加了五华山会议。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说：唐继尧“派其弟继虞与邓泰中赴安南河内，迎接蔡锷来昆明”。许多材料都说到邓泰中在蔡锷至昆明后才出发。

^② 杨虎（？—1919），字啸天，安徽宁国人。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长、上海警备司令。

反袁护国的风暴即将来临。但是袁世凯陶醉在虚假的赞扬声中，身穿金光耀眼的大元帅服，竟于12月13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俨然以皇帝的身份立于龙案之旁，欢听百官高呼“万岁”的哄叫声，并且无耻地宣称：“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举国一心，势不可遏”，“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谁再反对皇帝，就是大逆不道。19日，他又正式下令设立登极大典筹备处，21日和23日，两次特封公、侯、伯、子、男爵共一百二十八人，封建朝廷的官制官阶全盘恢复。大典筹备处早已为他登极准备好了龙袍、龙袜、宝座、玉玺等御用物件，只待择日加冕登极了。正当袁世凯帝梦正酣之时，从云南传来一声惊雷。

梁启超在蔡锷抵达昆明的前一天，以准备赴美就医为名离津抵沪。梁、蔡原在天津计划，云南前队“出发二十日然后发表独立之公文”。这样可以偷袭成渝，抢在袁调兵之前占领四川。蔡锷到达云南后，使那里人心更加振奋，但是唐继尧对云南军与北洋军力量的对比仍然存在顾虑。“到了临时，也不免言庞事杂，几乎发动不成。”梁启超考虑，当时“蔡、戴既到滇，滇局亦不能久持秘密”。22日，通过南京宣武上将军署转来梁启超致昆明的一个密电^①，请唐将军代转蔡锷。这个电报的内容虽然是讲袁世凯决定派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准备以卖国条件交换日本承认帝制的这件事，但证明了蔡锷所说的冯国璋反袁的话是有根据的。如果冯不反袁，他就不会代替别人发出反袁的电报。“以为冯华甫准备着就要响应了”，这个电报大大消除了唐继尧的顾虑。同时，蔡锷又考虑到，一旦日袁条约告成，外交上的压力更大，因此，梁的这封电报使反袁通电“早发”^②。

梁启超通过南京发出的电报，一方面鼓舞了云南官兵的士气，加速了护国战争的爆发；另一方面又打乱了护国战争的原订部署，惊动了袁世凯，使其迅速调兵入川，造成战争之不利。梁启超后来也承认：“后此在四川与北军相持，死伤甚多，未始非由揭晓太速

① 这个电报，系梁启超设法托冯国璋的秘书长胡嗣瑗代发的。胡系前清翰林，有宗社党之称。他想借反袁势力，推倒袁世凯，为清帝复辟创造有利条件。

② 《国体战争躬历谈》，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44页。

之故也。”^①

昆明接到梁启超的电报后，22日深夜，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重要军政将领会聚于将军署光复楼，通宵会商举义大计及对内对外一切布置。蔡锷在会议上发表沉痛动人的演说，主张即日兴师讨袁。他说：“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我们所争者不是个人的权利地位，而是四万万同胞的人格。”与会者慷慨激昂，歃血为盟，发出共同誓言：“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难，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鼎力。有渝此盟，神明共殛。”

当夜议定于23日先以唐继尧、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该电文以梁启超起草之《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为基础，经任可澄及省署秘书长由云龙稍加增删后，合并写成《唐继尧、任可澄致袁世凯请其撤销帝制电》（注：电文下有“·”符号者为任、由增改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即行发出。电文如下：

北京大总统钧鉴：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金谓谁实召戎，致此奇辱，外侮之袭，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輿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酝，良可寒心！窃惟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毁弃，国体既拔，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正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以之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碍己，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若一致，然利诱威逼，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

^① 《国体战争躬历谈》，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44～145页。

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渎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矣。尧等夙蒙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意，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尤望我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有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四日上午十时赐答，临电涕泣，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漾印。^①

上述“漾电”高举拥护民主共和，保卫临时约法，反对袁世凯称帝和严惩帝制祸首的旗帜。这个电报使袁世凯感到如利箭穿心，惊恐万状。但他又随即自宽自解，认为云南一隅之力，不难讨平。他一面请英国公使朱尔典致电云南英国领事葛夫，以私人名义劝告唐、任二人收回“漾电”，“勿为戎首，且谓如有转圜余地，愿居中间为调人”，遭蔡、唐严词拒绝^②；一面命政事堂于25日回电云南，首先列举唐以前劝进之各电，并且说“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③。不仅如此，袁世凯又任师长张子贞为将军，刘祖武为巡按使，企图取唐继尧而代之。更囑唐继尧，若能杀死蔡锷，即封为亲王，并由汇丰银行兑款三万元以为犒赏，欲以煽诱离间之惯伎，妄图转圜。

① 《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2页。该电原拟以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等五人名义发表。修改后以唐、任二人名义发表。参见董雨苍：《云南护国历史资料》、《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②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156页。

③ 《云南倡义纪闻》，见《护国军纪事》第一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67~76页。

及至12月25日限期已满，袁无答复，唐继尧、任可澄、李烈钧、蔡锷、戴戡等五人即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誓死驱逐叛国贼袁世凯，“永除帝制，确保共和”^①。从此，高举护国的旗帜，向袁家军展开猛烈的冲杀。

檄告全国

蔡锷、唐继尧早已料及袁世凯不会轻易放弃帝制，23日，即将“漾电”敦促袁世凯撤销帝制之全文，转致各省军政长官，强调说明“国势至今，危于累卵，非大总统即日取消帝制，惩办元凶，无以救亡”，要求各省“一致行动，联电劝告”。当云南宣布独立后，唐继尧、蔡锷等又致电各省，再次指出“袁氏违法食言，背叛民国”之罪行，要求各省“同申大义，一致行动”，见义勇为，当仁不让，使“共和复故，民国重新，则是烈烈轰轰，光耀千载”之大业。指出袁世凯“自筹安会发生以来，薄海人民，同深愤恨，贤达君子，高举远行，众叛亲离，已成独夫，攘臂一呼，行见众山皆应，摧枯拉朽，可操券而决”。希望认清形势，不要为袁氏之“官禄”所惑，更不必为袁氏之“积威”所胁，“而不敢发难”。“今兹之举，正所以去苦害之域，臻乐利之境；除帝制之毒，复共和之庥，安之大者也。人类以求安为目的，不此之求，复何求哉？”护国军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为此“但有进死，更无退生，非达到还我共和国之目的不止”，让“我中华民国巍然继起于东亚大陆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神州陆沉，谁尸其咎？”希望抓住当前之时机，“共兴义举”。

接着，唐继尧等发布《致中国驻各国公使电》、《致滇省在外服官道尹以上各员电》、《致各省军界同乡电》。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向全国同胞申明护国宗旨：“（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祚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铲除。（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三）讨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

^① 《唐继尧、任可澄、李烈钧、蔡锷、戴戡通告全国，宣布独立请同申义举电》（1915年12月25日），见《云南档案史料》第一期，第18页。

(四) 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线。”号召各地区、各党派、各民族团结起来，通力合作，讨伐袁贼。

1916年元旦，又发出《护国军出师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自辛亥窃国以来，酖杀国会、抛弃约法、诬扳党狱、出卖主权、叛国称帝、欺世盗名等十九大罪状。最后，以梁启超草拟之《云贵檄告全国文》提出四条纲领为结束语：“一，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四，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①同时还宣布，对袁世凯政府中军政官员之政策：“凡内外官吏，粤若军民，受事公朝，皆为同德。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其有党恶朋奸，甘为逆羽，杀无赦；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②

云南致各省通电、致中国各驻外使节电及讨袁檄文的发布，促使各省反对帝制复辟的民主势力闻风而起，形成全国性的护国反袁运动，给即将穿上皇袍的袁世凯当头一棒。袁世凯见到这些电文后，惶惶不可终日，哀叹不已地说：“自己一世做人聪明伶俐，不料这回被梁启超、蔡锷装在鼓子里头。”^③

对外方针

云南宣布起义之后，各国驻昆明领事之态度颇不一致。德国领事“魏思于此项义举极表赞成，宣布独立之次日，即赴军政府谒见蔡、唐两将军，晤谈一时之久，声言贵国义举本在意计之中，予不胜钦佩，苟可以为力，必予赞助”。法国交涉员兰必思在访问蔡锷时表示“严守中立”，但又说“竭力予以相当之援助，并声言北京传言，袁政府假道安南运兵入滇，本国公使暨越南政府闻之，极为愤怒，此不过袁之梦想云云”。英国领事葛夫接驻京公使朱尔典电，

① 《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5~6页。

② 《云南档案史料》第一期，第27页。

③ 《护国之役回顾谈》，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91页。

欲阻挠起义，遭到蔡锷、唐继尧之驳斥，“意兴索然而去”^①。

云南护国军政府为了争取国际上之支持以孤立袁世凯，代表中华民国布告各友邦。该布告首先说明国际交往原则应是“互相提携，一以诚实忠信为基础。慨自晚清失败，纪纲紊乱，我国民爱举义师，组织民国政府，而袁世凯存觊觎总统之心，佯为附和，当其受任之际，固曾向中华国民及友邦两次宣誓，矢忠民国，谨守约法，率履勿渝。乃口血未干，而蔑誓违宪”，“群小盈廷，与之上下其手，遂乃假托民意，窥窃神器，内罔我民，外欺列国，良士忠告，充耳而无闻，多方劝说，卒归于无效。我军政府睹人道之灭绝，见国运之将亡，不禁惻然矜悯。彼袁氏者，既背口宣之誓言，复废创制之约法，殃民祸国，罪通于天。我军政府用是奖率三军，申讨逆贼，整兵肃甲，誓诛元凶。举凡爱国之士，无分南北，不论文武，缓和激进，一致赞同，以布义声，而张公道。夫中华民国，业经友邦正式承认，今军政府既不得不执干戈以维持共和，深望各友邦，悯其境遇，鉴其用心，而赞其义举”^②。尊重吾人行动正当^③，希望各国“共守善意之中立，互敦永久之睦谊”。公布对外方针如下：

1. “帝制问题发生以前，民国政府、前清政府，以前与各国所订结之条约，均继续有效，赔款及借债均仍旧担认。”
2. “本将军巡按使势力范围内居留之各国人民，其生命财产力任保护。”
3. “自帝制问题发生以后，袁世凯及其政府与各国所订之条约及借款等项，民国概不承认。”
4. “各国如有助袁政府以战时禁制品者，查出概行没收。”
5. “如全国官商人民，有赞助袁政府，违害本将军巡按使之行

① 《云南倡义纪闻》，见《护国军纪事》第一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67～76页。

② 《云南军政府通牒各国文》（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见《护国军纪事》第一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17页。

③ 《云南军政府代表中华民国致各友邦书》，见《护国军纪事》第二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75页。

注：以上②《通牒各国文》和③《致各友邦书》系同一电文，但中译本略有区别。

为时即反对。”^①

同时，云南军政府专函照会法、英、德三国驻昆明、蒙自、河口、腾越之领事及外交官员，又强调申明五项原则：

1. 自宣告日起，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及关于滇越、滇缅会定各项单行章程，均继续有效。（照会驻滇德领事，应删去滇越滇缅等语一节。）

2. 凡本将军巡按使势力范围以内之旅居各外国官商教士游历人等，所有生命财产，均按约切实保护，如有正当损失，由本将军巡按使担任赔偿；惟私赴南夷荒僻及匪乱未靖地方所受损失，不在此限。

3. 请电告缅甸、越南政府，转飭沿边文武，照旧与民国云南省政府所派文武接洽，商办各事宜，互相维持两国边界治安。（照会德领不用此条。）

4. 民国政府因欧战事公布之中立条规，在本将军巡按使势力范围内，仍切实履行。

5. 以后若有国际重大事件，应由本将军巡按使直接办理，其他关于本省交涉事宜，仍请照常办理。（照会省内各领委者，应写仍请继续与云南交涉署商办等字。）^②

军师的运筹

梁启超至上海静安寺寓所后，受到袁世凯所派特务的严密监视，“此间之危险，又过于津，大约惟有一步不出，一杂客不见”，以保其生命之安全。其生活也较清苦，在一个时期内，家中无人照料，没有开火做饭，“每日由远邻送饭二次来”，“每日茶水”之珍贵视若“甘露”。实际充当护国战争军师的梁启超，在困苦的情况下，沉浸于反袁护国战争的运筹帷幄之中，“颇觉此境甚乐也”^③。

上海为护国战争的政治、外交及后勤中心。当时，进步党人曾

① 《云南政府照会各国公使文》，见《护国军纪事》第一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19页。

② 《云南起义时照会各国领事文》，见《护国军纪事》第一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20页。

③ 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梁启超《与嫀儿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61页。

服官袁政府者纷纷辞职，汤化龙、徐佛苏、汤觉顿、蓝公武等“皆翩然下野”，谋倒袁之法，“随梁启超密行赴沪”。而上海又为国民党人聚集之地。梁启超到上海后，“第一步在希望冯国璋从南京发难”，响应西南；“第二步则联络民党”，两党“推诚结纳”，共同策划及筹措护国反袁的重大问题^①。

唐继尧与蔡锷等讨论决定云南起义的重大事件以后，即派唐蔺赓、李伯英（宗黄）二人为驻沪代表，“秘与各方面同志，周旋接洽”，并致书孙中山，望他“登高一呼，俾群山之皆应”，“一切机宜，祈予随时指示，得有遵循”。又致书陈其美，“伏冀推同盟之旧谊，赐以南针，本革命之热忱，助以鼎力”^②。唐继尧、任可澄更给梁启超写了一封长信，对梁提出更高更具体的要求：惟大计所关，不能不仰望于先生者：（一）对长江下游，“乞速定策发谋，相为声应翹跂无穷”；（二）速求外交人才，“分驻港、沪等处，以便接洽，并先赴各国专事联络”；（三）急速物色人才，“商约赴滇，襄兹义举”；（四）袁氏倒台后之建设问题，“如中央地方权限之划分如何，机关之组织奚若。凡此建设问题，均非先生精思密运，先决大凡，以衷群言，定民志，亦乞预备提示，俾当事者并有轨辙可循，不致泛舛”^③。从上述信件的内容可以看出唐、任等人都依赖梁启超的策划布置，“一言重于九鼎”，可以说云南是言听计从的。昔日的革命党人杨永泰、李根源、程潜、林虎、程子楷等也写信给梁启超说，“此举关系重大，非得负信望如先生者莅东指导，恐难妥适”，希望他“于外交有着后，即行莅滇主持”，“敢为劝驾”，

① 《进步党人之行动》，见《护国军纪事》后编，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92～193页。

② 《唐继尧致孙中山先生早除袁氏密派唐、李在沪接洽同志请示机宜书》、《唐继尧致陈英士先生密嘱唐、李晋谒请示机宜书》（1915年10月），见《云南档案史料》第一期，第16～17页。考书中有“长沙子弟，虽仗义以先来”等语，说明上书写于蔡锷来滇之后，即1915年12月底或1916年元月，非写于1915年10月。由云龙在《护国史稿》中收集唐致孙、陈二函时，亦未写明日期。

③ 民国五年一月十五日唐继尧、任可澄《致任公先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66页。

“从速首途，以慰群望”^①。“滇中盼先生往甚急，敦促之书十数至”^②，梁启超亦“恨不即飞越关山，就参帷幄，惟熟审现在情形，实不宜遽行离沪”^③。为了不负众望，梁启超在上海夜以继日做了大量的工作。

梁启超决心反袁护国以后，对各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安排，他先后托命敬民、王家襄（参议院议长）、陈国祥（众议院副院长）、蹇季常（念益，贵州人，袁世凯之亲信）、梁善济等人在北京侦察袁世凯之动向，“随时详报，俾滇黔得以防患应付”^④。护国战争开始后，一般人物发密码电都要向有关方面交出密码底本，通过检查，方能发出。蹇季常以国府要员的身份，与各方面关系密切，陈国祥等通过蹇，由蹇找检查电报负责人盖章，不通过检查即可放行^⑤。

梁启超与蔡锷、唐继尧等函电交往，将北京及各方面的情况随时通告云南，又对护国军的军事教育、政治思想、外交及财政诸方面都作了精心的策划与指导。

在军事上，梁启超首先指出，必须明确主攻目标，“全力规复三川，自是滇军第一责任”，“则必以主力注蜀而已”。在进军四川时，对待四川各派系总的原则是“川军宜结合，北军宜诛讨，在津已曾商及”，但还必须谨慎处理，区别对待。“蜀军及蜀士其踊跃欢迎义师，自无待言，惟蜀中党派繁多，意见久积，调停固然殊非易易，万不可轻心以掉，必赖主军之帅德量机智兼备，乃能收六辔在手，一尘不惊之效。”对原川军第五师熊克武部，不易淘汰，“但能助我讨贼，自当一视同仁”，最好令其出境讨贼，“盖在境内则易触

① 李根源、程潜等《致梁任公先生书》（1916年1月29日），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69页。

② 《梁任公先生入桂纪行》，载《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五期，《选报》，第2页。

③ 《致蔡锷第一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41页。

④ 1916年7月15日《通电》，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82页。

⑤ 桂百铸：《刘显世集团内部斗争散记》，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8页。

旧感而生轶轹，出境外则义不返顾而益骁勇也”。第四混成旅长伍祥祜，为川境北军中坚，“此间有人与伍为道义交者，已委曲风以大义，今当更以明白痛快文字督助之。此君为中国不可多得之良将，深望其能自拔于贼中也”。对那些“犹有怀挟私见，不受节制，则所以镇辑之者，亦宜惟力是视，不能稍事姑息。盖必能奠蜀，然后能奠西南；必能奠西南，然后能奠中国。如有害马，在所必去也”。“北军若成穷寇之势，似宜资遣。”其次，扩充滇军，对“补充兵之训练编制，计当为滇政府目前第一大业”。对官兵之训练“不能专注重于技术，而尤当注重于精神”，也就是说，对官兵必须注重“爱国观念”的精神教育。这是因为：“我军方在极孤微之时，而滇黔又为极贫瘠之地，将来经略四方，其所遭值万种艰危，决无可避，即饷糈之时时不继，亦在意中。我有所恃以与敌决胜？恃军心之固结而已。固结军心，以爱国观念为根本，自无待言”，然而这种爱国观念的真正建立，必须以“将校与士卒个人感情之胶漆”为根本，“帅与将校，将校与士卒，其联属之基不植于平日，故一旦有事，而瓦解不可收拾也”。第三，必须明确反对袁世凯之目的，使广大官兵明确，“盗国逆贼”袁世凯自甲午战争后三十年来之罪大恶极，造成我国民极大的痛苦，给军界造成极不良之“恶果”，“自今以往”，为了消除这种“恶果”，今日发动护国战争，“计非以兵止兵，则天地永无清明之日也。以兵止兵者，以水灭火之义，非以火灭火之义也。夫必今之兵有异于昔之兵，然后能有挟持以息之”^①。也就是说，必须以战争消除袁世凯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而不是以新的灾难代替旧的灾难。

在政治思想上，梁启超首先要求护国军将士坚定必胜之信心，“逆贼不患不覆亡”，“吾辈当认定西南一隅为我神明氏胄唯一遗种之地，挟全副精神以经略而奠之”，不必考虑其他省份之响应与否，更不必“视他方之态度为欣戚”。当前，“各省诘责滇军之电文甚多，皆由伪政府拟稿迫令拍发，与前此推戴之电文同一笔法。其实各军巡中，安有效忠于贼之人？甚表同情于滇者，且十而八九”，他们或早或迟地将会响应。这里除冯国璋外，“其直接间接通声闻

^① 《致蔡锷第一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39～741页。

者尚不少”。可以预料，“一两月后，滇军进取稍得势，诸镇胆稍壮，而伪政府从而煎迫之，则同时蹶起意中事也”。其次，要求护国军内部增强团结。梁启超说，现在会聚于昆明之各方人士已数百人，“能否不生冲突”，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大问题，“应力防此种恶兆之发生。当思自辛亥以还，苟非吾侪党派轧轹，意气相凌，何至两败俱伤，使夫已氏（指袁世凯）匿笑而坐大。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昔所作孽，今宜自赎。海上民党方努力从事于大合同，其大部分之有力分子，既有偶俱无猜之感，滇中群彦，鳞萃气象，宜益郁葱”。尤其要注意的是，在具体“实践”上，又不可能不发生意见分歧，“凡是若不从一身或一党派之利害上打算，则天下断无不可调和之意见。深望共事诸贤念敌氛之猖勦，审负荷之艰巨，求精神上之一致结合，分劳赴功，毋授敌者以丝毫口实，致为中国不适共和论增一证据，而其关键则在首义诸贤。现在担任最重要之职务者，各精白乃心，而勿以一毫将来之权利思想杂于其间，则感化力所被，其或可以一洗前此之诟病，而树模范于它方。天心悔祸，庶有其期，此虽常谈，然深愿于首事伊始，与同志共勉者也”^①。第三，要认真对付袁世凯“威压与术取兼用”的两种手法。梁启超指出，彼威压之计“吾敢信其悉属无效，彼气已全馁，仅虚张声势而已”。“术取之法，首在离间滇人，将军新巡按之命，即其一端，此亦甚拙劣，不值一笑。其暗中最着力者，则在京滇人归而运动，闻已派数辈，李即其一。此辈即到滇，恐亦不敢施其伎。此外，则各军官学生欲脱逃投效者，所在多有，而伪政府即利用此种心理，派人冒充掺入，以作侦探。此则在滇诸贤审其人平日性行及临时察言观色。期于进不失人，退不失事而已。最注意者，则敌确已派外国侦察数辈前来，癸丑之役败于此辈之手者不少，亦慎之又慎。”因此建议，“凡可疑者，中国人至少予以拘禁，重则除之；外国人至少予以监视，重则遣之。宁我负人，勿人负我，危急之顷，不能空谈仁恕也”^②。

① 《致蔡锷第一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38~739页。

② 《与蔡锷第二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42页。

梁启超利用冯国璋与袁世凯的矛盾，配合李宗黄，极力运动冯赞助云南护国军。黄溯初说：“任公自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到沪至五年三月初四日乘日轮横滨丸赴香港止，计留沪七十余日之内，除与滇、黔、桂三省互通函电，共筹义军进行外，莫如运动南京冯华甫赞助起义之举为最要矣。当时在冯幕者，以胡晴初^①、潘若海两君为反对项城最力之人，故任公先后三次托溯初赴宁，由晴初引见冯，面述义军情形，并交任公手书。”^②冯国璋是北洋军阀的一员大将，坐镇南京，对长江下游及东南一带影响极大，护国战争爆发以前，袁世凯严防冯国璋有异，极力拉拢或削去冯之实权。1915年12月18日，袁世凯明令冯国璋为参谋长，欲调虎离山。但冯只答应以江苏将军遥领，不肯离开南京。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又想把冯国璋调到北京来以参谋长兼任征滇总司令。当时贵州尚未响应，东南持观望态度，曹锟征滇，“至今犹逗留岳州”，冯国璋态度之依违，将影响全局。为此，梁启超及时揭露袁世凯之阴谋，“实恐反授以隙，而为彼所乘，吾以警告华甫”^③，要冯谨防袁世凯之阴谋。冯国璋虽然拒绝了袁世凯的要求，但是他的态度始终处于中间状态，他反对袁世凯称帝，但不主张倒袁。为了争取冯国璋，后来梁启超又将籍忠寅从云南调至南京将军署。斗争错综复杂，颇为激烈。梁启超与冯国璋的紧密联系，实际上把他组织到反袁护国的阵营里，这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定东南局面，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摧垮袁世凯的力量，都有积极的作用。

梁启超对财政后援极为重视，滇省是贫瘠之区，发此巨难，餉糈支出颇巨，“滇中财政之窘，久在意中”。他为筹措款项，“惭汗焦灼，不可言喻”。当前线餉糈十分困难时，梁曾计划亲赴日本，开展外交活动，“借款购械”，后因故未能成行。蔡锷在北京时，

① 胡嗣瑗，字晴初，也作琴初，贵州贵阳人。前清翰林。护国战争期间，任冯国璋之秘书长，为宣统复辟派，主张反对袁世凯。潘若海，康门弟子，亦为宣统复辟派，时为冯国璋幕僚。

② 《民国十八年黄溯初记民国五年任公先生留沪运动冯华甫事》，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62页。

③ 《与蔡锷第二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42页。

“尝向中国银行说及云南省设立分行之必要，中国银行遂从其言，拨送现金三十万元，纸币二百万元，赴滇准备开设分行。此次云南独立，此等金币悉陷蔡锷之计，略为云南军没收”^①。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梁又写信给云南财政所所长籍忠寅，建议“扩充富滇股本，改为国家银行”^②，滇中巨室颇多，“此时宜晓以毁家纾难之大义，半敦劝，半强迫，亦非得已”。其最两全者，则莫如“强劝巨室投资”富滇银行，“集得此资，即以公债形式全部贷与军政府”^③。当时各地盐税为担保清偿外债及赔款之用，由洋员监督管理。时云南盐税收入约三百万元，库中亦存现款约二百万元^④，梁启超建议云南军政府将盐务署之洋员以“恐保护难周，暂以避患为辞”，命令护送出境，盐务由护国军管理，可以获得大量盐税收入^⑤。当时，“蒙自关税，亦宜与商提取，即不能提，亦当办到存外国银行”，不解袁世凯政府。梁启超的女婿周希哲原在南洋生长，“与富商子弟多交好”，梁特派其“往南洋筹款”^⑥。又与岑春煊等联系，请在海外筹款。1915年12月底，岑春煊与张耀曾同行，自槟榔屿经香港到上海，“与梁启超晤谈，再至东京晤孙中山，并与日人联络，由日本助以饷械”^⑦。据记载，“岑春煊、柏文蔚日前由南洋筹得巨款汇港，助云南军需，今日闻有二百七十箱现洋下船运往”；“黄兴已筹得八百万元，刻尚极力奔走，冀获多额之资金云”。护国军筹饷督办李烈钧曾赴香港，“预备筹饷运械，日昨由滇越火

① 《护国军纪事》第一期，《财政纪事》，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26～27页。

② 《民国五年一月二十九日致亮侪我兄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69页。

③ 《与蔡锷第三书》，见由云龙：《护国史稿》，昆明启文印刷所，1950年，第22页。

④ 《护国军纪事》第一期，《军情纪事》，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57～58页。

⑤ 《致蔡锷第二书》，见由云龙：《护国史稿》，昆明启文印刷所，1950年，第19页。

⑥ 《与蔡锷第四书》，见由云龙：《护国史稿》，昆明启文印刷所，1950年。

⑦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214页。

车运到饷银十余车，此系记者所亲见”^①。

在外交方面，梁启超极力谋求日本支持。当时，日本政府见支持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且见袁氏必倒，转而支持反对袁世凯之力量，企图乘“欧洲战乱，列强未遑东顾”之绝好机会，“另行物色一真实确定日支携手之人，与之握手”^②。因此，日本拒绝了袁世凯派特使周自齐赴东京，转而支持南方护国军。1月7日，日本“派外交界出色人物堀义贵为首任驻滇领事”^③。梁启超利用日本的这个转变，积极与之联系。日本对进步党领袖梁启超也极其重视。当时梁启超欲亲赴日本，进行外交联络及筹款，后因故未去，改派周善培^④赴日本，晤犬养毅。而“日本刻意联络吾党（青木中将特派驻沪，专与吾党通气，日内便到），饷械皆有商榷余地”^⑤。另一方面，梁启超对外国人入滇亦抱有警惕，以防袁世凯雇用外国间谍之危害。他在《与蔡锷第三书》中说：“顷闻梁士诒勾通税务司，假海关司为名，与滇税司往复密电甚多，此事至危。请即烦约束，凡外人往来之电，无论领事、教士、税司，只准用明码，不得用密码，必不得已须用时，非经检查员检查过，视为无害，不得辄发云云。切要、切要。”否则，“取败之道也”。

由于梁启超对护国军内政、外交、政治等方面的周密策划，护国军的胜利发展得以有序进行。

盛大的节日

洪宪帝制丑剧的上演，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不仅政治权利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经济上也是一场大浩劫。据当时人们统计，帝制运动共挥霍六千余万元，约相当于1914年全年田赋的总

① 《护国军纪事》第一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财政纪事》，第26～27页；《军情纪事》，第50页。

② 《日人北京有志团之宣言、序文》，见由云龙：《护国史稿》卷二，昆明启文印刷所，1950年，第28页。

③ 由云龙：《护国史稿》卷二，昆明启文印刷所，1950年，第24页。

④ 周善培（1875—1955），字孝怀，原籍浙江诸暨，长于成都。戊戌变法前与梁启超、谭嗣同等关系密切，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后任驻日使馆参赞、广东将弁学堂总办等职。

⑤ 《与蔡锷第四书》，见由云龙：《护国史稿》，昆明启文印刷所，1950年。

收入。实际上则大大超过这个数字，据 1916 年 9 月 16 日《申报》载：财政部调查帝制耗款，达六万万元有奇。为了筹措这些巨款，袁世凯不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肆意搜刮。在他的统治下，除照收前清的苛捐杂税外，又接连发布各种新税则，如印花税法、验契条例、贩卖烟酒特许牌照条例、所得税条例等。1914 年春，他公布“规复旧税文”，命令“将旧税速速恢复，新税一一进行”；还告诫各省官吏，务必“实力奉行”，“不可沽名钓誉，亦不可畏难苟安”^①。当年开办验契税，规定“无论卖契典契，每张缴纳查验费一元，注册费一角”^②。并预计一年之内搜刮两千万元。1914 年底，又下令清丈全国地亩，扩大田赋收入，打算从 1915 年起，每年田赋增收三千万元。同时，在广东等地实行鸦片专卖，刮得二千多万元。此外，又通过加征货税，发行公债和增强“爱国储金”等，无情地刮取民脂民膏，造成民不聊生，社会动乱。云南起义前夕，物价一日数涨，当时中国之社会，正如李烈钧所指出，是“妖雾黦黦，鬼气森森”，“卖国之事未终，窃国之事又起，行且奸污蛊淫，秽辱当世廉耻”^③。人民愤怒已极，忍无可忍，只有高举义旗，诛彼昏逆窃国大盗，保卫共和民主制度。

云南护国战争是在全国人民灾难深重，愤恨袁世凯卖国、复辟的沉闷空气中爆发的。

1915 年 12 月 25 日云南宣布独立后，护国军政府及人民群众清除了特务、内奸，召开了盛大的誓师与拥护共和庆祝大会，军民欢腾，士气高昂，昆明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欢乐之中。

首先，军政府以革命的权威，有效地清除了特务及内奸。当蒙自道尹周沆与阿迷县知县张一鯤阴谋杀害蔡锷的勾当暴露后，唐继尧立即派人逮捕了张一鯤，周沆侥幸逃至香港。袁世凯派往云南的授勋专使何国华，实际上是袁派往云南监视唐继尧的高级特务，当唐接受侯爵的头衔后，他就到滇西考察边界去了。当他在滇西转了一圈，经昆明乘船，悠闲地渡过滇池再回到昆明时，已是云南讨袁

① 徐友朋：《袁大总统书牍汇编》第十五版卷二，1926 年，第 85 页。

② 《北洋政府法令全书》第十类。

③ 《护国军第二军出发时告滇父老》，见《护国军纪事》第二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 年，第 69 页。

通电发出后的第三天。唐继尧、蔡锷当即派邹若衡、祝鸿基^①等人进行“迎接”监视。当何得知云南已经宣布讨袁并亲自见到蔡锷时，吓得魂不附体，连声哀叫，立即被迫交出了公文、密码、手枪等。从此，何国华被拘禁监视，不许外出，直至袁世凯死后，才让他离滇^②。“高等审视所所长张仁普见滇省起义，竟为袁政府内奸，现已查出证据被捕。”“又周家树、姜梅龄、李鸿祥、覃鎏钦等相继潜行入滇，充作奸细，亦被滇政发觉，严飭查拿。”^③

当云南护国军政府拘捕了特务、内奸后，“戒备甚严，检查亦甚密。袁政府苦不得个中消息，因利用无赖之外人，啖以重金，陆续派赴滇省，充军事侦探，并为种种运动。初入境者有日、英两国人五六名，均已发觉，加以严密之监视，其中有某国人摩姓者，向任铁路工程师，携同京汉铁路工程学生两名，一粤人何某，一浙人张某，奉袁氏密命，乘法国邮船亚多士前来，并闻密运枪弹三千五百箱，拟运动滇边土匪倡乱，俾牵制护国军兵力，为云南政府侦悉，密飭沿途关卡注意，一面照会全国领事加以取缔，并声明此种外国奸细，一经捕获，当然与敌人同视，立于枪毙示儆。故一般袁探，闻此风声，皆逗留海防，不敢前进”^④。

蔡锷抵滇，云南宣布独立，清除了特务、内奸，袁党所散布的流言飞语为之一净，使“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趋平静”，“人心更为安适”^⑤，使人民群众积蓄已久的反袁怒火猛烈地燃烧起来。

当时，从军记者无伪报道：“宣布独立之后，恍如阴霾四塞天地晦冥之际，霹雳一声，大雨滂沱，一霎时间，雨散云消，日丽天晴”，全滇人民莫不兴奋鼓舞，尽情欢呼。起义后，“十日来，全城

① 祝鸿基，字皋如，保山人。时任上尉副官，后任朱培德部旅长。

② 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1页。

③ 《护国军纪事》第一期，《军情纪事》，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50页。

④ 《护国军纪事》第二期，《军情纪事》，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30页。

⑤ 《致梁启超书》（1916年1月5日），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9页。

悬旗结彩，爆竹之声不绝于耳，士民则欢声雷动”。一般青年踊跃参军，投笔从戎，“军中则士气奋腾”^①，将士皆志切请缨，“有不斩楼兰不生还之概”^②。“各师兵士宣言，袁氏不倒，不求饷银”。许多机关人员“一律不支饷银”，“一时毁家纾难者甚多”^③。蔡锷的参谋长罗佩金，把自己的家产押给滇边银行，得十二万元^④，充作军饷。驻滇记者潜广报道，绅商态度“尤为激昂，两年以来，对袁氏之痛恨敢怒而不敢言者，至是倾筐倒篋而出”，“及闻宣布誓师讨逆，喜极而泣”^⑤。儿童走卒奔走相告，市民街头巷语云“袁世凯为猴子投胎，不配做皇帝”等，愤怒斥骂袁世凯。

25日正午12时，唐继尧正式宣布独立，改称都督。是时，昆明军、政、商、警、学各界着节日之礼服，咸集于城中。各校男女学生，各手执松柏花圈一环，内标“拥护共和，声讨叛逆”八字，分集府门两旁，秩序肃然，万众无声。在奏完雄壮的军乐后，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先后演说。蔡锷在演说中，愤怒痛斥袁世凯“内则金壬竞进，苛政繁兴，盗贼满山，人民憔悴；外则强邻侵逼”，“主权丧失”。“乃袁逆不曾悔祸，犹复妄肆威权，排斥异己，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等法制如弁髦，玩国民于股掌。伊古昏暴之祸，盖未有若袁逆世凯之甚者。”“袁逆帝制成，吾民之希望绝矣。”“而起视四境，则弥天忿叹，群发曷丧偕亡之恶声；武夫健士则磨刀霍霍，莫不欲劫刃贼腹。”“今日之势，民国国民与袁逆义不共戴天。三户亡秦，一旅兴夏，有志者事竟成。此匹夫之通责，而亦天下之公言。”他决心不顾个人安危，驰驱沙场，“竭股肱之力，济之以忠贞，以求勿负我父老之厚望而已”。更希望全体父老“一鼓作气，

① 《云南倡义纪闻》，见《护国军纪事》第一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67～76页。

② 《致梁启超书》，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00页。

③ 《护国军纪事》第二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30～132页。

④ 李根源：《罗佩金事状》，见《曲石文录》卷三，又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29页。李丕章在《护国军中见闻二三事》中说，罗佩金捐献给护国军的是十万元，系其祖父罗瑞图在辛亥前经手的民营股款，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53页。

⑤ 《云南共和纪实》，见《护国军纪事》第一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60～66页。

再接再厉”，打倒袁世凯，保卫共和制度，完成“不朽之盛业”^①。唐继尧又向全国同胞宣布誓词四条：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祚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铲除”；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三、“讨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众志成城，保卫共和^②。云南知名人士赵藩（前四川藩司、参议院议员）、黄德润（前云南司法筹备处处长、东川铜矿公司总理）、陈荣昌等代表云南一千七百万人发出通电，拒绝袁世凯的一切伪令，誓与民国共存亡^③。在会上，绅商各界先后发言，坚决支持讨袁护国战争。会场上群情激奋，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共和军万岁，云南军政府万岁”，“声震山谷”。“午后三时，唐都督至北校场誓师。”全市游行，高呼打倒袁逆、拥护共和口号，至夜乃息^④。“省城内燃爆之声，彻夜不息，逐户张灯悬旗”^⑤，昆明沉浸在一片盛大节日的欢乐之中。

1916年1月1日，当袁世凯启用洪宪元年之日历时，唐继尧、蔡锷在昆明召开了“讨袁誓师拥护共和”纪念大会。与会者几及万人，道路为之拥塞，市民扶老携幼，夹道鹄立，欢迎蔡锷。4日，商、学、绅、军各界再次召开欢迎蔡锷、李烈钧大会。各街道又是张灯结彩，演唱戏曲，热闹空前。各地张贴了许多新春对联，其中有“眼看金马腾空日，坐待黄龙痛饮时”，“立马华山，推翻帝制；

① 《告滇中父老书》（1915年12月），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1~392页。

② 《唐都督誓告全国同胞文》，见《护国军纪事》第二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67页。

③ 《护国军纪事》第二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50页。

④ 由云龙：《护国史稿》，昆明启文印刷所，1950年，第6页。

⑤ 龚振鹏：《致友人书》，见《护国军纪事》第一期，《军情纪事》，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58~60页。

挥戈燕地，重建共和”^①，充分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反袁护国的坚强意志和必胜的坚定信心。蔡锷、李烈钧与各界代表共同宣誓，特立格言六句：“开诚布公，和衷共济，不争权利，不避艰险，誓死报国，保障人权。”^② 决心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争取反袁护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① 《护国军纪事》第一期，《军情纪事》，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52页。

② 《护国军纪事》第二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29页。

第五章 指陈方略 川湘告捷

一、蔡锷进军泸州、纳溪

首取叙府

云南宣布起义以后，护国军按照梁启超、蔡锷等人的既定战略计划，进军四川叙府（今宜宾）、泸州一带，夺取四川。同时，谋求贵州、广西独立，使西南连成一片，然后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总参谋长罗佩金，秘书长李曰垓，第一梯团长刘云峰辖第一支队长邓泰中与第二支队长杨蓁，第二梯团长赵又新辖第三支队长董鸿勋与第四支队长何海清，第三梯团长顾品珍辖第五支队长禄国藩与第六支队长朱德^①，第四梯团长戴戡辖第七支队长熊其勋^②与第八支队长王文华。每个支队辖步兵两个营，每营辖四个连，约有官兵五六百人。第一、二两支队是原云南步一、步七两团改名，除步兵外，并有山炮一连（炮八门）、机关枪一连（重机枪六挺），配备齐全，最为精良。第三梯团次之，第四梯团更差。如禄国藩支队起先只辖昭通独立营，使用旧式九子枪；又如原驻临安之朱德营，临时由江外（土司地）调凑兵员，编

① 朱德（1886—1976），字玉阶，四川仪陇人。1909年在云南讲武堂参加同盟会，1911年毕业后，被派到七十四标二营左队当排长。“重九起义”时任连长。1916年1月任云南步兵第十团团长，编入护国军第一军，积极参加反袁护国战争。后来留学德国、苏联，成为中国共产党著名领袖。

② 熊其勋（？—1916），字克丞，贵州都匀人。寄居广西那地土州，曾办地方团练。辛亥革命时回贵州，充北防防营管带，后升任团长，参加护国战争。

成两营，使用九子枪。但这些部队约占云南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计四五千入，大部为滇军之精锐，出师讨逆，维护共和，士气旺盛，故战斗力甚强。

第四梯团长戴戡系贵州省贵定人，清朝末年在云南任矿务局职员，结识唐继尧、蔡锷。云南光复后，随唐继尧回贵州，唐任临时都督，戴任都督府参赞，不久升任贵州巡按使。卸任后调北京，成为进步党的活动分子，与蔡锷关系十分密切。袁世凯称帝时，戴戡在北京代表黔省公民劝进，因此，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参政。另一方面，他与梁启超、蔡锷、王伯群等秘密策划反袁。蔡锷逃离天津之前，戴戡被派赴香港，王伯群被派赴云南联络。护国战争开始后，1916年1月2日，戴戡奉蔡锷委任为护国军第一军右翼总司令，率军经由毕节到贵阳，策动贵州独立。王伯群则被派往故乡黔南兴义一带联系当地黔军。戴、王两人都是有声望的贵州人，王伯群又是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的外甥，派他们回贵州策动独立以响应云南，将有重要的作用。

第一梯团第一支队长邓泰中于12月20日奉命出发，向四川叙府进军。25日，云南讨袁通电发出后，第一梯团长刘云峰在人民群众夹道欢送声中，亦率部誓师出发。1916年元月中旬第一梯团邓泰中、杨蓁两个支队在昭通集合后进入四川。1月17日与敌接战。敌系北洋军伍祥祜混成旅与汉军巡防营朱登五部，由叙府开来，据守黄果铺的左右山，阻挡护国军前进。护国军初次迎敌，把愤恨袁世凯叛国的怒火，一齐集中在敌人身上。18日，第一支队不避枪林弹雨，向两山进攻，第二支队乘黑夜绕至敌方侧后，由山背冲到山顶，将敌右翼压垮，敌左翼独力难支随即溃退，夺船渡江，当夜十一时，护国军第一梯团占领横江。北洋军伍祥祜旅以全力守安边。但长江左右两山对峙，敌高踞左山，阻绝江路，形势险要，护国军难以渡过。19日，护国军准备进攻，杨蓁召集官兵说：现在我护国军人数少，弹药少，人人都要成为敢死之士，置之死地而后生，才可以战胜强敌。当夜，杨蓁率该支队出发，经楼东，偷渡长江，忍饥挨饿，绕道夜行荒僻山路百多里，包围安边。同时，邓泰中支队占据对岸的右山，次晨佯攻安边正面。24日下午，杨蓁支队由安边左山背后突出，奋勇杀敌，呼声震地，敌人慌忙溃逃，护国军当夜占领安边。护国军连战皆捷，安边一战，声势大

振，叙府北军闻风丧胆，弃城而逃。叙府绅商及汉军派出代表欢迎护国军入城。1916年1月21日，叙府即为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占领^①。随即派兵北向自流井一路伸展，以断成、渝通路，又分兵西占屏山，东出截击援泸州之北军，以策应护国军中路北上。

由昆明至叙府，大小二十四站，即要走二十四天。护国军左路于12月20日由昆明出发，于1月21日抵达叙府，历经三十一天，沿途势如破竹，顺利夺取叙府。

随第一梯团出发的有四川人熊克武师长及但懋辛、李蔚如、余际唐、张冲、邹有章、傅常、周官和、王维纲、彭竹轩、邓莫堃等，还有陕西井勿幕等人。这一批四川知名人士充当了护国军先头部队的向导，成为沿途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先锋。护国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经过盐津（老鸦滩）、捧印村，顺利到达横江，沿途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支持。护国军接近安边，“地方人士，即结队欢迎我军进城”，“进至城内，百姓均夹道焚香欢迎”^②。有的群众自告奋勇，愿意充当向导带领队伍走捷路打击敌人。护国军先头部队到横江时，地方绅士李乐伦、曾峻生、曾益周等跑来迎接，并指手画脚，要如何如何打击敌人。李乐伦动员巡防军连长曾一清，带所部投效熊克武部共同讨贼。从此，熊克武又开始有了一连自己直接掌握的九子毛瑟枪的队伍。此后，一些地方团队如江安的蔡时敏和熊绶勋、况场的倪焕文、安乐的陈华封等与原第五师熊克武师长的旧部亦纷纷加入。2月，唐继尧任命熊克武为护国军四川招讨军司令，但懋辛为参谋长，领导一支军队，参加泸纳战斗^③。

刘存厚响应及占领纳溪

护国军第一军右路由戴戡率领入贵州，左路由第一梯团经昭通、盐津至叙府。当第一梯团将要进入四川境时，蔡锷亲率第二、三梯团为中路大军，在唐继尧及昆明父老的热烈欢送下，于1916

① 陈天贵：《护国战役亲历记》，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1～183页。关于占领叙府的时间，有的说是1月18日，也有说于20日占领的，也有说于22日占领的。

② 刘云峰：《护国军纪要》，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0页。

③ 但懋辛：《护国之役回忆录》，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0～67页。

年1月16日离开昆明，取道宣威、威灵、毕节入川，于赤水河、雪山关、风水桥等地，击退前来阻遏之北军进迫叙永。驻叙永之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立即响应护国军。

刘存厚与蔡锷同为留日士官生，清末曾在云南新军协统蔡锷部下，与唐继尧、雷飙、刘云峰等同任管带。雷飙与蔡锷同为湖南邵阳人，陈宦入川时，蔡以雷相托，命为刘存厚师下属之旅长，驻泸州。蔡锷于12月19日入滇，21日即致电雷飙，告以国内反袁大势，“同人于京津计议多次，决心与此恶魔一战，以奠国家，而安生灵”，“一切计划，早已分途并进”，“滇、黔拟合编三师，分出湘、蜀，军队现已集中，克日出发。望与积之（刘存厚）师长速作准备，相机因应”^①。

蔡、唐讨袁通电发出，西南大震，四川督军陈宦即电令川南清乡军总司令刘存厚从泸州调往叙永，并派队扼守古蔺雪山关，防堵滇军入川。刘既与蔡、唐有了联系，决心响应，不愿放弃泸州险要之地，迟迟其行。当时外间传说刘师长密与云南接洽，陈宦为防泸州落入护国军之手，一再电催刘存厚军驻叙永，并另派川军周骏部的熊祥生旅及北军一部进驻泸州，名为增援，实为监视。刘存厚不得已，才率部开赴叙永。刘存厚离开泸州，对护国军之征川计划十分不利。北京统率办事处随即迭次来电，动以封侯，诱以奖金，要刘存厚守待曹锟部来援，即予该师奖金四十万元。而陈宦又来电，盛称曹锟军蔽江而上，饷械充足；蔡锷病危，滇黔贫瘠，反对帝制，定遭奇祸，以威胁刘存厚。同时，曹锟已率北洋军张敬尧、李长泰、吴佩孚^②、齐燮元^③等部来川，目的在协同陈宦镇压护国

①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0页。

② 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1902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学习。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被袁世凯派充间谍。与日军特务机关合作，赴东北各地搜集俄军情报。1906年回保定，历任北洋第三镇参谋、营管带、炮兵第三标标统等职。1912年任第三师师部副官长，1914年升任第六旅旅长，1915年随曹锟入川。直系军阀。

③ 齐燮元（1879—1946），字抚万，直隶宁河（今属天津市）人。秀才出身。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又入陆军大学，毕业后投靠直系军阀，1913年任江西督军李纯的督署参谋长，1914年调任江西第五补充旅旅长，继改任第六师第十二旅旅长。

军，进窥滇黔。刘存厚不为利诱和威胁所惑，乃召集所部军官密议，决定反帝讨袁，响应云南。酝酿成熟，乃密将部队集中，预为作战准备，并于1916年1月20日晚间，秘密召集当时营长以上军官在叙永忠烈宫歃血宣誓。个个激昂慷慨，均愿以身许国，拥护共和，奋力讨袁，铲除帝制。

当蔡锷进驻毕节时，刘存厚即派参谋杨必滇（四川人，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特别班毕业生）见蔡请示。蔡命刘部向后转，对北洋军作战。当护国军第一军中路先头部队董鸿勋支队抵达雪山关时，刘存厚派守关部队引导入川。从此，刘存厚部在蔡锷统一指挥下，顺利进占纳溪。2月2日，刘存厚率领该师步兵第六、第八两团，工兵一营和炮兵一部分，及总部直属队等，其主要将领有参谋长万成路，司令（团长）陈礼门、刘伯心（刘借故未参加作战），支队长舒云衢、邓锡侯、田颂尧、廖谦等^①，官兵共约三千人，在纳溪宣布独立。此后，护国军在纳溪、泸州之间的棉花坡、朝阳观一带，与北洋军展开激战。

刘存厚响应讨袁，壮大了护国军的队伍，鼓舞了护国军官兵的斗志，给袁世凯及北洋军的嚣张气焰当头一棒。

二、贵州独立

梁启超、蔡锷在发动护国战争时，对云南和贵州是同等进行联络和策动的。筹安会起，蔡锷与贵阳护军刘显世之间的电报往还频繁。蔡锷又多次致电贵州巡按使刘希陶（即刘显治，刘显世之胞弟），希望他多多影响刘显世，赞助反袁。梁启超更写信给刘希陶及秘书长、贵州银行行长熊范舆，希望他们“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积极投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行列，并要求他们努力争取刘显世，大力赞助反袁义举。

贵州方面在对待袁世凯称帝问题上，刘希陶最为动摇，他作为刘显世的代表，在京多年，自诩熟知袁逆的力量和威势，认为滇、黔如真反袁，十九无成，缺乏反袁勇气。而袁世凯已封刘显世一等

^① 邓锡侯、田颂尧：《四川护国战役始末》，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3～38页。

子爵、刘显潜^①一等男爵，他们在—批老官僚拥袁派和少壮军人反袁派的多方影响下，依违不定。加上戴戡、刘显世之间又有一定的矛盾，1913年夏，袁世凯调唐继尧率滇军回云南，命戴戡为贵州巡按使，刘显世为护军使，实行军民分治，而戴戡却欲独揽军政大权，遭到刘显世的反对。此后，袁世凯调戴戡入觐，戴、刘争权之矛盾才趋缓和。云南独立后，戴戡率兵回黔，刘显潜曾函令驻罐子窑的游击军管带易荣黔率部阻止戴戡过境，由于贵州省督署参赞张彭年之说和，才未造成悲剧^②。

贵州与云南在地形上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如果贵州不响应独立而落入北洋军之手，云南就会受到严重威胁。云南起义后，孤军无援，更望贵州早日发动。戴戡、王伯群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积极策划者和活动者，力促贵州尽快宣布讨袁。王伯群是刘显世的外甥，他持蔡锷的信，向刘显世反复陈述反帝制之必要，刘毫不为动。但是，贵州人民反袁的情绪很高，迫切要求响应云南宣布独立。贵州军团团长王文华、熊其勋等也都劝刘下决心讨袁。王文华就是王伯群的兄弟。由于贵州的兵额很少，团长一级的倾向具有很大的影响。

贵州巡按使龙建章是袁世凯派来监视刘显世的一个高级政治侦探。为了缓和贵州军民的反袁情绪，1月7日，他申请袁另行召集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袁一面授意参议院回电予以驳斥，一面于1月14日下令叫他离职北上，并为讨好刘显世起见，派其兄弟刘显潜署理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于1月16日化装逃走，使贵州的拥袁势力大为泄气。

1月18日，贵州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力促刘显世宣布独立，改称护国军贵州都督，但是刘仍然依违不决，还电请袁迅速接济军饷以固军心。1月24日戴戡率领云南军一营进抵贵阳，26日贵阳各界在省议会旧址召开群众大会，热烈欢迎戴戡。戴戡在会上痛斥袁世凯“叛国罪状”，详细介绍了云南首义情形。贵阳各界“于逆则

① 刘显潜（1865—1938），字如渊，贵州兴义人。时任贵州西路游击军总司令。

② 张彭年：《辛亥革命四十年间贵州政局的演变》（续一），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44页。

痛心疾首，于滇举义则鼓掌如雷”。会上，当推刘显世为贵州都督，宣布贵州独立，准备出兵北伐，“铲除帝制，还我共和”^①。当日，刘显世又收到袁汇来的军饷三十万元。刘显世接受推举，于27日正式通电宣布独立。贵州的独立，稳定了云南的外围，并使北洋军在湖南和四川两省都受到威胁，这是云南护国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一大胜利。

戴戡在云南曾参加商定滇、黔两军并肩作战，黔军担负右翼的责任，受刘显世之委令，以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名义，率黔军五、六两团由遵义北上，攻綦江。2月2日，抵松坎，开始与北洋军接仗，牵制北洋军，配合蔡锷军进攻。又以王文华为护国第一军右翼支队司令，率黔军一、二、三团出湘。省中除都督府警卫营外，委刘显潜为游击军总司令，以所部四营维持治安。从此，贵州又成为护国军的一个重要后方。

三、泸纳血战

袁世凯的妄想及北洋军之残暴

袁世凯在接到云南宣布独立的消息后，立即布置三路进兵云南的军事计划。他派虎威将军曹锟为第一、第二两路总司令。以第六师师长马继增（曾）为第一路司令，率第六师、第五师经湖南，图贵州，附以飞机二架，由秦国镛统领。以张敬尧^②为第二路司令，率第七师及第八旅由四川前进，附以飞机四架，由王颢统领。第三路派临武将军龙觀光假道广西攻云南。他认为，1913年国民党占有东南半壁五六省的地盘，只经过了一个多月，就被北洋军全部打垮，这次他用狮子搏兔的气力对付云南一隅之地，是不难迅速解决的。因此，他气势汹汹，限曹锟于六个月内平定云南。

第二路兵力包括由岳州调动的曹锟所属第三师约八千五百人，

① 《戴戡出征时之通告》，见《护国军纪事》第二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50页。

② 张敬尧（1881—1933），字勳臣，安徽霍邱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历任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南昌卫戍司令官、湖南督军。时任北洋陆军第七师师长。

由南苑调动的张敬尧所属第七师约六千人，由保定调动的李长泰^①军第八师七千余人。这些军队接到命令后，与袁世凯讨价还价，或者索饷要挟，或者逗留缓进，他们从岳阳、沙市、宜昌、重庆溯江而上，沿途强征夫役，虐杀无辜，抢劫商民，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北洋军到沙市，强拉民夫，苦力匿避，市上忽无壮丁。第八师兵站排长因争风妒奸，放火烧毁娼家，延烧居民四十余户。“北兵到宜昌，多强占民房而居，无论商店住户，该兵等不问可否，径趋而入，即将被褥置于堂中。亦不举火，见人家饭熟，即取而食之。若其家有青年妇女，即任意奸宿，或其父夫稍有违拗，则将其捆绑，置于一旁，更轮奸其妇女，必使其父夫俯首服从而后已，以致商民怨声载道”，视北军为豺狼野兽。由于北洋官兵的大肆骚扰，沙市、宜昌、重庆等处商货停滞，“商业殆有中止之势，日用品之价格，腾贵非常”。当北洋军大队人马麋集在巴东、青滩时，强拉民船，为其运输。此地水流湍急，暗礁险滩众多，船行十分困难。“是日风势不顺，舟行迟缓，北军迫令篙工挂帆，以期速达。篙工不得已，为挂半帆。北军遽推开篙工，将风帆自行挂满，未行数里，舟遂搁浅，北军暴怒，以篙工有意为难，竟拔枪刀刺杀之。该篙工家属得耗赶到，妻孥三人围尸而哭，乃北军气仍未平，复开枪连毙其妻孥等。附近居民睹此情状，愤极大哗，北军愈怒，一连开枪，共杀毙无辜乡民二十余人。”^② 1916年元月底，北洋军先后抵达泸州一带，“虎狼既至，劫掠一空，有将资财匿藏，不肯具告者，则被虐待残杀，尸体暴露，遍于里闾，然此皆安分守法之民也。全乡妇婢数百，无一能避奸污，哀号之声，惨不忍听”，“迨北军丧败，移营而去，又举阖村舍店，尽付一炬”^③。这批强盗进入四川，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给护国军带来较大的威胁。

北洋官兵所到之处，无恶不作，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南川

① 李长泰，字阶平，河北武清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历任北洋第六镇统领、大名镇守使、冀南镇守使、陆军第八师师长。袁世凯称帝时封其为三等男爵。

② 《行军残暴记》，见《护国军纪事》第二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90~194页。

③ 《川叟陈学成泣告世界血书》，见《护国军纪事》第四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69页。

县管内，有金元亨者，家世望族，拥有资产三四十万元，其长女某于冬季休假，由城内女校归宅，道遇四五名袁兵，尾之而行，直至金氏门前，盘桓不去，该主人谕令速退，袁兵转出恶言，势颇横暴。适该主人所练之团保兵数名来前，当即殴及袁兵，受创而去。袁兵忿甚，乃纠集同伍，各着常服，伙袭金宅，闯入室内，大肆掠夺，一家悉为之破碎。该主人急通知团保总局，顷之团兵赶至围攻，大放炮火”，赶走袁军。随即南川县团保总局告援于贵州护国军。贵州护国军二千，昼夜兼行，驰抵南川，给袁军以迎头痛击，袁军败窜綦江^①。

反围攻叙府鏖战

当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攻占叙府后，袁世凯大为震惊，川督陈宦、伍祥桢等均受谴责。袁急令冯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步兵两个混成营由泸州出发；伍祥桢之第四混成旅约四千人由叙北白花场出发；陈宦之警卫团及川军数营，以警卫团长倪聘卿率领，由成都顺江而下；巡防军统领朱登五调集防军十余营，在叙府之南伺隙而动。总计上述兵力约五六千人。冯玉祥攻叙之东，伍祥桢攻叙之北，倪聘卿攻叙之西，朱登五攻叙之南，袁世凯、陈宦以数倍于护国军之兵力，四面围攻叙府，企图一鼓而攻下之^②。

但是，进占叙府的护国军第一梯团在刘云峰的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对敌人各个击破。伍祥桢由白花场出发。该场距叙府不过百里，故先到。刘云峰派邓泰中支队全部、杨綦支队一营，于1月31日与伍祥桢战于宗场，战斗两日，未分胜负，至第三日下午，忽闻冯玉祥部由泸州出发，本日在南溪宿营。刘云峰一面命田钟谷营驰赴叙府城东四五里之白沙场布防，扼守泸州至叙府的交通要道；一面在宗场讲明敌军压境之形势，激励官兵务于当日下午将伍旅击退。官兵知形势危急，奋勇杀敌，当即将伍部击退，随即收拾队伍，尽数增援白沙场。时已天黑，官兵终日未得饮食。是日乃阴历年关（二月三日），全城百姓争将过年食品献出劳军，更加

① 《行军残暴记》，见《护国军纪事》第二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93页。

② 刘云峰：《护国军纪要》，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0页。

激发了官兵的斗志，夜间即将阵地占领，左翼占催科山，右翼到江边。田钟谷营与冯旅激战一日，未退寸步，但全营士兵只剩下八十余人。翌日黎明，即展开激战，相持至午后，梯团长刘云峰之右肋被炮弹铝丸所伤，仍坚持指挥战斗，营长金汉鼎之右臂被敌弹打断，亦拒绝回后方治疗。4日晚，营长田钟谷决心与全营共存亡，率壮士八十余人，避开敌人火力，占领江边高地。5日晨，即用大炮轰击敌人，午后，冯玉祥即率部退至内江。

当护国军正在叙府东郊与冯玉祥军激战时，叙府西郊离城二三十里之牛溪坳，被陈宦卫队团长倪聘卿率兵占领，5日晚又占叙西据点翠屏山，炮轰城内。当冯军撤退后，护国军官兵连夜由叙东经叙北至叙西，抄袭敌军后路。6日晨，给倪聘卿部以突然打击。敌猝不及防，即行溃败。护国军又在叙府西郊打退北军。2月7日，杨蓁率队乘胜南渡金沙江，打击朱登五部。该部均系巡防营，闻其三路友军皆败，亦不战而逃^①。

此次反围攻战，护国军以一个梯团约千人的兵力，击败敌人两个混成旅、一个警卫团以及川军数营等近万人的兵力，除打死打伤敌人约两千外，“计捕获北兵百余，持枪投诚者，北军汉军共计六百余”^②，缴获山炮四门、炮弹数百发、步枪弹七十多万发，取得重大胜利。这是护国战争中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在战争中，英勇的护国军将士斗志昂扬，视死如归，连伙夫们也表现了与全军共生死的决心，他们时常冒着敌人的猛烈火力，挑着铳锅，送饭到阵地，铳锅常被子弹击穿，甚至饭碗里会检出子弹。全体官兵重伤不下火线，每当护国军攻势遭到敌人顽抗战况胶着时，支队长杨蓁常亲率机关枪排和步兵一小部，冲锋在前，突破敌阵，使全线官兵士气大振，奋勇向前，夺取胜利。护国军官兵的这种英雄气概，充分表现了他们反对袁世凯倒行逆施和保卫共和制度的坚强决心，表现了正义之师是可以以少胜多的。正义的事业必将赢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预示护国战争的必然

① 刘云峰：《护国军纪要》，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0～93页。

② 《致唐继尧电》（1916年2月8日），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4页。

胜利。

泸州血战总攻受挫

泸州北枕沱水，南面长江，东据两江会合之口，西有龙透关的险隘，易守难攻，有“铁打泸州”之称。而此地又为滇、黔入川之要道，军事上极为重要。2月上旬，护国军进攻泸州，与北洋军主力在泸州与纳溪之间展开了激战。

2月2日，刘存厚师在纳溪宣布独立，随即由刘师之田颂尧支队占领纳溪上游之江安、南溪，断绝水上交通，上解宜宾之危，下用全力攻泸。2月4日，董鸿勋支队迅速开赴纳溪，与刘师会合，当即决定在敌人大部分增援军队快到泸州之前，乘胜北进，及早攻下泸州。5日发起攻势，占领蓝田坝、月亮岩等地，由刘存厚师陈礼门团防守，大江西南归护国军所有。董将山炮六门部署在月亮岩，率支队由下游泰安场渡长江，经过激战，于9日攻占五峰顶，瞰制泸州。但这时，北洋军精锐第七师张敬尧师、李炳之旅各一部，相继抵泸。2月8日黄昏，敌人组成敢死队，伪装难民，偷渡长江。而原川军陈礼门部竟受其欺骗，准予登岸，致使敌军偷渡成功，占领月亮岩阵地，拨给陈礼门团的山炮全部被敌军夺去，该团向纳溪溃退。团长陈礼门一时激于责任，当即自戕以殉。进攻五峰顶的董鸿勋支队后路受到威胁，不得已在敌人反击下，由原路渡江，向双合场方向撤退。

在纳溪前线首攻泸州不遂的情况下，蔡锷命刘云峰第一梯团酌拨部队增援。该团急抽调精锐李文汉营顺江而下，2月13日，与何海清、禄国藩两支队同夜抵纳溪，又调江安、南溪守军一部来纳溪，准备再攻泸州。14日晨，敌吴佩孚旅由护国军右后方双合场渡过小河袭击护国军后方安富街光山一带，被护国军击退。董、何两支队攻双合场，奋勇冲杀，毙敌二百余人，同时李文汉营攻敌右侧，占九川山岩敌阵地，毙敌百余人，遂解除纳溪危急，使战局暂告稳定。但是，董鸿勋却因首攻泸州不下，被蔡锷免职。董鸿勋早年经杨振鸿介绍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加入国民党，后又加入中华革命党。袁氏帝制自为，董奉孙中山先生委派回滇运动滇军，因此激烈反对帝制，积极讨袁，担任护国军第一军中路先锋，沿途所战皆捷，奉命攻泸亦特别出力，只因友军脆弱及后援迟到，以致功败

垂成，遂被免职^①。

敌军占领蓝田坝后，气焰十分嚣张。曹锟坐镇重庆；敌主力第七师由张敬尧率领，抵达泸州；加上吴佩孚及李长泰两混成旅、吴新田的新十四旅和一些附袁川军一齐集结在纳溪城东门外的棉花坡、双合场等地区，投入一线作战约两万人。双方兵力比较，敌军越来越多，护国军第三梯团长顾品珍率禄国藩、朱德两支队虽抵达前线，再加上刘存厚师两三千人，护国军的兵力亦不过五六千人，敌军超过护国军兵力四倍。在东西绵亘一百华里的战线上与敌人对峙，困难的确不少。北起长江，南至永宁河，双合场纵横二十余里间，成为两军主力战场，战斗激烈异常。这里岩岭险峻，山径崎岖，竹木丛杂，加之天雨，泥泞载道，护国军又大都作背水之战，战斗更为艰苦。而敌人兵力优厚，深沟高垒，与护国军作阵地战。战斗激烈展开后，蔡锷于23日前往纳溪，亲临一线指挥。他计划“仍以扼守要点，集结主力，多张疑兵，以分敌势，俟有隙可乘，分头击破之”。为了迅速歼灭正面敌军，又从叙府第一梯团抽调第二支队工兵营金汉鼎部与第一支队第二营马鑫培部，及机关枪和炮兵各一部。护国军在蔡锷的号令下，军官身先士卒，战士奋勇冲杀，短兵相接，杀声四起。敌人措手不及，张敬尧师死伤两三千人，吓得北洋军躲在战壕里不敢出击。24日激战后，张师所存仍有五千人，加上新到的第八师王旅，仍在八千人以上^②，26、27两日，敌又增加一团，总兵力近一万人。由于敌人不断增援，护国军与北洋军在棉花坡一带浴血激战，斗争更为艰巨。“敌更番休息，我则夜以继日；敌则源源增加，我则后顾难继。”^③

正当双方主力于泸纳血战胶着于棉花坡一带时，北洋军使出阴谋诡计，李长泰以一旅之众迂回到护国军后方，想从赤水抄袭叙永的后路，将使护国第一军全部受到敌人的大包围。当时叙永后方，

① 陈天贵：《护国战役亲历记》，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陈天贵，时任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刘云峰部少校副官。

② 《致唐继尧刘显世等电》（1916年2月24日），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8页。

③ 《致唐继尧刘显世等电》（1916年2月20日），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21页。

除一千余伤病员外，无一兵一卒。蔡锷立即命令何海清支队长率领本部不满百人，连夜从纳溪赶到叙永以东的双龙场（此地名可能有误，位于叙永通赤水的要道上）要口，给敌人先头部队以迎头痛击。李长泰不知护国军之虚实，狼狈而逃。双龙场阻击战吓退了敌人，稳定了后方，粉碎了敌人的包围阴谋，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2月28日，蔡锷认为敌我相持既久，后方之危业已解除，应该组织总攻，试图一战击破人数众多的敌军。蔡锷、刘存厚亲临前线督战，督饬各部队长官严守阵地，一时士气大振，奋勇杀敌，以弱胜强，曾在双合场、石包沟、牛背石、石棚、方山等地重创敌人，但因敌凭阵地险固，居高临下，利用猛烈火力顽抗，护国军主力总攻受挫，伤亡亦重，弹药消耗殆尽。当时因连续作战一月，夜以继日，战士“疲劳太甚”，士气亦受到影响，“非暂退不足以全师”^①。只好另择阵地扼守，“一以伺敌以制胜，一以迁延时日，用待日变”。3月6日，蔡锷自纳溪退向大洲驿。纳溪、江安、南溪相继失陷。但是，敌人方面弹药消耗更多，死伤倍于护国军，直到护国军撤退后，北洋军仍觉护国军余威可惧，不敢轻进南追，护国军主力得到休整之机会。

在左路叙府第一梯团方面，先被调走精锐李文汉营；2月26日又调走金汉鼎、马鑫培部。当时，守卫叙府的田钟谷营，自白沙场战后已经残破。此外，有唐继尧新派到叙府增援的工兵连刘国威部，又多属退伍老兵。田、刘两部加上步兵一排、少数炮兵，合计共不到三百人，因此，叙府兵力极为空虚。2月29日，冯玉祥、伍祥祜两旅乘机猛攻叙府，田钟谷仓惶退却，刘国威死守阵地，全连死伤殆尽。3月2日，第一梯团放弃叙府，向安边、横江退守。冯玉祥、伍祥祜等部占领叙府后，迭奉曹锟与陈宦电催追击滇军。但冯玉祥等见全国纷纷反对帝制，势不可当，遂骑墙观望，占领叙府后就止步不追了。

右翼护国军第一军五、六两梯团在戴戡率领下，于2月2日抵松坎开始与北洋军接火。2月中旬，迭克九盘子、青阳寺、赶水等要塞。17日攻克分水岭，进抵桥滨河，距綦江城仅八里。而

^① 《致李曰垓何国钧书》（1916年3月8日），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24页。

袁军张敬尧来援，相持至26日。守綦袁军开城出战，被护国军击退。不久，北洋军第六师马继增之一部由涪陵至綦江，与护国军大战于刘罗坪山，历时18日。黔军“或五六人一队，或数十人一队，潜伏山中，专以短兵相接”^①，以夜攻为主，狠狠打击北洋军。护国军曾于2月中一度占领江津、綦江。嗣以袁军逐渐增多，护国军中路又退出纳溪，曹锟得抽泸纳之兵以援綦，由李炳之旅长任总司令，经过连日激战后，戴戡军乃不得不退守黔边。

湘西及川东战场

贵州在宣布独立前夕，戴勘、刘显世即派王文华任右翼军东路司令，率领临时编成的十三营官兵由镇远入湘，于2月3日占领晃县（今新晃），复分兵经铜仁入湘，势如破竹，先后占领安江（黔阳）、洪江、靖县、双江（通道）、绥宁、麻阳等地。袁世凯令第六师师长马继增派两个团的兵力进入湖南，在湘西进行争夺战。护国军出湖南的兵力原是极其薄弱的，但由于“北军军纪不严，民怨沸腾”，并有“勒令县署供张、聚众挟制情事，各知县被迫不堪，纷纷逃去”^②，湘西人民的反袁武装力量不断壮大，配合护国军作战。2月20日，长沙中华革命党又袭击将军署、北门及小吴门等地。在此期间，袁军马继增部在湘西节节败退。马继增自驻辰州，周文炳旅长统率所部士卒扼守辰溪。袁世凯迭电“督兵前进”，相机恢复湘边。而马部半系北人，地形不熟，足着革履，不利山行，又无纪律，结怨地方。马继增据情电达中央，请求处分，忽于2月26日，自杀身亡^③。北洋军无主，袁世凯手忙脚乱，调盛京张作霖入湘不成，复调十一旅旅长周文炳继任第六师师长，与护国军相持于辰溪、沅州（今芷江）、宝庆（今邵阳）之间。3月中旬，二十师

① 《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三期，《时事日记》，第7~8页。

② 《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三期，《时事日记》，第7~8页。

③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第187页。另说马继增被湘西人民杀死，见《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三期，《时事日记》，第5页。

范国璋从岳阳至辰溪^①，会同周文炳师攻占麻阳、沅州。湖南战场的开辟，对牵制北洋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1915年冬，孙中山派中华革命党人刘伯承^②、康云程等从上海回四川，在川东万县、涪陵等组织士绅及会党一二千人在新庙场起义，称四川护国军第一支队，以王伯常任支队长，刘伯承负责军事指挥，康云程负责联络。起义军曾攻进酆都城，刘伯承亲临前线作战，气壮风雷，给敌人两个团的兵力以沉重打击，缴获快枪六百余支。在这次战斗中，刘伯承右眼被敌弹射中，眼珠被击出，部队退出城外，军队因无人领导，遂分头活动。此次起义，仅一二百支杂色烂枪，却声震川东，牵制了北洋军正规精锐部队六、七团人^③，有力地支援了川南护国军。

蜀道崎岖

泸纳血战虽以护国军退出阵地而告一段落，但是，护国军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首先，护国军以大约五六千人的兵力，给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北洋“常胜军”以迎头打击，敌军死伤三四千人，仅张敬尧师即有旅团营长十余人、排长四十余人死伤^④，杀伤了敌军的有生力量；其次，蔡锷及其护国军向敌官兵宣传了护国即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必要性及正义性，动摇了敌人的军心；第三，战争坚持一个月，从泸纳局部来看，取战术上之守势，从全局看，则为战略上之攻势，扩大了政治影响，促进了全国各地反袁势力的发展。

在这场浴血搏斗中，英勇的护国军将士克服重重困难，一往直前，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蔡锷领兵出发时，所携军饷不足两个月，兵士仅发伙食费和少许津贴。蔡锷怀抱“以身许国之心”，不顾身患喉头结核之重病，带兵出征，自背饭盒，用树枝作

① 《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三期，《时事日记》，第11页。

② 刘伯承（1892—1986），乳名孝生，学名明昭，后改伯承，四川开县人。少年时在家乡读私塾中学。辛亥革命时在万县参加反清革命军。1912年毕业于重庆陆军将弁学堂速成班。此后，入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排长，积极参加“二次革命”。1914年去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12月奉命返川建立川东军，发动讨袁战争。之后留学苏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将领。

③ 康云程：《护国战役中川军起义、刘伯承元帅光荣失去右眼换取革命胜利》，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2~75页。

④ 《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三期，《时事日记》，第9页。

筷子吃饭，穿着在日本当学生时常穿的破旧大衣，生活极为简朴，与官兵同甘共苦。虽喉痛难支，濒于死亡危险者五六次，仍躬赴前敌，指挥战斗。正如蔡锷自己所说，当时“身历戎行，风尘倥偬，军书旁午，精神激发之余，病势亦为之稍却”^①。在蔡锷精神的鼓舞下，虽然时值数九寒冬，士兵们“衣不蔽体，食无宿粮”，“风餐露宿，毫不为阻”，仍然士气旺盛，无不以一当十，英勇无比。蔡锷当时在《军中杂诗》中极其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情形：“绝壁荒山二月寒，风尖如刃月如丸。军中夜半披衣起，热血填胸睡不安。”“挥刀杀贼男儿事，指日观兵白帝城。”护国军正是在这种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的鼓舞下，与敌人血肉拼搏，取得巨大的胜利。在叙府反围攻鏖战中，“敌方望城锐进”，李文汉“以全营力量，伺敌进至相距仅二十余公尺时，突然进攻，出敌不意，冲入敌阵，肉搏冲杀”^②，取得大胜。李文汉调至泸纳前线后，“勇敢鏖战十几昼夜，身先士卒，以致负伤。朱德支队长守棉花坡正面陶家瓦房背后高地，与据守红庙高地之敌隔水田对峙，敌人日夜以火力攻击。何海清支队长屡挫敌之攻袭，几次突入敌阵”，与敌人搏斗，“泸纳方面以何战功最大”^③，杀得敌人闻风丧胆。

袁世凯军从北方而来，语言隔阂，纪律太坏，在战地尤甚，老百姓深受其害，更加激起对袁世凯称帝及北洋军的仇恨。而护国军方面，由于纪律严明，爱护百姓，受到当地人民的热情支持。“时有农民把茶饭送给护国军前线官兵，又辄有农民把敌人负伤官兵担送给护国军，但护国军都予以优待，送至野战医院诊治。”^④当护国军对北洋军实行总攻时，张敬尧派旅长吴新田亲率一混成团，经双合场渡河，绕道偷袭纳溪安福街护国军总司令部。但敌军不熟悉道路，强拉一老百姓带路，而带路者由于北洋军平时对人民凶残，

① 《复段祺瑞电》（1916年7月5日），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09页。

② 陈天贵：《护国战役亲历记》，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9页。

③ 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5页。

④ 祝鸿基：《护国战争》，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7页。

十分憎恨，有意将敌军引入一长约三华里的峡谷，当地居民又由捷径飞报护国军。此处紧急关头，总司令部因无兵力，十分棘手。幸在当天清晨，因司令部对岸发现敌军枪声，司令部从前线调回来的一连又一排士兵刚好赶到，参谋长罗佩金遂命少校参谋杨森协同该连连长赵燧生，迅速赶往安福街背后罗观山隘路口的峡谷两侧埋伏。当敌人进入埋伏圈内时，一齐猛烈射击，敌人措手不及，顿时慌乱，纷纷逃窜，自相践踏，死伤很多，吴新田本人困缩在队伍中最后才得幸免。经此打击，北洋军知道人民对护国军是支持的，不敢再来偷袭了^①。

在这里，有必要谈谈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支队长杨蓁。奚济霖（时任田钟谷营的连长）在《护国第一军第一支队回忆》中说，杨蓁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矢志保卫共和制度；爱护士兵；经济公开；着重战斗训练；严禁扰民，寓兵于农。因此，杨蓁所带之兵，个个朝气蓬勃。筹安会发起以后，杨蓁积极反对帝制。护国军誓师讨袁后，杨蓁在第一军右路兼程奋进，冲锋在前，表现出一定的军事才能，而梯团长刘云峰指挥不力，且受到杨的批评，因而对杨蓁怀嫉不满。杨蓁也曾不同意蔡锷从叙府抽调金汉鼎、马鑫培两营前往纳溪总攻的事情，使蔡锷不高兴。当叙府失守后，3月16日，杨蓁、邓泰中二支队长被蔡锷以请兵增援为名，派回昆明，离开了前线。杨蓁系同盟会员，继为国民党员，又继为中华革命党员，屡立战功，未被蔡锷提升，反被排挤撤向后方。“盖杨不失败于战事，而挫折于人事。”护国军许多官兵对杨蓁之遭遇抱不平，唐继尧也因此对蔡锷不满^②。在护国战争的紧急关头，蔡锷撤掉了中路先锋董鸿勋、左路健将杨蓁，临阵易将，至少表现了蔡锷在气量上的缺点。同时，护国军在叙泸前线与敌人军力之对比，众寡悬殊，且敌人踞有利之地形，在此种情形下，与敌人作阵地拼杀，在战术上也不能说完全合适。

① 杨如轩：《护国战争亲历记》，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9页。

② 陈天贵：《护国战役亲历记》，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5～196页。

指陈方略，反攻获捷

北洋军占领纳溪、叙府，使袁世凯高兴一时，认为云南问题不久即可解决。在此以前，在外交上，他迭次接到日、英、法、俄、意等国之警告，要他缓办帝制。在军事上，护国军在四川占叙府、纳溪、松坎，进抵綦江，在湖南占麻阳、芷江等地，给袁世凯以巨大威胁，因而不得不缓办帝制。而现在从前方又传来一些令他鼓舞的消息，在北洋军攻占纳溪的同时，护国军右翼退出綦江，广西方面龙觀光军攻占剥隘，湖南方面北洋军周文炳师3月13日占据麻阳。袁世凯被这些接二连三的捷报冲昏了头脑。这是袁党帝制复活及袁党气焰熏天的时期，也是护国军形势逆转和作战更加艰苦的时期。

护国军第一军被迫从纳溪、叙府向南背进后，“默察将士情状，其精神似甚颓丧”，护国军之官兵士气转向低沉。刘存厚部由于“弹乏饷竭，士气尤为腐窳”，“由阵地争先溃退，势如潮水”，“将士纷纷奔永宁者不少”^①，甚至有人退至镇雄。田钟谷营从叙府退向安边时，“在山野大道小路上纷纷退走”，“军心涣散”，“草木皆兵，狼狽殊甚”^②。当时，石陶钧曾说：“一旦背进，衰竭之实，遂不可讳，甚者至陷于无神经。”^③ 蔡锷也曾经说：“在那几日里，敌人只需以一营的兵力进攻，我军非全线撤退不可。”^④ 由此可见，不仅当时官兵士气不振，而且总司令蔡锷之心绪亦不安定。

泸纳血战中唐继尧后援不力，使蔡锷甚为恼火。2月8日，蔡锷致电唐继尧：“请即调昭属警备队或新招兵队赴叙，以厚兵力。”2月21日，又致电唐继尧：“我军激战兼旬，耗弹颇多。炮弹现只存二百发，枪弹除原领者悉数用罄外，纵列弹药亦耗三（分）之一。各部队纷纷告急，请予补充。”2月24日，又致电唐继尧、刘

① 《致李曰垓何国钧书》（1916年3月8日），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24~425页。

② 陈天贵：《护国战役亲历记》，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94页。

③ 石陶钧：《跋》（1916年12月），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28页。

④ 张彭年：《辛亥以来四十年间贵州政局的演变》，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页。

显世，务望唐继尧“将每枪所储弹药千发，悉数饬解，分存毕、永，并每月拨送补充兵五百乃至千人，则逆援虽众，不足平也”^①。唐继尧坐镇昆明，实际负责总指挥及总后勤。2月下旬，当李文汉、金汉鼎从叙府调援纳溪时，唐继尧曾派刘国威工兵连援叙府，“全部官兵系唐继尧新招来的退伍老兵”^②。叙府失守后，唐继尧又令新编支队廖廷柱增援横江，“该部武器均系柜盖枪、九子枪及二人抬等，尽系废物”，“不能作战”^③。可见，唐继尧派往叙泸前线的援军，全系老弱残兵，更未运去武器弹药。所以蔡锷从纳溪背进大洲驿后，弹饷耗尽，颇有山穷水尽之感，“云南不给子弹，我除自裁外，无法可想”^④。由于唐继尧对泸纳前线援助不力，很多人都怀疑他别有用心。蔡锷亦为此对唐不满。其实当时昆明亦有困难，云南起义后，龙觐光奉袁世凯之命为云南查办使，乘护国军四出，内部空虚之际，一面亲督所部三四千人由广西进犯云南，一面命其党徒龙体乾等起兵袭击个旧、蒙自等地，气势汹汹，唐继尧不得不派刘祖武率军南下。当时云南内外四处，同受压迫，对叙泸前线援济不及是必然的。

此次总攻受挫之原因，除了后援不济及敌人强大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梁启超过于性急，在指挥上犯了策略上的错误。对此，梁后来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检讨说：“余辈在津原订计划，欲由云南潜运军队到四川境后，乃始宣布独立，（12月）21日，余在上海得蔡君电，谓23日前队出发，出发二十日后，发表独立之公文，此正在津原议也。”但当时从上海外交方面得到一种传说，“袁世凯预备以重要权利许日本，将派周自齐赴日订约，日已允许”。梁启超信以为真，恐怕发动过迟，于国家损失巨大，因此“由南京发出一电，促其早发”。“故26日即揭晓。后此在四川与北军相持，死伤甚多，未始非由揭晓太速之故。”当时四川方面，刘存厚师已准备响应，冯玉祥、伍祥桢是可以争取的力量，陈

①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3～418页。

②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3页。

③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4页。

④ 《蔡锷与刘云峰的谈话》，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页。

宦身边亦有反袁势力，只有周骏坚持效忠袁世凯。如果按原订计划，出发二十日后才宣布独立，就有可能尽早地争取冯、伍，消灭周骏，一举夺得四川。因此，当时蔡锷十分惋惜地说：“此次出征，师行未能大畅，实因宣布过早，动员缓慢，出师计划未尽协宜”，以致宣布起义后半月余，蔡锷才率领护国军主力自昆明出发，这就给袁世凯调兵入川，使其主力先行抵达泸州的机会。因此，造成护国军的极大被动。当时，梁启超亦承认指挥失当，“其改早之故，想是因吾督电，不审曾改早而生军事计划之支障否？……果尔，则吾罪真末由自赎。然成事不说，今惟祝进取之胜善而已”^①。

护国军在泸纳前线与数倍于己之敌相持一个多月，困苦万状，而东南及两粤仍未响应，这也有损前线官兵的士气。因此，蔡锷及其他将领对梁启超电促云南过早宣布起义及对东南策动之缓慢，不免有所埋怨。当时，梁启超怀着内疚和急于扭转川南局势的心情，一面欲奔赴广西发动，一面多次写信给蔡锷，“指陈方略极详”^②，在《致蔡锷第四书》中指出东南诸镇尚不能发动的原因，更望蔡锷等“诸公勿缘此而稍有懊丧”，更应鼓起勇气，坚定必胜信心，如“志行薄弱，便不能任大事，须知我辈当此万难之局而毅然以身许国，岂为高兴来耶？将来所遇困难失意事，不知凡几，若以小利小挫而生欣戚，则此憧憬之心境，已足以败事矣”^③。他在《致蔡锷第五书》中说，护国军方面虽然有困难，但是前进中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困难，而袁世凯更有不可克服即“蹙独夫于死地”的困难。这就是“外交已决绝，鼯鼠五技，无复可弄，一也；库空如洗，中交两行破裂在即，二也；骄兵要挟，不能调遣，三也；新华宫炸弹事起后，见影怖魅，左右近习，株连无算，人不自保，四也；家庭内讧，树党纷争，庆绪朝义之变或将骤发，五也”。“都中已入恐怖时代，气象惨澹”，“人人心目中咸谓不出两月必生奇变”。

① 《致蔡锷第一书》（1月8日），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38页。

② 蔡锷在梁启超《致蔡锷第五书》（《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27页）跋中说：“锷在军中，凡得先生八书，每书动二三千言，指陈方略极详。”其六、七、八各书尚未发现。

③ 《致蔡锷第四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67页。

袁世凯已经黔驴技穷，无法维持其统治了，护国军应坚定信心，“先奠定全蜀，更图进取”，不能“为义愤所激”^①，轻举冒进。

3月16日，梁启超到海防后，更致书蔡锷及滇军将士，并托友人黄溯初至昆明，“代达忱款”，进一步说明形势。梁说：“友邦态度日趋变而助顺，大约日内必承认为交战团体”，广西即将独立，“重见于天下，自无待言”，“大局之定当不远矣”，消灭“元凶”已不成问题，而今后的建设问题，任务更重，热望云南诸公“益奋其高尚武侠之精神，为全国军界树立良好之模范”。在此之前，梁启超曾多次致书（电）蔡锷，对有关军事的战略策略、官兵关系、思想教育等都作了具体指示。梁启超强调指出：要求全军将士具有爱国思想，为保卫共和制度而战。全军将士明确了反袁战争的意义，也就不会被暂时的物质困难及小挫小败所吓倒，也就会振作精神，战胜敌人。要求蔡锷在与袁军作战时坚守阵地，“但能力顾藩篱，得寸则寸，得尺则尺，相持数月，诸方之变必纷作，而吾主力军既立于不可败，然后天下事乃有所凭借”^②。

在从叙泸前线南向背进时，护国军将士一时颇为慌乱，蔡锷严厉而迅速地制止了事态之发展，集合部将士卒，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讲明“总攻即将开始，川军须严申军令，能战者奖，怯战者惩”。又说：“迭接梁任公先生电，护国义军已博得中外同情和各方的支持，前线能多鏖战时日，倒袁定会成功。”^③蔡锷又决定，“非先作我士气不可”，对将士进行反对袁世凯、为保卫共和而战的爱国主义教育。蔡锷“乃遍历行间，耳提面命，以血泪申大义，以军法励怯懦”。当即将闻讯而逃的军警督察大队的中队长一名及第六支队临阵退缩的排长一名宣布罪状，予以枪决，士气为之大振。“竭移山填海之力，矢有进无退之心”^④，使人人树立为正义而战的

① 《致蔡锷松坡第五书》，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25页。

② 《致蔡锷第四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49页。

③ 邓锡侯、田颂尧：《四川护国战役始末》，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0页。

④ 石陶钧：《跋》（1916年12月），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28页。

决心，坚定必胜的信心。经过大约十天的休息与整顿，各支队也进行了思想教育，护国军官兵的士气很快复苏。

正当此时，在护国军方面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大好形势。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龙觐光部被护国军解决的消息迅速传到四川，极大地鼓舞了护国军的士气，更加坚定了胜利在望的信心。同时，陈宦与蔡锷谈判停战，冯玉祥倒戈反袁，张敬尧也已经动摇。3月20日前后，刘显世派“男女民伕，人背马驮，日夜运来一些子弹，并援助军服一万套，银五万元”。唐继尧也汇来“十万元，并运来子弹一部”^①。敌人占领纳溪后，一派骄气，军纪更坏，士兵有在壕内赌博者。蔡锷认为总攻时机已到，乃下令第三梯团长顾品珍所部五、六两支队于3月17日夜间冒着倾盆大雨袭击占据茶塘子及梁山一带之敌人。当日午夜正面已进入茶塘子敌人防线，戕杀哨兵后，将敌炮机拆下，始大声呼杀，声震山谷。敌于梦寐间手足无措，被刺杀于壕中者数百名，逃出者因两侧皆为绝壁，坠岩死者不计其数。左翼袭击梁山毙敌亦多，全线虏获战利品无数^②。连日跟踪追击，势如破竹地占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綦江等县，又歼灭大量敌军，张敬尧逃回泸州。在湘西，黔军发动猛烈攻击，占领永顺。护国军取得重大胜利，陈宦、张敬尧等要求停战。同时，广西独立，影响深远，使袁世凯军事独裁统治转入大混乱和总崩溃的最后时期。

四、叙泸停战

冯玉祥倒戈

1910年冯玉祥在二十镇统治陈宦麾下当营长，并受到陈的特别赏识。冯玉祥在1911年滦州起义失败后，得到他的舅父陕西督

^① 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9页；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3页。

^② 祝鸿基：《护国战争》，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3页。

军陆建章^①的提拔和重用，1914年升任第七师第十六旅旅长，驻防西安。1915年5月，袁世凯任命陈宦为四川将军，冯玉祥受命带领第一混成团（第二团仍留陕西汉中）随陈入川，分驻罗江、德阳等县。不久，冯玉祥在阆中、仪陇一带清乡剿匪的途中，忽接陈宦和陆建章先后转来对袁称帝劝进的表文，要旅长以上将官签名，冯玉祥拒绝了。

当蔡锷率护国军向四川泸州、叙府一带进兵时，陈宦命冯玉祥率领所部混成营由顺庆至泸州，配合北洋军阻击护国军。当冯行至内江时，迟迟不肯南下，以避免和护国军直接冲突。但此时北洋军的主力已进逼泸州，冯玉祥若拒绝南下，可能被北洋军缴械，若继续南下反对护国军，又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中，冯玉祥左右为难，痛苦不堪，乃与左右人员蒋鸿遇^②（参谋长）、张之江（参谋）^③、李鸣钟^④等人商量，决定站在革命的立场为国奋斗，但又不可闹到被人缴械的地步。因此，他既要奉袁世凯、陈宦、曹锟之命与护国军作战，又要与护国军探讨合作反袁的道路。

1916年元月下旬，冯玉祥将驻绵阳、罗江的一营调至内江，他率领两个混成营的兵力，经隆昌、泸州、南溪向叙府逼近，与护国军第一梯团刘云峰部接仗。冯玉祥以蒋鸿遇与刘云峰有同乡同学关系，经泸州时即派蒋与刘云峰部用电报通话接洽，说明张敬尧、吴佩孚大军在后相逼的情况，希望首先彼此不打，然后待机表明态度。刘云峰不明冯之真实态度，不肯答应，并声称：不立即表明反

① 陆建章（？—1918），字朗斋，安徽蒙城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1895年随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历任督队稽查先锋官、左翼步一营帮带、山东曹州镇总兵、广东商州镇总兵。1912年，任总统府新卫军参谋、右路备补营统领，后改任警卫军统领。同时任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有“屠户”之称。1913年，任警卫师师长，1914年警卫师改为第七师，仍任师长，兼豫陕甘剿匪总办，后升任陕西都督，不久改任威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被袁世凯封为一等侯爵。

② 蒋鸿遇，河北固安人。保定军官学校骑兵科毕业。当蔡锷任云南军务处总办时，蒋为云南骑兵营营长，与蔡锷过从甚密，交谊较深。与护国军梯团长刘云峰为同乡，关系也较好。

③ 张之江，字子珉，河北盐山县人。行伍出身，曾充二十镇下级军官，跟随冯玉祥，历任团长、旅长、西北军总司令等职。

④ 李鸣钟，字晓东，河北人。曾在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当团长，历任旅长、绥远都统等职。

袁则完全缴械^①。而袁世凯方面命冯攻叙的命令接连不断，冯玉祥乃领兵进攻叙府东郊之白沙场。2月初，经过一场战斗以后，冯军退回自流井，不数日，冯部驻汉中的第二团一、二营开到，这时全旅官兵始得集中。

2月底，当泸纳血战之际，曹錕命令冯玉祥限期攻克叙府。3月2日，冯玉祥军占领叙府，刘云峰退守横江。次日，冯玉祥所派之蒋鸿遇抵达横江见刘云峰，蒋对刘说，冯玉祥不赞成袁世凯称帝，“前日之战，乃不得已耳，今闻你要攻叙府，彼此不要作无谓之牺牲，你要叙府，给你就是了”。刘则说：“彼既不赞成袁做皇帝，即是同志，我等出兵，为打袁皇帝，冯旅长既是同志，当然不能再打仗，叙府无论谁占，均无关系。”^②至此，冯玉祥与刘云峰秘密达成局部停战协议。冯玉祥倒戈反袁后，暂编所部为护国军四川讨逆挺进军，与蔡锷携手合作，共同积极促进四川陈宦独立。在护国军从泸纳前线纷纷背进的情况下，冯玉祥的倒戈，使护国战争

① 张之江、吴景南：《护国讨袁时期冯玉祥在四川》，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13页。

另据陈天贵《护国战役亲历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4页）中说，冯玉祥派人送信给刘云峰，信中说：“你（指刘）是北人，从北方去云南，勿忘根本，不要跟随蔡锷造反，这样干下去，决无好结果，应该弃暗投明，回到北军，与我们合作，极为欢迎。”刘回信说：“来信混淆是非，不值一笑，如愿战，我军奉陪，如不愿战，应即通电讨袁，或解除武装下野。”陈天贵当时系刘云峰之少校副官、参谋长，其回忆当不会大误。如果陈天贵的回忆不误，则冯玉祥从何时起决心反袁，尚是一个疑案。

② 刘云峰：《护国军纪要》，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4~95页。另据张之江、吴景南《护国讨袁时期冯玉祥在四川》文中说，此次谈判局部停战，系冯玉祥派张之江由叙府前往横江与刘云峰“详谈合作办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1页）。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说：“我们从自流井出发，刘一清先生曾派人持亲笔信偕同蒋鸿遇先到叙府，和刘云峰接洽。”谈判停战，“当即与之签订协定。秘密保存起来。蒋鸿遇回来，我即率队向叙府挺进，两方稍一接触，刘云峰即照约撤退，我这儿派张之江、蒋鸿遇兼程追上他，交他一封转致蔡松坡先生的信，详陈一切经过。蔡先生复信表示很好”。这里说明谈判的地点在叙府而不是在横江，由蒋鸿遇代表冯方谈判。张之江与蒋鸿遇去横江，但已不是谈判停战的问题。3月2日，蔡锷《致唐继尧刘显世等电》说：“冯玉祥两次派人来言，渠已决心效顺。”（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22页）可见冯曾多次派人与蔡锷联系，则是事实。

呈现出胜利的曙光。

冯玉祥占叙府的第二天，曹锟、张敬尧等打电报给冯，责问其为何不再前进追击滇军。冯回电则说，官兵病者太多，故暂作休息。同时陈宦也致电询问，冯则回电说，官兵不但身上有病，心里亦人人有病，务请速作主张。冯玉祥占领叙府的第五天，袁世凯还打电报给冯，以克叙州有功，特封冯玉祥三等男爵。可见，冯不继续南追，也骗过了袁世凯。恰在此时，冯玉祥接陆建章急电，说西安被围，令冯星夜率队往援。接电之后，冯即不顾一切，将队伍撤向自流井，把叙府交给刘云峰接防。

泸纳停战

叙府战场，自3月初冯玉祥与刘云峰达成秘密停战协议后，已实际停止战斗。在北洋军中，曹锟坐镇重庆，在泸叙前线打先锋的是李长泰与张敬尧。而张敬尧替袁世凯最为卖力，蹂躏人民最凶的也是他的第七师。蔡锷曾写信谴责张敬尧说：“帝制未成，先屠百姓，苟无百姓，何以为国？足下媚兹一人，已属罪不容死，况复虐我同胞，人将不食尔肉！”^①张敬尧出师无名，不得不考虑蔡锷的警告。更重要的是，泸纳血战，北洋军死伤近半数。广西独立及蔡锷发起全面反攻的胜利，使北洋军闻风丧胆，军心动摇，厌战情绪日益上升，许多官兵不愿再为袁世凯称帝而卖命。护国军在3月17日以后的反攻中，不仅杀伤大量敌人，夺获许多械弹，而且俘虏了北洋军的中级官长，特别是其中一位军法官，是张敬尧的舅子。因此，张敬尧不得不向护国军低头，于22日向护国军提出停战，并要求护国军释放俘虏^②。同时，北洋军第八师李长泰亦要求停战。在四川前线停战的既成事实前提下，袁世凯在宣布撤销帝制的同时亦命陈宦提出停战条件，与护国军谈判。陈宦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摇摆不定，他受到袁世凯的重用，不便贸然反对帝制；他与蔡锷系日本士官同学，关系较好，又不能不同情蔡锷。而在他的左右，既有总参议刘一清（号杏村）坚决反对帝制，又有参谋长张联棻顽固拥袁称帝，且两派势力不相上下。因此，陈宦通过刘、张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173页。

^②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3、245页。

的不同渠道，一面与蔡锷暗地联络，一面又向袁世凯表示忠诚。当曹锟、张敬尧各部相继入川时，他亦感到不小的威胁，力图摆脱困境，不愿再打。此时，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亦电蔡锷等请停战。而蔡锷方面，一则利用敌人先骄后怕、厌战求和的心理，同意张敬尧的要求；二则认为“我军各路所控之敌，均较我为优，势非得新援及将器械、人员、弹药补充完备，决难移转攻势。在此一二月内，停止战斗，实我所利，而敌所忌。而在袁政府方面，财政外交两端，时日拖延愈久，困难弥甚”；三则我军可以得到休整补充的时机，“从中腾出时日”，以赶办筹饷、购械、联络各省响应，“以图大举”。“故彼辈请求停战，不妨虚与委蛇”^①，“俟新援到，即行进取”^②，蔡锷也就乘胜停战。

因为第一梯团长刘云峰在叙府早已与冯玉祥军达成秘密停战协议，同时刘云峰不仅是北方人，而且是段祺瑞的学生，与北洋将领张敬尧等早有交往。李长泰师之参谋长、团长数人，系保定军校同学，均与刘云峰来信，“约双方暂不开火”。因此，蔡锷将刘云峰调至大洲驿，协助谈判停战事宜。双方谈判数日后，遂允自3月31日起在川南及湘西一带，两军停战一周。停战一周届满时，刘云峰又打电话问张敬尧：“刻距停战期满仅有数日，你还愿意打否？”张敬尧回答说：“哪个王八蛋愿意打。”电话商定，由刘云峰去张营谈判停战条件。次日，刘云峰与参谋长陈天贵至泸州，张营仪仗甚盛，热情欢迎。谈判时，张敬尧无限悲伤地说：“我自当排长起，现在已到师长兼总指挥，未离开二十五团，你们那一顿刺刀棚死我七八百人，全师共死二三千人，我的精锐消耗殆尽，你看伤心不伤心，我还打什么？且袁做皇帝，我也不赞成。”^③于是，再次达成停战一月的协议，自4月7日到5月6日。陈宦见第一次停战期满，仍不开战，知事有变，乃派其参谋长刘一清及旅长雷飙到大洲驿探听消息。此二人乃蔡锷之至交，得知停战详情后，尽告陈宦。

① 《致唐继尧刘显世等电》（1916年4月2日），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0页。

② 《复梁启超电》（1916年4月6日），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4页。

③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97页。

陈又将张敬尧等之事告袁，并请袁退位。袁接电后，始知其多年训练之北洋劲旅，今皆倒戈相向，痛心万分。四川前线第二次停战期满后，又延期一月，即由5月7日至6月6日。事实上，自袁取消帝制后，四川方面护国军与北洋军的战事就完全停止了。

泸纳前线，蔡锷军自2月5日发起攻势至3月22日张敬尧要求停战，血战四十余昼夜，袁世凯不仅没有平定云南，反而被护国军打得大败。护国军在泸纳前线所取得的辉煌胜利，为反对帝制复辟、保卫共和制度立下了丰功伟绩。作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蔡锷将军，在泸纳血战暂退大洲驿之际，驻节于江上一叶扁舟，坚信正义一定战胜邪恶，坚信护国战争必然胜利，三户亡秦，况我七千健儿，乃亲书“护国岩”三字，以激励广大官兵坚定如磐石般不可动摇之信心，以打倒袁世凯。护国战争胜利后，蔡锷又书《护国岩铭》，由总参谋殷承瓚以笔力雄浑挺拔的仿颜字体书写，刻于大洲驿附近的永宁江岸石壁上。铭曰：

护国之要，惟铁与血。
精诚所至，金石为裂。
嗟彼袁逆，炎隆耀赫。
曾几何时，光沉响绝。
天厌凶残，人诛秽德。
叙泸之役，鬼泣神号。
出奇制胜，士勇兵骁。
鏖战匝月，逆锋大挠。
河山永定，凯歌声高。
勒铭危石，以励同胞。

第六章 从军广西

一、偷渡入桂

策动陆荣廷

梁启超到上海后，即按照天津秘密策划的起义方略，积极联络陆荣廷，谋广西之响应。

陆荣廷，字干卿，广西武鸣人，出身于赤贫农民家庭。青年时代，与地方游勇会党结伙，中法战后，拉起了一个数百人的绿林武装。1893年，被广西提督苏元春招抚，当了营管带。1903年后，受两广总督岑春煊提拔，历任巡防营统领、总兵，镇压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力量。1911年6月，升任广西提督，驻南宁。辛亥革命后，他“附和共和”，夺取了广西都督兼广西民政长职。他打着“桂人治桂”的旗号，网罗旧军队中的陈炳焜^①、沈鸿英、莫荣新等人，形成桂系军阀集团。1913年跟随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但是，袁世凯并不信任陆荣廷，推行帝制时，任命广东都督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封一等公爵郡王，却只命广西都督陆荣廷为宁武将军，封侯爵。陆荣廷与龙济光同为都督，陆对袁之厚此薄彼，甚为不满。1915年9月，袁世凯又派高等特务王祖同任广西巡按使，用以监督陆荣廷，更引起陆之不快。当王到广西时，陆既

① 陈炳焜，号舜卿，广西柳江人。家贫，粗通文字，行伍出身。与陆荣廷、林绍斐等结为把兄弟，历任陆荣廷部下统领。蔡锷任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时，陈炳焜进讲武堂学习，兼学兵营督队官。讲武堂毕业后，回广西任第二标新军标统。陆荣廷任都督后，陈任军政司司长。

不敢拒绝，又不愿接待。后来，他与王祖同联名“劝进”，又对王十分谦虚要好，使王不生疑心。但他并不真心拥袁，自袁世凯改元令下，便称病回武鸣原籍休养，调第一师师长陈炳焜来督军府暂行代理。当陆托病请假的时候，就以侍疾为由打电报召回在北京被袁世凯拘为人质的儿子陆裕勋。陆裕勋到了汉口，袁就派人把他毒死了。这样，就使陆对袁的仇恨更大。但是，陆荣廷并不形诸辞色，而袁也竭力装出十分悼惜的样子，派员照顾丧事，双方都是假戏真做。袁世凯企图通过监视陆荣廷，或将其引出广西，调虎离山，而陆荣廷则为归山卧虎，静观时变，待机而动。

过去，梁启超与陆荣廷并无直接关系，不甚相识。因陆荣廷的把兄弟广西第一师师长陈炳焜，在广西讲武堂时为蔡锷的学生，且“与松坡通兰谱”，结为兄弟，蔡锷即通过“此人牵线”与陆荣廷联系。同时，陆荣廷对梁启超久慕盛名，极为“推重”^①。因此，梁、陆之间在反对袁世凯称帝问题上相互接近起来。

1916年元月中旬，蔡锷在向毕节进军途中曾对其随身副官邹若衡说：“广西将军陆荣廷已由我先派学生去联络过，陆会响应。”^②但是，云南宣布独立后将近一月，叙泸之役已经进入紧张阶段，袁世凯早命滇各省严筹防剿。龙济光“荐保黄成伯（恩锡）随同龙觀光率师征滇”^③。袁、龙又对陆荣廷施加压力，促其出兵攻云南。如果袁、龙之阴谋得逞，不仅云南南线遭到威胁，而且广西亦可能落入袁世凯之手，将对护国军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在上海焦灼万分，遂于1月25日急书陆荣廷，促其迅速响应。

梁启超在《致陆干卿书》中，首先对陆荣廷在“国体议兴，各省风从”的情况下，“毅然示不苟同”的精神，作了极高的评价，这表明中国“正气之未尽绝而国事之尚可有为矣”。自云南起义后，“志士仁人”把希望寄托于广西，这不仅是由于“地势形便使然，

① 《民国十八年黄溯初与在君先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74页。

② 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3页。

③ 《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一期，《时事日记》，第4页。

实将军之志节器识为天下所共钦信也”。但是，一月以来，将军却仍无发动，人们不免“窃窃私议”，或疑将军有所顾惧，“见义不为”，或疑将军贪恋“好爵”，“遂捐初志”。梁启超指出，当前的反袁形势是“冤愤积于四海，怨毒积于毒夫，中智寒心，所亲解体，新华炸弹，祸起于萧墙，卖国使节，技穷于尊俎，鞑鞞之下，人心皇皇，老贼忧恚，杠成痼病”。袁世凯之称帝，只是丧心病狂的表现，绝不会长久，“似此冰山，虽至愚者不以为可倚，况将军之洞烛机先而扶义之心早决于数月以前者哉”。希望陆荣廷认清形势，若再犹豫观望，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袁之猜黠，天下共闻，与斗阴谋，实非易敌。彼之受饵，岂能再三。而义旗一日未树，则彼之奸细一日不能明拒，使彼得肆为运动，簧鼓人心，窥我秘扇，预谋抵抗，充其弊之所及，或将钳制我至不能复动”，到那时则悔之晚矣。“古来以过于持重而失机败事者不知凡几，此不可不深留意也。”那种“保境中立”的想法是不实际的，那种与龙济光“同舟共济”的想法，必将随其“陷于泥濘”。总之，“权谋不可不用，然亦不能久用；利害不能不审，然正不可太审”。希望陆荣廷认清形势、有利条件及利害关系，明确责任，“滇首动而桂继起，实天然安排之程序，桂犹观望，更何以风示天下，此又将军特别之责任，义无旁贷者也”。“将军若诚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则启超所能助者惟将军所命，不敢有辞。”

梁启超促陆荣廷迅速起兵书，与其说是请将，不如说是激将，使陆荣廷埋藏于心底的反袁之志顿时跃然而起。陆荣廷的老上司岑春煊^①也极力劝陆参加讨袁事业。革命党人钮永建、林虎两入南宁劝说陆荣廷反袁。同时，陈祖虞（协五）经吴贯因^②同意，专程从

① 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人。举人，清末曾任广东及甘肃布政使、陕西巡抚、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1907年受清政府排斥。辛亥革命后，被袁世凯任为福建宣慰使，1913年又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二次革命”时，因和黄兴有联系，被袁免职，愤而参加反袁活动。事败后，遭袁通缉，逃亡国外。护国军起，回国参加讨袁。

② 吴贯因（1880—1935），字柳隅，广东澄海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在政界曾任内务部参事、司长、编译处长；在报界曾主持《国风报》、《庸言》、《大中华》、《上海新闻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笔政；在学界曾任北平华北大学副校长，交通大学、北平国立师范大学、私立燕京大学等校教授。

上海回广西，“谒陆干卿。陆公披襟以谈天下事，言将起义，极愿得梁任公相助”^①。2月8日，袁世凯任命龙觐光^②为云南查办使，随即领兵假道广西入南宁，使陆荣廷感到形势紧迫，于是急派陈祖虞及唐伯珊，于2月19日和22日相继抵达上海迎接梁启超，并详尽地说明了陆荣廷响应之“经划”，“自谓不堪建设之任，非得贤而共之不轻发也”，只要梁启超“朝至”则桂“夕发矣”。梁深感陆荣廷之“器识”过人，于是“不谋于众，许以立行”。梁启超想到叙沪前线“状至艰险，待桂之兴，如旱望云”^③，更加速了他急于赴桂的步伐，以便扭转整个战局。但是，唐伯珊还要去南京谒见冯国璋，并要求梁启超待唐伯珊离开上海十日后再出发，以便唐先行赴桂联络，并相会于海防。因此，梁不得不推迟十日起程。

离沪赴港

梁启超从上海经香港、海防进入镇南关，是在日本人的秘密协助下完成的。

当袁世凯筹办帝制之时，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支持袁世凯，以“二十一条”实现独占中国的野心。当袁世凯称帝及出卖主权的“二十一条”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后，日本人眼见四面楚歌的袁世凯行将垮台，于是掉过头来，以严厉的态度“警告”帝制，并拒绝袁世凯之专使入日；另一方面，则支持反袁势力，企图利用中国人的反袁活动，推进中国的分裂，以达到其出兵山东，独占中国的目的。当时，日本大隈内阁认为：“袁世凯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为日本达到上述目的的障碍，为执行帝国的方针，最好使袁退位，其继承人应远比袁世凯更有利于日本帝国。”^④日本北京有志团之宣言中说，看来已不能依靠现元首袁世凯实现“日支亲善”，“必须另物色一真实确定日支携手之人与之携手，是为切要”^⑤。因此，

① 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74页。

② 龙觐光，字谓卿，云南蒙自人。为龙济光异母兄弟。曾任南宁步兵第一联队长、广西梧州民军第三军统领、广西第一师师长等职。

③ 梁启超：《从军日记》，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21页。

④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第418页。

⑤ 由云龙：《护国史稿》，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第28页。

日本人不嫌梁启超坚决反对“二十一条”的激烈言辞，努力接近并帮助梁启超。为此，日本政府专门派青木^①中将驻沪，青木到沪的次日，即3月1日，就与梁启超会晤。梁启超在《致蔡锷书》中说：“彼确已认识我辈实力，肃然加敬。彼言前此彼之国是未能一致，其中大部分人谋向我攫取权利，以致伤我感情。今识者皆知其非计，以后当然舍此方针，专务与我多数国民联络云云。”^②梁启超为了完成反帝护国的事业，正在拼力寻找外交上的支持，日本态度的转变，当然是他所欢迎的。

护国战争爆发后，党人邀请岑春煊从南洋回国，密谋反袁。1916年1月底，岑由南洋抵沪，与梁启超等密商后，偕章士钊^③、张耀曾^④赴日本活动。事前，梁、岑曾派周善培潜往日本，找犬养毅协助，拟借款日金百万，接济步枪万支。犬养毅慨然承诺，并愿派一高级官员来华联系。日本政府为了贯彻上述方针，在日本参谋本部和外务省的直接策划下，除派青木中将驻上海外，又用所谓“民间有志之士”的名义，由日本资本家出面，给中国国内反袁势力以援助。在上述背景之下，岑春煊赴日与日商竹内维彦于3月20日签订借款日金一百万元合同，作为护国军行政经费^⑤。其步枪万支，在广西梧州交付陆荣廷。

日本青木中将于元月中旬由日本来沪，宣称来华之目的，“一

① 青木宣纯（1859—1924），日本陆军中将。曾任旅顺炮台司令，时任驻沪武官，为日本军界有数之“中国通”，长期在中国活动。退役后，曾受聘为北洋军政府顾问。

② 《致蔡松坡第五书》，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25～26页。

③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早年以黄中黄等笔名，积极鼓吹反清革命，任《民主报》、《苏报》主笔。华兴会骨干。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④ 张耀曾（1884—1938），字镕西，云南大理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学士，历任众议院议员、云南都督府参议、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司法总长、法权讨论会会长、上海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法律系主任兼教授、律师。

⑤ 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S232，广东借款之部，转引自《民国人物传》第二卷，第190～191页。

为调查中国乱事情形，二为考察德国侦察之活动”^①。同时，日本政府又派外交界出色人物堀义贵为首任驻滇领事^②，以加强对中国护国战争动态的掌握。实际上，青木之驻沪，对梁启超秘密离开上海，偷渡成功，起了决定性作用。

当时梁启超寓于上海静安寺路，袁世凯之“侦探暗杀密布寓侧”，企图捕杀梁启超。因此，梁启超雇用了四个印度人守门自卫，室中不用仆役，“惟小妾执炊”，他本人“终日不下楼一步”，以防“危害”^③。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要想离开上海赴桂，不是轻而易举的。关于他决心去桂之计划，初则“秘之甚坚”，但“协五、伯珊之来，借展转介绍，其踪迹渐露于外，沪上一派之政客或喜刺消息而腾播之，以夸炫其声气”，梁启超之行止逐渐被人们所谈论，“日益烂漫”，乃至《时事新报》以北京访员之专电报道梁启超行将赴桂。这样，消息传开，更增加了梁启超出走之困难。当青木访问梁启超时，梁即将出走之困难告之，“托以代筹途旅”。而青木“慨然自任”，并嘱松井负责与东京、香港、海防联系，进行具体安排。

梁启超此次从军入桂，“最费踌躇者，则告南海与否也”。自反对袁世凯称帝以来，康主复辟宣统，梁主维护共和，两人已开始舌战，康对梁之行动，已“蓄怒既久”，如不将此次实情相告，“他日责备”，不堪设想。若告诉他吧，又因南海“以不能守秘密著闻”，梁此次行程二十余日，“生命常在掌握中”，恐泄漏机密，危及安全。梁启超认为，在此关键时刻，不能“事事禀承南海”，否则，不仅“精神上常感不断之苦痛”，而且反袁护国之共事诸君，“该将舍我去矣”。为了不开罪康有为，梁仍派汤觉顿往见，果遭康之斥责，并“正色大声疾呼以主张平昔之复辟论也。且谓君辈若不相从，此后恐成敌国”。其言“甚长而厉”，汤觉顿闻之“咋舌”，而梁启超认为，“此等不祥之言，本无价值”^④，不值一顾，仍然决定赴桂。

① 《时报》，1916年1月19日，1月28日。

② 由云龙：《护国史稿》，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

③ 《与蔡锷第二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43页。

④ 《从军日记》，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22页。

3月4日午前10时，梁启超与汤觉顿、黄溯初、黄孟曦、蓝志先、吴贯因、唐伯珊等七人，乘日本邮船横滨丸离开上海。从此，梁启超“蜚伏舱之最下层，在锅炉旁拓一室，饮食寝处其间，溷闷至不可耐，每深夜群动尽息，窃蹑舷栏，一响凭眺”，处境极为艰苦。但是，梁启超认为“因悟天下之至乐，但当于至苦中求之耳”，其精神境界正如大海一般，甚是开阔。当他们离开上海时，接到唐继尧之来信，“极言选举元首设立临时政府之急务”。于是，梁启超在舟中就“袁氏劝退”、“黄陂继任”、军务院之设置诸问题，起草有关“通牒”、“宣言”、“公电”等十余件，并经过“同行随员，往复讨论，金所赞许”。此外，梁启超在舟中读《现代与道德》终卷，《通俗世界全史》第六编半部。“此横滨丸中海行数日之功课也。”

蜚伏横滨丸

当梁离沪之次日，袁世凯即通电两广各要隘，谓梁任公等数人将潜行内地，谋为不轨，如查出即扣留请示办法，同时并电越南、香港政府。3月7日，横滨丸抵香港，“香港适在戒严中，不准党人托足”。香港巡捕立刻登舟搜查，对汤觉顿之行李更“严加搜查”，“行李中包物之字纸，警吏亦读之数遍”，结果搜出陆荣廷所给护照一张，“疑为广西官吏，始舍之而去”。最为可幸者，汤觉顿有一小皮包，“中藏梁任公所草起义后讨袁之檄文二，康南海寄陆干卿之书一”，皆未被发现^①。

护国战争开始以后，唐继尧选派亲信至京沪侦察外情，又促李根源等赴滇筹划，决定在上海、香港设立联络机关。上海由谷钟秀、钮永建、欧阳振声负责，香港由李根源、林虎、程子楷、曾彦等负责^②。当梁启超一行抵达香港后，李根源即积极筹划迎接。

3月8日，黄溯初伴梁启超留舟中，汤觉顿、唐伯珊携带梁启超所起草之广西独立等文件，乘小轮直奔梧州。吴贯因、蓝志先、黄孟曦三人投宿松源旅馆。此时，香港警吏得各方面报告，四处搜查。9日清晨，李根源来见吴贯因等，告以“香港各旅馆住袁、龙之侦探

^①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75页。

^② 《上海党人之行动》，见《护国军纪事》后编，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93~194页。

多，断不能住”，于是吴贯因等三人立即移跑马地李根源寓所。午后，警吏果然至松源旅馆搜索，如不及早转移，其危险不堪设想。

船抵香港后，出现两个不利的形势。一是经越南入桂的道路被封锁，原来外国人入海防不需护照，3月3日驻港法领事突然宣布新章，无论何国人欲入海防，皆须领护照，每一护照必有两殷实商家担保，并缴照片两张，且须亲盖手模。吴贯因说：“试思余等将谋揭竿事，安所得如许殷实之商家，以作余等领护照之担保人，且在梁任公又安能上岸拍小照。于是余等绕道海防，以入广西之计划，将成泡影。”欲经广东西江入桂，“袁、龙防范甚严”，也凶多吉少。二是“由广州日本领事传出消息，袁军已攻克叙州，未几又传袁军克纳溪，未几又传龙觐光攻下剥隘，噩耗频来，无在非恼人意事”。当时，梁启超等清楚地看到，如不及早谋他省之响应，云、贵义师将归于失败。因此，“进退维谷，中心皇皇，而以梁任公之焦逼为尤甚”。不数日，蓝志先、吴贯因、黄孟曦先后直入梧州。

横滨丸初泊九龙，警方搜查极严，乃驶至大海中停泊。因所转乘之妙义山丸尚未至，不得不稍等数日。在此期间，梁启超作鼠状蛰伏舟中，不见天日。他的父亲梁莲涧在港病危，他亦不敢登岸探视。“谭典虞^①自省来谒”，“港中党人领袖李根源（印泉）、杨永泰（畅卿）等四人来访”，除了畅谈合作反袁成立军务院外，梁启超还力谋由港直入梧州之策，谭典虞“奔走一日，布置就绪”，由于同行者之坚决反对，遂放弃陆路，易中装为西服，化装成日本人，仍经海防入桂。

在军中敬告国人

3月12日12时，在十数日本人通力合作下，梁启超、黄溯初乘小轮由横滨丸伴渡妙义山丸，登舟即展轮，一刻不淹，迅速离开香港，直驶越南洪崎（鸿基）。妙义山丸为日本三井洋行之运煤船，设备极为简陋，但船长为梁启超“别治一室，一切器用悉新置，饮食亦腆，舱面特加除粪洗涤，黝光可鉴。三日夜恣我徜徉，呼吸海气。横滨丸为缚丽之地狱，此其朴僊之天堂矣”。在舟中，梁与黄溯初独对，“谭谦至乐”，并起草了《护国军政府宣言》、《上黎大总

^① 谭学夔，字典虞，广东新会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入禁卫军任职。民国元、二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教务长。帝制议兴，返回广东秘密联络本籍军官反袁，时任龙济光顾问，海珠会议时被杀害。其兄谭学衡任广东海军司令。

统电》、《致电使团领事团电》及《军务院布告》等文，黄溯初则起草了军务院组织条例。当船至离海防仅半日航程之洪崎时，船长将二人关于舱底之一室，“煤为四壁，以烟养肺”，蜇此达十四小时之久。由洪崎至海防路程较远，白天不易成功，日本政府乃命驻海防之名誉理事横山以往游白大龙为名，于15日夜3时驾游船并携带女眷数人来洪崎相迎。此后，他们即登游艇，穿过“水碧沙白，小岛星罗，朝晖夕阴，美观无匹”的白大龙群岛，沿途观景赏鱼，赋诗咏歌，一扫数日来蜇伏舱底之沉闷。16日，在横山的导游下，“力避官吏讯察”，迂回往返，拖延时刻，入夜8时，在大雨滂沱之中，悄然抵达海防，宿于横山之卧室^①。

在从香港至海防的妙义山丸上，梁启超写了《在军中敬告国人》，再次检讨了他在辛亥革命后拥袁的原因及过错，说明了他“从军”并与袁“相见于疆场”的目的及决心。

梁启超素主和平而害怕破坏，现在却要亲赴前线，与袁世凯相见于疆场，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当元二年之交，国论纷拏，启超惧邦本之屡摇，忧民力之徒耗，颇思竭其驽骀，翼赞前大总统袁公，亟图建设，以为以袁公之才而居其位，风行草偃，势最顺而效最捷。”因此，积极拥袁，“勉列阁员，力图共济。乃与袁公共事数月，渐觉其别有肺腑，非能先公而后私。及辞职后静观两年”，而袁世凯倒行逆施，“处今日文明之世，而行中古权譎残刻之政”，对外出卖主权，对内实行专制，“黜全国之智，箝全国之力，涸全国之资财，摧全国之廉耻，而以资一时便安之计，成一姓篡窃之谋。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取子毁室，率兽食人。循此迁流，更阅年载，则人道且将灭绝于中国，而中国更何自由存于世界者”。虽屡经告诫，而袁仍“昏迷”“不寤”。又因袁世凯“在国中播种恶因，既深且广，我国民终当刈此恶果，穰穰浩劫，无可逃遁，所争者早暮耳。而袁公多擅政一日，即恶因之广深多增一度，以凋残垂尽之元气，更日日加以削伐，不一二年行将渐灭而无复余。其时欲更求负荷世难之人，恐不可复得”。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从西南诸君子之后，“杖策”于军中，与袁世凯“相见于疆场”。

梁启超说，此次毅然从军的目的，“欲以死中求生，亡中求存，

① 《从军日记》，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24～126页。

而绝非有所争于意气，有所贪于权位”。“今杀机既动，其血玄黄，净洗甲兵，未卜何日”，要完成推翻袁世凯和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千难万险，意中之事。然国人则安能有所惮而委置不顾者。须知不能不解决问题，既已临头，无论若何困窘，终须以自力解决之”，是责无旁贷的，而且是有条件来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因为“我国固有天赋之特长，我国家亦不乏雄飞之缘会，徒以生息于恶政治之下，窒其本能，桔其发展，以有今日。及今努力拔此病根，安见种种忧虑，不遂迎刃而解。此真国人所宜审择而奋兴者也”。

最后，他再次沉痛地检讨，“频年以来，颇不免缘党派偏见，误断事理，间接以酿国家隐患。中间又尝以悲观弛情自荒匹夫之责，致国民活力，生一部分之损耗。今以国脉安危，迫于眉睫，不敢不沉痛忏悔，请献此身，以图自赎。微诚所贯，舍命不渝，功不敢承，罪不敢避。国之君子，其有同兹感痛者乎”。梁启超一面作沉痛之自我批评及自我忏悔，决心奔赴前线杀贼，“以图自赎”；同时亦望志士仁人相互“提携”、“督责”^①，共同完成反袁护国的大业。

偷渡入桂

3月10日，陆荣廷即派驻镇南关交涉员某君准备前往越南迎接梁启超。梁在入海防之当夜，云南驻海防秘密代表张南生（华侨）即会晤梁启超，“商今后进取之路”，告以法人受袁世凯之托，严密捉拿梁启超，劝其迅速离开此地。17日清晨，横山以汽车亲送梁启超、黄溯初赴其所办之帽溪牧场，以待桂使之来。而黄溯初受梁启超之托先赴云南，与唐继尧商讨护国军政府宣言及其他要事，并有《致滇军将士书》托唐继尧转致松坡^②。18日，黄溯初冒充日本记者，在横山等人帮助下，奔赴云南。

由于北京遍电各地，指明梁启超之行期行踪及随行人员，意欲截留或暗杀，敌谍四处奔忙，搜旅馆，截车站，越南政府亦不得不与之周旋。故梁启超藏匿帽溪万山丛中，寸步不能移。在此，梁启超度过了他一生中生活上最为艰苦的十日。睡在“此间傭保”床上，被褥秽不敢近，“地卑湿，蚤缘延榻间以百计，嘬吾至无完肤”，“浑

^① 《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15～117页。

^② 《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五期，要牍。

身发痒，搔之则起鳞粟”。“最苦者烟亦吸尽，书亦读尽，一灯如豆，虽有书亦不能读也。”“饭亦不能入口，饥极。”梁初到帽溪时，当地人告以黑布裹头，以免烈日炙脑。但他不以为然，竟因此犯了极危险之热病，“孑身在荒山中，不特无一家人，且无一国人，灯火尽熄，茶水俱绝”，十分危急凄苦，幸土人急以草药治之，高烧两日即退。但是，梁启超认为：“效命于疆场者，其苦不知加我几十倍，我在此已太安适耳。”“离沪迄今虽仅半月，而所历乃至诡异，亦不能名其苦乐，但吾抱责任心以赴之，究竟乐胜于苦也。”他在山中“一人枯坐，穷山所接”，除病倒卧床外，每日仍写作数千言。病起后即捉笔著成《国民浅训》一书，约二万言。“三日夜成之，亦大快也。”又写《从军日记》一篇，作为此次从军入桂的特别纪念。

以上写的是梁启超的生活，更是他的战斗，说他投笔从戎，倒不如说他是捉笔从戎。他从上海至越南的航程中，夜以继日，无时无刻不在战斗，一篇又一篇反对袁世凯的战斗“宣言”、“通电”，像利箭般射向袁世凯的心脏，使袁世凯坐卧不安，节节败退。

梁启超抵达海防的前一日，广西早已宣布独立，随即肃清了桂、越边境的袁氏党徒。3月26日，梁离开帽溪，躲过“谍骑四布”的越境，在经过二日一宵的风餐露宿后，于次日午后三时，在曾其衡的陪同下踏上国土。“镇南关大悬国旗，列队肃肃”^①，梁启超在军乐声中，被欢乐的人群簇拥入关。傍晚，犹登关一览形胜，不仅看到了冯子材镇南关大捷的遗址，亦看到护国战争的胜利在望，一舒偷渡中的紧张困苦，不禁怡然。28日破晓即首途奔赴龙州，准备到南宁与陆荣廷胜利会师。

二、歼灭龙觐光犯滇军

龙觐光犯滇

云南宣布独立后，袁世凯惊恐万状，手忙脚乱，调兵遣将，分向川南、湘西、滇南三路围剿护国军。其攻滇南之粤桂军一路，以龙觐光为总司令。

袁世凯原计划北洋军假道滇越路进攻云南，由于遭到法国公使的

^① 民国三年五月二十日、二十五、二十六日梁启超《与嫔儿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79~482页。

拒绝，他即改变计划，决定派遣北洋军假道广西进攻滇东。陆荣廷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利用广西人民团体拒绝北洋军假道的呼吁，电阻袁世凯派兵到广西境内。袁既不愿放弃这个军事计划，又怕把陆逼上梁山，就反过来劝陆自己派兵打云南，陆又以广西军饷械两绌为由加以谢绝。后来，袁世凯又想出一个主意，就命广东将军龙济光的哥哥龙觐光率领军队假道广西进攻云南。这不仅由于龙氏兄弟是云南人，在云南南部有一定的潜在力量，更由于龙觐光与陆荣廷为儿女亲家，他的儿子龙运乾就是陆的女婿，由至亲来假道，不会引起陆的猜疑。果然，陆拿不出理由来拒绝，他就电请龙觐光多带军械，少带士兵，士兵可在沿途招募。刚好龙济光正忙于对付广东的反袁势力，不能抽出更多的兵力交给他的哥哥，仅仅抽调了四千人组织征滇军。龙觐光完全同意陆所提出的沿途招募新兵组织成军的意见。

1月30日，龙觐光率领广东军四千人到了南宁。不久，龙建章由贵阳逃至南宁，“与陆荣廷会商要政”后，电告袁世凯，“主张用两广兵平乱，谓滇黔山险，北军人地不宜”。袁接电后，“立飭陆将军速募二十营，预备征用，飭龙觐光亦在南宁招兵十营，款械均由中央接济”^①。于是，龙觐光在南宁招募四千人，合共八千人准备攻滇。30日，龙觐光亲赴武鸣，访问陆荣廷，力请相助，陆以在家休息无心时事为由，请其与王祖同巡按使接洽，龙扫兴返南宁，与王筹商一切，不日西行。

2月8日，袁世凯任命龙觐光为临武将军兼任云南查办使，率军分三路进犯云南。先遣部队第一路司令李文富率步炮五千余人，于2月19日由百色进犯云南，3月9日占剥隘；第二路司令黄成伯率步炮三千余人，由西林进犯云南广南、丘北、竹园、临安等地；第三路由龙觐光的儿子龙运乾假滇越路回其故乡蒙自，勾结乡团谋为内应。与此同时，袁世凯电请陆荣廷派兵协助龙军进攻云南。不料这次陆毫不推辞地派他的儿子陆裕光随旅长马济带领军队前往协助龙军。不久，袁世凯又命陆为贵州宣抚使，请陆进兵贵州。陆对此亦不推辞，并向袁要求拨发步枪五千支和军饷一百万元，以便动员出发。陆对袁表示了忠诚的态度，袁对陆亦不能不予信任，按数拨发了军火及经费。

① 《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二期，《时事日记》，2月5日。

在云南护国军方面，由于主力军已经北上，南线较为空虚，龙觐光大兵压境，陆荣廷亦准备进兵，出现南线危急的形势。

剥隘、百色之捷

3月20日，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发表《致袁世凯电》及《告滇父老书》，痛斥袁世凯“内为奸谋，外媚强敌，丧权辱国，懦弱无耻”，“才略不如操莽，而奸猾却更过之”。今四方贤彦讨贼之声高涨，将随诸父老之后，“摄领师旅，飞旂前行”，“相见疆场”，“诛彼昏逆”，平乱兴邦。决心“横刀跃马，竭股肱之力，无负我父老之厚望”^①。李烈钧当即率两个梯团经滇越路至蒙自进军广南，总司令部驻广南城。

李烈钧派方声涛梯团由广南出龙潭，入桂向西林迎敌；派张开儒梯团由广南出富州至剥隘，与李文富旅激战于剥隘。李烈钧即由广南赶往富州、剥隘前线指挥战斗。当时，李烈钧部多为“新募、器械窳败”^②，困难亦属不少。

当时，粤军李文富分龙潭、皈朝两路进攻广南县城。李派团长莫礼华率五百人号称四个营为右翼，偷袭龙潭乡向广南前进。龙潭乡是滇、桂分界的地方，以乡街道为线，街道之两边分属广西西林及云南广南县。李文富是广南县的大地主，龙潭乡的农民群众百分之八九十是李文富的佃户，因此，李文富所部很容易地偷袭、占领了龙潭乡。李文富本人率领所部大队人马为左翼，从剥隘、皈朝进攻广南。从军力人数及配备上看，粤军均优于护国军，曾于3月12日占领广南。当敌团长莫礼华率部由龙潭乡进占广南县城时，遭到方声涛梯团长率领朱培德、毛光栩两个营及警卫大队一个中队的阻击，相持两昼夜，粤军伤亡较重，向皈朝方向退却。方声涛军收复龙潭，巩固了广南县城，乘胜追击。

皈朝方面，由张开儒梯团迎击李文富。由于粤军众多，李文富倾其步、炮、机枪全力进攻，其战况比龙潭战斗更为激烈。方声涛、

① 《护国军第二军李总司令致袁世凯电》、《护国军第二军出发时告滇父老书》，见《护国军纪事》第二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51~52页、第68~70页。

② 邓之诚：《护国军纪实》，载《史学年报》，民国二十四年九月，第二卷第二期。

张开儒两个梯团共约五六个步兵营，在皈朝激战李文富旅。历时八九昼夜，战斗极为艰苦。敌可轮换战斗，而护国军战士持续对敌，疲乏已极，加上蛮烟瘴气，蛇、虫、蚊蚋极多，染瘴疠者甚多，且无援兵，疲困危急，有不可支持之势。正在此时，张开儒梯团长在炮兵阵地指挥连长鲁梓材发炮，准确地击毁了敌人的炮兵阵地，致使敌军动摇。同时，李文富军多为广南子弟，原多不愿攻打家乡，不想再战，当炮兵阵地被毁后，慌乱一团，护国军士气大振，奋勇冲杀，乘胜占领皈朝，并收复了剥隘，张开儒军乘胜向百色进军。

与此同时，护国军挺进军黄毓成、第三军第一梯团长赵钟奇^①率部数千人，由贵州他郎、黄草坝（今兴义）、坡脚向广西旧州南下，会攻百色。桂军马济^②、陆裕光率部原以与龙军会攻云南为名，紧随龙军之后，今突然向龙军开火，阻截了龙觀光的退路。由于马济在南宁替龙觀光所招之新兵多为马济之亲信，皆反戈袭击。同时，龙军驻百色后，“极无纪律，骚扰闾阎，民皆苦之，而龙觀光且征色选声，以求行乐，于‘美人帐下犹歌舞’之余”，突然成为瓮中之鳖，势将就擒。龙觀光见势不妙，“乃连发数电与陈炳焜、谭浩明，请令马济停战，陈、谭不答”，龙觀光无计可施，乃令其子龙运乾连发两电给他的岳母谭夫人，乞求“救命”。陆荣廷之妻谭夫人“乃令陈炳焜电马济勒令龙军缴械，而贷觀光父子一死。觀光哀求，许其卫队五百仍带驳壳枪，桂军不准”。于是龙军缴械投降，“其所带过山炮十余尊，机关枪三十余架，步枪七千余支，由桂军滇军分而有之”。3月12日，龙觀光在被袁世凯任命为督理云南军务兼巡按使的同时在百色当了俘虏。护国军取得剥隘大捷^③。

粤军黄成伯部三千人从西林分两股窜入云南，一股在邱北境内被护国军击溃，散匿在该地。黄率一股到其家乡竹园后，招纳亡命游民，破坏了巡检司至小龙潭铁路，进犯临安（今建水），遭滇军

① 赵钟奇，字毓衡，云南凤仪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第七师团长、第四旅旅长，后任滇军第三师师长。

② 马济，字慎堂。陆荣廷之亲信，时任旅长，广西独立后任武卫军总司令。

③ 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81页。

旅长李修家率队迎头痛击。3月初，龙运乾窜回蒙自后，与堂兄龙毓乾^①一道，勾结蒙自、个旧、建水一带之土司及无赖，凑成数千乌合之众，攻入个旧城，破坏电线交通，危害城乡人民，企图控制云南进出口的咽喉。3月11日，龙运乾亲率三千余人（持枪者仅二百余人）攻蒙自，被滇军师长刘祖武率军打得惨败。3月20日，唐继尧所派之援军赶到，黄成伯及龙运乾兄弟闻讯震骇，纷纷挟卷金银财宝及军用物资，逃向深山老林。至此，滇南龙军被全部歼灭，滇境遂告安静，解除了云南南线的威胁，对促进护国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正如李烈钧在广南举行追悼阵亡烈士大会上之挽联中所说：“马革裹尸无遗恨，龙潭埋骨有余香。”^②

三、广西独立

陆荣廷隐居武鸣，称病不起，对时局似乎漠不关心。特别是元月底龙觀光抵南宁后，陆更表示不关心时事。但是，他一面秘密派专使去沪迎接梁启超，约其来西南共商大计；一面派马济在南宁筹划对付龙觀光。3月7日，袁世凯特派陆荣廷为贵州宣抚使的命令到来，陆即一变称病的沉默态度，兴奋地立即拜命；同时请拨之步枪五千支、饷银一百万元业已到手，于是调兵遣将，向柳州进发。那种剑及履及的状况，使得王祖同都为之暗暗喝彩。陆荣廷就职贵州宣抚使于11日抵柳州后，并不即作向贵州进兵的准备，部队在此集结待命。14日，唐伯珊、汤觉顿亦抵达梧州。广西原计划22日宣布独立，但陆荣廷忽接到陈炳焜自南宁来电，报告龙觀光部已于12日被马济、黄毓成等全部解决，事不宜迟。13日，陆即与梁启超及广西第一、二师长陈炳焜和谭浩明等联名通电劝袁“即日辞职”，“以谢天下”^③，限于二十四小时内答复。15日，在柳州、南宁同时宣布独立，陆在柳州的行营改称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部，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正式通电宣布独立。梁启超在起草之

① 龙毓乾，字元贞，龙裕光之子。龙裕光赴粤后，土司职位由其承袭。

② 陈亚波：《护国之役李烈钧等入滇及皈朝龙潭战役见闻》，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3页。

③ 《广西致北京最后通牒电》，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6页。

《广西致各省通电》中，指出袁贼在位四年“秕政百出，神人冤愤”的罪大恶极之后说，“自云南申讨，贵州景从，东出湖湘，西奠巴蜀。义师所指，前徒倒戈；父老壶浆，相属于路，民情可见，天监斯昭。袁氏曾不悔祸，益煽凶锋，驱亿万之生灵，殉一姓之基业。荣廷忝守岩疆，捍圉有责；启超历游各地，蒿目滋惊，是用述约法之明条，劝袁氏之引退”，以解除民困国难。“何图昏极，听之藐藐”，怙恶不悛，狡不认罪，此“大慙不除”，国无宁日。因此，“荣廷怵于报国大义，不敢不挥涕以誓师徒；启超虽以文弱书生，亦只得竭才以赞帷幄。顷又与滇黔湘蜀各路护国大军通联策应，会师江汉，荡氛燕云”。伏望各公“讯举义麾，共犁妖窟”^①，推翻袁世凯的罪恶统治。

广西宣布独立，梧州“全城市民欢欣鼓舞，有举国若狂之概。消息于日落后突然达到省中，各处张贴独立之示文，人民一闻此耗，顿时纷纷奔走相告，忙碌异常，大商店及私人住宅皆悬灯升旗，极力铺张，以炫其庆祝心之伟挚。并大放爆竹焰火，声声相应，火药味到处触鼻，盖革命之气势充塞于空中矣”^②。

梁启超于3月27日进入镇南关时，已是广西独立后的第十二天（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的第五天），因此在赴南宁途中，沿途受到热烈的欢迎，“沿途所经小村落小集市”，“居民皆是悬旗燃爆，父老子弟，迎送于数里之外”，抵达龙州时，“全城爆竹之声，喧天沸地，聚观者空巷”。梁启超白天忙于接见绅商，晚间因接陆荣廷发来之袁世凯取消帝制电，并说“有粤使来商条件”，故梁启超“焦急已极，凡致陆督电千余言，致滇黔蜀电亦数百言”，“彻夜不寐”。次日上午，“应龙州商会教育会广东会馆之欢迎、演说共三小时，下午遂乘船赴南宁”。行数日，“至镇龙村，南宁都督府遣第六号巡轮来迎，4月4日，舟抵南宁，荣廷率水师全队自梧州返南宁督舟艤江口相迎，两人携手入城，万旗齐飏，万炮齐发，列队肃肃

① 《广西致各省通电》，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7页。

② 《桂省宣布独立时人民之态度》，载《时报》，1916年3月28日。

入都督府”^①。

广西独立，是全国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必然趋势，更是“梁启超辈之游说与岑春煊、李根源、钮永建、林虎等多方联系推动的结果，又为蔡锷入滇前预为筹策”^②，造成滇桂桴鼓相应的局势。蔡锷说，梁启超“间关”入两粤，适“当锷极困危之际”，泸纳战斗失利，全面后撤，李烈钧在皈朝之战中有被龙军击败之势，“设广西再有十天不宣布独立，真不知如何收场”^③。

广西独立，“突起而拯拔之，大局赖以定”^④。同人“皆额手相庆，真中国之福也”^⑤。它极大地鼓舞了叙泸前线护国军的士气，促进了反攻的全面胜利。广西独立，使滇、黔、桂及川南、湘西连成一片，极大地巩固了护国军后方，动摇了袁世凯自以为可靠的川、湘、粤防线，促使全国反袁斗争的进一步高涨，把护国战争推向新的阶段，有力地打击了帝制派的嚣张气焰，促使北洋军阀内部公开分裂，使袁世凯面临末日的无限悲哀。

四、帝制丑剧收场

丑剧收场

袁世凯原来梦想六个月内消灭异己，而无情的历史却拨乱了他的如意算盘，称帝不及三月，护国运动的烽火燃遍西南。从3月17日起，蔡锷在四川反攻获胜，重创张敬尧军。广西独立后，桂军即分三路出兵湖南、广东肇庆及钦州、廉州，中华革命党早已在广东、湖南及东南各地发起进攻，已成燎原之势，使袁六神无主，恐慌万状。广西独立的次日，袁世凯立即召集各要人在公府商讨对付计划，席中有主张和平解决者，有主张武力解决者，以无结果而

① 《梁任公先生入桂纪行》，载《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五期，《选报》，第2~3页。

② 詹秉忠、孙天霖：《护国战役中的唐继尧及其与蔡锷的关系》，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42页。

③ 杜叙机：《护国战争中北路黔军作战经过及入川失败始末》，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1页。

④ 蔡锷：《序》，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

⑤ 《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第7页。

散。17日，又召集袁最亲近者开特别会议。智多星杨士琦^①力主和平解决，但袁世凯还不肯下这个决心，一面电令广东将军龙济光“严守粤疆”，令江西将军李纯^②以重兵扼守粤赣交界，密电湖南将军汤芑铭^③指示机宜，电苏、皖、赣三省分军赴援衡州以厚兵力；一面希望龙济光出师攻桂，“一日之间，与广东往还电文共六七次”，龙则以“党人注目粤省，自顾不暇，万难图桂”为由，拒绝出兵。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袁世凯“一面授意旅京桂人，忠告陆氏，加以威胁”；一面“派与陆部相识之人赴桂疏通意见”^④，企图分裂护国军。

此时，北洋军阀内部的争夺公开化。以冯国璋为首的北洋军阀实力派认为打击袁世凯的时机已到，于是联合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⑤、山东将军靳云鹏^⑥、湖南将军汤芑铭，共同联电劝袁取消帝制。正当袁世凯因广西独立而暴躁异常时，3月20日，他又接到冯国璋等五将军联电劝退的密报，几乎昏倒过去。自此，他

①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州人。早年入李瀚章、李鸿章幕，参与庚子议和机密，奔走于奕劻、李鸿章之间。袁督直隶，仍留北洋幕府。先后协助袁世凯交涉收回关内外铁路，会办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1903年后得袁世凯特保，历任商部右参议、左参议，农工商部左丞、右丞。1911年袁北上组阁，杨任邮传部大臣，南北议和时任北方参赞。

② 李纯（1874—1920），字秀山，天津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1902年任北洋督练公所教练处提调，后来历任标统、协统。武昌起义爆发后，随冯国璋南下与革命军作战。民国成立后任第六师师长。1913年奉袁世凯命进军江西，镇压“二次革命”，任江西都督。

③ 汤芑铭（1880—1975），字铸新，湖北蕲水人，汤化龙之弟。早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后留学英国。历任镜清军舰机长、南琛军舰副舰长。民国成立后，官至海军次长。“二次革命”爆发后，率北洋军到湖南镇压讨袁军，升任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有“屠夫”之称。

④ 《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四期，《时事日记》，第1页。

⑤ 朱瑞（1883—1916），字介人，浙江海盐人。南洋陆军学堂毕业。光复会会员。先任浙江新军管带，继任标统，参加杭州起义，因率浙军攻克南京有功，升任第六师师长，旋任浙江都督。因拥袁称帝，被浙江党人排逐去沪转津，1916年病死。

⑥ 靳云鹏（1877—1951），字翼青，山东邹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在云南任清军十九镇参议。1911年蔡锷发动云南新军起义时，他在昆明五华山战败逃走，后被袁世凯重用，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升山东都督。

才完全明白自己一手培养的北洋军阀已经众叛亲离，自己已经成了孤家寡人，帝制崩溃之势已不可避免。于是，他见机行事，决定取消帝制，妄图摆脱困境。袁世凯先后分别召见了徐世昌^①、王士珍、段祺瑞和梁士诒等人，一一说明他的决定。21日，召开公府紧急会议，袁世凯请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等人参加，会议决定：一、撤销承认帝制案，取消洪宪年号；二、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院的临时会，以便于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三、解除陆徵祥^②的国务卿职，请他仍任外交总长；四、任命段祺瑞为参谋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五、请黎、徐、段三人联名电劝西南护国军停战议和，如果得到他们的同意，拟任命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企图软化收买进步党人，换取袁世凯继任总统。

22日发表申令，撤销承认帝制案。申令首先把帝制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说实行帝制是时代的要求、国民推戴的结果。“民国肇造，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时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至上年时异势迁，几不可遏。”“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士吏庶，同此悃忱。”“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其次，说他一再推辞，不想当皇帝，“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职之忧，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第三，袁世凯承担责任，不存在惩办祸首问题，

①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江苏东海人。1886年进士。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他兼管营务处，成为袁的主要谋士。后来以内阁学士任练兵处提调，历任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东三省第一任总督。1911年，任奕劻内阁的协理大臣。辛亥革命后，助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1914年任国务卿。袁帝制自为时，他辞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自号“水竹村人”，被袁封为“嵩山四友”之一。

② 陆徵祥（1871—1949），字子欣，亦字子兴，上海人。先后入基督教和天主教。1906年任驻荷兰公使，1911年转任驻俄公使，此后历任唐绍仪内阁和赵秉钧内阁外交总长、袁世凯外交顾问。袁推行帝制，他继徐世昌任国务卿，仍兼外长。

“实予不德，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第四，“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议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安事宜立即停止”。第五，“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而爱国者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挣发政见，断然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把帝制派说成爱国者，把反帝制说成危及国家者。第六，撤去皇帝称号，继续就任大总统职，否则，以武力镇压。申令说：“今承认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曲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①

不管袁世凯在申令中如何玩弄花招，但他承认了帝制自为的彻底破产，宣告帝制丑剧结束。洪宪王朝仅八十三天的短命，是民主潮流不可抗拒的铁证，是袁世凯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梁启超、蔡锷等积极发动的护国战争，加速了帝制的灭亡。

民意耶？帝意耶？

自筹安会起，袁世凯即伪造民意，把帝制丑剧的上演，说成是时代的需要，民意之所归，这在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已经提到。直到袁世凯发表撤销帝制申令时，仍然说他是立法院合词推戴的，是国民代表硬拉他出来当皇帝的，是民意使然，企图继续欺骗中外人士，达到他仍然窃据总统宝座的目的。

为了彻底推翻袁世凯的罪恶统治，必须揭开他伪造民意的画皮。云南军政府讨贼檄文中，指斥袁世凯运动帝制之罪恶，有威逼利诱矫诬民意等语。袁乃嗾使御用之参议院，反唇相讥，谓云南亦曾经表决赞成，请愿推戴，不承认“威逼利诱”。为了弄清事实真相，1915年1月中旬，梁启超即写信给蔡锷，收集袁世凯给云南之伪造民意密电，“尤有最要之一事，请将自筹安会发生以来北京关于选举推戴各项事宜唆使之密电，交此间机关发表，将彼阴谋尽行暴露。盖非此不能抵参议院反唇相讥之口实，且于外国人之观听关系极重”^②。梁启超根据收集的密电，写了《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除把1915年9月26日至12月21日密电原件摄制成版

^① 《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四期，《法令》，第3~4页。

^② 《致蔡锷第二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44~745页。

在报上发表外，还以中、英两种文字，刊印成册，散发中外，彻底揭露袁氏伪造民意之真相。梁启超首先指出：“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然而袁氏方以天下皆易欺，狡不自承。”他详细列举了北京政府致各省将军巡按密电十多条。兹摘数件如下：

9月26日，孙□□电云：“现拟另筹征求民意办法，由各省将军巡按使都统就在省各县绅民中每县择定一人，召集临时公民大会。”

9月27日，筹安会代表团电云：“各县投票人，事实上虽系军民长官指定，而形式上仍须用各县推举字样，以昭郑重。一面指定各县投票人，一面即将各县投票人姓名，分饬各县知事补具详文，正式推举，但须倒填日月耳。”

8月30日税□□等十人电云：“现拟定第一次方法，用各省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上请愿改革书。每省各具一请愿书，均由此间代办，随将稿底电闻，请将尊名并贵省绅商列入。”

梁启超按：“夫公民名义而曰用，谁用之，政府用之也，用其名者，谓不必取实云尔。请愿改革公民，而由将军巡按使都统就在省人员指定，公民耶？私民耶？”“各省请愿改革书，乃由税□□等十人代拟，此谁实愿之而谁请之，乃至二十余省之将军巡按绅商，皆由北京政府代为之列名，民意耶？官意耶？帝意耶？”

10月10日，国民会议事務局电云：“国民会议议员，各县之初选当选人，实为产出国民代表之枢机，允宜特别注意，各县初选监督，当能体会入微，善为运用。尽可于未举行初选之前，先将有望被选资格之人，详加考察，择其行性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碍碍难通处，不妨隐加以无形之强制。”

梁启超按：“观此，则国民大会之当选人，以何种方法产出可知也。所谓体会运用，所谓能就范围，所谓指挥支配，所谓无形强制，请读者试想，此何等语。其中含有几许恶孽。更问读者，此项选举人，能否有丝毫自由选择……能否有丝毫自由主张之余地。而天下万国，往古来今，果闻有此种选举法焉否也！”

10月11日，朱□□等十人电云：“每县初选当选人来省报到，必须设招待员或派员疏通意见，再由监督长官以谈话宴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并将拟定充选之人名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

10月26日，朱□□等十人电云：“国体投票开票后当即行推戴，无须再用投票手续，即由公等演说，应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如赞成，应起立，表决后，即将拟定之国民推戴书，交请各代表署名。事毕，再由公等演推戴及催促大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国民代表名义，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即将预拟之国民代表致代行立法院电稿交请各代表赞成。至推戴文内，必须叙入字样，已将漾电奉达，此四十五字，万勿更改。”

抄录至此，梁启超则说：“已无从更下批评，读者但绎文辞义，则可以恍然于全国一千七百余票何故无一票之反对。可以恍然于各省投票决定国体后，何故皆以同日上推戴书，而无一省之延缓。可以恍然于各省何故一致委托参议院为总代表，而无一省之参差。可以恍然于各省推戴书中，何故皆用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等四十五字，而无一字之异。呜呼！民意耶？官意耶？帝意耶？请读者自裁判之。”

10月11日，国民会议事务局电云：“京外官署往来密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漏，轻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貽政治历史之污。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又12月21日该局电云：“此项电文，无论如何慎密，终涉迹象，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遗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回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万望赶速慎密办理。”

梁启超按：“吾不知读者诸君读此两电，其感想何如？吾所最怪者，则袁氏及其党人，乃犹知此为政治历史之污，乃犹知此为开国缺点，乃犹知此为有伤国家威信，乃犹知此为难逃外人品评。夫袁氏不尝月日扬言，谓改变国体主权在民，政府更无发言之余地乎。谓吾誓死不敢为帝，无奈国民全体拥戴强迫，勉牺牲身家以从其请乎？若果尔者，诚可谓最大之荣誉，最高之道德，何所谓污？何所谓缺？何所谓威信？何畏于品评？而秘密之，而烧毁之，何为者也？”

梁启超将袁世凯政府伪造民意的密电公之于众，又加上切中要害的评语反问，恰似一把锋利的心灵解剖刀，把袁世凯弄虚作假、做贼心虚的丑恶面目，淋漓尽致地揭露无遗，逼得袁世凯无可遁之词，无可退之路，只好宣布撤销帝制。但是，梁启超并不就此罢休，他在列出上述十多条伪造民意密电并加评剖析后指出：“质而言之，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持利刀，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这出傀儡丑戏的总导演就是袁世凯，是帝制复辟的罪魁祸首。这个总导演之处心积虑和手段之卑劣亦达于极点，“专用鼠窃伎俩，昼伏夜动，东偷一孟，西偷一钵，以前清托孤之大臣而盗卖前清，以民国服务之公仆而盗窃民国。即假外人言论（古德诺）以劫持吾民，复冒用吾民名义以欺罔列国”。“以总统为未足，则觊觎皇帝，若皇帝做不成，则又将谋保总统。险诈反复，卑劣无耻，一至此极。以此等人而为一国元首，吾实为中国人羞之。以此等人而为全世界人类四分之一归其统治，吾实为全世界人羞之。”因此，决不能让此败类复任总统之职，要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此次我国民之反抗袁氏，在国法上为讨伐一国之叛逆，在道德上为驱除人类之妖魔，一息尚存，义无反顾，欲其宁息，惟有两途：‘一则袁氏退让政权，一则袁氏将我国民屠杀过半’，决无妥协之余地。”

梁启超的《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把袁世凯妖魔之原形公之于众，使国人“色然忿怒，拔剑而起”^①，万夫所指，使袁世凯在光天化日之下站立不稳，使袁世凯撤销帝制欲保总统之阴谋破产，成为逼袁世凯退位的舆论先导。

① 《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序，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99～112页。

第七章 迫龙独立

一、中华革命军兵临城下

龙济光及“济军”

在清末，龙济光曾与陆荣廷一起镇压孙中山、黄兴、胡汉民领导的镇南关起义，1909年任广西提督，不久调广东任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是忠于清王室的顽固派。龙济光所部“济军”，是清室遗下的巡防营，虽缺乏训练，但械弹充足，有一定的战斗力。辛亥革命以后，胡汉民任广东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革命党人对这些死心塌地效忠清室的军队，自不能任其留驻广东，欲以武力解决。但粤局初定，尚无力量，胡汉民乃以如何安置龙济光及其所部“济军”，向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请示。袁世凯正想利用清朝遗臣，笼络拥有兵力的清末武弁，为己所用，于是下令龙济光率部调驻广西梧州一带，并补充以大量饷械。“二次革命”时，广东胡汉民宣布独立，不久失败，胡汉民出走香港，由陈炯明继任广东都督，袁世凯却下令免陈炯明职，改龙济光为广东都督。

龙济光到广东后，收买了新军标统黄士龙（广东花县人）等人，大肆杀害原新军革命军官，建立了一支由反动的“济家”“四大天王”统领的军队。所谓“四大天王”即旅长广惠镇守使段尔源、高雷镇守使王纯良、潮梅镇守使马存发、驻惠绥靖处督办李嘉品，此外还有黄成伯旅及肇阳罗司令官李耀汉等部队，合计约五个旅六十余营，官兵二万余人，装备较好，战斗力亦较强。但是，这支军队纪律极端败坏，所到之处无恶不作。1914年春，“济军”数千人镇压南海上洪乡人民的反袁斗争，“当时各村庄的农民被龙军杀死的有数百名，因被强奸愤

而投河自杀的妇女亦有数百人”^①。袁世凯称帝后，封龙济光为振武将军、郡王衔。龙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和恩遇，极力效忠，在广东大肆推行帝制运动，屠杀革命党人。因此，广东人民积极组织“屠龙团”，反对龙济光。由于广西独立，同时接到龙觐光被歼灭的电报后，龙济光惊恐万状，风声鹤唳，“与北京政府密电往复，日有数十次，连日并开秘密会议，城厢内外，警戒极为严重，凡出入城门者均一一检查其身体，其茶馆旅社以及其他群众之所，派有多数密探，言语之间，形迹稍涉可疑，即被拘捕，甚为严格。将军府之卫兵皆以亲近之人确保者充之，彻夜梭巡，极力警戒……由省赴香港者甚众，车站码头拥挤不堪，虽经官吏百方谕止，而乘民船舢舨等向香港方面者，仍继续不断。检查报纸，益加严重”^②。

龙济光虽有重兵在握，但面对省内外迅猛发展的反袁讨龙形势，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在港澳的策动

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卖国协定，充分暴露了他复辟帝制的野心。逃亡在新加坡的革命者，在邹鲁^③的领导下，印发揭露袁世凯称帝野心、鼓吹“救亡图存”的小册子，分送爪哇、泗水、吉隆坡、大霹雳等处展开宣传活动。当时，聚集在新加坡的陈炯明、李烈钧、柏文蔚、林虎^④和邹鲁等人开会决定返回香港，展开反袁讨龙活动。

陈炯明、邹鲁等回到香港后，首先在香港半山清风台一房间设立机关，不久又搬到妙高台和湾仔医生馆分别租房居住。总负责人为邹鲁，下设军事、总务两部。军事部人员有曾仲宣、罗侃廷、蒋光鼐、赖培基、张廷辅、范其务、李一球、陈钜海、丘肇周、谭启

① 李朗如、陆满：《从龙济光入粤到粤军回师期间的广东政局》，见《广东文史资料》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7页。

② 《时报》，1916年3月19日。

③ 邹鲁（1885—1954），字海滨，广东大埔人。同盟会员，参加黄花岗之役。武昌起义后，在广东参与组织北伐军，继任广东官钱局总办。1913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袁世凯解散国会后，逃到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后来加入欧事研究会。

④ 林虎（1887—1960），字隐清，广西陆川人。江西武备学堂毕业，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警卫团团长、江西独立旅旅长。“二次革命”后逃往海外，参加欧事研究会。

秀、黄堃南、刘次贞、叶醉生等十余人，总务部人员有张龙云、谢公达、肖文、范芳甫、罗介纯、罗兼柔、江公伟、杨季仙、杨实其、王兴中、黄秋舫、林仙使、余子青、陈心海、林谔庵、谢涤新、侯铁梅等十余人，分别掌握军事方面的调查、联络、计划和发动各地军民以及总务方面的文书、庶务、交际、筹款等工作。

当时，在香港的反袁讨龙负责人，有新加坡来的陈炯明，有北京来的姚雨平^①，有被龙济光入粤时解除师长职务的苏慎初和邹鲁等四个方面。他们根据各人的籍贯和地位等条件分工发动，陈炯明负责东江地区，邹鲁负责潮梅地区，苏慎初负责高雷钦廉地区，姚雨平负责广惠地区。各负责人对负责地区的军队和民军都各有其一定的历史关系。如陈炯明掌握有旧部仲景棠统领所部数营兵力驻海丰一带；苏慎初掌握有苏庸五、黄质文的亲友江防舰舰长阮××等舰队；姚雨平掌握有龙部下的营连排长旧部；邹鲁掌握有在潮汕一带驻防的刘国翔（字仙舫）统领、蓝揆芳（字荫南）分统的数营兵力。

他们利用“济军”的内部矛盾，对龙济光的正规军也进行了发动。当时，可能发动的对象有莫擎宇^②团、陈德春（励吾）团及刘国翔、蓝揆芳三个营的兵力，分驻汕头、潮安、揭阳、潮阳、澄海等地区。选定由新加坡回来的谢涤新（顺丰人，与陈德春有同乡和亲戚关系）和杨实其（与陈德春有朋友关系）与陈德春团长进行联系；由罗侃廷（合浦人，与莫擎宇团之军需莫衡有同学关系）通过莫衡与莫擎宇进行联系；由罗兼柔（大埔湖寮人，与刘国翔、蓝揆芳有同乡关系）会同留汕头的邹敏初、蓝逸川等与刘国翔、蓝揆芳进行联系。当时，由于“济军”马存发旅长歧视莫擎宇全团官兵，莫团待遇低下，官兵大为不满，莫亦决心反袁，不断派莫衡为代表去香港与邹鲁等会谈，决定莫团首先进行起义。陈德春团和刘国翔、蓝揆芳所部响应，得到莫衡的完全同意。此外，他们与西江、

① 姚雨平（1832—1974），原名雨龙，广东平远人。秀才出身，1905年入黄埔陆军中学，1907年化名姚汉强加入同盟会。策划黄花岗之役时任调度课长。广东光复，任广东北伐军总司令，率军北伐，旋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二次革命”爆发后，在上海协助孙中山讨袁。

② 莫擎宇，广东东莞人。光绪秀才，当过廪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任广东省督练公所兵备处科员。辛亥革命后历任营长、团长。1915年时任广东陆军第一团团长，驻朝阳、揭阳等处，归潮梅镇守使马存发统辖。

南江、北江和东江地区的民军进行了联络，以便乘机响应，壮大反袁讨龙的声势^①。

另一支力量以进步党人徐勤、伍宪子、伍权公为主，自帝制发生以后，即通过他们主办的香港《共和报》、澳门《澳门日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鼓动反袁活动，影响颇大。云南起义以后，徐勤亦以港澳为基地，在省内大力组织民军，自称“广东护国军总司令”。由于云南的影响，当时人们认为“护国军”为讨袁的主流，因此，这一派的力量也较为强大^②。

朱执信讨袁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一面派胡汉民、邓铿、许崇智^③等先后往南洋筹款，一面派人分赴国内，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讨袁护国战争。

1914年2月，孙中山致函南洋革命党人，告以正积极策划组党进行讨袁事宜。随即派遣朱执信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李朗如为参谋长，在澳门设立机关。3月，朱执信派陆领^④等回南海县上淇乡召集农民和部分“绿林豪杰”举行起义。同时，运动“济军”统领贺文彪所部之陈营长和余员甫等做内应。但因机密泄漏，龙济光派兵数千围攻上淇乡一带，陆部兵力单薄，只抵抗了数小时，即撤出战斗。

6月4日，朱执信在广东吴川、电白、信宜三县组织反袁武装。龙济光派兵于黄坡分路围剿，驻广州湾法国侵略军会同堵截。朱执信败走海外，到南洋各埠筹集反袁资金。10月，回到香港，

① 范准：《反袁讨龙活动在香港的一些回忆》，见《广东文史资料》第十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8～50页。

② 冯秋雪：《中华革命党澳门“讨龙”活动杂忆》，见《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9～40页。

③ 许崇智（1886—1965），字汝为，广东番禺人。1899年入福州船政学堂，日本士官学校陆军科毕业。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历任福建武备学堂教习、总教习，新军第十镇第四十标标统、第二十协协统。武昌起义后，胁迫统制孙道仁在福建举兵响应，任第一师师长。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走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军务部长，兼中华革命军福建司令。1915年参加反袁斗争，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

④ 陆领，南海县上淇乡人，系珠江三角洲著名绿林首领之一。参加过同盟会和1911年顺德民军起义。

与邓铿策划在广东发动反袁武装斗争。同月，中华革命党为讨袁发布告同胞书，痛斥袁世凯为“专制魔王”，并历数其毁弃宪法、迫害议员、破坏民主、祸国殃民等罪状，号召全国人民“扫除独夫凶焰……重建共和”。不久，朱执信又回到顺德，继续发动讨袁。

11月11日，朱执信在顺德县起义讨袁，率领千余人进攻佛山。16日，高州革命军攻占电白县城，以响应佛山起义，与龙济光军激战十余日后，弹尽粮绝，不得不退出佛山。同时，朱执信、邓铿等策动驻防广州观音山（今越秀山）的炮兵内应讨伐龙济光。事泄，与谋者二十余人被捕。

当筹安会起，孙中山召集廖仲恺等各部长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1915年9月1日，中华革命党党员千余人在东京开会，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0月10日，朱执信抵香港，与邓铿进一步策划讨袁战争。不久，朱执信再派陆领等先后发动南海、顺德、三水、花县、清远等县和西江一带起义；又派李海云发动高州、雷州地区和台山、新会、恩平、开平等地起义；派刘海兴发动阳春、阳江起义；派洪兆麟发动惠州、三多祝一带起义。1915年冬至1916年春，护国战争开始以后，朱执信以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名义，委派陆领为广肇两府区司令，陆常、陆满等为副司令，邓子瑜为惠州潮梅区司令，李海云为高雷区司令，以便分区召集“绿林豪杰”及农民在当地分别起义^①。1月6日，朱执信领导的中华革命军在惠州淡水、白芒花等地起义，与陈炯明护国军相配合，进攻惠州，占领平山。2月上旬，又进攻番禺县石湖村和袭取广州。这些起义都利用会党，缺乏正规的组织训练，与龙军战斗中都因寡不敌众，先后失败。但是，这些起义与陈炯明及广大民军起义相互呼应，陷龙济光于人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动摇了龙济光的反动统治。

陈炯明攻惠州

邹鲁等在香港筹划反袁后，1916年初，陈炯明在惠州附近之马鞍成立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并以广东都督兼讨逆共和军总司令名义发表长篇讨袁檄文，系统揭露袁世凯自窃国以后的种种罪恶，弃约法、毁国会、卖主权、复帝制，“弥天之罪，罄竹难

^① 李明如、陆满：《从龙济光入粤到粤军回师期间的广东政局》，见《广东文史资料》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7～18页。

书”，若任其“倒行逆施”，“亡国灭种，何待五稔”。“今幸人心未死，人思共和，义烈之气，激为霆雷，吊伐之师，望若云雨。东南各省扶义为盟，西北健儿联伸天讨。”“凡我国人，责无旁贷”，望“各省将吏，举国同胞”，共同“诛除祸首，永奠邦基”^①。陈炯明又发布《致各路统领书》，号召各路统领，值此“国贼猖狂，共和垂绝”之际，“尚望早定大计”，“去逆就顺”，“率队来归，同赋泽袍，共维民国大局”^②。

1月6日，陈炯明率领民军分十路十八支队围攻惠阳。

第一路：第二支队司令林海山，第三支队司令陈国强，由平山进攻惠城。

第二路：第四支队长陈月侨，由白芒花进攻。

第三路：第五支队长黄伯群，第六支队长叶匡，由淡水进攻。

第四路：第七支队长严德貽，第九支队长温子纯，第十三支队长钟德貽，由横沥永口进攻惠城。

第五路：第十二支队司令长陈成章，进攻博罗城。第十六支队司令长杨实夫，第十九支队司令长杨一清，由赤江、绿兰起事，踞东江下游进攻石龙。

第六路：第八支队司令长刘济权进攻河源城，第十一支队司令长曹鼎钟在河源响应。

第七路：第十七支队司令长罗惠江，由惠城附近起义，占领西湖飞鹅岭炮台。

第八路：第十四支队司令长张杰，由龙冈起事，进扼平湖。

第九路：第十支队司令长张化如，进攻龙川。

第十路：第十五支队司令长曾汉波，第十六支队司令长邓绍良，第十七支队司令长李怀清，分赴东江上游紫金、连县、和平等县，西出与北路接应。

以上十路，大者数百人，小者数十人，以进攻惠阳为中心，遍及东江十余县，于同日起事。响应起义之民众不下二万人，对广州

① 《广东都督陈炯明檄文》，见《护国军纪事》第一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71~72页。

② 《陈都督炯明致各路统领书》，见《护国军纪事》第一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96页。

造成极大之威胁。龙济光急派惠州清乡督办李嘉品遣兵分途镇压，由于起义军兵力分散，不数日，起义军即被各个击败^①。

民军蜂起

广东自云南起义后，在中华革命党朱执信、欧事研究会陈炯明及进步党徐勤的分头发动下，讨袁之师遍地蜂起，人数虽多，器械却十分缺乏，又无统一领导，广西独立前，大都旋起旋败。

兹将广东独立前后崛起之各路民军附录如下^②：

占领地	名称	司令官	人数
新会江门	中华革命军第三军第二支队	梁 德	1500 人
新会县城	中华革命军第三军第二支队一部	梁 德	500 人
新会猪头山	中华革命军第三军第一支队	李 华	500 人
香山前山	中华革命军第五军一部	刘少廷	三连
香山县城	中华革命军第五军	纳洪顺	四营
香山县城	孙大元帅护国军第五军	任鹤年	1200 人
新宁广海	中华革命军第三军第三支队	梁廷桂	1200 人
新宁牛湾	中华革命军第三军第七支队	伍慎修	800 人
高州	中华革命军第一军	李海云	2000 人
顺德县城	中华革命军第三军第五支队	李 雄	三营
顺德黄连勒楼	中华革命军第三军第五支队一部	李 雄	300 人
南海澜石	中华革命军	周之贞	1500 人
南海九江	陈炯明护国军中路第三支队	关三和	200 人
南海九江	中华革命军第三军第四十一支队一部	黄 会	300 人
顺德龙江	徐勤护国军	张 炳	300 人
顺德龙江龙山	中华革命军第三军第四十一支队一部	刘 联	500 人
陆丰	陈炯明护国军	林干材	二营
英德	中华革命军	张玉洲	四营

① 《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一期，《时事日记》，1月7日，1月12日。

② 《护国军纪事》第四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18~121页。

番禺太和	中华革命军中路第一支队	陈少怀	1500 人
番禺市桥	中华革命军铁血团	李天德	1300 人
南海关山	中华革命军第三军第四十二支队	冯伯翬	一营
新安城	中华革命军第六军	李宝祥	500 人
新会古井	中华革命军第三军第四支队	林 雄	2000 余人
惠阳	中华革命军第六军第九支队	林 垣	400 人
惠阳	陈炯明护国军	林海山	200 人
惠州河源	中华革命军第六军第八支队	李占元	1000 人
博罗黄麻碑	中华革命军第六军第五支队	黄玉山	800 人
惠州马鞍山	陈炯明护国军	林海山	500 人
新会潮连	中华革命军第八军第二支队	卢汉华	800 人
韶关	中华革命军北路	何克夫	3000 人
高明	中华革命军	周之贞	400 人
佛山紫洞	中华革命军第三军	陆 领	700 人
南海石湾	中华革命军第三军	陆 常	2000 人
翁源	陈炯明护国军	周其英	400 人
佛岗	陈炯明护国军	刘华良	300 人
惠城附近	陈炯明护国军	叶 谨	1000 人
雷州	中华革命军第一军第二支队	蔡文炳	二营
潮城	无所属之护国军	莫擎宇	三营
廉州	无所属之护国军	隆世储	三营
连州	中华革命军北路	何克夫	600 人
阳江	中华革命军	黄汉杰	700 人
宝壁兵舰	徐勤护国军	欧阳干	
江大兵舰	徐勤护国军	魏帮屏	
平南兵舰	中华革命军	陈镇华	
安北兵舰	中华革命军	陆 安	
广庚兵舰	陈炯明护国军	锡戴侯	

兵临城下

广西独立，极大地震动了广东，使已经发动的民军增强了胜利的信心，使正在酝酿的反袁势力下定了决心，促使广东的反袁讨龙

斗争迅速走向高潮。

在潮汕方面，忠于袁世凯的龙军马存发旅驻汕头，第一团莫擎宇驻潮阳，第二团陈德春驻揭阳一带。革命党早对莫擎宇、陈德春两团进行了联系和发动，一切准备就绪。3月26日清晨，莫擎宇起义潮阳，随即领兵进占潮安（今潮州），潮安秦知事立即表示赞成，遂于下午二时宣布独立。该县署有游击队员200名，保卫营成员150名，连副俞家驹及警监教练所学生140名，以及团保局、商会等均一致赞成独立。而莫擎宇的把兄弟陈德春亦率领第二团在揭阳竖起反袁讨龙的旗帜。随即击溃了马存发军。朱瑞华、蓝揆芳两警卫营亦响应独立。马存发见大势已去，只得乘合昌号轮船逃往香港，起义军占领汕头，潮梅地区十五县遂告统一。

当马存发逃走后，北洋第二舰队司令汤廷光率领海琛（舰长林永漠）、海筹（舰长林颂庄）、应瑞（舰长由汤廷光兼任）三艘军舰抵汕头，积极响应莫擎宇起义，并与莫擎宇联名通电讨袁。党人蔡德别等组织民军亦在澄海等地响应。潮梅军的声势从此大振，于3月30日宣布独立。潮梅各界公推莫擎宇为护国军广东潮梅总司令，在潮梅镇守署成立潮梅首义讨袁军总司令部。将原驻梅十五属的队伍改编为两师和一个独立旅、一个独立团。莫擎宇以总司令自兼第二师师长，陈德春为第一师师长，蓝揆芳为独立旅旅长，朱瑞华为独立团团团长。原营连排长均提升一级。另增总司令部警卫团一团，任莫衡为团长。随即发布治军纪律七条及对外文告。4月初，遣军向惠州进发^①，直逼广州。

钦州廉州为广西进入广东的要道之一，战略地位比潮汕更为重要。自帝制问题发生后，党人黄明堂在钦边屡图举事，皆未成功。广西独立后，陆荣廷致书道尹冯相荣^②，劝其独立反袁。3月28日，冯相荣约同镇守使隆世储（驻廉州）在钦廉同时宣布独立，陆

① 范准：《反袁讨龙在香港的一些回忆》，莫孝同：《莫擎宇在潮梅反袁与投段始末》，均见《广东文史资料》第十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8～54页。

② 冯相荣，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冯子材之子。自辛亥以后，即在钦州掌握兵权，其中多为冯子材旧部。

荣廷又派兵十营至钦廉，向龙济光宣战^①。

广西独立后，陆荣廷、唐继尧、岑春煊先后电促龙济光，望其认清形势，宣布独立，并愿担保他的地位及家属之安全，否则将为众矢之的，广西亦将进兵广东。同时，发兵至梧州，矛头直向肇庆。肇阳罗司令官李耀汉率领十五营军队在肇庆响应宣布讨龙，反对帝制^②。龙济光为形势所迫，一方面向广东各界人士宣布准备独立，以便阻止各路民军进攻省城；另一方面与蔡乃煌^③密电请求袁世凯急调北洋军入粤“平乱”，而袁世凯也正在调派驻上海的第十师，由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准备乘舰南下。这些消息引起广东人民的更大愤怒。

但是，北洋军还没有来得及开到广东，高雷亦宣告独立。4月4日，停泊省河的宝璧、江大、江固等舰及其他小兵船五六艘响应民军，听从徐勤所部攻城司令魏邦平^④调遣。4月5日，魏邦平乘舰抵虎门，广东巡按使张鸣岐早促广西独立，海军总司令谭学夔、警察厅厅长王广龄也都主张反袁。徐勤、王和顺^⑤等领导民军数千，准备于4月7日攻打广州城，城内警军数千，准备内应。6日午后，徐勤所部魏邦平率江大、宝璧两舰至白鹅潭，行将炮击观音山^⑥。当时，唐继尧、蔡锷等的《致滇籍在粤将士书》，号召应援者“分别给奖”，中立者“概不追究”，冥顽抗拒者“不特粤军加以

① 《广东独立记》，见《护国军纪事》第四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14~117页。

② 彭智芳、龚志鑒：《广东肇军始末》，见《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九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73页。

③ 蔡乃煌，字伯浩，原名蔡金湘，广东人。曾任苏松太兵备道。时任粤桂湘闽赣五省禁烟督办，在广东帮办军务，督促龙济光推行帝制。

④ 魏邦平，别号丽堂，广东中山县人。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广东光复后，充都督府高级武官、广东江防司令等职。龙济光督粤时，排挤粤籍军官，魏被迫离粤。

⑤ 王和顺（1869—1934），字德馨，号寿山，广西南宁人。曾在刘永福部任哨官，后弃官加入会党，1903年在梧州、南宁等地起义，失败后走香港、西贡。1906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钦廉起义、河口起义，辛亥革命时曾在惠州组织民军响应。次年被陈炯明攻击，走香港，去北京，被袁世凯任为总统府军事顾问。袁称帝时，回广东反袁。

⑥ 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民国五年四月六日，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84页。

骈戮，滇人亦皆摒弃”，“何去何从，急宜自择”^①。因此，许多粤军将士“蠢蠢欲动”，在军营中的墙壁上，到处书写“身在广东心在云南，生在云南死在广东”的标语^②。城内驻军中亦有人鼓动独立，高悬旗帜，上书“听候龙济光、张鸣岐宣告独立”^③。龙济光不仅面临着兵临城下，而且出现众叛亲离之局面。

龙济光在局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向袁世凯请示机宜，袁复以“独立，拥护中央”六字。这就是说，宣布独立以缓和民军的进攻，用假独立的手段来达到拥护中央的目的。6日下午3时，在观音山召集官绅士商会议，举龙济光为都督后，于当晚6时宣布独立。独立宣言只说：“广东绅商学界公呈，为保全人民生命财产，公议请龙上将军为广东都督，以原有职权维持秩序。”而布告最后则说：“如有不逞之徒，假托民军，借端扰害治安，即为人民公敌，本都督定当严拿重办，以尽除莠安良之责。”这个布告完全没有一个字表示反袁和反帝制的态度，并且暗示民军如果不停止进攻，他仍然会采取敌对态度与之继续作战。这个布告引起广东人民的强烈不满，民军当即识破龙之假独立阴谋，继续进攻广州，要消灭龙济光。而龙济光则电令海防办事所水警厅，将大小兵舰一律调回省城，另派江巩兵舰开往三水河口，扼守城厢内外。民军总司令魏邦平要龙济光即刻离开广州；而龙则说须待陆荣廷、梁启超二人到省交代清楚，然后离省等^④，用以欺骗民军。

二、留龙与逐龙之争

停战待议

龙济光宣布假独立后，高要、高明、鹤山、河源、新会等县皆不相信龙济光之“独立”，因此迭有警报，仍有民军起义。龙深知他在广东作恶多端，不能为广东人民所谅解，而他本人也未真正改

① 《唐都督等致滇籍在粤战士书》，见《护国军纪事》第二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64页。

② 菊庄：《追志广东独立内情》，载《时报》，1916年4月18日。

③ 《龙王穷蹙之独立》，见《护国军纪事》第四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22页。

④ 《民军继起之奋斗》，见《护国军纪事》第四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23~125页。

变拥袁之态度，便唆使部下进行顽抗。龙济光之部下曾在观音山召开紧急会议，到会者有贺文彪、颜启汉、赵越、李文远、潘斯铠、梁金文等，“群谓都督一席，必当由龙氏任之，若有提议改选者，无论为陆荣廷，为梁启超，为其他民党，惟有以铁炮待之”。会上群魔乱舞，磨刀霍霍，跪地拜天，歃血为盟，誓死服从龙济光，“倘有违背，天诛地灭”，“于是以恶辣手段对待民党之方针遂定”^①。

广东宣布假独立后，粤省民军总司令徐勤不认龙济光为都督，派宝璧兵轮率快艇等攻击河口香山，龙军亦与民军巡船开战，各路民军陈炯明、朱执信等亦领兵进攻，勒令龙军缴械，战斗不断发生，人心极为惶恐，广东各界纷电陆荣廷、梁启超，请速赴粤调停。8日，陆荣廷从武鸣赶至南宁与梁启超会商后，星夜东下，准备解决广东问题。龙济光为各省军阀中拥袁最力和杀人最多的首恶分子，是广东人民的公敌，所以广东著名人士唐绍仪、伍廷芳等联名发出通电，认为去龙是广东的首要问题，梁启超开始也认为“舍龙退职外，对粤无调停余地”^②。但是，梁启超接受了陆荣廷的意见，对龙济光妥协，阻止民军进攻，作了停战议和的如下部署：

4月7日，致电龙济光、张鸣岐说：“闻敌军一旅，乘海容将到，而城厢内外，欲乘机蠢动者颇多，尊处兵力，或恐不敷分配，设有糜烂，前劳尽弃，后事何堪设想。”^③拟由广西派兵助防，随即陆荣廷率军万人东下，作出威胁广东的姿态。

4月8日，致电广州各官署、各团体、各报馆，说明“两粤唇齿之邦，必须联为一气，乃足以充实力而收克敌致果之功，望我同志，推诚相信，勿怀猜疑，绅商学界，戮力同心，协助各官厅共维秩序，务使境内匕鬯不惊，然后不授贼党口实，而使各友邦起敬，将来扫荡妖氛，还我山河，实与诸公共利赖之”。

同日，致电广东民党领袖陈炯明、李根源、林虎、杨永泰、文

① 《民军继起之奋斗》，见《护国军纪事》第四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25～126页。

② 《致汤觉顿电》（3月28日龙州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2页。

③ 《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7页。

群、徐勤、朱执信、邓铿、叶夏声等，说明龙济光、张鸣岐响应独立为“干公（陆荣廷）至诚所感，亦以至诚相应，丝毫无可猜疑之余地。今日之事，必须两粤完全安堵，乃可蓄精锐以歼狂寇”。“务望苦劝各同志，协保秩序，待干公到后，断无不可解决问题。”^①希望停止进攻，待陆调停，以便联合两粤，共同北伐。

海珠惨案

4月6日，汤觉顿受龙济光、张鸣岐之“数电哀恳敦请”，作为梁启超、陆荣廷之代表急赴广州。由海军总司令、都督府顾问谭学夔代表龙济光，邀请民军总司令徐勤上省，先行疏通意见。徐根据梁、陆之要求，同意停战议和。12日，龙济光召开会议于海珠岛水上警署，参加会议的有民军总司令徐勤，梁、陆之代表汤觉顿，海军总司令谭学夔，警察厅厅长王广龄，民军李福林之代表何福乔（译音），商团团长岑伯铸及龙军统领颜启汉、潘斯铠、贺文彪等人，讨论民军与龙的合作问题。会上，汤觉顿首先讲，此次系奉陆都督令先行东下，梁、陆二人计程二日内当可抵粤，一切事宜到时当易解决。继由徐勤提议，粤省所有军队一律改为护国军，另举总司令等问题。会议进行不过十五分钟，贺文彪先表示赞成，并说我先签字，但一语未完，颜启汉即开枪击中贺文彪^②。顿时枪声大作，颜启汉有蛮船数艘泊于海珠，亦向八角亭会场射击，当即击

① 《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7～38页。

② 关于当时冲突及开枪情况，众说纷纭。《粤东海珠大惨案续纪》（《时报》，1916年4月21日）说徐勤“提议调停军队问题，旋徐君勉（勤）偕颜启汉二人转入内房谈话，有顷，而外间遂忽哗噪，枪声旋作，徐、颜将出议厅时，秩序已乱，各卫队纷纷拔枪互击，颜启汉右手被伤”。一说“原因系贺文彪欲将警卫军编入护国军，一军官大不赞成，贺文彪即拔枪，该军官亦即拔枪，互相轰击，八角亭外之军队一闻枪声，即放炮向八角亭乱击，泊在海珠之小兵舰亦向八角亭发炮”。一说是日“开议之后，徐君勉提议将警卫军一律编为护国军，贺文彪先表示赞成，并云我先签字，但一语未完，颜启汉即拔枪向贺轰击，贺中枪遂倒”。另据《时报》4月17日报道：“系由统领颜启汉先拔手枪轰击徐勤，徐即倒地佯装死状，然后乘间逃脱，统领贺文彪连枪击毙十余人。”另据高劳《帝制运动始末记》云：“甫开会，颜等卫兵即开枪轰击。”

毙汤觉顿、岑伯铸、谭学夔^①、王广龄、何福乔^②等，造成骇人听闻的海珠惨案。汤、谭、王都是梁启超的亲密战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骨干分子。徐勤为立宪派，属康有为领导，幸免于难，次日逃往梧州。

海珠会议，是一次有计划有准备的政治谋杀事件。这次重要会议，不在观音山开，更不由龙济光亲自出席，而在海珠岛水上警署召开，这里“济军”荷枪实弹，江中又有“济军”之炮艇，可见凶杀之阴谋。吴贯因回忆此次事件时说：“海珠之变，由梁士诒遣其弟士诒谋之颜启汉、蔡春华诸人，许以重金酬谢，而龙济光亦参与其谋。然在梁士诒兄弟则欲杀尽诸民党；在颜启汉则因与徐勤有旧，欲脱徐而杀其他诸人；在龙济光则以汤觉顿为梁任公、陆干卿之代表，有所顾忌，欲脱汤而杀其他诸人。故梁、颜、龙之大目的虽同，而其所杀之范围则不无广狭之异。”^③而事件的主要肇事者为颜启汉，“颜自知罪大恶极”，即于20日逃亡香港，并在交通银行领得赏银二十万元，“转轮逃赴上海”^④。

两广都司令部成立

5月1日，两广都司令部于肇庆成立，举岑春煊为都司令，俾统一领导两广的军事行动。

岑春煊在清末曾任两广总督、云贵总督，龙济光、陆荣廷都是他提拔起来的，在西南军阀中颇有影响。后来受到清政府及袁世凯的排挤，蛰居上海。“二次革命”发生前，岑在上海与王芝祥等人联名致电袁世凯，要求“和平解决南北冲突”，遭到袁世凯拒绝。于是，他便和黄兴、陈其美、章士钊等联系，随即加入倒袁行列，被推为大元帅。“二次革命”失败后，岑亦遭袁通缉，乃逃亡南洋，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第195页上说：“当场击死了汤叔和龙的顾问谭学衡（就是谭学夔的兄弟）。”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四的《新会谭公略传》中说，谭学夔“与汤公同赴海珠之会，遂遇害”。梁又说谭学夔系龙济光之“顾问”，被击毙。本文采梁说。

② 《追志广东独立之内情》，载《时报》，1916年4月18日；《粤东海珠大惨案续记》，载《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四期，《时事日记》，4月12日。

③ 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84页。

④ 《粤东海珠大惨案续记》，载《时报》，1914年4月21日。

联络党人反袁。护国战争开始后，李根源、钮永建等自日本渡上海后，与在沪诸同志联络，派代表前往南洋，请岑春煊归主大计，而黄兴亦自美促岑速出^①。岑到香港后见情形不妥，不能停留，故于1月4日抵达上海，梁启超迎入同住。岑、梁商议以后，岑即赴日本，主办反袁外交事宜，并时以书信劝促桂、粤独立。广西独立后，梁启超、陆荣廷急邀岑春煊赴桂。4月19日，岑春煊与温宗尧^②、周孝怀、李根源、章士钊等一同抵达肇庆，与梁启超、陆荣廷及张鸣岐等会师。“群贤毕至，两广人士之视线皆集于此，于是有设立两广都司令部之议。”

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岑春煊、梁启超、李耀汉、莫荣新^③、温宗尧、章士钊、李根源、唐伯珊、杨永泰、张习、林虎、章勤士、龚政、魏邦平、孔昭度、曾彦、容伯挺、周善培、张鸣岐、吴贯因等。公推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参谋，章士钊为秘书长。岑春煊在就职宣言中说：“民国四万万人之国”，袁世凯早已叛国，癸丑之役时，一部分人以为不当讨，“今日之讨袁，无（论）妇人孺子，一闻袁世凯称帝，无不裂眦攘臂”。今被推为都司令，受“天下之督责，不负两广之委托者，惟有两言：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决心“抱万死不顾一生之志以讨贼”。决不能“容其退位”，保其总统之职，此乃对四万万人不仁之举，决心推倒袁世凯，必置袁氏死地而后快。号召大家“解除旧怨，与子同仇”，集中精力，共同杀贼^④。梁启超亦发表演说，除了再次表明反袁到底的决心外，强调指出滇、黔护国军以少胜多

① 《上海党人之行动》，见《护国军纪事》后编，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93页。

② 温宗尧（1876—1947），字钦甫，广东台山人。清末留学美国。历任广东将弁学堂总办、驻西藏帮办大臣、外交部参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驻沪通商交涉使兼议和参赞。护国战争时期，随岑春煊赴肇庆军务院，后任广东军政府外交部长。抗日战争期间公开投降日本。

③ 莫荣新（1853—1930），字日初，广西桂平人。行伍出身，初从陆荣廷驻梧州，任桂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1915年任桂平镇守使，次年随陆荣廷入粤，任广惠镇守使，1917年任广东督军，后任护法军政府陆军部长，时率军驻汕头，称桂军护国第四军总司令。

④ 《两广都司令岑春煊就职宣言》，载《护国军纪事》第五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7～20页。

之艰难困苦，要彻底战胜袁世凯，还必须有更充足之准备，望广东绅商各界踊跃捐赠，“慷慨作指困之赠”^①，支援前线，夺取最后之胜利。

两广都司令部组织条例规定，都司令统辖广东广西两省军队，管理一切军务，兼筹政务财务；都司令部设置参谋部、秘书厅、外交局、财政厅、盐务局、饷械局、参议厅等机关。由于广西军界及广东独立各军都赞成上述原则，龙济光亦不敢反对。“故龙与南方护国军虽貌合神离，然以名义论，亦在都司令部节制之下。”此外，隶属都司令部之军队有：

第一师，由潮梅总司令莫擎宇所部改编，以莫为师长。

第二师，由肇阳罗镇守使李耀汉所部改编，以李为师长。

第三师，由驻三水等地莫荣新部改编，以莫为师长。

第四师，由林虎所收广东军队改编，以林为师长。

另有独立混成旅二旅，以程子楷为第一混成旅旅长，魏邦平为第二混成旅旅长。独立团以张习为团长，将校团（专以搜集各级军官）团长由张习兼任。军舰由李耀汉兼管。

当时，广东各路民军，“凡携有枪一支及子弹二百者，即算为一兵”，收归都司令部管辖，“其余皆以枪支子弹缺乏，以次归于消灭”^②。

两广都司令部的成立，把广东各路分散的民军统一了起来，壮大了护国军的力量，把广东之大部分军权集中在都司令部之下，极大地孤立了龙济光。同时，为组织两广军队之北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留龙与逐龙之争

对于龙济光的假独立及海珠惨案，各地民军万分愤怒，“盛倡屠龙之论”，纷纷要求杀掉龙济光，或将其赶出广东。梁启超闻汤、

① 《两广护国军募集军资公启》，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29～31页。

② 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88～489页；《都司令部设立始末》，载《护国军纪事》第五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军情”。

谭、王凶报，肝肠痛断，真欲去龙而后快。梁、陆率桂军东下，扬言有兵一万。龙济光预感大祸临头，不得不稍事让步，以求转圜之机会，于是派巡按使张鸣岐^①赴梧州，为龙洗刷海珠之责，商谈两广“合作”的条件。4月13日，张鸣岐与从南宁来的陆荣廷、梁启超同日抵达梧州，并进行会谈。张鸣岐说明，海珠事变的凶手是颜启汉，而主谋者为四省禁烟督办蔡乃煌。陆、梁则提出解决广东办法：“龙宜自带兵北伐，而以都督让之他人，每月则给龙军饷若干万，并宜交出蔡乃煌及海珠罪首颜启汉等。”^②15日，陆、梁抵肇庆后，“见广东除羊城外，皆树独立之旗，与龙为难，盖非龙去职不可，乃再电龙请其自行告退，而以都督让之岑西林”^③。19日，龙济光又亲赴肇庆，被迫接受了上述条件，于24日处决了蔡乃煌。

陆荣廷为了牵制广东势力强大之民军，并不想赶走龙济光。自龙答应上述条件后，他即回到广西，率师北去湖南。龙济光看到肇庆兵力不足畏，而梁启超、岑春煊又“示以可亲之态度”，于是违背上述诺言，先说“辞职北伐之事，必二月后方能实行”，继言“都督一席决不辞去”。而梁启超、岑春煊并没有掌握军队，更不愿发动民军反龙。为了换取龙济光的一个“北伐宣言”，“以平民党之气”，竟向他让步，由岑春煊保证龙之地位，决不与争都督一席。龙初许之，旋亦不肯宣言。龙济光的这种反复无常，激起肇庆军人及各地民党之极大愤怒，皆主张欲讨袁必先去龙。因此，出现逐龙与留龙之争。

肇庆军人及民党坚决主张驱逐龙济光。这是因为：第一，可以解除护国军北伐的后顾之忧；第二，可以使广东富裕之财源及军械支援战争；第三，可以使华侨拥护捐款，不会惧遭不测；第四，可以打通海路，输入外国军械；第五，可以在广州设立讨袁联合政府。而岑春煊、梁启超不赞成讨龙，岑认为：“第一，此次起义为拥护国法而来，非为争权夺利而来，若坚持去龙之说，恐人疑为与

① 张鸣岐（1875—1945），字坚白，也作健伯，山东无隶人。清末举人。1898年就馆于岑春煊家，颇得器重。1900—1904年为岑春煊幕僚，被称为“智囊”。此后任广西太平思顺道、广西巡抚，署两广总督，兼署广州将军。武昌起义后，逃亡香港、日本。袁世凯执政后，历任广西民政长、广东巡按使。

② 《滇桂纪行》，载《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五期，《选报》，第4~5页。

③ 《滇桂纪行》，载《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五期，《选报》，第4~5页。

之争地位，无以取信于国民；第二，龙未独立之先，岑尝贻书劝告，今既独立，若复取而代之，则前此之劝告其意何居，反之，于心亦觉难以自解。”而梁启超认为：“自揣力量，欲攻下广州最速须两月以上，而城下之后，疮痍遍地，欲理财治兵，从事北伐，非再有两月之准备不能为功，然则在此四月内广东无一兵可以北伐，而滇、黔、桂诸省能否再支持四月，实不可知，则何如暂置龙勿问，专治兵北伐，一面以壮云贵之声势，一面以促他省之响应。”^①从双方所持之理由看，民军之主张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而梁启超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当时，广东除广州、韶关一线及其附近地区外，都被民军所占领，不仅兵临城下，而且广州内部亦极不稳定，张鸣岐等军政要员也都主张独立反袁。川、黔前线业已停战。如果陆荣廷迅速东下，即可拿下广州。当梁启超在龙州之时，致电陆荣廷，提出逐龙的主张，认为“粤之得失，国命所系”，龙济光但知禄位，“宁知有国”，非使龙“屈而从我不可。即彼欲要求保其地位，亦请勿轻许”。因为龙济光失政害民，“粤人共弃”。“至于为国家计，粤不得手，西南大局，终无法维持。公笃于念旧，但允保全彼生命财产，即为仁至义尽；若公轻许彼把持吾粤，则是不忍于一二友之爵位，而忍于全粤数千万人幸福之消灭，忍于全国命脉之颠危。终不免以私害公，将难免于千秋之责备矣。”^②

4月6日，蔡锷又专电复梁启超：“羊城为我军所必争，桂师宜举全力东下。”^③梁启超初则认为必须去龙，后来屈从于陆荣廷，“干公对粤别有规划，持之颇坚，弟初不谓然，今亦首肯”^④，转而采取对粤妥协的方针。这是他害怕“破坏”的旧病复发，是他自己没有力量、没有决心、没有勇气的遁词。他只看到一个地方军阀的实力，看不见全省广大人民反袁的力量。为了迁就陆荣廷，他不仅自己放弃讨龙的意见，而且劝告广东民军停止一切对龙的进攻。与

① 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民国五年五月一日，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89～490页。

② 《复陆都督电》（3月28日龙州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2页。

③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4页。

④ 《致周孝怀电》（4月6日南宁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7页。

龙妥协，不但不能稳定广东的局势，反而加剧了广东局势的紧张和纷乱，阻碍了护国军北伐的计划。

梁启超保留龙济光督粤的计划，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把广东政权交给龙济光，而妄图把广东财权、军权收归肇庆两广都司令部，以调和龙与民军之关系。为此，他不顾许多人的反对，决心“亲自出马靠血诚去感动”龙济光。5月5日，梁启超偕李根源、张鸣岐、黄孟羲赴广州。在李根源的伴随下，梁启超跑去观音山向龙“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次日晚，龙又召集军官会议，“欢迎”梁启超，酒过三巡，龙济光的大将胡令萱大骂护国军、蔡锷及张鸣岐，并横眉怒对梁启超，“像是就要动手的样子”。梁启超此时亦不得不鼓足勇气，愤起演讲舍命来穗的意义。“我在海珠事变发生过后才来，并不是不知道你们这里会杀人，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并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来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东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要怎样便怎样……”慷慨激昂，“意气横厉”，虽一部分人有所感动，然终不能消除危局，继有伏兵于门外，将效海珠之故伎。当夜，梁启超“通宵未寐，受惊不小”，在张鸣岐、李国治等人的调解护送下“步行出城”，走间道，第三天才回到肇庆。“故返肇之后有密电与蔡松坡，云‘鸿门恶会，仅乃生还’。盖纪实也。”^①梁启超赴广州，虽然与龙济光达成协议并发出“团结一致，专心北伐”^②的通电，但并没有将广东局势从“不生不死”中扭转过来。不久，在军务院成立时，梁启超在广东问题上的失策，遭到各方面的谴责，甚至不同意他出任军务院职务。但是否为失策，梁启超也有他的理由。

① 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民国五年五月五日、八日，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91～492页；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95～96页。

② 《龙济光、梁启超共同声明团结一致，专心北伐的通电》（1916年5月8日），见《云南档案史料》第一期，第34页。

第八章 逼袁退位

一、坚持逼袁退位的方针

舍袁退位外无调停余地

广西独立前，由梁启超起草之《广西致北京最后通牒电》中指出袁世凯“自强行帝制，民怨沸腾。云贵执言，干戈斯起，兵连祸结，徂冬涉春，国命之危，未知所届”。远推祸本，则应由“盗国”“殃民”、“失政犯宪”之袁世凯负责。“祸国者自祸”，劝袁自行下野，“以谢天下”。广西独立，把护国反袁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袁世凯在惊恐万状之中，决定取消帝制，以退为进，并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取消帝制骗使并压迫滇、桂、甘省取消独立。此后，袁世凯表面上向南方摆出求和的姿态，暗地里则部署武装，玩弄新的阴谋，以保住总统宝座。

袁世凯在宣布帝制撤销案的前夕，召集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参加公府紧急会议，黎拒绝赴会，徐、段怀着乘机攫权的野心，应邀出席。会议决定撤销帝制，并授意徐、段玩弄调停阴谋。23日，以黎、徐、段的名义电告梁、蔡、唐、陆等独立各省将领“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袁世凯又利用陆荣廷与龙济光之儿女姻亲关系，特由政事堂电告龙济光、张鸣岐，“嘱其转致桂省，以帝制实非予所愿为，今已将前次承认帝制之案一律撤销。陆荣廷素顾大局，当可回邕，恢复秩序^①”。

^① 《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四期，《时事日记》，第4页。

龙济光秉承袁世凯之旨意，于24日即电陆荣廷，请其“取消广西独立”^①。随即，龙济光派专使至南宁，以说服陆荣廷取消独立。

当袁世凯兜售撤帝保位骗局之时，梁启超尚潜伏在越南帽溪，3月28日抵龙州后，知有“粤使来商条件”，“焦急已极”^②。深恐陆荣廷中途变卦，使护国战争半途而废，日夜兼程赶往桂林，又连续急电陆荣廷，反复说明对袁世凯的方针及坚持到底的决心。闻“龙张来使，所商不知何事。但若以取消帝制为取消独立交换条件，务乞坚拒勿许。袁之无信而阴险，中外共知，若彼仍握政权，将来必解西南诸镇兵柄，再施伎俩行专制。如此，非特义军诸将校遭其荼毒，且地方治安亦不克保”。

梁启超进一步揭露袁世凯之阴险可恶，向陆荣廷晓以大义说：“袁氏最大之罪恶，在专用威胁利诱手段，将全国人民廉耻丧尽，若彼依然掌握政权，则国家元气必至渐灭无余，举国沦为禽兽，将何以立于天地。今兹义军申讨，其大宗乃欲为中国服一剂拔毒再造散，不专为帝政问题已也。袁氏图帝不成，乃欲更保总统，反复无耻，至于此极，威信坠地，中外共弃，岂复能有统治国家之力。欲以此敷衍止乱，五尺之童，知其不可也。彼自知已陷末路，乃借外国干涉为事实，欲利用吾民爱国心为自固之计。启超在沪数月，于各邦趋向，详细研究，慎之又慎，苟有一毫危及国家，岂肯轻心以掉。以今日大势论之，若我义军，虎头蛇尾，不能为国家驱除元凶，万一他人攘臂代我驱除，其时袁既无力抵抗，而我国在亦无发言之余地，则中国其真已矣。”希望陆荣廷“持以毅力，善始善终”，坚持“除袁退位外，更无调停之余地”。现在形势是大好的，前途是光明的，没有任何“危险之处”^③，应该坚定必胜的信念。与此同时，梁启超又分别致电汤觉顿、马济及各都督总司令，请勿

① 《时报》，1916年3月27日。

② 《梁任公先生入桂纪行》，载《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五期，《选报》，第3页。

③ 《复陆都督电》、《致陆都督电》，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1～34页。

言调和，坚持袁氏退位的方针^①。

广西独立，极大地鼓舞了叙泸前线的护国军士气，蔡锷在物质条件仍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发起反攻，获得巨大胜利。袁世凯撤销帝制后即命陈宦派人与蔡锷商谈议和条件。当时，一部分人对是否应坚持逼袁退位，继续与袁作战能否取得胜利，缺乏足够的信心，其中包括蔡锷在内，也不无此种忧虑。当时，蔡锷一方面认为必须迫袁退位，“既揭义旗，自宜贯彻始终，方肯罢休”；另一方面由于叙泸之役的艰辛及巨大耗损，自觉疲惫，且后援不继，对能否彻底战胜袁世凯缺乏足够的信心。3月末，他在《致唐继尧刘显世等电》中流露出这种情绪：“惟应审虑者：一，我军力量，能否于短时期内速遣援师，将川、粤戡定，大举北伐。二，袁既撤销帝制，我如用兵，各国及各省对于我军能否仍有多数表同情。三，某国（按指日本）能否实力助我，且保无别项野心。四，我军支撑数月，即不大得胜利，袁政府因种种困难，将自行倒毙否。以上四端，亟应确实研究，以为决心之根据。”“早望冀、周两公速商梁新会及桂督，审度时势，早予抉择是幸。”同时，蔡锷在《致启超电》中亦说：“滇、黔贫瘠，力已不支；川虽富饶，然连年兵燹，饥馑之余，罗掘亦至不易。我军出发以来，仅发伙食津贴，无实惠以维军心，殊非久计。”^②在这种反袁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坚持逼袁退位，认清形势，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梁启超于3月28日致各都督各总司令“勿言调和”电发出后的三四天中，蔡锷致黎元洪等电，坚持迫袁退位。同时，唐绍仪也从上海发电劝袁退位。唐继尧、刘显世、熊希龄等亦通电逼袁退位，“项城一去，诸事立即解决”。上海革命党早于3月25日即提出：“非袁退位，护国军必继续战争，至直捣北京而后已。”^③又民党进步人士联合以十九省“公民”的名义发表宣言，尖锐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扑灭此獠”^④。4月中旬，张謇致徐世昌书，也建议袁世凯

①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82页；《致汤觉顿电》、《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致马司令电》，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2~33页。

②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8、436页。

③ 《时报》，1916年3月26日。

④ 《时报》，1916年4月18日。

退位^①。

当袁世凯得知以梁启超为首的各方面迫袁退位的通电如乱箭射来之时，焦急万分，日夜筹商对策。他除了通过徐世昌、龙济光、陈宦等企图软化瓦解护国军外，又通过帝制派首领梁士诒、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②、参政庄蕴宽^③等充作“调人”，致电梁启超，妄图使袁继任总统。梁在给他们的复电中指出，袁世凯“专操权术，以侮弄万众，失信天下已久”，今欲以一纸撤销帝制之空文，“换已去之人心，云何能济”。若让他继续统治中国，“长此养痍，举国士夫，沦为禽兽，且率兽食人，国又将何以立。项城若稍知自省，则瀛海九洲，何处不可从容以养余日”^④，不要再继续祸乱国家了。

5月4日，梁启超与岑春煊再次通电全国各省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各团体，严厉指出那种“谓帝制既停，可认项城更为总统”，实为“苟且”之论。这正如蔡松坡所云：“再醮之妇，更求归本宗，纵不恐夫绝，于礼且亦难以为情”，要让背叛民国的袁世凯再当总统，是万万办不到的。接着，梁启超驳斥了“调停”者的那种“谓北方军队甚众，非项城不能统一”，“或动辄以外人干涉为词”的种种谬论。梁启超深刻地指出，以“项城衰老之躯”，日益腐败不堪，若强留其以图“苟安”，将“遗后患于异日”。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倘必欲拂舆论以强留项城”，“欲南方强为屈从，则断无望”。“项城虽侈膏牛债豚之威，南方岂能貽乳虎食牛之诮”，而方独立五省军民抱着“三户尚存，九死无悔”的决心，决不让袁世凯继续为害。再说，只有袁世凯早退，才是避免外人干涉的唯一办法。袁世凯欲使徐世昌、段祺瑞、张国淦等人出面调停，梁启超乘机指出，袁世凯阴谋狡诈，惯于排除异己，望北方诸将提高警惕，

① 《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7～38页。

② 张国淦（1876—1959），字仲嘉，湖北蒲圻人。清末在奕劻内阁任统计局副局长。1912年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张任国务院铨叙局局长，以后历任总统府秘书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等职。

③ 庄蕴宽（1867—1932），字思缄，江苏武进人。清末毕业于江苏南菁书院。历任广西潯江书院山长、桂平知县、梧州知府、广西督练公所总办。辛亥革命后任江苏都督。

④ 1916年4月6日《复梁燕孙电》、《复张总长电》、《复庄思缄电》，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5～36页。

“乘此艰难时会，协谋解决之方，既可为项城卸肩以答私恩，复可为国家策治安以全公义。公忠体国，不当如是耶？”^①用以扩大北洋派内部的矛盾，动员一切力量迫袁退位。

袁世凯通过各种渠道妄图软化梁启超及护国军将领，梁却发动各方面逼袁退位，不遗余力，使袁惶恐不安。袁企图用重金贿赂梁^②，梁则用锋利之笔刀解剖袁世凯，使中外人士进一步认识他的本来面目。你死我活，斗争颇为激烈。

袁世凯之解剖

袁世凯玩弄撤销帝制保住总统的花招后，全国政界出现了迫袁退位与保袁继位的激烈斗争，也有人徘徊于二者之间。在国内国外一部分人士中，以为“除袁氏外，举国遂更无势力”，特别是在外国人中，存在两种普遍的想法：一种认为，在袁氏统治下之中国，其能进步与否虽不敢知，然若无袁氏，则中国现状且不能维持，前途更何堪设想；另一种认为，袁氏之为人，固然不能使人满意，然继任者能否优于袁氏，表示怀疑。这些想法，实际上成为保袁继位的论据，成为迫袁退位的巨大障碍。因此，必须对袁世凯进行解剖，揭开他的画皮，弄清袁世凯究系何等人物，才能达到逼袁退位的目的。

梁启超首先列举了袁世凯自筹安会发生以来，为复辟帝制所导演的“请愿”、“投票”、“推戴”等，“如演傀儡戏”，全由“袁氏自牵总线”；又如“施催眠术者，强制受术人使自灭其意识”，作出“种种罪恶”。从报纸公布的北京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五十九通中，就彻底揭露出新华宫之黑幕，解开了人民的种种疑问。梁启超又将其最重要的三十五通译成英文，宣示天下，并请各友邦明确下列重要问题：其一，当知我国“百人中必有九十九人反对帝制”；其二，当知反帝潮流，“已弥漫全国”，“联成一气，百折不回”，不战胜妖魔决不罢休；其三，袁氏之威信已坠，“今日之袁氏，拥有将尽之游魂，利用结束之精力，断不能维持中国之和平，惟益陷中国于扰乱”；其四，“当知我国人经数年来苦痛之经验，其自治能力已渐发

^① 《岑春煊、梁启超论袁世凯不可再任大总统的通电》（1916年5月4日），见《云南档案史料》，第一期，第33~34页。

^② 民国五年陈叔通《致任公先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88页。

展，他日脱离妖魔专制之后，必能以自力善治此国家”。

为了保袁继位，有人认为袁世凯乃中国之一大人物。梁启超以极其蔑视的语言讥讽说：“袁氏诚不失为一大人物，然只能谓之中世史黑暗时代东方之怪魔人物，而决非在十九、二十世纪中价值的人物。彼善能制造混浊腐败之空气，而自游泳于此空气之中，独擅绝技。”因此说，他在黑暗腐败的旧中国，诚不失为一人物，但在今日“震荡新潮之中国言之，袁氏绝不算一人物”，他“纯以个人利害为本位，而不知国家社会为何物”；他是中国祸乱的“种子”，“袁氏多统治一日，则祸乱之程度加深一日”。

为什么说袁世凯再也不能统治中国呢？看他的过去，执政四年来，“曾否有一二成绩可指？”“曾否有所进行？”“曾否有所规划？”四年来，他灭国会，弃内阁，废约法，由总统变终身总统，使国家政治倒退。历史证明，袁世凯既无能统治中国，又不是什么政治家。梁启超为了进一步解剖袁世凯绝非政治家，详细列举了他思想品格之七大缺点：“第一大缺点，则其头脑与今世之国家观念绝对不能相容。”“凡为政者必须认识时代之精神”，今治事“宜蹈袭欧美”，而袁氏自确立总统制后，专门规复“前清中最黑暗最秽浊之一部分”，与世界历史发展之潮流背道而驰。袁世凯头脑中之所谓政治，“除却舞文弄法，罔利营私，炫耀虚荣，鱼肉善良之外，更无一物”。他不仅未尝出国门一步，“亦未到过扬子江流域”，“不能晓解现代文明之真相”，视“东西各国之政治理想，政治现象”为妖魔。第二大缺点是“骄傲自大，不能容人之言”。第三大缺点是顽固僵化，主观武断，不知国家全局利益、百年大计为何物。第四大缺点是玩弄法律，朝令夕改。所颁之法令，专以“强制他人之自由”，“袁氏则绝对以不肯自受限制”，与今世“法治国”之政治毫不相容。第五、第六大缺点是对人“挟猜忌之心”，用人疑人，使僚属互相怨责，互相攻讦。“作弊则法门孔多，持政则束手无策。”正人君子受其愚弄，狡黠之人“若蚁附膻”。第七大缺点是“既揽万事于一身”，又“万事不负责任”^①，鬼域多端，强奸民意，弄巧成拙，误国害民。

^① 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四，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5～19页。

梁启超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表现以及个人的品格、手段等诸方面，层层剖析，雄辩地证明了袁世凯只是一个妖魔并非政治家。这就使中外一些对袁氏仍然抱有幻想的人明白，袁世凯再也不能继任总统；同时使一部分外国人明白，推倒袁世凯后，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和平保障惟恃武力

广西独立后，梁启超即决定护国军“专力规划中原”^①的进军计划。配合四川、湘西护国军的反攻，广西陆荣廷军分三路出击：一支由太平向钦廉方向移动，一支由梧州向肇庆进发，一支由柳州向湖南出兵^②。广东独立后，梁启超、陆荣廷再次强调“以维持秩序戮力北伐为宗旨，坚持此志，始终不渝”^③。要求广东停止内争，一致北伐。4月28日，梁启超《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指出：“我独立省，须发展势力，多添一省，则发言权加一分，宜速进兵径略湘赣，勿待冯等提议停战云云。”另电说“现桂军克日出湘”，“前队日内出赣”，“以退位媾和条件，四省以实力盾其后”，“望持初志，毋稍中馁”^④。4月30日又《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再次强调“以惩罪魁”、“退位”为停战媾和之“主眼”。再者袁氏方日思停战，以懈我军心，而彼仍暗中运兵南来，希图侵扰，此时万不容堕其术中。桂粤入湘入赣之兵，务并力进取，勿稍松动。和平保障，惟恃武力。

当时，蔡锷大约没有收到梁启超的上述电报，对外间形势不甚了了。5月6日，他与陈宦在四川达成第三次协议后，在《致冯国璋、陈宦电》中建议：“除飭滇、黔、川各军遵照停战规约一律停战外，应请电京转飭前敌各军，一律照办为荷。”^⑤当时，护国军势力正旺，中华革命党在山东、江西等地发起攻势，袁世凯欲调兵镇压而又手忙脚乱，无可奈何之际，此时若按照蔡锷建议，“前敌各军”一律仿四川停战，则正中袁计。因此，梁启超急电蔡锷，说

① 《致李侠和电》（4月7日南宁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7页。

② 《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四期，《时事日记》，第1页。

③ 《致谭督办岑伯著电》（4月14日梧州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9页。

④ 《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44～45页。

⑤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61页。

明实力对袁之方针，“实力发展一分，则条件有利一分”，其结果“最低限度，亦须造成南北均势。否则，实无以对死事先烈也。停战之约，本君弟与陈所订，弟处疲敝太甚，不妨仍许展期，惟不必代两粤负责，听其自由活动，两粤既取攻势，退位将成事实，按兵于湘蜀，而会商善后，庶目的稍深保障，前劳不致尽弃”^①。

按照梁启超的战略部署，四川前线在停战中促陈宦独立，湖南军事则取攻势。陆荣廷率军分三路出湘，中路由陆荣廷亲自领兵，率马济等军约一万人，取道柳州、桂林、全县入湖南；左路为林俊廷的巡防营，出武冈趋宝庆；右路为沈鸿英的巡防营，出江华趋道县。桂军沿湘江北进，“一路无战事，所过城镇，万人空巷，夹道欢迎，尤其是零陵、祁阳、衡阳张灯结彩，到处壶浆”^②，5月下旬，抵达衡阳，成为促使汤芑铭独立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军务院成立

筹组军务院

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袁世凯政权和领导南方起义各省的内政外交，特设立军务院。

军务院之成立，为梁启超所首倡。“军务院之历史，梁任公实与相始终。”3月中旬，梁启超在香港舟中即与李根源等筹商：“将来起义各省，对内对外皆不可无联合的机关，此种机关使以政治命名，恐未起义之省疑为组织政府，有垄断政权之意，不如以军事命名更少窒碍，可即名之曰军务院，后来南方有军务院之设立，其义即发源于港也。”^③3月12日至16日，梁启超由香港去海防，在妙义山丸上起草了护国军政府第一号至第五号宣言，上黎大总统电，致公使团领事团第一至第三号电，军务院第一、第二、第六号布告，为军务院的成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① 《致蔡松坡电》（5月14日肇庆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51页。

② 卢五洲：《陆荣廷史实的片断》，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29～30页。

③ 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民国五年三月十二日，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77页。

袁世凯取消帝制后，梁启超在龙州即电陆荣廷除坚持迫袁退位的方针外，拟成立临时政府，“超在沪港与各方面熟商，拟遵照约法，大总统缺位副总统继任之条文，由现在之都督及岑、蔡、李与超共同宣布，恭承黎公依法继任，并组一军务院，用合议制，执行军国重事。如此对外有统一机关，承认可望办到”^①。此后，梁即与唐继尧、蔡锷、戴戡等人电商组织军务院事宜。唐亦电梁，讨论进行讨袁之办法：“目前问题帝制既终，关于倒袁进行之主张如何，及倒袁后之建设如何？先生成竹在胸，当必早有硕划。”“前示军务院组织条例及各公电宣言书，极佩伟划，惟自帝制取消后，是否仍照旧组织？地与人问题如何决定？”“抚军长应否设置？抑或由军务院所在地都督代表，务请就近与干公（按：陆荣廷）从速筹商见示。”^②此后，梁启超即与各都督各总司令电商军务院之人选：“前奉莫公（即唐继尧）书，知军务院组织，极表赞许，惟人地两问题待商。窃意抚军长一职，以滇省首义之勋劳，自非莫公莫属，黔、桂、粤当无异辞。惟为交通计，其地点拟不能不在粤。莫公既不能来粤，拟增设副长摄职，推西林任之。”^③5月2日，又致电唐继尧，确定军务院“地点在粤，拟无疑义。公为长而西林副，切无拗谦，致稽成立。组织条例，承公奖许，想以函商刘、蔡诸公，此间同人，亦无甚更改。但得公承认就职，便可由此间公布。早成立一日，大局多得一分利益，盼火急示复”^④。6日，“任公与龙济光商军务院事，得其同意，旋即通电全国，宣告军务院成立”。

军务院之组织，设抚军、抚军长、抚军副长各职，以合议制行使职权，抚军之下，又有政务委员会，置政务委员长一人，综理一切政务。此外又有各省代表会及外交代表专使。抚军长、抚军副长及政务委员长，由各抚军互选之。抚军资格以各省都督两广都司令

① 《复陆都督电》（3月28日龙州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1~32页。

② 唐继尧：《致任公先生书》（4月21日），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86页。

③ 《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4月28日肇庆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42页。

④ 《致唐都督电》（5月2日肇庆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44页。

部参谋及统有两师以上之总司令为范围，但抚军无定额，无论何省一经独立，其具有上列资格者，即当为抚军，无须重新选举。军务院成立后，抚军为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岑春煊、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炯明、戴戡、罗佩金、吕公望、刘存厚、李鼎新。抚军长为唐继尧，抚军副长为岑春煊，政务委员长为梁启超，秘书长为章士钊。唐继尧不能驻粤，故由抚军副长岑春煊代行抚军长职权。外交专使则为唐绍仪^①，而王宠惠^②、温宗尧副之。又派范源廉与谷钟秀为驻沪代表，与各方面进行联系。李根源任滇桂粤联合军副都参谋兼摄都参谋。军务院直辖之军队有：滇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桂军第四军，总司令莫荣新；桂军第五军，总司令谭浩明；肇军第四军，总司令李耀汉；粤军第六军，总司令林虎。军务院设在肇庆，因此地交通不便，各省代表会没有成立。

对袁世凯之宣判

军务院成立后，随即发布宣言。《第一号宣言》宣布：前大总统袁世凯“紊乱国宪，公然倡乱”，谋叛民国，“自居皇帝”。“查总统谋叛，应受弹劾裁判，载在约法”，今因“约法上之弹劾裁判机关，久被蹂躏，不能行其职权，致使通遥法外。除由本军政府督率大军，务将该犯围捕，将来召集国会依法弹劾，组织法庭，依法裁判”。前大总统“因犯谋叛大罪，自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之资格，当然消灭。布告中外，咸使闻知”。《第二号宣言》宣布：“查民国二年九月国会参众两院议决公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三条云，大总统任期六年；第五条云，大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本大总统期满之日止等因。前大总统既

① 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74年随容闳赴美留学，1881年回国后，初入天津税务衙门，旋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他协助徐世昌负责营务处。历任外务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总办，邮传部左侍郎、尚书等职。辛亥革命时，充袁世凯内阁代表。1912年，被任为第一任国务总理，加入同盟会，因不满袁之专横而辞职。此后，在上海集资设金星人寿保险公司，自任董事长。

②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广东东莞人。清末留学日本，与冯自由、秦力山等创办《国民报》，宣传革命。后赴欧美留学，专攻法律，1905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以广东代表身份，被推为各省代表会议副议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司法总长。1913年任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从事法学研究，著有《中华民国宪法研究》一书。

已犯罪缺位，所遗未滿之任期”，当听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第三号宣言》宣布军务院直隶大总统领导，代行国务院职权，“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庶政”。《第四号宣言》颁布军务院之组织条例、职权范围，军务院所设之政务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委员长以下设各种委员，分掌外交、财政、法制等各种政务。“军务院俟正式国务院成立时撤废之。”《第五号宣言》公布军务院之人选及所在地点。唐继尧、梁启超等宣称，他们决心“效忠国事，一俟大难削平，即当退避贤路。皇天后土，实鉴斯言，为此布告中外，咸使闻知”^①。

军务院代行国务院职权，当时抚军长唐继尧没有到任，岑春煊虽然坐镇肇庆，但也缺乏独立之策划，其实权实际掌握在政务委员长梁启超手中。军务院之成立，兼理外交、财政及海陆军各行政事务，从政权上根本否定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又正式宣布了袁世凯的谋叛罪，护国军对该犯进行“围捕”，并要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宣判，这对袁世凯在政治上和舆论上都给予沉重打击。军务院成立，表明独立各省的团结，同时规定抚军无限额，够条件者可随时参加，这有利于团结和扩大反袁势力。

军务院的成立，使护国战争发展到最高潮。

斥筹安新派

在迫袁退位的高潮中，康有为在上海也发出了《请袁世凯退位电》，一方面指出袁世凯众叛亲离，人心已去，建议袁退位自保；另一方面对袁退位后由谁继任，是行帝制还是行共和制，却不加论述。只是说：“苟能救国而富强之，则为共和可也，用帝制亦可也。”这种论点实际上为复辟宣统打下基础。早在4月4日，他在《上海周报》公开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倡议复辟。5月5日，梁启超即于《时事新报》发表《辟复辟论》，针对康有为的复辟谬论进行尖锐的批判。复辟派与杨度的筹安会在理论上是一致的，而所著之论题亦为“筹安定策”，因此，梁启超说这种复辟派“故得名之曰筹安新派”。

自护国战争开始以来，康、梁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论争，在梁从军入桂以前，就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如今，当袁世凯在迫退激

^① 《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7~10页。

浪中战栗不安之时，旧约法及共和制度即将重见天日之际，“海上一二耆旧，颇有持清帝复辟论者”。梁启超初则“以为今日安得复有此不祥之言，辄付诸一哭”，继则发现“有倡之而和之者”，于是不得不立即发表文章加以驳斥。

梁启超指出，筹安新派既主张清帝复辟，为何不在杨度筹安会发生时，“挺身为请愿代表”，“为故君请命”呢？而是“当筹安会炙手可热，全国人痛愤欲绝时，袖手以观成败”。今者国人“蹈厉奋发，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反对袁世凯称帝，大功尚未告成，“而逍遥海上之耆旧，乃忽仰首伸眉”，持清帝复辟论，“与众为仇，助贼张目”，不仅厚颜无耻，而且居心叵测。

筹安新派认为“立国之道凡帝制必安，凡共和必危”。梁启超驳斥说，这种理论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国体宜采君主制或民主制，“当视民情之所向背如何”，“数月来国人之一致反帝制”，为全国民情趋向共和之铁证。“今梦想复辟者，若谓国体无须以民情为基础”，实愚顽至极，亦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帮凶。

筹安新派的另一论据则说，“共和国必以武力争统治也”，“非君主国不能有责任内阁也”。梁启超认为此种谬论，乃旧筹安派杨度所发明，毫无驳论之价值。他斩钉截铁地告诫新旧筹安两派：“国家能否立宪，惟当以两条件为前提：其一，问军人能否不干预政治；其二，问善良之政党能否成立。今新旧筹安派之说，皆谓中国若行共和，必致常以武力争总统，而责任内阁必不能成立。”这就是说，今后中国之政治，常以武力所左右，而国会与政府不能循正轨以完成其责任。如果这种论据可靠的话，则易共和而为君主，而国家岂可不设一统兵之官。这种统兵官“在共和国体之下，既敢于挟其力以争总统，在君主国体之下，曷为不可挟其力以临内阁”。如果我国不改变军人干政的态度，则无论行共和制，行君主制，都不能实现立宪。其次，我国之政客若能“轨于正道”，“在君主国体之下，完全责任内阁，又曷为不能成立。君主国宪法可以为元首无责任之规定，共和国宪法独不可以为同一之规定耶？若谓宪法之规定，不足为保障，则共和宪法固随时可以成具文，即君主宪法又安得不为废纸”。因此，那种认为“凡帝制必安，凡民主必危”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那种死抱住君主立宪不放的“复辟论者”，并不是在真正地追求宪政，而是“惓怀故主”的奴才言论。今中国之民情趋向共和，窃国大盗将被推翻，“今使复辟论若再猖獗，安

保移国之大盗不翦除之”^①。

三、争取冯国璋，促段反袁

争取冯国璋

袁世凯称帝，妄图子孙世袭，直接影响到冯国璋之高升。因此，当筹安会起，冯国璋即邀梁启超一同劝袁放弃帝制，受到袁世凯之欺骗与愚弄。此后，冯国璋对袁更为不满，成为袁的一大忧心。冯坐镇金陵，握长江中枢之重镇，影响东南一片，成为时局的重心。护国战争开始以后，梁启超一直把冯作为争取发难的对象，“其所以南下者，第一步在希望冯国璋从南京发难”。梁启超曾屡次警告冯国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②。“实则冯虽有反对之志，并无发难之心。”冯既不希望袁称帝得逞，亦不希望西南彻底胜利。“无论何人游说，毫不为动。”^③因此梁启超曾说“冯华甫可谓竖子不足与谋”^④，但他始终未放弃对冯之争取。护国战争开始后，冯国璋利用反帝制派的力量以压迫袁世凯让权，同时摆出忠于袁世凯的架势，以压制西南护国军，发展第三种势力，企图从中攫取更大的权位。他本人时而与梁启超唱同一调子，时而又在袁派压力之下表示反对西南护国军，因此，冯国璋对护国军之态度采取了自相矛盾的做法。1916年元月，他曾与张勋、倪嗣冲^⑤、段芝贵^⑥等“请

① 《辟复辟论》，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17～119页。

② 《致蔡锷第三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45页。

③ 《进步党人之行动》，见《护国军纪事》后编，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92页。

④ 《致蔡锷第三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45页。

⑤ 倪嗣冲（1868—1924），字丹忱，安徽阜阳人。秀才出身。曾为袁世凯部属。辛亥革命时任河南布政使帮办军务，1913年奉袁世凯命攻占安庆，任安徽都督，后改安徽巡按使，支持袁世凯称帝。

⑥ 段芝贵（1868—1925），字香岩，安徽合肥人。1886年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调往日本为东文学生，回国后跟随袁世凯，历任督操营务处提调兼讲武学堂教官、管带、帮统。1905年调任陆军第三镇统制，后督理黑龙江巡抚，督理湖广总督。1912年任驻京总司令官，继任拱卫军总司令、察哈尔都统。1914年任湖北都督，后督理东三省军务兼奉天巡按使，积极拥护袁世凯称帝。

从速征讨”，并“条陈平乱之办法”^①，向袁提出“对滇作战计划之建议案”^②。但当袁任命冯为征滇总招讨时，冯即借故说不能离开南京，拒绝率兵征讨。他知道离开南京就意味着失掉根据地。不久，他干脆装病请假，不理政事^③。在广西独立前不久，即3月9日才销假视事。

袁世凯撤销帝制后，曾要求护国军收兵罢战，“共图善后”。当时冯国璋表示，“撤销帝制，系现时救急良法，嗣后长江一带，可保无虞”。袁在得到冯的保证后，遂对西南采取强硬政策，通过康有为转劝梁启超、蔡锷顾全大局，接受“中央”六大条件：（一）滇、黔、桂取消独立；（二）责令维持地方治安；（三）三省添募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战地所有军队，退至原驻地点；（五）即日起，三省军队不准与官兵交战；（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④。这六项条件实际上是诱使西南的投降书，护国军不仅不予接受，而且针锋相对地提出另外六项条件：（一）袁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二）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三）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六千万，应查抄袁世凯及帝制祸首十三人的财产赔偿；（四）袁世凯之子孙三代剥夺公权；（五）依照民元约法，以黎副总统继任大总统；（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军队驻扎地点，须听护国军都督之指令^⑤。这六项条件不仅逼袁退位，而且要袁打入地狱，三世不得翻身。

双方条件，水火不相容。袁世凯外强中干之威慑，却换来势不可当之霹雳，不禁丧胆。他虽态度强硬，毕竟外强中干，他指挥将

① 《时报》，1916年1月3日。

② 《时报》，1916年1月11日。

③ 《时报》，1916年2月22日、23日。

④ 《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四期，《时事日记》，第6页。

⑤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189页。另据《时报》1916年3月30日载：“南方共和派人已委任梁启超君与政府开谈判，正式要求之条件如下：（一）战事以下列三条件停止：（甲）袁世凯退位；（乙）袁退位后不得再任民国职务；（丙）袁氏子孙三代不得被举为民国总统。（二）袁于退位前应下令大赦国事犯。（三）袁于退位前应下令解散参议院。（四）袁若去至外国，其所有财产除五十万元外，均应没收归公。（五）帝制发起诸人应处死。”

士，已不那么灵活了，不得不多说好话。3月30日，他带着哀求的口吻密谕前敌将领曹錕等道：“蔡、唐、陆、刘、梁迫予退位，予念各将士随予多年，富贵与共，自问相待不薄，务望激发天良，共图生存。万一不幸，予之地位，不能维持，尔等身家俱将不保。现时乱军要求甚苛，政府均未承认，各将士慎勿轻信谣传，堕入术中，务必准备军务，奋勇猛进。”^①同时派内史监阮忠枢再赴南京讲明四川、湖南官军之胜利与外交上之关系，运动冯将军挽留袁总统^②。

自从五将军密电泄漏以后，冯、袁之间的裂痕已不可缝合。此时，冯国璋见袁之帝制失败，乘机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4月16日，冯在《致袁世凯（铤）电》中，对袁集中财权、兵权大为不满；用人则“阿谀者取悦，憨直者见猜”，“国体甫改，劫运忽开”，称帝是“政乱”之根源；今帝制既已取消，再向西南用兵，“于理为不顺”；“若不为除旧布新之谋”，“行见号令不出国门，舟中皆成劲敌”^③。因此，建议总统“推让治权”，隐有讽其退位之意。这是北洋将军中第一个敢于公开劝袁“推让治权”的电报。袁读之不禁恐惧之至，但他却故作镇静，抓住冯电中提到“若不为除旧布新之谋”等语，立即复电说：现在会商成立“责任内阁”，“他如国会、省会，以及中央地方政治分权，亦正讨论方法，竭力进行，所谓根本着手，除旧布新，无过于此。该上将军思虑所及，望将应兴应革各端，列举以闻”。袁世凯对冯讲这些“布新”的话，是希望冯能维持“人心浮动”之苏省，并“会商各省，迅筹调停之法，以救颠危之时局”。“至于引咎已德，补过将来，予虽不德，敢忘忠告。”^④尽量承认一些错误，满足冯国璋之要求，稳住冯国璋之阵脚，以维持即将崩溃之政局。

帝制取消后，冯国璋的动向决定袁世凯的存亡。袁曾先后派蒋

① 《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四期，第8页。

② 《时报》，1916年3月30日。

③ 《冯国璋居中调停电》，见《护国军纪事》第四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48～51页。

④ 《政事堂复冯国璋电》，见《护国军纪事》第四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51～52页。

雁行^①、阮忠枢、荫昌^②、田中玉^③到南京疏通，加紧拉拢并监视冯国璋，以控制反袁势力的发展。梁启超为了加紧运动冯国璋，将进步党骨干籍忠寅（亮侪）从云南财政厅任内调往南京，“亮侪兄似已离滇，连电请其到申，以便与冯接洽，仍未见其来。晴初太孤，现又胡源汇^④捣乱，非亮侪不能抵制之”。“亟宜由四省电冯联合各省，请袁退位。”^⑤

冯国璋之“调停”

冯国璋怀有野心，但意志不坚定。正当他对袁愤愤不平建议“推让治权”之际，忽接北京来电，哀恳他竭力调停，周围又有拥袁势力之围攻，嗣又接徐世昌、段祺瑞来说：“四川将军陈宦，已向蔡锷提出议和条件，仍戴袁为总统。”既然如此，何不顺水推舟。于是他与江苏巡按使齐耀琳^⑥联合于4月18日提出调停意见八条：一、应遵照清室交付组织共和政府全权，使袁世凯仍居民国大总统地位；二、慎选议员，重开国会；三、惩办奸人；四、各省军队须以全国军队按次编号，不分地域，并实行征兵制度；五、明定宪法，宪法未定以前，用民国元年约法；六、民国四年冬之各省将军、巡按使仍旧；七、滇事发生后，派来川、湘方面之北军，一

① 蒋雁行，字宾臣，天津人。北洋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兵科毕业，曾充任江苏江北都练公所参议兼十三标标统。辛亥革命后，历任江北都督、江淮检查使，督理江北军务，1913年升江北护军使。

② 荫昌（1859—1928），字午楼，满洲正白旗人。北京同文馆毕业。历任出使德国随员、北洋武备学堂教习、江北提督、陆军部侍郎、陆军大臣兼军咨大臣。辛亥革命后依附袁世凯，历任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总统府侍从武官长、参议院参政、参谋总长等职。

③ 田中玉，字蕴山，直隶临榆县人。武备学堂毕业，曾任武卫右军右翼快炮队领管、奉天督练公所总参议。1912年起，历任曹州镇守使、兖州镇守使、陆军第五师师长。1915年任陆军部次长，支持袁世凯称帝。

④ 胡源汇曾为宪友会直隶会员。

⑤ 陈叔通：《致任公先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88页。

⑥ 齐耀琳（1863—？），字震岩，又字照岩，吉林伊通人。光绪进士，授庶吉士。历任天津道、安徽按察使、直隶提法使、河南布政使、河南巡抚。民国以后，历任吉林民政长、江苏巡按使等职。

律撤回；八、大赦党人^①。

上述八条，虽然东拼西凑，杂乱无章，但保袁的意思明确，因此，通电发出后，引起全国人民特别是西南护国军的一致反对。梁启超急电唐继尧等人，“报载华甫宣布松坡所允之议和条件，有认袁仍为总统之条，想属谣传”^②。当时陈、蔡磋商，确有留袁之意^③，但不过交换意见，并无决议。不久，冯国璋忽向陈宦电达北京政府，说蔡锷、陈宦议和条件未得滇、黔同意。冯国璋顿觉受到袁世凯之欺骗，气愤不已，又立即通电劝袁退位。他说：“近以政府电知川省协议和解条件，与国璋用意略相同，方且担任调人，冀回劫运。”但袁氏至今“犹不肯相见以诚，调人暗于内容，将从何处着手”。现在“中枢已渐废纪纲，官吏将不循法度，财政之困窘，军心之懈怠”，内外交困，袁世凯能否“旋乾转坤”？若“无术挽回，无宁敝弃尊荣，亟筹自全之策”^④。

徐世昌自3月22日任国务卿以来，谋和保袁。冯国璋促袁退位，宣告徐世昌努力的失败。同时，也说明护国军方面对争取冯国璋取得一定效果，使冯成为逼袁退位的一个暂时联合的同盟军。

促段反袁

徐世昌谋和不成，辞去国务卿职务。4月22日，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由国务卿担任政务，称为“责任内阁”。23日，

① 《护国军纪事》第四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54～56页。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第213页讲，此电报系与张勋联名提出。待考。

② 《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43页。

③ 1916年4月22日蔡锷《致唐继尧刘显世等电》云：“吾人若绝对的主张倒袁，则惟对外宣言非推翻袁氏不能罢兵可矣。”“今若一面要求袁氏退位，一面仍要求惩办元凶，召集国会及其他种种条件，于理是属不通，于事实何能办到。”同时，蔡在《复刘显世戴戡电》中说：“此间与陈二庵磋议一切，不过交换意见，借以为探刺各方面情形及运动联络之地。”（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52～453页。）

④ 冯国璋：《致政事堂电》，见《护国军纪事》第四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52～53页。

袁任命段兼任陆军总长，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孙宝琦^①，内务总长王揖唐，海军总长刘冠雄^②，交通总长曹汝霖，教育总长张国淦，农商总长金邦平，司法总长章宗祥^③。这些总长除段外，都是帝制派。5月8日，废除政事堂，恢复国务院，袁让段组织“责任内阁”，表示恢复了共和国体，以装点门面。同时要求段调停南北，主持和议，以保持袁的总统宝座。

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为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亲自培养起来的所谓“北洋三杰”。王士珍自清政府灭亡起，就回原籍正定隐居。冯国璋外任南京。只有段祺瑞紧跟袁世凯，后任陆军总长。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北洋派系的新生力量大多是段培养和提拔的，段的势力逐步取代袁的势力，对袁世凯称帝造成一种威胁。袁世凯用人疑人，当然也怀疑段祺瑞日益揽权要在北洋派内造成段派势力，以便进一步夺他的权。

袁世凯为了称帝，首先要直接掌握兵权。1914年5月，袁世凯成立陆海军统率办事处，任王士珍为坐办，直接领导全国海陆军，使陆军部名存实亡，段祺瑞成为空有其名的陆军总长。因此，段大为不满，不再到陆军部办公，由亲信徐树铮^④次长代行其职。1915年5月，段辞职赴西山养病。8月，段被解除陆军总长职，从此袁、段关系恶化。帝制期间，段受到监视，行动不甚自由。

① 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浙江杭州人。历任直隶道台、驻法公使、顺天府尹、驻德公使等职。1911年任山东巡抚。1913年至1914年3月任外交总长。1914年起，先后任北洋政府税务处督办、审计院院长、财政总长等职。

② 刘冠雄，字资颖，福建闽侯人。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留学英国。清季任海天军舰舰长。1912年任海军部部长。1913年任海军巡阅使，率舰队到福建镇压革命，封为海军上将兼陆海军大元帅办事处办事员。海军总司令，袁世凯称帝后封为二等公。

③ 章宗祥（1879—1962），字仲和。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归国后在清政府民政部任职。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1914年任司法总长，1916年任驻日公使等职。

④ 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辛亥革命后，历任段祺瑞内阁陆军次长、国务院秘书长，并创办《平报》，为段宣传。袁帝制自为时，曾劝段消极抵制，被免职。由于一贯亲段，被称为段祺瑞的“智囊”。

帝制撤销后不久，袁世凯见徐世昌调解无效，而冯国璋又对他似忠非忠，甚至劝他退位，在众叛亲离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把在北洋军中尚有一定威望的段祺瑞请出来。段就任国务卿后，不愿做一个有职无权的傀儡，他仿照袁世凯当年对待清室的老办法，不仅要求掌握国务院政权，而且要求直接控制军队。他建议袁裁撤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该处所管事务归并陆军部办理，又请求由陆军部接收模范团和拱卫军。而袁不仅不交出军权，也不给段以用人权。因此，段对袁极为不满。就在段、袁矛盾尖锐，段祺瑞愤愤不平之时，梁启超抓住时机，利用这一缝隙致书段祺瑞，打进一个楔子，以扩大这个矛盾。梁在信中简要地讲明反袁形势，时至今日，“项城威信，中外两坠，不能不退”，迟早必须退位。梁针对段出山后之处境及思想情绪说，“公忍辱负重，出执国命。公不轻出，国人共知。公既出而事犹不济，则国家前途，宁复可问。窃谓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鼓励段立即起而反袁，此若办不到，国家灾难无穷。“公今所处，功首罪魁，间不容发。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①段虽恨袁，但他仍是袁的学生，他不便自己出面反袁，让护国军打到北京来倒袁更不可以。最好的办法，是抄袭袁在辛亥年的老办法，利用护国军来倒袁，然后他自己继承北洋领袖的地位，以北洋军的力量对抗护国军。

袁世凯清楚地看出段是他的一个化身，看出段正在抄袭他的老办法，迫他让权。但此时的袁世凯自以为深谋远虑，死死抓住军权不放。而段祺瑞早知袁氏之为人，想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警句，不得不感到处境之危险。因此，他仿照辛亥年袁调拱卫军入京自卫的办法，急调第二十师一部到北京，以便待机而动。

在经过一段思考之后，段祺瑞对解决时局之方针拿定了主意，“南军事和则和之，不可和则劝袁退位，以息兵争”。而袁世凯“初以为借段之力，可以媾和，继见南军坚持退位，不为段转移，而段颇赞成之”。因此，他不仅不肯移交军权，而且通过梁士诒等“多方搪塞”，“以掣其肘”。5月初，袁系主战之声高涨，“于是和议一

^① 《致段国务卿电》（5月4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48～49页。

变，袁即密令前敌备战，仍继续募兵”。段祺瑞认为与他“和平解决之初意相背，面请辞职”。袁虽未准其请，但“以段于和议无功，颇欲置段而倚冯，而南京会议即于此兆其机矣”^①。

南京会议

正当冯国璋《致袁世凯（铨）电》时，袁又派阮忠枢到南京，说跟冯联络未独立各省军民长官发出一个拥袁留任总统的联名通电，借以向护国军示威并加强北洋派内部的团结。冯国璋仍念袁世凯之旧恩，不欲最后决裂，答应再作斡旋。他打算借此与各省联络，结成团体，扩充实力，对于南北两方，可以左右轻重：如护国军不从其议，则并力征讨；袁政府如有异议，亦一致争执。于是，他向阮忠枢表明目前正值南北停战议和之时，不宜发出示威性电报，因此主张联合未独立各省在南京举行会议，先取得一致意见，才有力量与独立各省进行有利的谈判。这个意见得到袁的同意以后，冯就打电报请张勋、倪嗣冲二人提出解决时局的具体办法，以便作为三人的联合意见向南京会议提出。

在袁派势力的影响下，冯国璋为了筹备南京会议，将4月18日调停意见八条略加修改，于5月1日发出和议八条（东电八条）：一、总统问题：因实行帝制，民国中断，大总统地位消灭，副总统之地位亦当同归消灭，副总统代行职权不能成立。不如根据清室交付全权原案，承认袁大总统对于民国暂负维持责任，并恢复副总统名义，一面迅筹国会锐进办法，一俟国会开幕，袁大总统即行辞职，依法产生大总统，实行责任内阁制。二、国会问题：自应提前赶办，定期开会，以便大总统地位得有继承之人；至此次选举议员，必须严定资格，慎防流弊，凡以金钱运动及政党暴乱分子，一概不许入。三、宪法问题：暂以民元约法为标准，但以此项约法未合国情，先将适用各条提出宣布，余再斟酌修改。四、经济问题：中央将收支情形明白宣布，应办善后之滇、黔二省，亦应声明需用实数，国内不急之务，悉予罢除，设法匀拨，万一不敷，再借外债。五、军队问题：原有各军，调回原防，起事后各方所招军队，一律遣散。六、官吏问题：凡民国国内任命保用之各军政官吏

^① 《南京代表会议纪》，见《护国军纪事》第五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28~129页。

资格，一律存在，四省将军巡按，仍旧任职，官制官规如有改变，应由国会成立后再议。七、祸首问题：应先削除杨度等国籍，俟国会成立后，再行宣布罪状，依法判决。八、党人问题：民国以来，热心国事，以微嫌引去者，固不乏人；而专持私见，主张破坏以遂其欲望者，亦多标揭党帜，应由政府审查原案，判别是非，咨送国会讨论，俟得同意，然后宣布大赦^①。

以上东电八条，是以冯的个人名义发出的。其中第一条是解决时局的关键，由于他自己想做总统，因此首先反对黎元洪以副总统资格继任大总统。这个意见，与西南护国军完全对立。其他几个问题，也都是站在袁世凯方面，压制护国军及国民党人的。因此，冯国璋的东电八条，遭到各方面更为猛烈的反对和抨击。旅沪二十二省区知名人士，由唐绍仪（军务院外交专使）领衔，包括护国军驻沪代表谷钟秀、湖南谭延闿^②、湖北汤化龙等联名通电，详尽地驳斥冯国璋东电八条，指出冯自护国以来，态度暧昧，人们曲加原恕，不意会有东电八条，“杜撰法律，自绝国人，横梗中原，扰乱大局”，“彼胸无丝毫国家观念之龌龊官僚”，其手段“较袁氏尤为卑劣”，我国人万难姑容，决不依赖冯国璋之调停，“以武力解决外，无他道足以扫除国家之障害”^③。5月12日，梁启超亦致电冯国璋说，见东电八条，“不胜骇诧。查此次国民所以积愤于项城，正以项城破坏约法。约法者，民国之生命也。项城毁之，国人争之，国人以爱护约法，故不惜糜顶踵以为之殉。项城自绝约法，而约法未尝因此而损其毫末也。项城所以失去总统资格，全因其犯约

① 《南京代表会议纪》，见《护国军纪事》第五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30～133页。

② 谭延闿（1880—1930），字祖庵，也作祖安，号无畏，湖南茶陵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回湘后，结交绅商界，参与办学。1907年组织“湖南宪政公会”，积极进行立宪活动，与汤化龙等发起“宪友会”，任湖南咨议局议长，成为湖南立宪派首领。辛亥革命时，谋杀湖南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接任都督。1912年加入国民党，此后历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二次革命”时，曾宣布独立，被袁世凯解职，先后寓居青岛、上海。

③ 《二十二省旅沪公民唐绍仪等反对冯电之宣告》，见《护国军纪事》第五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21～25页。

法上之谋叛罪，并非约法消灭，总统名义消灭，而彼之资格随而消灭也。约法当然存在，副总统名义谁得而消灭之。项城犯罪缺位，黄陂当然继任”。“今日时局，除项城退位外，别无解决之方。”“四省既已宣言于前，决不能反诂于后，若退位继任两问题相持不决，则恐和平克复，永不其期。”^①

冯国璋另有盘算，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于5月5日亲赴徐州，与张勋、倪嗣冲会商，联名发起召集南京会议，电请未独立各省于15日以前齐集江宁，开会协议共图进止。

南京会议，为护国战争后期的一次带有关键性的会议，袁世凯企图通过这次会议，发动和诱使各省将军出兵镇压护国军，前拟调冯国璋为征滇总司令或内阁总理，以除心腹之患。而冯国璋与拥袁派虚与委蛇，暗地里策划迫袁退位。

会议由冯国璋主持，于5月18日开始，30日结束，参加会议的有奉天（赵锡福）、吉林（张恕）、黑龙江（李革林）、直隶（刘锡钧）、山东（丁世峰）、河南（叶济）、江西（何恩溥）、安徽（万绳栻）、湖南（陈裕时）、湖北（冯笈）、福建（贾文祥）、山西（李骏）、察哈尔（何元春）、热河（夏东骅）、绥远（陈开光）十五省区和上海、徐州、蚌埠等地区的代表共二十余人。其中列席旁听者有袁世凯特派之蒋雁行、海军司令饶怀文等。会议首先讨论总统去留问题，山东代表丁世峰^②在会上首先发言：“吁请总统，暂弃尊荣，使天下早日息兵，以救危亡。”这个建议是得到冯国璋暗中支持的。湖南代表陈裕时、山西代表崔廷献等亦主退位，各代表相继赞同，第一次会议主退位者占多数。当晚，倪嗣冲由蚌埠亲率卫队三营至宁，企图以武装挽救北洋派解体和袁退位的危机。19日，倪列席会议发言，力主维持袁的总统地位，当即遭到丁世峰的反驳，会上争吵不休。20日会议，鄂、湘、鲁代表主张“袁速退位，以保治安”。冯国璋说“总统本应退位，惟宜向国会辞职”，意在缓

^① 《致冯上将军电》（5月12日肇庆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50页。

^② 丁世峰，山东黄县人。廪贡。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立宪派，山东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时策动山东独立。进步党员。

退，与会者多表赞成。后来丁世峰力主速退，冯又说“鄙意与丁代表略同。前日由国会解决一层可取消。宜电独立各省，派员来宁加入会议，解决善后办法”。众赞成。于是通电西南选派政治法律专家为全权代表来宁共商。西南已不承认袁世凯之总统地位，拒绝派代表参加会议。

25日，张勋、倪嗣冲联合反对会议决议，主张对西南用兵，张勋为了抓住军权愿就“督师之任”。袁世凯喜出望外，速召张勋到北京商讨进攻西南计划，并命倪嗣冲到汉口组织征湘司令部。冯国璋不主张战争，如政府果欲主战，请自行调兵，“国璋能力只可维持江苏秩序”，“其他未能兼顾”。独立各省亦来电拒绝与会，至30日，南京会议宣告结束^①。

在南京会议上，冯、丁等大多数代表主袁速退，这使逼袁退位的声势更加壮大，加速了袁世凯的灭亡。冯国璋与西南梁启超在劝袁或逼袁退位的宗旨上是相同的，而在由谁继任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因此，护国军方面争取冯国璋逼袁退位，取得一些进展，但又存在许多曲折与困难，致使梁启超不得不亲自返沪，以便争取冯国璋。

离粤返沪

由于冯国璋、段祺瑞与袁世凯之间的权力之争不可调和，梁启超等在迫袁退位中，将冯、段“引与共事”作为护国军之一大方针。4月底5月初，梁启超多次接到冯之来电，意在劝袁退位，建议双方停战议和，并邀梁亲自返沪协商一切。对此，梁在给冯的回电中作了两项申明：一、“大局至此，非急谋收拾，必将举全国以殉一人……得公出任调停，大难或有宁日。超虽不才，敢辞奔走，惟方组织联合，仓猝颇难离去，且必四省同意奉教，始能生效”^②。二、“公虽抱宁人之志，袁氏似尚无悔祸之心，顷方进兵赣闽，谋

① 《南京代表纪》，见《护国军纪事》第五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28~142页。

② 《复冯上将军电》（4月30日肇庆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43页。

扰吾粤”，指出袁世凯毫无诚意，“以此而求停战，譬则抱薪救火”^①，只会扩大战争事态，望冯拿出有效办法。

同时，梁启超致电各都督各总司令，一则指出袁世凯停战议和之阴谋，护国军“亦当猛进，勿稍松动”，“和平保障，惟恃武力”，要求继续进兵；二则说明“华帅早有退袁之志”，“必须引与共事”，因此，赴沪之行，“似不容已”，“惟必须四省示以方针，乃有率循”；三则提出“惩罪魁”和“退位”为停战媾和之主要条件，请大家迅速示复^②。

两广都司令部成立后，因为财政、外交问题，梁启超拟于5月初赴上海，当时，由于解决广东纠纷和筹组军务院，未能成行。不久，冯国璋电请梁启超去上海，商量解决时局方法。

当时，护国军前线由于连续残酷的战斗，军需物资又极缺乏，当袁世凯取消帝制后，颇欲全面停战和早日议和。蔡锷在3月末和4月22日《致唐继尧刘显世等电》、5月6日《致冯国璋陈宦电》中，都反映了这种倾向，当即得到梁启超的通电纠正。5月15日，梁启超再次致电各都督各总司令，详细阐明不能急于谈和的原因。他说：“统观半月来黔蜀诸电，意旨联络冯段，趋重和平。此固将来一定办法，惟所争者时间问题。此间及沪同人意，谓北方望和平甚急，我却宜受之以缓。现桂军正大举出湘，西林亦整旅待发，俟湘、赣、闽到手，海军归附，乃议善后，庶均势局成，而共和得确实保证。此间抱此方针，故设军务院，派外交代表，仅认局部停战，非袁已去国，不肯息兵。现彼以和平说弛吾气，仍日派兵窥粤，意未可测。四省总代表似可缓派，待超到沪察情形，若有必要，要电请公推，公推时超固不敢辞责，但须与唐少川共事，并推参赞数人，其人亦待到沪后商定奉闻。”^③这是梁启超离粤赴沪前全面的部署，也是他在护国战争中最后一次富有战略意义的谋划。如果按照这个部署执行，护国战争可望取得更大的胜利。

① 《致冯上将军电》（5月2日肇庆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44～45页。

② 4月30日、5月2日《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44～45页。

③ 《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5月15日肇庆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52页。

当南京会议即将开幕之际，梁启超于5月15日离开肇庆，17日离广州，18日离香港，22日到达上海，随即奔赴南京，与冯国璋会商逼袁退位问题，成为南京会议的幕后参与者。22日至24日梁曾数次致电军务院和各都督总司令，报告南京会议结果，“宁议结果，由冯、张、倪电五督及松坡，请派代表，该电想达。闻冯别有私电，言意在商退位善后，冯目的尚正，惟手段太劣，魄力太弱，我宜引之当道，若坚拒恐授旁观口实，挑冯反感，增北方团结，为袁利用。彼既未要求停战，则不害军事进行，桂、粤大军仍宜猛进，湘、赣勿稍松劲，代表亦不好派，惟复冯电，大意宜云南省主张非袁退后，无协商善后之余地”^①。5月22日至25日，戴戡、刘显世、蔡锷等往返电商，“迩来时局变迁，有一日千里之势，筹维应付，尤非新会出而主持不可”。公推梁启超为起义各省总代表，“借联声气，而资统筹”^②。在此逼袁退位时局变迁的关键时刻，西南起义各省对护国战争的军师梁启超寄予更大的希望，但他到上海后，却垂泪于先父之灵前，一度闭门居丧，声称不复与闻国事。

梁启超的父亲梁莲涧，3月14日病逝于香港。当时梁启超正从军于广西，途经香港时，梁父乃弥留之际。梁莲涧为人正直，爱国爱民，积极支持梁当超反对帝制维护共和的事业，当他病重之时，谓启超“有事于国”，“乃严责家人，毋得以电告”。梁启超“乃循朋友之请，匿不以告”。诸同人亦以梁方在军中，责任不轻，亦未以实情相告。这都充分反映了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崇高精神。

四、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气急暴死

浙、陕独立

广西独立及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以后，在全国范围内逼袁退位的形势不断高涨。浙江、陕西相继独立，湖北、江苏、安徽、江

① 《致唐都督并蔡、刘、戴三公电》（5月24日），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93页。

② 《致陆荣廷梁启超等电》（5月25日），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5页。

西、上海、山东各地国民党人纷纷起事，四川、湖南独立，袁世凯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广东独立后，浙江人民的反袁斗争更为高涨，袁世凯急令驻防上海的北洋第十师赴浙江镇压，浙江人民立即掀起了反对北洋军入浙的怒潮。浙江军界，在杭州的第二旅旅长童葆暄^①、警察厅厅长夏超、宁波独立旅旅长周凤歧、嘉湖镇守使吕公望^②、台州镇守使张戴扬等都有独立反袁和阻止北洋军入浙的明显要求。童葆暄曾劝浙江将军朱瑞独立，朱却欲捕杀童葆暄。于是童于4月11日夜带兵入城，直攻军署，朱瑞越墙逃走，起义军推浙江巡按使屈映光为都督。但屈映光为袁世凯派到浙江的高等政治侦探，不接受都督头衔，只答应以浙江巡按使暂兼总司令，维持地方治安。12日，屈映光在宣布独立的同时，又暗地致电袁世凯，说他完全是被强迫宣布的，“固辞不获，始行承诺”。这个电报本来是给袁个人看的，但袁却于14日下令公布，并对朱瑞加以表彰。这样一来，屈映光假独立的面貌完全暴露无遗，浙江各界纷纷通电，痛责他称臣劝进和首鼠两端的罪行，屈见势不妙，遂于17日改称浙江都督。不久，宁、绍、嘉、湖、台等处宣布独立，周凤歧、吕公望到杭州，屈映光被迫辞职。5月6日，改推吕公望为浙江都督，改任王文庆为民政长，张戴扬为嘉兴镇守使，周凤歧为二十五师师长，童葆暄为第六师师长，夏超为警务厅长并兼省会警察厅厅长，范贤方为高等审判厅厅长。从此，浙江局势稳定，与云贵两广采取一致行动。随即，吕亦被推为军务院抚军，又致电政事堂，希望袁世凯“洁身引退，牺牲己之地位，拯救万民之痛苦”^③，并与梁启超多次函电交往，梁亦为促使浙江“与西南之团结”^④做了工作。浙江的独立，

① 童葆暄，字伯颂，浙江宁海县人。北洋陆军学堂毕业，清末曾充任浙江宪兵中队长、浙江讲武堂堂长。原为朱瑞部属，民国后升任陆军旅长。

② 吕公望，字载之，浙江永康人。北洋速战武备学堂毕业，曾充浙江新军督练公所科员、第八十二标督队官。辛亥革命时，任浙江总司令朱瑞的参谋长，后任浙江第六军第十一旅旅长、第六师师长，1914年7月任嘉湖镇守使。

③ 《浙江嘉湖镇守使吕公望致政事堂电》，见《护国军纪事》第三期，《对内文告》，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9页。

④ 《致吕都督童师长周参谋长电》（6月21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62页。

更加壮大了护国军的力量。

自云南义声传入陕西，革命党人颇为活跃，3月18日，革命党人王绍文、南南轩、杜守信等十八人，因密谋讨袁，事泄被捕，在西安被陕西将军陆建章杀害。4月初，陕西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反对陆建章残暴统治的斗争更为高涨，革命党人曹士英、王义山等联络会党，在合阳、韩城、朝邑、宜川、白水、富平、铜川、宜君、洛川等处拥兵万人以上，揭起讨袁的旗帜，举李鸣凤^①为司令，声震全陕。陆建章闻讯，急派陕北镇守使陈树藩^②率兵往攻。陈早有反袁之意，17日至韩城后，与革命党联合。5月9日，在蒲城宣布独立，陈被推为陕西护国军总司令。

陈树藩宣布独立后，即向陆建章交涉，令其所部缴械，退出陕境。但陆建章却派其子陆承武领兵两营往攻陈树藩护国军，在富平激战，陕军纷纷溃退，陆承武亦被俘。

陆承武被俘后，陆建章不得不接受陈树藩的条件。5月16日，护国军和平进入西安城。18日，陆建章以威武将军名义，陈树藩以陕西护国军都督名义，会衔发表通电话：“秦人反对帝制甚烈，数月以来，讨袁讨逆各军，蜂起云涌，树藩因欲缩短中原战祸，减少陕西破坏区域，业于9日以陕西护国军名义，宣告独立，一面请求建章改称都督，与中央脱离关系。建章念总统廿载相知之雅，则断不敢赞同，念陕西八百万生灵所关，则又不忍反对。现拟各行其是，由树藩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负全省治安，建章即当遽返都门，束身待罪，以明心迹。”随即由陆建章下令所部军长一律缴械，归陈军接收。陈树藩为安慰和平缴械之陆建章，推其子陆承武为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并编所部为二师，命曹士英为第一师长，李鸣凤为第二师长，自称陕西都督兼民政长，布告全省。

① 李鸣凤（？—1920），字岐山，山西人。留学日本，同盟会员。回国在山西发动革命，辛亥响应起义，任旅长，因与晋督不睦，入陕西。袁称帝时，在三原与曹俊夫等密谋起兵反袁，劝说陆建章独立。

② 陈树藩，字伯生，陕西安康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任陕西新军下级军官。1911年参加陕西起义，任东路招讨使。民国成立，投靠袁世凯，任陕西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1915年，因镇压白朗起义，升任陕南镇守使，旋调任陕北镇守使。

浙江、陕西的独立，使袁世凯忧愤交集，一病不起。

孙中山第二次讨袁宣言及中华革命军之进攻

1916年1月20日，孙中山致函邓泽如，告以反袁斗争计划，并嘱其积极筹款，指出：“云、贵独立后，鄂、赣、苏、杭等处均准备发动。……刻下决注全力于粤省，旁及福建。闽、粤一下，与云、贵打成一片”，一俟“南方军械补足，即图大举”^①。

护国战争开始以后，在孙中山指挥下的中华革命军设四个总司令部，分别到浙江、陕西、山东、广东等地组织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中华革命党人直接参加云南起义及在广东的反袁逐龙斗争，已在本书有关章节中加以叙述。这里，重点介绍广东、云南以外的中华革命军的反袁斗争。

在湖北，以蔡济民^②为讨袁军总司令，分五个区，由赵鹏飞^③、熊秉坤^④、刘英^⑤、曾尚武、王华国为分区司令，分别在各地组织力量，进行反袁斗争。蔡济民、刘英决定在武昌发难，汉

① 《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卷3，见《孙中山年谱》，1980年，第187页。

② 蔡济民（1887—1919），原名国桢，字幼香，湖北黄陂人。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毕业，先后加入群治学社、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为同盟会湖北分会参议长。参加武昌起义，与议员刘廌藻往迎黎元洪为都督，为武昌军政府谋略处负责人之一。1913年初任黎元洪的参谋长，“二次革命”时反袁，后逃往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4月，孙中山任蔡为湖北讨袁军司令官。

③ 赵鹏飞（1879—1936），字纯青，又字雄群，湖北钟祥人。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毕业。参加日知会，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任湖北都督府顾问。“二次革命”时与蔡济民谋反袁，后逃往日本。护国战争开始后，受孙中山命回湖北反袁。

④ 熊秉坤（1885—1969），字载乾，湖北江夏（今武昌）人。初投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为士兵，荐升正目，加入共进会，秘密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武昌首义的发动者，不久任民军第五协统领。1912年任改编第五旅旅长，反对黎元洪与袁世凯勾结，被黎侦知，弃职潜逃。“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4年秋奉孙中山命回鄂讨袁。

⑤ 刘英（1886—1921），原名光铭，字丹书，湖北京山人。1905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次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加入共进会，次年归国发动革命。1911年11月12日，在京山宣布起义。1912年任同盟会湖北支部长，国会众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后逃往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4年受孙中山委派回国反袁。

阳、汉口同时响应。1916年2月18日（正月十六日）夜，武昌南湖马队一营举事，反对袁世凯称帝。在湖南，杨王鹏^①组织护国军，运动混成旅起事。为了配合护国军黔军进入湘西，杨王鹏于2月19日下午率领敢死队百余人，身怀炸弹，攻击将军署，在将军署的前门、后门、警察厅等处，到处一片轰隆之声，吓得湖南将军汤芑铭四处躲藏。4月18日，杨虎、蒋中正^②奉陈其美令占领江阴炮台，宣布独立。17日，革命党人在安徽大通起事。18日，革命党人何嘉禄在江苏吴江攻占县署，宣布独立。23日，福建民军起义，占据闽江上游一带。24日、25日革命党人在江西玉山、上饶宣布独立。28日，奉天桓仁、庄河二县独立。以上革命党人策动的护国反袁独立运动，虽然都先后失败，但与西南独立各省遥相呼应，形成了日益高涨的讨袁运动。

中华革命党人发动的讨袁护国战争，除了在广东、陕西获得成功外，在山东的功绩亦较突出。3月中旬，孙中山委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统筹直隶、山东、山西革命军事事宜，谋从根本上推翻袁世凯。不久，居正即赴青岛活动，因为山东系南北枢纽，孙中山于4月4日函促居正“占济南则东北全局可迎刃而解”，指示居正，务占济南。3月29日，亦曾电询居正山东军情，若成功，当“亲来”济南^③，指挥反袁斗争。4月下旬，孙中山偕廖仲恺、戴季陶^④由日本返回上海，以便联络“党内党外”^⑤，把反袁

① 杨王鹏（1887—1916），姓杨王，名鹏，字子邕，湖南湘乡人。先投湘军当兵，因宣传革命，被开除。后投入湖北第四十一标当兵。1908年创建群治学社，后改振武学社任社长。后被黎元洪发觉，逐回湖南谋生。辛亥九月湖南起义，在都督府供职。焦达峰被害后，到武昌任军令部人事局长。南北议和后任文学社机关报《民心报》经理，加入同盟会，参与“二次革命”。1914年到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奉孙中山重委回湖南发动反袁。1916年2月20日，被汤芑铭残酷杀害。

② 蒋中正（1887—1975），原名瑞元，字介石，浙江奉化人。早年曾就学保定军官学校，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依附护军都督陈其美，从此起家。

③ 4月4日《孙中山致函居正》，载《中央党务月刊》，第8期。

④ 戴季陶（1890—1949），名传贤，号天仇。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做投机买卖，后又投靠孙中山。

⑤ 《国父全集》第3册，第389页；《孙中山年谱》，第191~192页。

斗争进行到底。

5月9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说：“滇黔独立，文意豁然”，“今独立诸省通电，皆已揭橥民国约法以为前提”，“此尊重约法之表示，足证义军之举为出于保卫民国之诚。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故当自维持约法始”。“文与袁氏无私人之怨，违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弃之，与独立诸省及反袁诸君子无私人之惠，尊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助之。”“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今是非已大白于天下人心，自宜猛厉进行，无遗一日纵敌之患，国贼既去，民国始可图安。”^①表示愿与独立各省共同努力，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共建民国。

在反袁护国的斗争中，海外华侨除了通电声讨外，还纷纷集会，演剧宣传，筹集讨袁经费，“倾囊捐助军费者，大不乏人”。特别是加拿大、美国华侨，在孙中山的感召下，组成“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五百余人，华侨又捐资购买飞机三架，组成飞机队。1916年2月，留加讨袁军华侨敢死先锋队，奉东京总部电召，由蔡鹤朋、黄伯度、李宜民、李锐军、吴泽理等带队，整队到日本横滨待命。美国东部的队员则由伍横贯、黄培等带领，先后分三批抵达横滨，共三百余人，至三月底集中完毕。在日本又有爱国华侨一百多人加入敢死先锋队，总共五百余人及飞机三架，均在日本训练待命。五月初，孙中山派夏重民与东京总部军事部派员一同带领华侨敢死队回国，经青岛进入山东潍县，归中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居正指挥，改编为中华革命军华侨义勇团。该团装备精良，有几十挺美式手提机关枪，此外有步枪、手枪等，飞机三架，在日本驾驶员的帮助下，亦调赴潍县，定名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华侨义勇团飞行队^②。

① 《孙文宣言》，见《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六期，《要挟》，第6~8页。

② 胡汉贤：《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组织始末》，见《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九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5~37页。

居正到山东后，将山东革命党人吴大洲^①、薄守德^②、尹锡五、赵中玉、吕子人、马海龙所部革命军编为二师一独立旅，朱霁青、吕子人、刘廷汉分任师旅长。5月4日，居正领导华侨义勇团向潍县发起进攻。5日，吴大洲、薄守德率军攻占周村宣布独立，号称山东护国军，随即派兵攻下长山、邹平、淄川、青州（今益都）、昌邑、平度、即墨等处。同时，居正派兵攻占安丘、高密、诸城，23日占潍县。那时，山东北洋军尚无飞机，装备精良的华侨义勇团及飞机队，给北洋军以巨大威胁。当居正进攻潍县时，守军第五师师长张树元^③迫于形势，表示有“附义之意”，15日与民军达成十五条协议后，即和平退出潍县。至此，沿胶济铁路各城市大都为民军所占。飞机又盘旋于济南上空散发传单，要求山东将军靳云鹏宣布独立。靳云鹏迫于形势，表示愿与护国军携手，促袁退位，“否则以全体辞职对待”，但以袁退位后解散民军为条件。袁世凯畏于山东的动摇，强令靳云鹏“维持山东现状”^④，并续派兵至山东，靳亦未宣布独立。25日，中华革命军进攻济南，袁世凯手忙脚乱，将靳云鹏撤职，急派张怀芝^⑤督理山东，但革命军并未放弃进攻，形势至为紧张。

黄兴及海外华侨讨袁之声

① 吴大洲（？—1919），山东诸城人。辛亥12月，在诸城参与组成山东军政分府，任警务处长。“二次革命”时在山东谋响应，失败后赴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山东支部总干事。民国五年五月，被推为山东讨袁军都督。护国战争结束后，被段祺瑞诱骗入都，禁锢终身，八年护法军兴，被段杀害于狱。

② 薄守德（？—1919），字子明，山东日照人。同盟会员。十七岁入山东陆军小学。辛亥之役，参加各界联合会。民国成立，入山东军官养成所。“二次革命”失败后走大连。袁世凯称帝，在沂州宣布独立，孙中山任为山东革命军岱南司令官，积极参与反袁。军务院成立，被委为护国军第七军军长。袁死后，所部改为山东新军第二旅。护法失败，所部瓦解，薄走上海，被段祺瑞勾结英捕房所杀害。

③ 张树元，字少卿，山东吴棣县人。“新建陆军”随营德文学堂学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历任北洋第五镇炮兵标统、第五镇第十协统领。1912年镇压山东革命后，升陆军第五师师长、山东军务帮办、山东督军兼省长等职。

④ 《周潍独立记》，见《护国军纪事》第四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16～124页。

⑤ 张怀芝，字子志，山东东阿县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历任“新建陆军”左翼炮兵营领官、北洋常备军协统、山海关巡防营统领、北洋第五镇统制。民国后历任天津镇守使、保定镇守使、察哈尔都统。1916年封清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

袁世凯称帝的第三天，即1915年12月14日，黄兴就在美国致电美国驻中国公使，表示坚决反对帝制，“中国五千年来，至今乃得改为共和政体，国民始得享自由幸福，吾国民断不能坐视袁氏任意复行帝制”，请美国及各国公使执持公理，保守共和，协助反对袁氏称帝之举^①。随即又致书美国政府、议会及实业家，26日又在《费城新报》发表长函，驳斥外人为袁世凯辩护之论据，表白中国人民讨袁到底之决心，呼吁美国朝野赞助中国人民的共和事业^②。

与此同时，黄兴又致函张謇、汤寿潜^③、唐绍仪、赵凤昌^④、伍廷芳、庄蕴宽等，指出袁世凯称帝必败，重申讨袁决心，希望他们在袁世凯践踏共和复辟帝制之时，不要“委曲求全”^⑤。又致书陆荣廷，力促“兴讨贼之师，发扬奋迅，激励国民之气，无使时机坐失，贼势日涨，则国家之福，亦足下之所赐也”^⑥。早在云南起义前，“张继^⑦、李根源等，欲向外国富商借款二百万元，以供西南起义之用”，富商要求黄兴签名担保，黄乃嘱张孝准为代表签名。云南起义后，黄兴除在美加紧反袁宣传，办理交涉与筹款外，与唐

① 《黄克强致美公使电》，见《护国军纪事》第一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30页。

② 《黄克强先生之辩奸论》，见《护国军纪事》第二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77～79页。

③ 汤寿潜（1857—1917），原名震，字蛰仙，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890年进士。曾任知县、两淮盐运使、沪杭铁路总理。1906年与张謇组织预备立宪公会。浙江谘议局成立，被推为议长。1911年11月杭州新军起义，成立军政府，被举为都督。次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为交通部总长，未赴任，托故去南洋游历，归国后病死。

④ 赵凤昌，江苏武进人。曾充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客，立宪派，《申报》的大股东。辛亥革命时，他受袁世凯的指使，操纵南北议和。

⑤ 《赵凤昌藏札》第六十七册，北京图书馆藏。

⑥ 《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第301～303页；毛注青：《黄兴年谱》，第273页。

⑦ 张继（1882—1947），原名溥，字溥泉，直隶沧县（今属河北）人。早年去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政治经济。1903年回国任《苏报》参议，与章士钊创办《国民日报》，与黄兴创立华兴会。1905年加入同盟会，兼《民报》发行人和编辑。1908年赴法国，一度倾向无政府主义。1911年归国，任同盟会交际部主任。1913年国会成立，被选为第一届参议院议长。后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欧美鼓动华侨反袁。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回国。

继尧等函电往来，“潜筹默运”，对国内讨袁运动之进行亦殷切关注，多所策划。刘揆一时在天津，创办《公民日报》，反对帝制，黄兴命其联络居正、孙岳、张辉瓒^①、吴大洲等，“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②。又命谭人凤、周震麟等“赴南洋筹饷”，支持西南义举^③。张孝准在东京与日本朝野进行各项交涉，亦多承黄兴旨意，谨慎行事。

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以后，4月15日，黄兴致电唐绍仪、伍廷芳、张謇、温宗尧、梁启超、汤化龙、谭延闿、钮永建、柏文蔚、范源廉等，指出：“不去袁逆，国难无已。望力阻调停，免貽后累。”^④ 当全国逼袁退位之声不断高涨之时，国内同志都电催黄兴早日回国。他遂于4月中旬离开纽约，经旧金山乘轮西航，“好风吹送返神州”^⑤，于5月9日抵达日本。

黄兴抵达日本后，首先致电袁世凯，痛骂他生平以权谋奸诈愚弄一世，“骗取总统”，“攘窃帝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今者，独立之声，遍于全国，兵精粮足，士气振奋。而公众叛亲离，左右皆敌，公纵不知爱国为何义，亦当知所以保身保家之道”^⑥，促其悔罪引退。5月12日，又通电全国各界，呼吁反袁到底，“元凶势穷，意仍负固，不除祸本，终是养痍”^⑦。17日，又致函唐绍仪、张謇、程德全、伍廷芳、汤寿潜、赵凤昌，请他们“合力主持”，逼令袁世凯“早行退位”^⑧。

黄兴来到日本，拥护孙中山的第二次讨袁宣言，表示与孙中山“联合一致，同事挞伐”，这对团结和动员各派势力，逼袁退位，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① 张辉瓒（？—1931），字石侯，长沙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第十二师师长。

② 刘揆一：《黄兴传记》，见《辛亥革命》（四），第311页。

③ 周震麟再跋《黄克强手札》，载《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④ 《黄克强先生全集》，第327、328页。

⑤ 黄兴在此次横渡太平洋时赋诗：“太平洋上一孤舟，饱载民权与自由。愧我旅中无长物，好风吹送返神州。”

⑥ 《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第308～310页。

⑦ 《黄克强先生全集》，第329页。

⑧ 《赵凤昌藏札》第六十七册，北京图书馆藏。

护国战争以后，云南留日学生、进步党留日学生、留日学生联合会先后发布宣言书，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表示“愿从执鞭，挽此危局”^①。华侨联合会更致电袁世凯，痛斥他“帝制自为，身犯国法，虽自取消，已失总统资格，人民已不公认，公犹恋恋不去，引起兵争，全国涂炭。海外侨众，日接外人，既不堪国家体面之辱，内顾祖国，尤不胜水深火热之忧，函电纷来，皆不认公仍为代表国家之元首，请速退职，以免辱国殃民”^②。在旅外商学各界及南洋、美洲等地的华侨中，也广泛掀起迫袁退位的高潮。

促陈叛袁，逼汤独立

袁世凯派亲信陈宦总揽四川军政大权，震摄滇、黔，以为西顾无忧，大做复辟帝制之梦。帝制撤销后，随之梦境幻灭，又妄图通过陈软化蔡锷，推行停战保位的阴谋，而蔡锷却积极推行梁、蔡天津策划的图川计划，争取陈倒戈反袁，宣布独立。

蔡锷与陈宦私谊较厚，当陈督川时，蔡即推荐其学生雷飙任川军旅长，属刘存厚师长管辖。筹安会起，蔡锷急电泸州雷飙，告以对“国体问题”，“务望镇静”。而师长刘存厚、陈宦之参谋长刘一清均与蔡锷关系密切。因此，云南起义后主攻四川，不仅因为四川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还有重要之人事关系。1916年1月8日，梁启超在致蔡锷第一书中，再次强调了规复三川的重要意义及其应注意的策略。“全力规复三川，自是滇军第一责任”，“必以主力注蜀”。“盖必能奠蜀，然后能奠西南；必能奠西南，然后能奠中国。”对袁世凯之北洋军与川军应有不同之策略，“在津已曾商及”，“川军宜结合，北军宜诛讨”。对川境之伍祥桢师尤应注意争取，“伍军为川境北军中坚，闻目前即单身赴叙，不审现在背向如何？此间有人与伍为道义交者，已委曲风以大义，今当更以明白痛快文字督助之。此君为中国不可多得之良将，深望其能自拔贼中也”。对“蜀

① 《留日学商两界之热泪》、《云南留日学生通告各省》、《留日学生进步党支部决议讨贼书》、《留日学生联合会宣言书》，载《护国军纪事》第一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91页、94页、102页。

② 《华侨联合会电》，见《护国军纪事》第二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48页。

军之散在草泽者”，如“二次革命”后之第五师、蜀中会党等，“尤不能操之过急，惟欲从事招集，必曲与其首领相接，但能助我讨贼，自当一视同仁。若犹有怀挟私见，不受节制，则所以镇辑之者，亦宜惟力是视，不能稍事姑息”，“如有害马，在所必去也”^①。

蔡锷根据梁启超的指示，在得到刘存厚的喻应以后，给曹锟、张敬尧北洋军以狠狠的打击。不久，又争取了冯玉祥师、伍祥桢师的同情与消极避战，取得叙泸战场的巨大胜利。在此基础上，蔡锷即着手促陈宦独立。3月中旬，他曾“设法促冯、伍迫陈宣告独立”^②。同时，陈宦也觉察到，受他指挥的三个师，并不跟他一致行动，川师周骏还不时威胁他的安全，他不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战争的结果，如果曹锟、张敬尧获胜，还可能抢去他四川将军的地位。因此，他并不坚决拥袁，对蔡采取了似敌非敌、似友非友的态度。袁世凯撤销帝制后，随着四川前线停战谈判的展开，陈、蔡之间就倒袁及四川独立问题进行了反复协商。原来，从2月以来，陈宦即派胡鄂公到南京与冯国璋联系，愿以冯之动向为进退，并拟倒袁后举冯为总统。3月底，陈向蔡提出一个方案，“陈二庵昨派人来言，意在倒袁行联邦制，而举冯、段、徐为总统，并谓已派人联络湘、鄂、赣三省，已得赞同，等语”。蔡锷在得到这个方案后，即于3月31日电告梁启超，询问“吾师主张如何？望以见示”。当时，梁启超关于袁倒黎继的意见早已提出，蔡锷即复电陈宦，袁退位后，首先应根据约法规定，“目前继任自属黄陂”，至于将来召集国会正式选举时，“无论为黎，为段，为冯，为徐，均无不可”^③。但是，陈宦受到入川之曹锟、张敬尧等北洋军的牵制，迟迟不敢宣布倒袁。至5月16日冯国璋发出劝袁退位的铣电后，陈宦才下定决心。蔡锷说：“现陈已决心与我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39～740页。

② 《致唐继尧刘显世等电》（3月2日），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26页。

③ 《复陈宦电》（3月31日），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6页。

一致，正事准备，揭晓之期，当亦不远。”^① 5月3日，蔡又致电梁启超说：“二庵已决心宣布独立，一切准备已有头绪。”^② 蔡见时机成熟，一再催陈早日宣布，又授意冯玉祥，将其军队从自流井开至离成都十五里之龙泉驿，促陈并助陈独立。同时，川北号称十八路诸侯的温、郫、崇、灌等县民军已经向青羊宫发动进攻。陈宦不宣布独立，就不能维持他的地位，遂于5月3日、12日两次电劝袁世凯退位，22日致电袁世凯宣布独立，“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

袁世凯撤销帝制的阴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识破，迫其退位的电报如雪片飞来，使他受到一连串的打击，忧郁成疾。但他从未想到他的亲信竟会落井下石，当他看到陈宦的电报后，竟然气得死去活来，病情遽增。

在四川酝酿独立的同时，袁世凯的另一宠臣湖南将军汤芑铭，在湖南推行屠杀政策，结果受到各方面的威胁和反对。革命党袭击将军署，湖南绅士郭人漳想把他赶走，护国军黔军由湘西逼进。4月27日，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在湘南宣布独立，称湘南护国军总司令。5月9日，革命党人占衡山。5月10日，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张学济占乾城（今吉首县），程潜在靖县就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5月下旬，陆荣廷率军占领衡阳，威胁长沙。24日，湘西宣布独立。革命党、会党在湘乡、平江等地十分活跃。北洋军的大批入湘，也威胁到汤芑铭的地位。其兄汤化龙几次打来密电，劝他独立。汤芑铭在各方面的逼迫下，于5月4日发出通电，劝袁退位，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29日正式宣布独立。

自3月下旬以来，迫袁退位之声从四面八方像海潮般地冲击袁世凯。梁启超对他之剖解，并动员各方面倒袁，已使他站立不住，各地独立之声接踵而至，众叛亲离。虽然袁世凯仍顽固不化，至

^① 《致唐继尧刘显世等电》（4月中旬），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51页。

^② 《致梁启超电》（5月3日），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60页。

死不放弃武力解决，但一连串的猛烈刺激和过度劳累，使他夜间失眠，面目消瘦，喜怒无常，痰壅气结，语言颠倒，小便不通。至5月底，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他不仅无能保持其总统宝座，连生命亦无法苟延了。在四面楚歌中，他终于在1916年6月6日一命呜呼。至此，反袁护国战争，因为袁世凯的暴死而宣告提前结束。

第九章 民国安在

一、胜利与妥协

坚持恢复《临时约法》

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气急暴亡，加速了护国战争的胜利。在迫袁退位的过程中，冯国璋欲取袁代之，段祺瑞也想继承北洋派的衣钵，而西南护国军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蔡锷、陆荣廷等一致坚持主张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且在梁启超起草的《护国军军政府第二号宣言》中告示中外：“前大总统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所有大总统资格，当然消灭。继本军政府根据约法宣言在案，查民国二年九月国会参众两院议决公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三条云，大总统任期六年。第五条云大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本任大总统期满之日为止等因。”军务院成立，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宣布：“恭承副总统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孙中山、黄兴亦发表声明，拥护黎元洪继任总统。护国军坚持黎元洪继任，也就是维护《临时约法》的尊严，是民主共和派的一致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冯、段不得不暂时放弃野心，同意黎元洪继任。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宣誓继任总统。

段祺瑞早于1916年4月22日继徐世昌任国务卿。袁世凯死后，段以国务卿名义主持国务院，妄图继续推行袁世凯的政策。6月6日，他以国务院名义通电，遵袁世凯遗令依约法，以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这里说的“约法”，不是《临时约法》，而是1914年5月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这个约法称为“新约法”，又称“袁记约法”，由于它的出现，废除了《临时约法》。根据新约法

制定的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出缺时，由副总统“代理”，但应在三天内在金柜石屋中启示前大总统预先推荐的三人名单，组织总统选举会，在三人中选举一人为总统。段祺瑞的花招，再次否定《临时约法》，立即在全国引起激烈反对。6月9日，孙中山发表规复约法的宣言，提出“规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则唯一无二之方，无所用其踌躇者”，进而针对段祺瑞的阴谋指出，“于此时期，而犹有怙私怀伪不顾大局之流者，则国人疾之，亦将如疾袁氏”，“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不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①。同日，黄兴致电黎元洪，请“规复旧约法，除去袁氏一切伪造之法律与民国抵触者，召集旧国会，组织内阁，严惩祸首”。同日，梁启超亦电黎元洪，提出“规复旧约法”，“速集国会”，“请任段芝老组织新阁”，“帝制祸首付裁判”。西南各省一致主张恢复旧约法，北洋军阀内部冯国璋、河南将军赵倜^②也主张恢复旧约法。从此，展开了恢复新约法还是恢复旧约法之激烈争论。

在全国一致反对新约法的呼声中，6月23日，段祺瑞再次发出漾电说：“民三约法，履行已久，历经依据，以为行政之准。”一面坚持袁记约法，一面要求各省军民长官各派代表三人到北京组织“修正约法委员会”，在新、旧约法之外产生一个“段记约法”，以求实现其毁法造法的个人野心。

段的漾电招致全国各方面的坚决反对。孙中山再次函劝段祺瑞规复旧约法尊重国会。梁启超致段祺瑞电中反驳说：根据《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凡增修约法，得“由参议院议员三分之二以上，或临时大总统之提议，经参议员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员四分之三可决”，方视为有效。今三年约法系由袁世凯指定之约法会议议员所炮制，未经参议院依法通过，“绝对不能认为法律”。“一法不能两容，三年约法若为法，则民元约法为非法。”然三年约

① 《民国日报》，1916年6月9日。

② 赵倜（1871—？），字周人，河南汝阳县人。原是武卫左军（毅军）马玉昆部下，曾任总兵。民国后任河南及河北镇守使、护军使，以镇压白朗起义军有功，封宏威将军，所部称为“宏威军”。1915年封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袁世凯称帝时被封为一等侯爵。袁死后靠近皖系，皖系失败，依附直系。

法，不“特国人均不公认为法，即今大总统之地位，今国务院之地位，皆必不先认为法而始能存在也”。因为“国务院者，元年约法之机关，三年约法所未尝有也”。“三年约法若为法，元年约法定非法”，则段祺瑞所在之国务院“何由成立”。此外，若召集各省军民长官代表去修改约法，更是荒谬之举，因为各督代表无议法之权利，广征名流意见，尤为不可也。现在，只有“规复元年约法”，并“根据该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产生宪法，传诸无穷”^①，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当时唐绍仪、伍廷芳、蔡锷等亦通电反驳段祺瑞。6月25日，驻沪海军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②、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南下广州并联合发布宣言说：“今率海军将士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军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受。”同时原参众两院议员宣言，非俟约法恢复，决不入京应召。

梁启超等人的驳斥，使段祺瑞在国务院之位置上站立不稳，海军的独立，使段感到事态日益严重和自身日益陷于孤立。段祺瑞“深恐迟久别生事变”，终于被迫放弃其不肯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的成见。6月29日，北京政府公布恢复《临时约法》，命令说：“共和国体，首尊民意。民意所寄，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恃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民国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至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仍应有效。”^③同日，宣布废除国务卿，消灭帝制中枢，又特任段祺

^① 《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64～65页。

^② 林葆懌，字悦卿，福建闽侯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赴英国留学，学海军，归国后任北洋舰队管带。1912年9月任海军部参事、练习舰队司令、第一舰队司令。1916年参加反袁。1918年8月任广东护法政府七总裁之一，海军部部长、海军司令。

^③ 《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八期，《法令》，第1页。

瑞为国务总理，并发布命令，定于8月1日召集国会复会。在6月30，准帝制时期的各部总长免职，特任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①为内务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②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③为交通总长，段祺瑞兼陆军总长。国务院之重新组成，虽然尚待国会批准追认，但也是恢复《临时约法》的一个胜利。

北京政府明令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及国务院并续行召集国会，是护国战争的重大胜利，使民主共和的旗帜重新飘扬在中国大地。

惩治及对段祺瑞妥协

袁世凯已被打倒，《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国务院已经成立，国会即将召开，护国战争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惩办帝制祸首。

云南独立之时，即要求惩办祸首杨度等十三人，当袁世凯撤销帝制，并阴谋使南方停战之际，梁启超又提出了舍袁世凯退位及惩办罪魁外，无调停之余地。袁世凯死后，黄兴、梁启超及独立各省一致要求惩办祸首。但西南方面又认为，如果牵涉面过广，可能会影响与北方的和平解决，因此，只提出了一个不上不下的惩办祸首的名单，计有：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所谓

① 许世英（1872—1964），字俊仁，一作静仁，安徽贵池人。拔贡出身。历任刑部主事、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1910年赴欧美考察司法、监狱。辛亥革命时，与张锡銮等联各吁请清帝退位，建立民国。辛亥革命后，历任奉天民政长、福建巡按使等职。

② 孙洪伊（1870—？），字伯兰，直隶天津人。袁世凯幕僚。1911年任直隶谘议局议员，参加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与汤化龙在上海组织民主党，为党魁之一。1913年为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次年反对袁世凯解散国会图谋帝制，秘密离京赴沪，公开发表反袁宣言。

③ 汪大燮（1860—1929），字伯唐，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举人出身，援例为内阁中书，升侍读、户部郎中，考上总理衙门章京。1902年后，历任留日学生监督、外务部左参议、出使英国大臣等职。1910年出使日本，1913年回国，任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1914年任平政院长、参议院参政兼副议长。袁称帝时，退出参议院。

“六君子”和朱启钤^①、段芝贵、周自齐^②、梁士诒、袁乃宽、张镇芳^③、雷震春^④所谓“七凶”，合计为“十三太保”。对这些“内乱重要罪犯”，“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其他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之人和征滇军首犯袁克定、倪嗣冲、曹錕等人均不过问。

尽管护国军并不苛求，但段祺瑞却不同意上述名单。段祺瑞与不少帝制祸首都有血肉相连的关系，而且一般帝制派都是北洋军阀的“谋臣勇士”，他既继承了北洋派领袖的地位，袁世凯的私党也就是他的私党，自然不愿意对他们严惩，只是西南提出了这个要求，不能不相应地处理一下。而梁启超早就认为“张勋最猾险可恶”，袁世凯死后，如全局破裂，“东南更无人可以收拾，大约前清复辟必成事实”^⑤，为了预防复辟，及维持全国之稳定，把希望寄托在段祺瑞身上。他致电各都督各司令说：“收拾北方，惟段是赖，南方似宜予以援助，毋使势孤，更不可怀彼我成见，致生恶感。”^⑥因此，他尽力迁就段祺瑞，在惩凶问题上，初则态度坚定，继则动

① 朱启钤（1871—？），字桂莘，号蠖园，贵州开州（今开阳）人。举人，历任道员、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北京外城警察总厅厅丞、内城警察总监、蒙古事务督办、津浦铁路督办等。1912年7月以后，历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1915年支持帝制活动，任大典筹备处长。袁死后，逃匿天津租界。

② 周自齐（1871—1932），字子虞，山东单县人。历任驻美旧金山总领事代办公使事、外务部左丞、度支部副大臣。1912年任山东都督，残酷镇压革命。1913年后，历任交通总长、陆军部总长、财政总长、农商总长。1916年4月任税务处督办兼中国银行总裁。支持洪宪帝制，任大典筹备处委员。

③ 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的表弟。光绪进士。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兼署直隶臬司、署理直隶总督等职。1912年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1914年因镇压白朗起义失利，调回北京。1915年积极支持袁世凯称帝。

④ 雷震春，字朝彦，安徽合肥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在“新建陆军”工程营任队官，升任北洋第三镇第五协统领、江北提督等职。1912年任河南护军使。1913年任长江查办使，同张勋、冯国璋攻打南京，镇压“二次革命”。1914年任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封为震威将军。袁世凯称帝时，封为一等伯爵。积极支持袁世凯及张勋复辟。

⑤ 《致蔡锷第三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745、747页。

⑥ 《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6月7日上海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54页。

摇妥协，不了了之。6月8日，他致电黎元洪说：“帝制祸首不惩，无以谢天下，请分别拘留候裁判。必民气平民志定，然后一切兴革乃有着手。”^①当时帝制派借开党禁为名，运动大赦。6月9日，梁又电请北京熊希龄、徐佛苏等转告段祺瑞，“闻有赦帝制祸首明令，时论哗然，恐增口实激大变，虽未得严惩，亦岂可于人心惶惑时，更姑息以危国本”^②。这就是说，在“惩”、“赦”祸首问题上，要识时机，决不能在“人心惶惑时”谈大赦。这表明梁启超在惩凶问题上开始退却。此后，梁启超在各种电文中，一面提出“惩治祸首”，同时又为段祺瑞庇凶进行开脱，“逆党无惩办消息，海上事杂言庞，折衷不易，以超观察，段无恶意，惟所处既艰，恐被劫持”^③。至6月19日，他在致西南的电报中又退了一步，“又惩祸首问题，中央极迟疑，即吾辈亦非乐强以所难。但此事若不趁此时急办，以塞民怨，则国会开后，必为第一激烈之议案，其时依法律解决，更无通融余地，且牵连不知所届，大局或陷极险。昨冯商拟以行政处分将十三人褫职，永不录用，似亦折衷缓和之一法”，又希望蔡锷以私谊劝段“速断”^④。由此可见，梁启超与冯国璋商定的惩凶方案并不想使段祺瑞为难，只是想及早办理，“以塞民怨”，不必“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只要求将十三人革职，“永不录用”就行了。

梁启超为段祺瑞的种种开脱及提出的折衷方案，表现了对段的极大妥协。段祺瑞在得悉梁启超的折衷办法后，得寸进尺，为帝制祸首大开绿灯。北京政府在研究这批祸首名单之时，首先袁克定由彰德打来急电，为雷震春、张镇芳乞情；随后冯国璋为段芝贵乞情；李经羲又力保严复、刘师培，说他们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又有人说李燮和、胡瑛为老同盟会会员，不宜列为祸首；袁

① 《致黎大总统电》（6月8日上海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54页。

② 《致熊秉三、蹇季常、徐佛苏电》（6月9日上海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55页。

③ 《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6月11日上海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56页。

④ 《致刘都督电》（6月19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61页。

乃宽因与袁世凯有同族之谊，亦可免究。这样，“六君子”剩下“两君子”，“七凶”剩下“三凶”，合起来“十三太保”只剩下杨度、孙毓筠、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这“五太保”了。当时，还有人替梁士诒乞情，说他与银行界有密切关系，留着他可为政府筹款。由于黎元洪的反对，梁士诒未被免除。

由于祸首的人数越研究越少，段祺瑞自己也觉得交代不下，才又补进了并非重要的顾颉、夏寿田、薛大可三人。7月14日，以大总统黎元洪名义发布惩办变更国体祸首的申令，“杨度、孙毓筠、顾颉、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均着拿交法庭，详确讯鞠，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律宽免”。这申令不过徒具形式掩人耳目而已，早在惩办令发布前，北京政府已暗示榜上有名的人赶快离开北京。因此，杨度、梁士诒、孙毓筠等从容不迫地由北京搬到天津。有的祸首从天津南下到上海、香港一带，有的被张勋召往徐州礼为上宾。北京法庭没有捉到一个祸首，在北京的各军警和侦察机关也从来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缉捕。至于被宽免的洪宪忠臣、帝制健将等，不仅逍遥法外，而且继续从事颠覆民国的阴谋活动。

尽管北京政府只下了一道“通而不缉”的命令，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西南方面也认为问题得到解决，护国任务已经胜利完成，立即宣布撤废军务院。

撤废军务院及中华革命军改编

《军务院组织条例》第十条中写明：“军务院俟正式国务院成立时撤废之。”袁世凯刚一倒台，浙江都督吕公望就提出了撤销军务院问题。6月10日，云南唐继尧提出撤废军务院之要求：“一、旧约法；二、国会；三、撤兵；四、在沪开军事会议。并声明军务院俟国院正式成立时取消。”此是公电，惟另有让步办法，“但使约法规复后，芝老（段祺瑞）重组临时新阁，阁员得军院同意亦可先行撤销”等等。梁启超完全同意唐继尧早日撤院的主张，遂立即致电北京蹇季常、黄溯初（梁启超派往北京之代表），嘱其与当局交涉，南方深谅“新阁员组织之艰”，“必不过为挑剔”^①。这就是向段祺

^① 《致蹇季常电》（6月14日上海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58页。

瑞示意，只要他出任组阁，南方即可撤废军务院。此后，梁启超即以唐继尧提出早日废院为借口，积极与独立各省电商：“诚如莫公所言，若此机关久存，非惟我辈倡义本心不能自白，且恐有人假借名号，生事怙乱，将来反动之结果，转助复辟派张目，此最可忧。鄙意宜各省联名……迳电中央，请以名令改组国务院，任员署理，军务院即行宣告撤废。”^①

6月29日，段祺瑞任国务院总理后，梁启超于7月1日即致电各都督各总司令，“顷已奉明令，复约法，召国会，任段芝泉组新阁，我辈要求已达，军务院宜立即宣言撤废”^②。“今犹不撤，则太不为黄陂留地步，中外疑骇，危险万端”^③，“与其对峙增猜，不若统一协议”^④。当时，一部分人反对梁启超立即撤废军务院的主张，认为“帝制余孽盘亘中央，元首等予赘旒，国会受其蹂躏，不应袭政客之浮谈，作和平之甘语，以长天下惰情，请暂缓撤销”^⑤。持这种论点的人，对当时北京政局的看法是比较清醒的，对段祺瑞继续推行袁世凯的政策大失所望，因此，提出保留军务院，“以此窘毙中央”，或者“留此为交换条件”，至少应按军务院组织条例之规定，俟“正式阁成，始撤军务院”。但是，梁启超认为南方独立各省困难较多，“各省各军皆无见粮，捐借之路两绝，非与政府协商，曷由接济结束，而政府仰屋，亦同于我，终不能不乞灵外债，南北不统一，外债决无成立之望”，且南北之间“开诚协商较易，对抗要求或较难”^⑥，连续电催唐继尧及早宣布撤废。

袁世凯死后，各种矛盾同时爆发。有南北之间的矛盾，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段、黎之间的矛盾，独立各省之间的矛盾也相继出

① 《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6月28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69页。

② 《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71页。

③ 《致陆陈两都督电》（7月2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74页。

④ 《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7月24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85页。

⑤ 《军务院撤销之内幕》，见《护国军纪事》第五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61～62页。

⑥ 《致岑都司令电》（7月4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74～75页。

现。当袁世凯取消帝制之时，即诱骗南方取消独立，那时因梁启超曾深受袁世凯专制之害，坚决反对袁世凯继任总统，把反袁护国战争进行到底。但当段祺瑞被迫同意恢复《临时约法》之后，梁对段祺瑞继承袁世凯封建专制衣钵的真实面目缺乏认识，反而认为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此公若挤去，北军人人自危，大局将不可问。”只要段祺瑞出山组阁，“万事愿与协商，俟内阁改组后，必力为拥护”。由此可见，梁对段又寄予无限希望，并准备对段作最大限度的妥协与支持。但是，段祺瑞对独立各省则采取拉拢、分化、打击与欺骗的手法，以尽早搞垮军务院。6月7日，陕西都督陈树藩取消独立，段则立即委为汉武将军；以示拉拢。6月8日，四川都督陈宦取消独立，以讨好新总统黎元洪，但却遭到段祺瑞唆使周骏攻陈。6月9日，广东都督龙济光取消独立投靠段祺瑞，段立即派他兼任广东巡按使以酬其功，达到他分化西南的目的。这样，独立之八省就只剩下五省了，且南方内部“汲汲倾轧，真乃以国为戏”。军务院之根基已经动摇。当时梁启超面对这种情况，亦无可奈何，“近睹人欲横流之象，深恐元二年覆辙复见”，首义诸公相互倾轧，担心护国战争的胜利果实又会被袁世凯式的人物所窃取。目前，既无力回天，只好“蓄力观变”^①，将护国战争结束为好。同时，段祺瑞抓住梁启超之弱点，速电南方“取消独立”。梁启超经过“飞电”与独立各省联系，又代拟撤军务院之布告，唐继尧在梁启超的一再催逼下，终于7月14日，在北方申令惩办祸首的同一日，南方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陆荣廷、蔡锷、李烈钧、刘显世、陈炳焜、吕公望、戴戡、李鼎新^②、罗佩金、刘存厚等宣布撤销军务院通告中外电。电文说：“今约法既复，国务总理既特任，虽阁员未经国会通过，然当国会闭会时，元首先任命以俟追认，实为约法所不禁。现国务院既依约法而成，与本院组织条例所指正合。今大总统之依法继任，既符独立各省最初之宣言，政府国会次第成立，允为全国人

① 《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6月30日上海发），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70页。

② 军务院海军总司令。

民心理所同愜。本军务院谨依组织条例于本日宣告撤废，其抚军及政务委员长外交专使军事代表等名目，一并消除，国家一切政务，静听元首政府国会主持。为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云云。”^①至此，段祺瑞未费丝毫气力，就统一了全国。梁启超以为，“约法既复，国会既开，南方军务院即同时撤销^②，余此次经手事业亦完结矣”，并断言今后“我国之共和政治必日趋巩固”^③。其实，军务院将政权移交给北洋军阀，与民国元年交权给袁世凯颇有相似之处，打倒了一个封建专制的代表，又将政权垂手交给另一个封建专制的代表。

袁世凯暴死后，孙中山于6月9日发表规复约法宣言，认为：“规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则唯一无二之方，无所用其踌躇者。”进而指出：“于此时期，而犹有怙私怀伪不顾大局之流者，则国人疾之，亦将如疾袁氏。”并再次表示：“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不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④同时，他对上海报界发表对时局之意见说：对“未独立各省之执政者与乎伪内阁之人物”，在“彼等苟非今后表示其爱国护法尊重民意之真诚”前，“则予不敢信其忠于人民”。“倘各执政者皆能表示其诚意之所在，则予愿与国民共助之；倘不然者，则予愿奋起而与国民同尽挾伐之责。”^⑤孙中山看到了段祺瑞“伪内阁”并无“诚意拥护共和”，但是又说，

① 《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71页。

② 关于提前裁撤军务院的问题，当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和评价。《护国军纪事》第五期所载之《军务院设立始末》一文中说，撤销军务院之通告发布后，“南中领袖人物颇骇愕，以列名电中抚军多有事前未及备知，故一时舆论所以奉梁氏以阴谋家之徽号也。梁氏声望之顿落者以此”。而吴贯因在《丙辰从军日记》（7月20日）中说：“黎公正位以后，所谓惩办罪魁也，恢复旧约法也，召集旧国会也，撤去龙济光也，凡护国军方面所提议者，北京政府一皆降心以相从，军务院既终当取消，则提前裁撤，以示交相让步，顾全大局之意，此正公忠体国之所为，宁有不合。且惩办罪魁，恢复约法，召集国会，撤退孽龙等事，欲使总统命令有效，必有阁员副署，苟以军务院与之对抗，而不认现国务院为合法之机关，则其所副署之命令，安能发生效力。诚如是也，则各种问题奚从解决，故军务院之取消，诸抚军不特忠于谋国，亦见理甚明，丝毫不得置议也。”

③ 《护国战争躬历谈》，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46～147页。

④ 《民国日报》，1916年6月9日。

⑤ 《民国日报》，1916年6月6日。

只要他表示“爱国护法，尊重民意”，也就可以信赖了。同时，黄兴也致电黎元洪，主张以明令规复约法，从速召开国会，惩办帝制祸首。孙中山与黄兴共同确定了“黎能复约法，召国会，当消纷争，事建设，以始信义，固国本”^①。从此，把希望寄托在黎元洪身上，准备停止纷争。从6月9日起，孙中山连电山东居正、广东朱执信、福建革命军、四川石青阳、山东吴大洲和薄子明等，告以袁死后，政局变化，应各“按兵勿动”，俟与黎元洪协商解决^②。当时，段祺瑞仍坚持袁世凯的政策，推行新约法。孙中山针对这一情况，在与上海《民意报》主持人徐朗西谈话时指出：“目下时局，当难骤言容易解决。因袁党依然盘踞要津；国会议员尚未正式集会；完全责任内阁又未成立；斯时之民军，正未能从此息肩，而即云国是已大定也。”并在《致广东、山东、福建诸军电》文中说：“不过请其暂时停止进行，息肩一层尚未易语及。”^③这就是说，如果不恢复旧约法、国会及责任内阁，中华革命军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段祺瑞从袁世凯那里学来一套善于作伪的伎俩，为了诱使民军放下武器，他赞成恢复旧约法及国会。7月8日，黄兴回到上海。从此，孙、黄重申“共和国体”，“主权在民”，把希望寄托在国会之召开上。希望议员们“无所畏避”，为民造福，“国民深受民权之庇护，识其为无上之光荣，则必出死力以卫民权”，数年后，“有一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大陆，驾诸世界共和之上矣”^④。孙中山在这种对未来充满盲目乐观的情绪下，于7月25日指示中华革命党通告国内外各支分部：“袁贼自毙，黎大总统依法统就职”，“推翻专制，重造民国”，目的已达，各省革命军停止军事行动^⑤。8月5日，居正、吴大洲所派代表与山东将军张怀芝的代表共同商定，中华革命军与山东护国军改编。不久，部分首领被杀、被囚，其余民军也被逐步解散了。山东讨袁

① 《民国日报》，1916年6月14日。

②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3集，“文电”，第23页。

③ 《总理遗教谈话》，见《孙中山年谱》，第195页。

④ 《民国日报》，1916年7月16日。

⑤ 《民意报》，1916年8月1日。

军遭到十分不幸的结局。

军务院的过早撤废及革命军的被瓦解，意味着重造的民国仍然只是一个空洞的招牌而已。

善 后

撤废军务院及山东革命军的改编，标志着护国战争的结束。“统一之形既成，善后乃可着手。”^①在处理善后问题上，唐继尧等都督电催梁启超和唐绍仪为南方代表与北方共商善后。梁认为南方各省共同之要求不外约法、国会数端，现在目的已达，更无协议之必要，各省军政财政善后，亦应由各省直接与中央接洽。梁启超坚持不同意派总代表，更不望推他为代表。但有关护国战争善后事宜，他又不能弃而不管，“闭门避地等说，实行固非易，即为良心计，为自卫计，日益感觉其不可，盖自身既有首尾未清之事，终不能一刀两断”^②，还应该负责到底。

广东龙济光假独立后，仍与袁世凯及其继承者段祺瑞保持密切联系，并与护国军及民军明争暗斗。当李烈钧率领张开儒、方声涛两梯团进兵江西时，龙济光拒绝李烈钧路过广州。6月7日，张开儒梯团到达韶关时，龙电令韶关镇守使朱福全闭城不纳，并炮轰护国军，爆发了江北战争。6月9日，龙济光未经军务院同意又擅自取消独立。龙的一系列反动行为，激起广东护国军及民军的强烈不满，“龙济光之残暴，粤人愿与偕亡”^③。李烈钧军进逼广州，军民一致要求驱逐龙济光。梁启超在处理广东善后问题上，曾数次与冯国璋联系，设法把龙济光调出广东，给他弄一个“云贵两广林矿名义”^④，梁主张“合力驱除”^⑤，并建议北京政府任陆荣廷督粤，非

① 《致各都督电》（7月7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79页。

② 《致蹇季常书》（7月27日），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98页。

③ 《章太炎请除遗孽电》，见《护国军纪事》第五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30页。

④ 《致冯上将军电》（7月1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71页。

⑤ 《致岑都司令电》（7月4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75页。

干公不能统驭彼旧部而安其反侧。段祺瑞初则以种种借口欲留龙督粤，后来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于7月6日任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①为广东省长，调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同时又任命陆荣廷暂署湖南督军，陆未到广东以前，仍由龙暂署广东督军。段祺瑞的这些任命，企图把陆拴在湖南，使龙仍赖在广东。此后又调兵遣将企图援助龙济光，使龙继续督粤。为了打破段、龙图粤的阴谋，促陆离湘赴粤，7月7日、8日梁启超又连电陆荣廷，说明发表陆督粤，“事前未求同意，纯为救粤急起见，万无误会。干公若辞，龙必借口恋栈，为困兽之斗，粤必糜乱”。若有困难，“亦必先接任以渡此难关，徐图举贤自代。全粤安危，系公一诺，谨百拜请命”，“万勿推辞”，“即日由湘返旆，以苏粤民”^②。7月10日，陆荣廷由衡州班师回桂，8月18日，至肇庆就任广东督军职，终于把龙济光赶到海南岛就任两广矿务督办职去了。

当陆荣廷将抵达肇庆之前，8月17日，李烈钧通电解除职务，在粤滇军由张开儒、方声涛两师长直接统辖。8月22日，李烈钧军与滇军告别，27日到肇庆会晤陆荣廷后，取道香港赴上海。李烈钧自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后，率滇军从昆明向滇桂边境进发，在百色、剥隘之役中痛击龙觐光军。广西独立后，又率军直下广东肇庆，在北伐途中的江北战争中，迫使龙济光军纳关投降，接着回师南下，指向广州，大败龙军，并与桂军莫荣新紧密配合，迫龙退回广州困守。7月19日，梁启超在《复大总统国务卿电》中说“李烈钧劳苦功高”，“似宜优加倚畀，竟其贤劳”^③。可是梁并未提出给李安排应得之职务，致使李未能分享胜利的成果。在此之后，护国军各都督各总司令都得到北京政府的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唐继尧为云南督军，任可澄为云南省长，刘显世为贵州督

① 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也作梓侨，浙江绍兴人。先在奉天督练公所巡警总局任职，复调四川巡警道。1909年任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统领。1911年升暂编陆军第十七镇统制、四川副都督。1912年后历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民政长，加镇安右将军衔，署黑龙江巡按使、黑龙江护军使。1915年9月列名段芝贵联合十四省将军通电拥护袁世凯“速正大位”，12月被封为一等子爵。

② 《致陈陆两都督电》(7月7日、7月8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79～80页。

③ 《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84页。

军，戴戡为贵州省长，陆荣廷为广东督军，陈炳焜为广西督军，罗佩金为广西省长，李根源为陕西省长，陈宦为湖南督军。以李烈钧之军功，理应安排为广东督军。但北京在任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的同时，仅令李烈钧调北京“另有任用”。郅孔昭在《云南讨袁护国第二军入桂粤亲历记》中说：李烈钧“以国民党员故遭多方忌，尤以龙济光嫉其为赣籍非滇籍，不肯移交事权，所以不得志”。“李烈钧在告别讨袁护国第二军将士时，率全军驻广州部属祭黄花岗烈士于荒烟蔓草中”^①，向辛亥革命烈士表白自己无愧于民主共和的忠心，怀着无限愤慨、无限不平的心情，离别了护国军战士。

四川方面，早在陈宦宣布独立时，袁世凯即提升川军第一师长、重庆镇守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唆使他进攻成都，驱逐陈宦。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又授意北洋军驻川统帅曹錕暗中支持周骏，攻下成都。陈宦被迫向周乞和，6月26日离开成都东下，冯玉祥也脱离陈宦领导北上陕西。与此同时，蔡锷率领护国军熊克武、刘存厚所部进攻周骏，30日攻下成都，周骏逃走。梁启超为了控有一省地盘及相当兵力，作为与北京周旋的后盾，积极运动蔡锷督川。北京政府乃于6月24日发表命令以蔡锷督理四川军务。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之喉病起自去冬出京以前，因戎马倥偬，迄无治疗之余裕。至6月中旬，“喉痛日剧，殊痛楚，几乎不能发音”^②。6月28日，蔡锷由永宁启程，29日抵大洲驿，7月1日抵泸州。他在泸州接到北京政府任命他为四川督军和省长的公报。此时，他喉肿更甚，饮食难进，体温高达三十九度，无法支持工作。他一再致电梁启超，“请乞假数月”，川督之事，请罗佩金“暂行护理”^③，“查成都公、私款项，经陈督及周、王两次搜刮，硬、软两货均为一空。现本军

^①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316页。

^② 《复梁启超电》（1916年6月21日），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05页。

^③ 《致梁启超电》（1916年7月11日），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11页。

入蓉，为维持救济计，需用甚急。拟请迅商沪中行交款三十万于天顺祥克期汇蓉，以应眉急，不胜盼祷”^①。

为了处理四川善后，梁启超致电中央，详陈蔡锷率兵入川经费、物资之困苦情况，“今大局既定”，应付之“恤赏”、“欠饷”及“息借商民贷款”，“均非由锷负责办清，无以安众心而全信用，职上所需各款，共计在三百万内外”，“请中央速筹发”。又松坡“以久病之身，亟患结束引退，以图疗养”^②。梁启超又将上述电文之内容致冯国璋，请冯代转中央，速予拨款，“又中央或筹措尚艰，更请公从各方面代为设法，凑垫成数，俾解眉急”。蔡锷“初出滇境，仅持两月饷，以后一无接济，今谋善后，仅需三百万，严正坚卓之操宜鬼神所同欤。今以久病速请息肩，若政府不急为筹维，真足令天下短气”，望冯国璋“力为援助”^③。

北京政府接到蔡的辞职电，认为是一种表面文章，因此于7月19日批准给假一月，叫他“就近调养”，并令罗佩金护理四川督军兼省长。7月21日，蔡由泸州启程往成都，29日抵达。但他由于一则病情严重，二则感到四川难治，不愿留蜀，继续向北京请假辞职。8月9日，北京政府批准给假两月，并改派戴戡会办四川军务。就在北京政府准假的同一天，蔡偕蒋方震^④等由成都出发，经过重庆稍作逗留，即换乘轮船下驶。蔡锷在成都仅停留十天，因重病在身，竟匆匆东下，更无法整治四川，来不及处理善后。

蔡锷在宜昌会见了从四川逃出来的陈宦。此时陈宦辞去湖南督军新职，又把他统率的相当于一个师的北洋军在宜昌解散。从此，

① 《致梁启超电》（1916年7月22日），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15页。

② 《致黎大总统段总理陈总长电》（7月1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72页。

③ 《致冯上将军电》（7月1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73页。

④ 蒋方震（1882—1938），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清末被选派留学日本。入成城学校习军事，在梁启超帮助下，进入士官学校第三期，与蔡锷同学。毕业后赴德国见习。归国后在北京南苑禁卫军中任管带。辛亥革命时，曾往东北活动。1912年冬，以陆军少将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至广州，任两广都司令部出师计划股主任。不久，去四川助蔡锷。蒋为杰出军事家，当蔡离川时，本欲留蒋在川掌握一定军权，但蒋坚持请伴蔡锷赴日就医。

陈宦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8月26日，蔡锷乘大元商轮抵达汉口，湖北督军王占元早已派有许多兵轮以热烈欢迎蔡锷为名，包围了大元商轮，如果在船中发现烟土，即以贩毒犯捉拿蔡锷。这是段祺瑞北洋军阀的又一毒辣手段。以前蔡锷由北京脱险至云南，沿途遭到过多少次危险，而此次在从四川到上海的途中又仍然极不平安。因此8月28日到上海后，他就隐藏起来，仅与梁启超、黄兴等人会见，互道劳苦。梁启超说：“他到上海时候，我会着他，几乎连面目也认不清楚，喉咙哑到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都看着这病是不能救了。”^①蔡锷又一次向北京政府辞职请求“东渡养病”。段祺瑞电请梁启超转劝蔡到北京西山疗养，不必远渡日本。但蔡坚持不同意去北京，以免又受软禁。北京政府只得继续给假三月，派罗佩金署理四川督军，戴戡署理四川省长仍兼会办军务，并以熊克武为重庆镇守使。9月9日，蔡锷自上海动身赴日本就医时，黄兴亲往码头相送，忍泪告别。不久，黄兴因操劳过度，胃部出血，治疗无效，于10月31日在上海逝世。11月8日，为护国战争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另一位陆军上将、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在日本福岡九州医院与世长辞。为保卫民主共和而英勇战斗的领袖黄兴、蔡锷的相继去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巨大损失，他们的英名永垂青史。

梁启超对他们的善后事宜，分别作了一些交代与处理。在离开肇庆返上海时，都司令部曾拨给六千元，“充东游及此间同人通电之费”。因考虑到“公款至艰，未敢滥用”，此款仍交都司令部处理^②。7月15日，梁启超通电表彰众议院副议长陈国祥等人之“首义功绩”。电文说，戴戡、王伯群由滇黔入京，与蔡锷、梁启超、蹇季常、汤觉顿、徐佛苏等多次密商于陈宅，此后“与滇黔通电，多赖陈君斡旋，蔡、戴南下各事，应赖陈君料理，起义后京中消息，全赖蹇、陈两君随时详报，俾滇黔得以防维应付，其贤劳坚

^① 《护国之役回顾谈》，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97页。

^② 《致岑西林电》（7月17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83页。

卓，视从军未遑多让”。又众议院议长王家襄，于帝制发生后，与蹇季常、陈国祥、梁善济在北京任“侦探”，“同历艰苦”^①，为护国战争立下功劳，应予表彰。对“死事诸贤”，“阵亡将校”，请大总统国务卿“飭各军元帅从速册报”。如中国银行总裁汤觉顿、陆军少将谭学夔、广东警察厅厅长王广龄等，“皆一时俊彦，为国捐躯，似宜优加表恤，以慰忠魂”^②。

军务院的撤销，标志着护国战争的结束。

二、护国战争与梁启超

护国战争是民主共和与封建专制矛盾发展日益尖锐的必然结果。矢志追求民主宪政的梁启超，在孙中山、黄兴侨居海外无法继续领导反对封建复辟斗争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发动和领导了这场维护民主制度、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武装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壮举。它推翻了洪宪帝制，将袁世凯送进了坟墓，维护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恢复了《临时约法》及共和制度，在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是梁启超一生政治生活中最为瑰丽多彩的篇章。如果说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理论家、君主立宪派康有为的热忱追随者及助手，为变法增添了光辉，那么，在护国战争时期，他却成为“忍背师门，当仁不让。立谨民国，见义能为”^③的英雄，彻底与康有为决裂，为保卫民主共和制度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绝不是投机取巧抢夺了护国战争的领导权，而是不顾生死、当仁不让、勇敢地承担了领导护国战争的义务。所以章太炎在给梁启超盖棺论定的挽联中写道：“逮梟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④

孙中山对护国战争及梁启超曾作过高度的客观评价。他说，云南起义“与黄花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

① 《通电》（7月15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82页。

② 《复大总统国务卿电》（7月19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84页。

③ 王文儒给梁启超挽联，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10页。

④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10页。

轻，充分表露了中华民族之正气”^①。他在《建国方略》中说，袁世凯称帝后，“所幸革命之元气未消，新旧两派皆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而民国乃得中兴”^②。1916年6月上旬，孙中山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谈话时对护国战争的参与者也作过客观的评价。他说，对于“起义各省之执政者”，可“信其诚意拥护共和”^③。这里所说的“各省之执政者”，当然也包括梁启超，相信梁是“诚意拥护共和”的。事实证明，袁世凯从解散国会踢开政党起，民主与专制的矛盾，梁、袁矛盾与日俱增。从《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到《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辟复辟论》以及坚持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梁启超揭露和反对了两种复辟派，坚定不移地保卫了民主共和制度，说他是真诚拥护共和的，这是公正的结论。

梁启超不仅是护国战争的军师，而且是最高指挥者，诸如战争的战略战术、财政筹划、官兵思想、组织宣传、对外方针等，事无巨细，无不运筹帷幄。而前线蔡锷、唐继尧、刘显世各都督各总司令无不依赖梁启超之决策及指挥。梁启超还是护国战争胜利的推进者，在泸纳血战总攻受挫，前线官兵士气不振的关键时刻，他一面致书蔡锷，激发将士的爱国热忱，鼓舞士气；一面偷渡香港、越南，从军广西，推动陆荣廷宣布独立。因此，护国战争的局面为之一新，迫使袁世凯立即撤销承认帝制案，推动了护国战争的节节胜利。在军事胜利的同时，梁启超利用北洋军阀内部的一切矛盾和缝隙，争取了可以暂时争取的包括段祺瑞在内的一切反袁力量，结成了广泛的反袁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袁世凯。同时，梁启超更利用犀利的笔锋，对袁世凯进行层层解剖，刺向他的心脏。袁世凯站立不住，终于倒下了。

护国战争获胜的功劳，首推蔡锷。正是由于蔡锷在云贵诸军中有崇高声望，团结各派势力，发动了云南起义。他不顾个人身患重病，克服蜀道崎岖的重重困难，弹粮俱缺，敌众我寡，依靠他艰苦卓绝的革命意志及雷厉风行的卓越指挥，立下了赫赫战功，使他几乎成了护国战争的代名词，后人言及护国战争必称蔡锷，这是合乎

① 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载《传记文学》，第14卷第2期、第3期。

②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3页。

③ 《民国日报》，1916年6月6日。

情理的。如果没有蔡锷以武力为后盾，仅凭梁启超的运筹策划和唇枪笔剑是不可能打败袁世凯的。梁启超说，“和平保证惟恃武力”，这是他二十余年坎坷政治生涯的科学总结，是对政治学原理中战争与和平关系的精辟总结。蔡锷、李烈钧等人在战场上所取得的胜利，是推倒袁世凯的保证。但是，蔡锷等人在前线取得的胜利，又与梁启超的运筹指挥有着密切的关系。当袁世凯撤销帝制案并推行全线停战阴谋时，包括蔡锷在内，都曾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梁启超及时指出，一律停战正中袁计，坚持“实力发展一分，则条件有利一分”的方针，得寸则寸，得尺则尺。梁启超及时正确的指挥，挫败了袁世凯的阴谋，使护国军前线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护国战争胜利的取得，蔡锷的武力推进成为胜利的保证，梁启超的正确指挥又成为取得胜利的关键。所以蔡元培在给梁启超的挽联中说：“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①而梁启超则说，护国战争的“成功，原来是全国心理所造成，并不是一部分几个人之力”^②。这种认识更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但是，梁启超顺应了全国人民对袁世凯称帝的普天同愤的心情，勇敢地领导了护国战争，其功绩亦应名垂史册。

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梁启超，在与封建买办势力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同样存在着软弱性与妥协性。军务院的成立，使护国战争的发展达到顶峰，使反袁势力有了团结的中枢，有效地利用军务院可以使护国战争取得更大的胜利。以梁启超离粤返沪居丧不出为转机，加上袁世凯的突然死亡，梁启超认为护国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决定早日收场。加上新的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采取袁世凯窃国的同样手法，虚伪地同意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欺骗了梁启超及许多追求民主共和的善良人士。同时，梁启超也感到军事实力及财力之不足，无法彻底战胜封建军阀势力，因此，迫不及待地过早地撤废了军务院。这样，就使议员们失去组织正式内阁的发言权，不能使护国战争取得彻底的胜利。

造成军务院过早撤废的思想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09页。

② 《护国之役回顾谈》，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87页。

幼稚性。他们没有认识到只有牢牢地掌握已经掌握的部分政权，努力争取夺得更多的政权，才是巩固和扩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根本保证。一切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他们反对袁世凯是为了争权夺利，而他们却以某些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和天真，一再发表声明不为权位，功成身退，这几乎成为梁启超一派人物的思想倾向。梁启超、蔡锷早已发誓：功成身退，决不在朝。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多次宣布“袁朝倒超夕退，此志如山，不能动摇”^①。蔡锷则说：“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②岑春煊宣布退隐，黄兴亦拒绝出任。山东护国军代表张鲁泉说：“吾辈志士以舍身护国为前提，绝不作争权争利之丑态。”^③

梁启超抱定“决不立朝”的宗旨，更是由于他们在历次政治斗争中都败下阵来，由失败、灰心以至退却。袁世凯死后，徐佛苏、范源廉等主张梁启超积极从政，甚至有人要求梁出来组阁。当时，张勋纠集奉、吉、黑、直、豫、晋、皖等省旧势力，在徐州开会，公然发出巩固北洋团体以对抗西南各省及国会的狂妄叫嚣，并且提出尊重清室，推崇袁前总统的各项荒谬主张。梁启超手无军权，蔡锷病在垂危，西南唐、陆等人也不一定再听他的指挥。面对这种情况，梁认为，“现在投身旋涡，危险无匹，此非爱惜羽毛之谓，古人称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明知必败，而甘作数月之牺牲，以臻永远之资望”，何必“作重茧以自缚”^④，自取灭亡，因此决心弃政从教。“觉今后报国之途，与其用所短以劳形于政治，毋宁用所长献身于教育。”^⑤“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功夫”，增进“人民政治常识”

① 《致张佩严书》（1916年6月19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61页。

② 《致唐继尧刘显世等电》（1916年7月19日），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13页。

③ 《周维独立记》，载《护国军纪事》第五期，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第122页。

④ 《致与庐诸贤书》（1916年9月13日），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第499页。

⑤ 《复黎大总统电》，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78页。

和“政治能力”，以便确立“宪政基础”^①。

三、民国安在

梁启超虽然宣布弃政从教，但他作为历史前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想完全摆脱政治是不可能的。正如他自己所说：“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骤然完全脱离，原属不可能之事。但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治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不可少。”二十余年来，他奔走呼号，追求宪政，历尽艰辛。君主立宪的方案破产后，满以为在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下可以实现政党政治，实现宪政，而希望再次破灭。护国战争胜利，国会于1916年8月1日重新开会后，梁启超首先关心的是制宪问题。他说：“此次国会之恢复，实以无量数人之血换来，国人曷为甘出此极重之代价，凡欲求产出善良之宪法，为国命民命之永远保障耳。苟宪法终不能产出，则议员终何以谢天下。”因此，他希望国会集中精力完成这一“重要任务”^②。为了制定一个合于国情的宪法，梁启超与原进步党人汤化龙、王家襄、林长民等于9月13日成立宪法研究会。但是，当时既有张勋召集第二次徐州会议对抗国会，叫嚣废止约法，又有段祺瑞排挤国民党及西南人物。北京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等，全面爆发。原国民党、进步党内部都四分五裂，国会内部又争斗不停。面对这种情况，如何能制定一套“善良之宪法”呢？！结果，国会除了通过段祺瑞内阁同意案，即承认段祺瑞内阁为合法外，一无所成。梁启超追求宪政，终于只停留在善良的愿望上，停留在学究的研究之上。这是由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现实所决定的。

梁启超摆脱政务后，总结以往之教训，开始有了新的觉悟，对未来充满了新的希望。他回顾往事，感受最深之教训，莫过于两党之关系。“盖数年来政局经数度之翻覆，我国人实领得一种最良而

① 《与报馆记者谈话》，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32～133页。

② 《与报馆记者谈话二》（8月16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35页。

最切之教训。此教训为何？曰：凡政治之作用，当容许异种之势力同时并存，且使各得相当合法之发展机会，此不磨之原则也。若强违反此原则，一种势力伸张过度，而使异己之势力感压迫而起恐慌，甚或滥用势力以图磨灭异己之势力，则其结果必反动而遭自灭。此种教训，当同盟会全盛时代一领得之，当袁世凯全盛时代再领得之。现在国中凡与政治有关系之人，皆饱受此种教训而悟得一原则，若能各方面常常提醒，制其血气之勇，则政治之进入轨道，当不难也。”^① 也就是说，一定要两党并存，如果一党攻倒了另一党，自己也无法存在。袁世凯全盛时，进步党帮助袁世凯压倒了国民党，结果进步党势孤力单，又被袁世凯踢开。因此，他认为在两党斗争中应相互克制，适可而止。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党政治得到正常之发展。梁启超这种认识的提高，是他多年来政治生活教训的总结，也是政党政治应有的准则。但是，准则毕竟不是现实，在实际生活中，在护国战争期间，他并没有直接和孙中山发生联系，进步党人对中华革命党人亦不免有排挤之嫌。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北洋军阀及帝国主义的收买、拉拢及分裂割据的局面，使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异常复杂，护国战争结束后，资产阶级的各个政党更加分崩离析，互相倾轧不已。

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梁启超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对未来提出了新的希望。

梁启超在研究了中国近代历史后指出，近“五十年的中国，最进化的便是政治”，“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国民政治进化的自觉意识，“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扩大”。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由于这两种精神的力量，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了民国。辛亥革命时，“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样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样狡猾，

^① 《与报馆记者谈话一》（8月10日），见《盾鼻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34页。

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①。袁世凯帝制复辟被推翻，也清楚地说明，今日中国之政治，谁要想“恢复帝制，此其不可能者也”。他相信民主政治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但是，他又认为在“当时”“此地”的情况下，马上实行美国式的民主亦不可能。目前，“举国呻吟憔悴”之污浊政治，“可能使少数优秀者觉悟，克服袁世凯之游魂，在‘半保育的’政策之下，历若干年，成立多数政治”^②。

严格地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力量独立地支配历史的命运，不是依靠封建势力，就是依靠人民大众。梁启超总结政治生活的教训，他发现自己过去依靠光绪，依靠袁世凯之流是一种罪恶。他说：“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个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③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沉痛地讲到：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全国人民包括他的几位“最亲爱的朋友”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想要换来“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如今生命是送了，中华民国却怎样？民国安在？‘袁世凯的游魂，现在仍然在国内纵横猖獗。’‘国家元气，斫丧得干干净净。’不禁伤心之至。他说：‘像我这个和他们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后要从那一条路把我这生命献给国家，才配做他们朋友。’^④他希望青年人以蔡锷为榜样，把蔡锷精神“变作千百万亿化身”，英勇奋斗，“将来当真造出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出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和

① 《五十年中国近代论》，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46页。

② 《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专集》（一），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122页。

③ 《外交软与内政软》，见《饮冰室文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7、59页。

④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见《饮冰室文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9、47页。

新青年的觉醒，梁启超相信“旧时代的游魂”“不久定要完全消灭”，“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①。“我很盼望最近的将来，有真正的国民运动出现，倘若有的话，我梁启超应该使役我的舌头和笔头来当个马前小卒。”^②

梁启超“迟中山主张革命”^③，但他能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前进，誓死为保卫共和制度而英勇战斗，是十分可贵的。他多次地犯过错误，但他沉痛地检讨自己与袁世凯之流共事的罪恶，愤而发动护国战争，并进而愿意做“真正的国民运动”的马前小卒。他从依靠皇帝、依靠权威，转而明确依靠国民群众，不能不说是他政治思想上的巨大转变。

① 《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87、97页。

② 《外交软与内政软》，见《饮冰室文集》，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37、59页。

③ 王文濡挽梁启超八联之四：“时势有难言，胜朝王运告终，与南海宗旨保皇，不妨后异。英雄所同见，洪宪盗名声讨，迟中山主张革命，反作先驱。”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10页。

附录1 护国战争大事日志

1912 年

- 1 月 1 日 孙中山于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 1 月 2 日 袁世凯复孙中山 12、29 日电，“国体尚待公决，未敢预闻临时政府事”；孙复电重申相让之意，“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论”。
- 1 月 3 日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各省代表会议通过孙中山提出的各部总长、次长任名单。
- 1 月 16 日 袁世凯密奏隆裕太后，力劝实行共和。
- 1 月 28 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举林森为议长。
- 2 月 11 日 袁世凯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赞成共和。
- 2 月 12 日 清帝溥仪宣告退位。清王朝统治结束。
- 2 月 13 日 ①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②梁士诒致电梁启超，请参酌法、美等国制度，撰划共和方案。
- 2 月 15 日 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 2 月 20 日 参议院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 2 月 23 日 ①梁启超自日本致书袁世凯，陈述财政设施及组织政党问题，并派汤觉顿面谒。
②袁世凯复梁启超贺他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电。
- 3 月 8 日 ①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凡七章五十六条。申明正式宪法产生前，其效力与宪法相等。规

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由国务总理副署。

②袁世凯电参议院，宣誓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誓告同胞。

- 3月10日 袁世凯在北京就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 3月11日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4月1日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莅临参议院辞职。
- 4月2日 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 4月5日 参议院议决本院移于北京。
- 4月21日 国务院成立。
- 4月23日 章炳麟于北京成立统一党。
- 5月1日 参议院改选议长，吴景濂、汤化龙为正、副议长。
- 5月7日 参议院议决国会采用两院制。
- 5月9日 共和党成立，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那彦图、程德全、伍廷芳等为理事。汤化龙、林长民、王揖唐、刘成禺等为干事。
- 6月25日 袁世凯电各省都督辟谣，重申不使君主政体重建于中国之宣言，谓自己决不为“拿破仑第一”。（时传袁将行帝制。）
- 6月29日 特任陆徵祥为国务总理。
- 8月10日 公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及筹备国会事务局官制。
- 8月25日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芝祥、王人文、吴景濂、张凤翔、贡桑纳尔布为理事（孙曾请辞）。胡汉民、柏文蔚、李烈钧、阎锡山、谭延闿等为参议。
- 9月3日 国民党理事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孙请宋教仁代理。）
- 9月22日 国务总理陆徵祥辞职。
- 9月25日 ①特任赵秉钧为国务总理。
②袁世凯经与孙中山、黄兴协商，并电询黎元洪，发表内政大纲八条。
- 10月4日 黄兴宣称赵秉钧及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

- 10月5日 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上演说，对袁世凯颇为推崇，国民党当以全力赞助。
- 10月8日 梁启超自日本神户抵天津。（今春以来，梁早有归国之意，经原立宪派人士多方联络疏通，与国民党、袁世凯达成谅解，乃成行。）
- 10月20日 梁启超抵北京，出席共和党欢迎会（旋任共和党理事）。
- 10月21日 梁启超出席报界欢迎会。
- 10月22日 梁启超出席民主党欢迎会。
- 10月27日 民主党成立，推汤化龙为干事长。
- 10月30日 梁启超出席国民党欢迎会。
- 11月1日 梁启超自北京返天津。
- 11月14日 杨度电黄兴，仍以取消政党内阁制为加入国民党条件。
- 11月26日 令各省都督民政长，凡有倡言革命，敢为国民公敌者，按法严办。
- 12月1日 《庸言》杂志在天津创刊。（初由梁启超任主编，进步党成立后，由吴贯因任主编，从1914年元月起，由黄远庸任主编。）

1913年

- 1月10日 下正式国会召集令，命所有当选之参众议员于本年三月内齐集北京。
- 2月24日 梁启超正式加入共和党。
- 3月8日 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南京发表演说，评论时政，主政党内阁、国会制宪、中央地方分权。
- 3月20日 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被刺，22日死亡。
- 3月25日 孙中山自日本长崎返国抵上海，即与黄兴、陈其美、居正等商“宋案”，孙主讨伐袁世凯，黄主法律解决。
- 4月×日 梁启超发表《暗杀之罪恶》，称宋教仁为第一流政治家，指责暗杀之罪。
- 4月8日 民国第一次国会开会，袁世凯在开幕词中宣言：“共和国家由于四万万人民心理所缔造，国家主权当归之

- 于国民全体。”
- 4月16日 克南京首功之林述庆在北京被害死。
- 4月26日 参议院选举张继、王正廷为正、副议长。
- 4月30日 ①汤化龙当选为众议院正议长。
②宣布善后大借款成立，以盐税为担保。
- 5月1日 ①国务总理赵秉钧称病辞职。以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
②陈国祥（共和党）当选为众议院副议长，张耀曾（国民党）当选为众议院议长。
- 5月5日 ①众议院否认善后大借款案。
②湘、赣、皖、粤四省都督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通电反对政府违法借款。
- 5月6日 袁世凯下“除暴安良令”。
- 5月15日 袁世凯撤销黄兴陆军上将职。
- 5月29日 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组成进步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那彦图、孙武、汤化龙、蒲殿俊、王印川等为理事。名誉理事有阿穆尔灵圭、张绍曾、冯国璋、周自齐、熊希龄、阎锡山、胡景翼、尹昌衡、蔡锷、朱瑞、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张凤翔、程德全、陈国祥、徐勤、庄蕴宽、汪大燮、陈昭常、齐耀琳、陈炯明等。
- 6月9日 袁世凯免江西都督李烈钧职，以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
- 7月12日 ①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
②宪法起草委员会于众议院开会成立，于天坛祈年殿起草宪法。起草委员60人，国民党与进步党人各半。
- 7月15日 黄兴入南京，迫都督程德全独立，称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 7月16日 黄兴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举岑春煊为讨袁军大元帅，李根源为讨袁军参谋长。
- 7月17日 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为都督。
- 7月18日 陈炯明在广东宣布独立。
- 7月20日 福建都督孙道仁从师长许崇智请，宣布独立。

- 7月22日 袁世凯宣布“讨伐令”。
- 7月24日 袁世凯撤去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
- 7月25日 ①湖南都督谭延闿宣布独立。
②袁军攻陷湖口，李烈钧败。
- 7月29日 黄兴自南京出走去日本，程德全宣布取消独立。
- 7月31日 袁世凯任进步党人熊希龄为国务总理。
- 8月4日 ①驻重庆师长熊克武宣布独立。
②陈炯明弃职出走，广东取消独立。
- 8月7日 胡万泰等取消安徽独立。
- 8月9日 福建取消独立。
- 8月10日 袁世凯以内乱罪，下令通缉参议院议员居正、胡秉柯，众议院议员杨时杰、田桐、胡瑛等。
- 8月13日 湖南都督谭延闿宣布取消独立。
- 8月18日 李纯军攻陷南昌。
- 8月×日 梁启超致袁世凯第一书，国民党“与闻”破坏者，“实什不得一二”，不要打击过多，以免国会无法召开。
- 9月1日 张勋攻陷南京，“二次革命”结束。
- 9月11日 熊希龄“名流内阁”（即进步党内阁）组成，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周自齐为交通总长，熊希龄兼财政总长。
- 9月23日 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天坛宪法大纲》十二条，采责任内阁制。
- 9月27日 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
- 9月28日 令蔡锷来京（蔡于“二次革命”时联合黔桂调停，遭袁世凯之忌），任命唐继尧署云南都督，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
- 9月×日 梁启超致袁世凯第二书，荐秦炳直为广东民政长，建议袁整顿吏治。
- 10月6日 袁世凯以军警包围国会，强迫国会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
- 10月15日 北京总检察厅通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谭人凤、张继、熊克武、钮永建、何海鸣、

- 廖仲恺、朱执信、邓铿等。
- 10月18日 令谭延闿入京“待罪”，命海军次长汤芑铭为湖南都督。
- 10月25日 袁世凯电各省军政长官，反对宪法草案。
- 10月26日 梁启超致袁世凯第三书，说有人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窃谓误天下必此言也”，建议对国民党议员采取收罗政策。
- 10月31日 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天坛宪法草案。
- 11月4日 ①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北京本部及各地国民党机关，并取消国民党籍之国会议员，被迫缴议员证书及徽章者百余人。
②袁世凯再电，指责宪法草案。
③蔡锷抵北京。
- 11月5日 ①国务院电各省派员至京，会议地方行政。
②袁世凯第二次追缴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证书及徽章（先后两次共438人）。
- 11月7日 梁启超、张謇谒袁世凯，商维持国会，主召集后补议员。
- 11月10日 宪法起草委员会自行解散。
- 11月12日 袁世凯政府取消各省议会国民党籍议员资格。
- 11月17日 众议院议员194人质问政府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及破坏国会。
- 11月23日 孔教会推举康有为为会长。
- 11月25日 唐继尧自贵州抵昆明，接任云南都督。
- 11月26日 袁世凯派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许世英、杨士琦等为政治会议议员，另由各部院及各省派代表参加。政治会议行使议会职权。
- 12月8日 段祺瑞奉袁世凯命抵武昌，请黎元洪赴京。次日黎动身北上。
- 12月12日 袁世凯任命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
- 12月14日 袁世凯任命张国淦为政治会议副议长。
- 12月16日 任命冯国璋署江苏都督，调张勋为长江巡阅使，赵秉钧署直隶都督。

- 12月19日 准黎元洪辞湖北都督职（黎在京形同软禁）。
- 12月23日 国务总理熊希龄复参众两院议员质问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书，谓事关国家治乱，不能执常例相绳。
- 12月24日 黎元洪通电脱离进步党。
- 12月26日 正式准云南都督蔡锷辞职。

1914年

- 1月1日 《申报》载梁启超呈请司法改革诸条：一、厉行考试以杜幸进；二、严定考绩以汰不职；三、回避本籍以免瞻徇；四、编纂法典以定民志；五、严定律师资格以扶微弱而彰人权等。
- 1月3日 章炳麟不满袁世凯，拟出京赴天津，被阻。（去秋以来即被软禁于共和党本部。）
- 1月9日 政治会议议决停止现有国会议员职务，并请特设造法机关，重订约法。
- 1月10日 袁世凯通过政治会议，停止国会现有议员职务，解散国会。
- 1月16日 袁世凯向政治会议提出祭天祀孔案。
- 1月17日 召集财政会议，熊希龄、梁启超、梁士诒、徐恩元、汤觉顿及洋员马理孙（Morrison）、古德诺等出席。
- 1月24日 政治会议议决特设约法会议（造法机关）。
- 1月26日 ①公布政治会议所议决之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②陈其美自日本抵大连，策划奉天山东讨袁军事。
- 1月29日 政治会议通过祭天祀孔案。
- 2月1日 任命段芝贵署湖北都督。
- 2月3日 ①任龙觐光为广惠镇守使兼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
②令停办地方自治会。
- 2月4日 ①交政治会议议决解散省议会案。
②孙中山致书南洋同志，告以正积极策划组党讨袁事宜。
- 2月×日 黄兴在东京创办浩然庐与政法学校，着重研究军事、政治，培养干部。
- 2月12日 准国务院总理熊希龄辞职，以孙宝琦兼代国务总理。

- 2月19日 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孙宝琦为高等文官甄别会议委员长。
- 2月20日 准梁启超辞司法总长职。
- 2月26日 ①直隶总督赵秉钧暴死。
②政治会议议决停止省议会议员职务。
- 2月28日 解散各省省议会。
- 3月4日 特派李经羲为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长，蔡锷、姚震、饶汉祥等为会员。
- 3月10日 梁启超就任币制局总裁职，并上书袁世凯，提出整顿币制方案。
- 3月18日 约法会议正式开会，孙毓筠、施愚为正、副会长。议员有宝熙、袁金凯、齐耀珊、马良、庄蕴宽、王印川、梁士诒、陈国祥、任可澄等六十人。
- 3月21日 夏重民、朱执信、邓铿等奉孙中山命自日本抵香港，策划讨袁军事。
- 3月24日 黄兴致函章士钊，促主编国民党机关刊物《民国》杂志，进行反袁宣传。（《民国》后由胡汉民任主编，戴季陶、朱执信、田桐、李根源等分任撰述。章办《甲寅》杂志。）
- 3月下旬 袁世凯派遣两名刺客由釜山前往日本，企图暗杀孙中山。
- 3月29日 徐世昌自青岛到北京（袁世凯曾派王揖唐往青岛促驾）。
- 4月1日 张謇出京南下，农商总长由章宗祥代理。
- 4月2日 命于平政院附设肃政厅，兼审判纠弹之权。
- 4月3日 ①任庄蕴宽为都肃政史。
②召段祺瑞回京。
- 4月29日 ①广东梅县军讨龙济光，占海阳（旋败）。
②约法会议通过《中华民国约法》（袁记民三约法）十章六十八条，规定采用总统制，官制官规之制定及国务员、外交大使之任用，对外宣战、媾和以及宪法公布等等，概由总统自决。
- 4月×日 梁启超致汤觉顿书，求“自脱”之法。
- 5月1日 废止民元《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废国

- 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任徐世昌为国务卿。
- 5月2日 任命杨士琦为政事堂左丞，钱能训为右丞。
- 5月4日 政事堂成立，裁撤总统府秘书长。
- 5月10日 ①《民国》杂志创刊于东京，以反袁为宗旨，鼓吹“三次革命”。（以后成为中华革命党机关刊物。）
②章士钊（署名秋桐）主编之《甲寅》杂志在东京创刊。
- 5月11日 孙中山致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请赞助国民党倒袁世凯，革新中国政治，中国愿开放全国市场。
- 5月14日 设政治讨论会于政事堂。
- 5月23日 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观察使为道尹。
- 5月24日 公布约法会议所制订的参议院组织法。
- 5月26日 ①停止政治会议，参议院成立，黎元洪、汪大燮任正、副院长，参政员为陆徵祥、李家驹、梁士诒、赵尔巽、锡良、荫昌、李经羲、熊希龄、梁启超、王家襄、陈国祥、蒋尊簋、蔡锷、严复、劳乃宣等73人。
②特任周树模为平政院院长。
③任张国淦为参议院秘书长，由林长民代理。
- 5月30日 孙中山所委之讨袁军第一路司令蒋中正在上海闸北所设之机关被破获，陈乔荫等被捕。
- 6月4日 朱执信在广东吴川、电白、信宜三县组织反袁武装（旋败，朱走海外）。
- 6月×日 陈叔通致书梁启超劝辞参政，“尚不在将来之奇剧难演，即目前之宪法起草，倘举先生为委员长，将何以处之”。
- 6月27日 黄兴在寓所宴请孙中山叙别。孙中山临别书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共尝”。
- 6月28日 革命党人李国柱在湖南郴县举兵讨袁。
- 6月×日 江西赣南镇守使李廷玉诬指进步党各支部为“乱党机关”，下令密拿赣宁等府二十四县进步党分部。
- 6月30日 ①裁撤各省都督，于北京建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分驻各省，督理军务：以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张勋为定武上将军，仍兼长

江巡按使；冯国璋为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段芝贵为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汤芑铭为靖武将军，督理湖南军务；陆建章为威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唐继尧为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督理广东军务；陆荣廷为宁武将军，督理广西军务……任命蔡锷为昭威将军，蒋尊簋为宣威将军，张凤翔为扬威将军。

②黄兴“为使孙先生得以行其所是，各不相妨”，离日本横滨赴美国。

- 7月1日 雷瀛在湖南桂阳举兵响应李国柱起事，旋败。
- 7月2日 湖北国民党人在汉水流域各县联络遣散士兵一百余人，在脉望咀等处同时举事反袁，旋败。
- 7月3日 梁启超致周印昆书，谈币制改革计划均成空想。
- 7月8日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到会者二百余人，孙中山任总理。
- 7月9日 黄兴抵檀香山发表演说，宣传讨袁。
- 7月15日 黄兴抵旧金山发表演说，揭露袁世凯有称帝野心。
- 7月17日 外交总长孙宝琦照会日本代理公使小幡西吉，请禁止黄兴再回日本，并拘捕陈其美。
- 7月18日 外交部电驻美公使夏偕复，请美取缔黄兴在美活动。
- 7月27日 黄兴致函萱野长知，说他赴美之任务为“将袁氏罪状，节节宣布，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保东亚之和平，非先去袁氏不可”。
- 7月28日 ①公布文官官秩令，分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少士九等。
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 7月×日 孙中山派丘丕振赴东北组织武装策划起义，丘以“东北讨袁军总司令”名义，派人到营口、铁岭、昌图、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地策动起义，先后失败。
- 8月3日 查禁革命党人张继、李烈钧、居正、张人杰等人所设之人权急进社。
- 8月9日 曹汝霖告日本代使小幡西吉，如日本对亡命乱党断然处置，使退离日本，愿以许可日军登陆青岛为交换条件。

- 8月10日 任命任可澄为云南巡按使（原由唐继尧兼署）。
- 8月14日 孙中山致函美国入戴瑞克请善待黄兴。
- 8月18日 上海中华革命党人派遣四五十人到江苏南通，准备起兵讨袁，被军警发觉，起义流产。
- 8月23日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对德作战，与英舰共攻青岛。
- 8月25日 孙中山连日与日人犬养毅、头山满商讨袁时机，犬养毅等认为不宜。
- 8月×日 李根源、彭允彝、殷汝骊、林虎、程潜、章士钊等百余人在东京组织欧事研究会。
- 9月25日 日军侵占山东潍县车站，捕捉华人，并伤路工。
- 10月2日 梁启超在参议院提出质询案：日本在山东不断西进，政府是否与日本订有条约？质问袁世凯持何态度。（蔡锷、徐绍楨、赵惟熙、王揖唐附议。）
- 10月5日 参议院为日军侵占胶济铁路事，通过梁启超向政府提出质询，并请政府向英日抗议。
- 10月10日 朱执信由南洋抵香港，与邓铿等策划在广东发动反袁武装斗争。
- 10月22日 中华革命党准备在杭州举事，事泄，二十余人被捕，均遭杀害。
- 10月25日 中华革命党人在广州成立敢死队、炸弹队，进行暗杀活动。是日，广州城内连续发生炸弹案。
- 10月×日 中华革命党人为讨袁发布告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扫除独夫凶焰……重建共和”。
- 11月10日 黄兴致函萱野长知，谴责日本内阁袒袁政策。
- 11月11日 朱执信在顺德起义讨袁，失败。
- 11月13日 肃政史夏寿康等呈请严行查禁改变国体、还政清室之论说。
- 11月14日 任命张国淦为参政，林长民为参议院秘书长。
- 11月23日 申令严禁倡归政清廷之说。
- 11月24日 长沙破获旅长赵荣等之新同盟会（谋“三次革命”）。
- 11月27日 谓变更国体纯属谣传，请杜渐防微。
- 12月23日 袁世凯赴天坛祭天。
- 12月27日 准币制局归并财政部。总裁梁启超辞职，并裁撤币制局。

- 12月28日 ①参议院代行立法院期满（六个月）闭会。
②约法会议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
- 12月29日 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由大总统推荐三人为候选人。

1915年

- 1月1日 授徐世昌为上卿，赵尔巽、张謇、梁士诒、熊希龄等为中卿，章宗祥、汤化龙、庄蕴宽、梁启超、杨度、孙毓筠等为少卿。
- 1月9日 留日进步党支部决议讨袁书，维护共和，反对帝制。
- 1月16日 特命蔡锷督办经界局事务。
- 1月18日 日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 1月×日 梁启超避居天津寓西旅馆，谢客著述。
- 1月20日 ①梁启超主持之《大中华》杂志在上海创刊（1916年9月20日停刊）。
②日使日置益正式向外交部致送“二十一条”要求。
- 1月×日 梁启超致张仲仁书，对“小鬼”提出之“二十一条”，十分愤慨。
- 1月×日 袁克定宴梁启超，杨度在席，谈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梁赞助。梁认为复辟帝制必遭内外之危险。
- 2月3日 梁启超论中日交涉，谓日人若为解决悬案，政府应开诚布公谈判，不妨稍屈己见，若属新要求，则无谈判余地。
- 2月12日 袁世凯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问。（3月11日又命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均未受命。）
- 2月20日 任命陈宦为毅武将军，会办四川军务。（冯玉祥、李炳之、伍祥祜均带兵随陈入川。）
- 2月25日 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通电斥责袁世凯专制独裁，但否认假借外力图谋革命，声称当谨守绳墨，不危及邦家。（在美洲的冯自由、林森等亦曾联合致电孙中山，请示“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免为国人借口”等语。）
- 3月6日 湖北沔阳党人罗石相起事。

- 3月10日 中华革命党通告党员，对日交涉事舍去袁世凯之外，无他法。
- 3月12日 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
- 3月18日 约法会议闭幕。
- 4月4日 袁世凯下令严加防缉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活动。
- 4月×日 梁启超上袁世凯书说称帝必败，劝他悬崖勒马，急流勇退。
- 4月22日 梁启超从上海返粤省亲。曾去广州、香港等地，感粤事日趋败坏。
- 4月14日 公布地方自治实行规则。
- 5月1日 任命陈宦为四川巡按使。
- 5月7日 日本致外交部最后通牒，限5月9日下午6时以前答复。
- 5月9日 夜11时外交部照会日置益，承认日本之最后通牒。
- 5月中旬 黄兴、陈炯明、李烈钧、柏文蔚、钮永建、林虎、熊克武、张孝准、程潜、李根源等联名通电，斥袁世凯丧权辱国，接受“二十一条”修正案。
- 5月25日 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使日置益签订“二十一条”草约。
- 5月31日 特任王士珍署陆军总长（段祺瑞与袁不和，请辞）。
- 6月4日 ①孙中山复叶独醒，促其筹款反袁，认为“今日救国，舍倒弃恶劣政府，更无他术”。
②梁启超去粤省亲，游杭州后，本日返上海。
- 6月5日 梁启超游苏州、杭州、镇江、南京等地，并与冯国璋
- 15日 商谈劝阻帝制问题。
- 6月末 梁启超偕冯国璋入京，探询袁氏的真意，劝阻袁行帝制。
- 7月5日 冯国璋向北京报界宣布袁世凯否认帝制之谈话。
- 7月6日 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任命李家驹、汪荣宝、达寿、梁启超、施愚、杨度、严复、马良等为宪法起草委员。（梁曾托病相拒，后仍赴会参与起草。）
- 7月20日 梁启超发表《复古思潮评议》。
- 7月24日 黄兴、冯自由、林森、钮永建等在旧金山商谈“团结一致讨袁方略”。
- 7月31日 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

- 8月3日 宪法顾问古德诺（Frank J Goodnow）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古氏于7月中旬自美返抵北京。）
- 8月11日 《国民公报》发表时评《古德诺氏政体之商榷》。
- 8月14日 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发起筹安会。（时总检察厅厅长罗文干欲按法逮问，后悉其为袁世凯主使，遂辞职。）
- 8月15日 ①贺振雄请肃政厅代呈大总统诛奸救国书。（此后连日上书者不下千百起。）
②蔡锷访梁启超于天津，在汤觉顿的寓所密商反对帝制。相约梁之责任在言论，立刻作文反对，蔡则“深自韬晦，勿为所忌”。
- 8月16日 《新中国报》发表林袖湖《读筹安会发起词感言》，指出发起诸公与约法为敌，使国本动摇，反对变更国体。
- 8月17日 ①袁世凯表示对筹安会不加干涉。
②黎元洪欲保“中华民国”招牌，召集张国淦、周树模、饶汉祥等密议。张主张黎直接反对帝制，黎默然。
- 8月18日 湖南省议会议员李海（李燮和之弟）上书总统，告发筹安会，要求将国贼杨度等从严惩治。
- 8月×日 蔡锷电召戴戡入京。
- 8月20日 蔡锷电贵阳刘希陶，告筹安会事，拟派韩凤楼赴滇黔协商。
- 8月22日 梁启超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并交汤觉顿带入京登报（刊于《大中华》杂志第八期，8月31日问世）。
- 8月23日 ①筹安会宣告成立，杨度为理事长。（徐佛苏、汤觉顿拒绝任名誉理事。）
②蔡锷致电唐继尧、刘显世等，告筹安会“关系国家前途甚巨”，“务望稳静，以靖地方”。
- 8月26日 ①蔡锷复电贵阳刘显世：帝制“势在必行”，“仍以推举代表为宜”。
②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
- 8月27日 宪法起草委员会定宪法起草程序。

- 8月28日 ①段祺瑞正式免陆军总长职，王士珍实授陆军总长。
- 8月28日 ②蔡锷电唐继尧、刘显世“催速派筹安会代表”。
- 8月30日 ①段芝贵等密电各省长官，以公民名义向参议院上请愿改革国体书。
- ②蔡锷电云南将军府探交黄永社（蔡派至云南与各方接洽者）：“言出其位，明哲所戒。一切希慎重。至公事容徐图之。”
- ③蔡锷致电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滇处极边，尚望加意部署震慑，俾免意外。”
- 8月 夏末，孙中山密令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等，在上海、青岛、广州、陕西三原设中华革命军东南、东北、西南和西北军军部。
- 9月1日 ①参议院代行立法院开会，沈云沛、周家彦、马安良、蔡锷等请愿改变国体。
- ②中华革命党党员千余人在东京集会，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 ③蔡锷致唐继尧电，周钟岳已赴东省调查经界事宜，筹安会代表请另派替员。
- 9月3日 蔡锷电贵阳戴戡：“以势测之，为期不远，执事能早来京甚佳。”
- 9月4日 ①《申报》刊梁启超与京报记者谈话，反对变更国体。
- ②蔡锷复刘显世电：“以各省文武长官合词环请为宜。”
- 9月6日 ①袁世凯派左丞杨士琦在代行立法院宣称，改变国体听之国民。该院推联芳、梁士诒、陈国祥、汪有龄等审查9月1日之请愿。
- ②日本政府电驻华使领，中国帝制问题或将影响中日关系，暂勿表明态度。
- 9月7日 北京《天民报》以反对帝制被封。
- 9月11日 云南军官第一次秘密会议，准备反对帝制。
- 9月15日 陈独秀主办之《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
- 9月18日 ①中华革命党通告海内外同胞，“能速革命，而后有国”。
- ②蔡锷复电贵阳刘显世：“国体事现仍进行”，“尊处

尽可电院表示赞同”。

- 9月19日 梁士诒等组织“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沈云沛为会长，那彦图、张镇芳为副会长。
- 9月20日 陆军部组织国防会议，以王士珍为会长，蔡锷为副会长。
- 9月23日 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密告陆宗輿，如袁世凯诚意联日，当努力援助。
- 9月24日 沈云沛等之请愿团向参议院总请愿，反对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
- 9月25日 袁世凯咨复参议院，主提前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
- 9月27日 蔡锷电云南唐继尧，同意以刘祖武接任沈石荃为师长。
- 9月28日 参议院议决以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指定梁士诒、汪有龄、陈国祥、蔡锷等起草办法。
- 9月30日 孙中山派胡汉民等赴菲律宾，邓铿、许崇智等分赴南洋筹饷反袁。
- 9月底 蔡锷密函黄兴，告以国内形势，拟赴西南发难，征求黄兴意见。
- 10月7日 ①朱启钤、梁士诒等十人密电各省长官，国民代表大会应明白推戴袁世凯为帝，并委托参议院为总代表。
②云南军官第二次会议，决以武力反对帝制。
- 10月11日 ①李根源、程潜、钮永建、林虎、陈独秀、熊克武、冷遁离日赴沪，策划讨袁。
②朱执信抵香港与邓铿策划起兵讨袁。
- 10月12日 唐继尧请早定国体，以图永久治安。
- 10月14日 ①日本阁议，决定干涉袁世凯之帝制运动。
②蔡锷之北京护国寺街棉花胡同住宅被搜（亦说18日被搜）。
- 10月15日 筹安会以君主国体即可见诸事实，今后应注意立宪问题，改组为“宪政协进会”。
- 10月19日 参议院决定以“君主立宪”四字为国体投票标题。
- 10月23日 朱启钤、梁士诒等以拟定之推戴袁世凯为帝之字样

- (45字)电告各省。
- 10月28日 国体投票开始(11月20日完成)。英、日、俄使至外务部劝告暂缓变更国体,免起扰乱。
- 10月30日 准经界局督办蔡锷请假五日。
- 10月 戴戡、王伯群同到北京经界局。梁启超、蔡锷、戴戡、汤觉顿、蹇季常、王伯群、徐佛苏等多次在众议院副议长陈国祥家(天津)密议讨袁。此时,梁、蔡相约:“今兹之役若败,则吾侪死之,决不亡命;幸而胜,则吾侪退隐,决不立朝。”
- 11月3日 云南军官第三次会议,续商反对帝制事宜。
- 11月11日 蔡锷出京赴天津(亦说11月19日)。随即去日本(亦说12月2日离天津去日本)。
- 11月20日 国体投票结束,全数“赞成”君主立宪。
- 11月21日 梁启超请辞参政,袁世凯令给假二月。
- 11月26日 黄兴复函张孝准,在滇、粤发难均可。
- 11月30日 蔡锷呈称赴日本疗养(袁批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
- 12月5日 杨虎等夺取肇和舰,驶入浦江炮台攻击上海制造局,陈其美聚众起义,皆败。
- 12月11日 代行立法院推戴总统袁世凯为皇帝。
- 12月12日 袁世凯宣誓承受帝位。
- 12月13日 袁世凯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贺。
- 12月14日 黄兴致电美国驻华公使,表示反对帝制到底。
- 12月15日 ①袁世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
②日、英、俄、法、意公使联合向外交部警告缓改帝制。
③梁启超、蔡锷派出之王伯群抵昆明。
- 12月16日 ①梁启超以赴美就医为名离天津。18日抵上海。(在此之前,梁曾写《上总统书》,忠告袁世凯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
②蔡锷、戴戡过香港赴越南。
③唐继尧接蔡锷电,即将来昆明。
- 12月17日 ①李烈钧、熊克武等抵昆明。
②唐继尧派唐继虞率军二连去河内迎接蔡锷。
- 12月18日 蔡锷、戴戡抵云南阿迷,县知事张一鲲谋刺未遂。

- 12月19日 ①蔡锷、戴戡抵昆明。（是日北京统率办事处再电唐继尧拿办蔡、戴。）当晚，唐继尧在五华山都督府宴请蔡锷、李烈钧等23人，洽商讨袁。会上，戴戡宣读并通过梁启超所拟讨袁通电。
- ②黎元洪辞武义亲王，不许。
- ③袁世凯正式设立大典筹备处。
- 12月20日 ①滇军邓泰中奉命向四川叙府出发。
- ②袁世凯申令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
- 12月21日 ①袁世凯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等49人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 ②国民会议事務局电各省长官，将伪造民意之电文一律烧毁。
- ③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殷承瓛、戴戡、刘祖武、顾品珍、赵又新、黄毓成、刘云峰、但懋辛、庾恩旸、戢翼翘、籍忠寅、王伯群、杨蓁、李曰垓、由云龙等会议，决议反对帝制。
- ④黄兴自美国致函张謇、汤寿潜、唐绍仪、赵凤昌、伍廷芳、庄蕴宽等，重申讨袁决心。
- ⑤梁启超在上海接蔡锷电，谓23日前队出发。
- ⑥蔡锷致电川军驻泸州雷飙旅长电，说明反袁形势，望与刘存厚师长相机因应。
- 12月22日 ①梁启超电蔡锷促即发动（此电系自南京发出）。
- ②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昆明五华山歃血为盟，拥护共和。
- ③黄兴致函陆荣廷，敦促兴师。
- 12月×日 留日学生联合发布宣言书，反对袁世凯称帝，宣布倾覆共和恢复帝制者为叛国。
- 12月23日 ①唐继尧、任可澄电（梁启超起草）袁世凯，请取消帝制诛罪魁杨度等七人，以谢天下。限25日上午10时前答复。
- ②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刘显世、李烈钧、戴戡等致各省请联电劝告袁世凯取消帝制电。

- 12月25日 ①蔡锷、唐继尧、戴戡、李烈钧等宣布云南独立。云南致各省通电（梁启超代拟），号召讨袁。
②唐继尧致电黄兴，告以云南独立。
- 12月26日 ①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进军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进军广西。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兼云南都督，留守昆明。
②黄兴在美国《费城新闻》发表文章，呼吁美国朝野赞助中国人民的共和事业。
③孙中山致电旧金山革命党人，告云南独立事。
④护国军政府致各友邦通牒，宣布谨守条约义务，望各国赞助共和。
⑤政事堂电劝袁世凯，勿出尔反尔。
- 12月27日 袁世凯派张敬尧第七师入川。
- 12月28日 ①孙中山致电上海党人，告以唐、蔡已动，“吾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
②唐继尧致滇省在外服官道尹以上各员电，揭袁违誓称帝，望支持讨袁。
- 12月29日 ①袁世凯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撤职，以师长张子贞、刘祖武分别代理云南军务及巡按使。
②唐继尧致书孙中山，盼号召讨袁，并派唐萍麋、李宗黄为驻沪代表。
- 12月31日 袁世凯申令明年改为洪宪元年。
- 12月 ①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
②岑春煊自槟榔屿赴日本，抵香港，张耀曾等同行。（岑先到上海，与梁启超晤谈，再至东京见孙中山。并与日人联络，请援助枪械。）

1916年

- 1月1日 ①袁世凯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改年号为洪宪元年。
②昆明召开讨袁誓师拥护共和大会。护国军发出讨袁檄文，宣布袁十九大罪状，提出反袁四条纲要（梁启超代拟）。云南都督府正式成立。
- 1月2日 戴戡奉蔡锷派遣至贵阳响应独立，王伯群往黔南兴义

一带联系当地黔军。

1月5日 ①蔡锷致电梁启超，说明唐继尧决心反袁，望梁立即赴滇，“不啻十万雄师”。梁接电后，即“摒挡入滇，旋以入桂，遂止滇行”。

②袁世凯令近滇各省“严筹防剿”，并派曹锟督师入川。

③广东龙济光保荐黄恩锡随同龙觐光征滇，广西陆荣廷派韦荣昌率炮兵五营，会同攻滇。

1月6日 ①陈炯明率革命党人攻惠州，占领平山，旋败。

②朱执信以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官名义，委陆领、邓子瑜、李海云分任广肇区、惠潮梅区、高雷区司令，积极筹划讨袁。

1月7日 贵州巡按使龙建章电请另行表决国体。（14日，袁世凯电令龙建章离职。）

1月8日 ①令王占元为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

②梁启超致蔡锷第一书，重申图川的意义及应注意之策略。

③段芝贵、陆荣廷、赵倜、孟恩远电请袁世凯早正帝位。

④征滇军第一师、第七师、第十师均抵宜昌。

1月9日 ①孙中山电告上海总机关部，日政府将派海军中将青木来沪，嘱与联络。

②进步党东京分部通电反对帝制。

③陆荣廷电请袁世凯迅拨加饷，以安军心。

1月10日 ①蔡锷命第三支队董鸿勋部由昆明出发，向毕节进军。

②参议院奏请袁世凯速正大位。

③任命伍祥祜（陈宦部第四混成旅旅长）为川南镇守使（驻叙府）。

1月12日 广西陆荣廷、王祖同急电袁世凯，酌加军饷。

1月15日 ①唐继尧致书梁启超，盼对四川、广东及长江下游发动，并请策划外交、聘人才来滇及今后建国问题。

②贵州巡按使龙建章离任，以刘显潜署理。

1月16日 ①日本拒绝袁特使周自齐赴日庆贺日皇加冕。

- ②蔡锷自昆明率顾品珍、赵又新两梯团取道黔境入川。(亦说蔡于14日离昆明。)
- ③熊希龄应袁世凯召至北京，袁世凯亲自接见，叙谈良久，拟请熊疏通蔡锷。(2月8日，熊南返。)
- ④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第一支队邓泰中、第二支队杨蓁抵川滇交界的新场与北洋军接战，次日占黄坡耳、燕子坡、凤来场等地。
- 1月17日 ①广州日本总领事馆书记藤春赴云南视察。
- ②陈宦命张振鸿死守横江，北洋军伍祥祜旅约四千人从叙府来横江。
- ③岑春煊从香港抵沪，与梁启超同寓，商决岑之行动。
- 1月18日 ①护国军第一梯团刘云峰（辖邓、杨支队）克四川横江（次日占安边场）。
- ②贵阳民众举行“人民代表大会”，一致要求刘显世宣布独立，刘依违不决。
- 1月19日 日本内阁会议严重警告袁世凯政府延缓帝制，否则实力干涉。
- 1月20日 ①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率营长以上军官秘密宣誓响应护国军。
- ②曹锟由岳州起程入川。
- 1月21日 ①护国军刘云峰部克四川叙府（宜宾）。
- ②外交部通告各国政府，袁世凯暂缓登极。
- ③梁启超致蔡锷第四书，要求前线坚持一月，得寸则寸，等待响应，不要以小胜小败而生欣戚。并商迎岑春煊入滇。
- ④袁世凯严令陈宦反攻叙府。
- 1月23日 日本海军中将青木奉命来华考察时政。1月26日抵沪，次日即会见梁启超。
- 1月24日 ①戴戡率滇军一营约千人至贵阳。
- ②曹锟先锋抵重庆。
- ③美国使馆武官赴云南考察。
- 1月25日 ①袁世凯令各军分途进剿蔡锷。
- ②梁启超致书陆荣廷，劝其反袁。

- 1月26日 ①戴戡在贵州省议会演说，揭露袁世凯之罪恶。
②护国军董鸿勋支队抵毕节，川军刘存厚立即响应。
- 1月27日 ①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告独立，自任都督。以戴戡为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向四川綦江进发，王文华为东路军总司令，进军湖南。
②梁启超致蔡锷第五书，指出袁之五大困难，护国军已得日本支持。
- 1月28日 ①梁启超派周善培自上海赴日本，晤犬养毅，以求援助。
②岑春煊到东京。
③李根源、杨永泰、程潜、文群、程子楷、林虎等致书梁启超，要梁速赴日本办理外交（梁原拟亲往日本）后，速莅滇主持。
④刘存厚军之先遣队占纳溪城东南棉花坡、马鞍山一带高地，掩护全军在纳溪集中。
- 1月29日 ①蔡锷至毕节，护国军士气百倍，决心以身许国。
②刘存厚进驻纳溪。
- 1月30日 ①龙觐光到南宁。（继至武鸣访陆荣廷，商攻云南。陆称病在家，诸事不表积极。）
②北军冯玉祥师由南溪开向叙府，与伍祥桢师合围叙府之护国军。
- 1月 在云南起义影响下，广东各方面“讨龙”军活动日益活跃。
- 1月31日 ①蔡锷率护国军中路赵又新、顾品珍入四川永宁，左翼刘云峰击败反攻叙府之北军冯玉祥师。
②川军伍祥桢与护国军于叙府北之宗场激战三日，川军被护国军击败。
③第三师曹锟部到重庆。
- 2月1日 ①张敬尧师抵重庆（亦说2月10日抵重庆）。
②护国川军刘存厚部占领江安、南溪。
- 2月2日 ①刘存厚宣布独立，就任四川护国军总司令。派兵占江安、南溪。
②护国军戴戡率军抵松坎。
③冯玉祥率军攻叙府与护国军激战。（4日冯被击败，

退往内江。)

- 2月3日 护国军东路总司令王文华克湖南晃县。
- 2月4日 蔡锷部董鸿勋支队抵纳溪，与刘存厚师会合攻占蓝田坝、月亮岩等地。
- 2月5日 ①护国军东路克湖南黔阳。(连克洪江、沅州等地。)
②蔡锷指挥护国军攻占蓝田坝，敌退泸州。(北洋精锐第七师张敬尧师、李炳之旅陆续抵泸州。)
- 2月6日 护国军进攻泸州。
- 2月7日 第八师师长李长泰率部自北京南下赴鄂转往四川。
- 2月8日 ①袁世凯特任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免刘显世职。任龙裕光为广惠镇守使。龙觐光率军分三路犯云南。
②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山东起义，一周内连克昌乐、安邱、高密、益都、昌邑和寿光六城。
- 2月9日 ①蔡锷部董鸿勋支队占泸州城北之五峰顶。
②朱执信等率部袭取广州，未克。
- 2月10日 ①护国军刘存厚在泸州失利，团长陈礼门殉职。
②陈宦派秘书胡鄂公赴湖南、江苏，联络汤芑铭、冯国璋，拟倒袁拥冯为总统。
- 2月11日 蔡锷致函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李曰垓，告粮弹不济，望桂省独立，“得粤后，饷械可望源源接济”。
- 2月12日 张作霖应袁电邀至北京，商出兵湖南事。
- 2月13日 ①袁世凯派蒋雁行抵南京，以探病为名，拉拢冯国璋，或相机除冯。
②蔡锷部第四支队何海清部抵纳溪。
- 2月14日 ①护国军董鸿勋、何海清两支队攻占双河场，李文汉营攻占九川山，解除危急，使泸纳战局稳定。
②护国军黔军熊其勋团自贵州松坎进攻四川綦江，威胁重庆。
- 2月15日 北军第七师张敬尧部袭击纳溪，为护国军所败。
- 2月16日 ①护国军王文华部团长卢焘克湖南麻阳。
②曹錕军已抵重庆者约一万五千人，大部赴叙泸一带。
- 2月17日 ①援泸北军张敬尧率部由合江攻纳溪，激战二十

余日。

②护国军戴戡率部抵桥滨河，距綦江八里，与张敬尧军相持。

③护国军王文华部占湖南芷江，与袁军第六师马继增部相持。

2月18日 ①蔡锷以罗佩金为护国第一军左翼总司令。

②革命党人蔡济民于武昌南湖策动马队起义，失败。

③陆荣廷所派迎梁启超特使陈祖虞抵上海，访吴贯因，次日由吴引见梁启超。

2月19日 龙觐光部李文富由百色犯云南。陆荣廷派兵随龙军西进。

2月20日 ①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自昆明出发，取道蒙自向广西迎击龙军。

②龙觐光前锋抵百色。

③梁启超与汤觉顿等议决赴桂。

④蔡锷军收复纳溪。

2月21日 ①革命党人杨王鹏等率百余人攻长沙将军署，旋败。

②蔡锷电唐继尧，前线弹饷两缺，望速解拨。

③袁世凯连日召集秘密军事会议，研究对付蔡锷之策略。

2月22日 陆荣廷派唐伯珊抵泸欢迎梁启超赴广西。

2月23日 ①袁世凯申令缓正大位，并不许再递请正大位文电。

②蔡锷自永宁抵纳溪督战，赵又新、顾品珍部会同川军刘存厚与北军熊祥生和李炳之旅、张敬尧师、川军周骏师激战。

2月24日 ①张敬尧等部八千人进攻纳溪。

②蔡锷再电唐继尧请补充弹药士兵。

2月25日 冯国璋不肯接受征西总司令之职。

2月26日 ①北军又增援一团攻纳溪。攻纳北军近万人。

②冯玉祥、伍祥桢奉命乘叙府空虚，率军进攻。

③北军第六师师长马继增在湘西辰州自杀。

2月27日 纳溪护国军失利，蔡锷急调叙府金汉鼎率两营及机、炮兵增援。

2月28日 ①蔡锷领兵总攻纳溪，因寡不敌众，伤亡很大。

- ②梁启超决定赴桂，“冒万险万难不容辞”。
- 2月29日 ①护国军击败张敬尧部于纳溪。
②北军冯玉祥、伍祥祜两部以十倍于护国军之兵力由白花场攻叙府。
- 2月 梁启超编《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中文及英文合订本，在上海出版发行。
- 3月1日 ①袁世凯停发大典筹备费。
②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晤梁启超，商讨袁事，并为梁设法赴广西。
- 3月2日 龙觐光军第一路司令李文富攻占云南剥隘。
- 3月3日 北军冯玉祥旅再占叙府，滇军刘云峰退横江。
- 3月4日 梁启超与汤觉顿、兰志先（公武）、黄孟曦、吴贯因、黄群（溯初）等，乘日轮横滨丸离上海，密赴广西。
- 3月5日 袁世凯电香港政府及两广各要隘，谓梁启超等数人将潜入内地，谋为不轨，如查出，扣留请示查办。
- 3月6日 ①北军周文炳师攻占湖南麻阳。（一说3月12日占麻阳。）
②蔡锷以纳溪战事未能得手，补给困难，叙府又失守，所部自纳溪南退叙永。
- 3月7日 ①袁世凯特派陆荣廷为贵州宣抚使，以陈炳焜兼督理广西军务，以分化陈、陆。同时密令龙觐光监视陆之行动。
②北军第二路司令张敬尧、旅长吴佩孚占四川纳溪。
③梁启超抵香港（未登岸）。
④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树立在华霸权，推翻袁世凯，承认中国南北两军为交战团体，默许日本民间援助南军。
⑤日本派堀内为驻云南领事。
⑥驻港法领事发布新章，无论何国人入海防，均须领护照。
- 3月8日 ①汤觉顿、唐伯珊携带梁启超所草拟之广西起义等文件，乘小轮船入梧州。
②川军第一师周骏部团长刘湘占江安。（次日，护国军退出纳溪。）

- 3月9日 ①龙觀光军占剥隘。龙运乾之定滇军占云南个旧。
②李烈钧率护国军第二军抵云南广南，迎击龙觀光军。
③革命党人在广东顺德起义。
- 3月10日 ①蔡锷、刘存厚两部分别退集叙永大洲驿及古宋安宁桥。
②龙运乾进攻蒙自。
③袁世凯特派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驻常德）。次日派曾钺为川南宣慰使。
- 3月（10日 冯玉祥之代表张之江（参谋）赴大洲驿与蔡锷谈判合前后）作及促陈独立。
- 3月11日 ①李根源、杨永泰访梁启超于香港横滨丸轮，商与岑春煊合作及筹组军务院问题。
②夜，梁启超由横滨丸换乘妙义山丸轮，次日离香港去海防。
- 3月12日 ①护国军第二军李烈钧联合桂军旅长马济、陆裕光大破龙觀光军于百色。（是日，袁世凯任命龙觀光督理云南军务兼巡按使。）
②四川第二师师长钟体道在顺庆宣布独立。
③袁世凯任命林长民为立法院秘书长。
- 3月13日 ①陆荣廷、梁启超等通电（自柳州发）劝袁世凯辞职，限24小时内答复。
②孙中山令居正速在山东起事，先占济南。
- 3月14日 ①梁启超之父梁莲涧于香港去世。
②梁启超之代表汤觉顿到广西梧州。
- 3月15日 陆荣廷、陈炳焜等宣布广西独立，拥护共和。陆自任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任梁启超为总参谋。
- 3月16日 ①梁启超、黄溯初由日驻海防名誉理事横山派艇接至海防。
②滇军张开儒、赵世铭败龙运乾，解蒙自围。
- 3月17日 ①蔡锷军开始反攻，乘夜雨袭击茶塘子守敌，痛歼敌军。（连占江安、纳溪、彭水、綦江等地，张敬尧逃回泸州。）
②日本驻海防名誉领事横山以汽车送梁启超赴其所经

营窑业牧业之帽溪山中。(梁在帽溪写《从军日记》、《国民浅训》等。)

③梁启超于海防草《致滇中将士书》。

3月18日 ①黄溯初携带梁启超所起草之文件,在横山派人护送下乘火车入滇。

②护国军占湖南永顺。滇军占四川江安、南川。

③陕西革命党人王绍文、南南轩等十八人被陆建章杀害。

④江苏将军冯国璋、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芑铭等五将军联名密电取消帝制,惩办祸首。

3月19日 ①滇军赵世铭克个旧。

②革命党人谋起事于通州,不成。

3月20日 ①袁世凯发现冯国璋等五将军密电,几乎昏倒。

②护国川军自叙永反攻纳溪、江安。

③袁世凯召国务卿、各部总长、参政等商撤销帝制。

④岑春煊与日商竹内维彦签订日金100万元借款合同,为护国军经费。

3月21日 ①袁世凯召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等开紧急会议(黎不到会),议取消帝制问题。

②云南护国军击退从丘北进攻临安之龙觐光军。

③蔡锷部顾品珍、赵又新再败北军张敬尧师,进围纳溪。(一说占领纳溪。)

3月22日 ①袁世凯撤销承认帝制案,发还各省区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

②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

③袁世凯电令陈宦居间调停,向蔡锷疏通。

④护国川军刘存厚部再占江安。

3月23日 ①袁世凯废止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民国五年。

②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

③袁世凯用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名义致电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蔡锷,“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先戢干戈,共图善后”。

④四川将军陈宦之代表刘一清、雷飙晤蔡锷于叙永大

洲驿，商停战。

- 3月25日 ①袁令朱启铃退还皇帝推戴书于参议院。
②代行立法院（参议院）议决因推戴皇帝案失效，各法令仍旧复其效力（企图以此维持总统地位）。
③护国黔军王文华部再占湖南麻阳。
④护国川军刘存厚部再占南溪。
- 3月26日 ①护国军提出停战条件，要求袁世凯立即退位。
②梁启超离越南帽溪，次日入镇南关，28日至广西龙州。
③护国军占四川彭水。
④广东莫擎宇团长率兵起义攻潮州。
- 3月27日 ①袁世凯忧愤成疾。（日报谓袁病失音，疑系中毒。）
②唐继尧之代表李宗黄得日武官青木相助，往晤冯国璋。
③革命党人何海鸣联合莫擎宇攻入潮州。
- 3月28日 ①梁启超自龙州电陆荣廷等都督司令，请坚持袁世凯退位及进取广东的主张。
②广东钦廉镇守使隆世储、道尹冯相荣宣布独立。
③徐世昌函康有为，请力劝梁启超顾全大局。
- 3月29日 ①袁世凯焚毁关于帝制文书八百四十余件。
②任命陈树藩为陕西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
③日本派领事驻桂林。
④蔡锷由永宁进驻大洲驿。
⑤梁启超致电陆荣廷坚持迫袁退位，不容调停。
- 3月30日 ①陈宦电蔡锷，赞成倒袁，行联邦制，举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中一人为总统。
②莫擎宇在潮州宣布独立，称潮梅护国军总司令。
③贵州刘显世通电迫袁退位，黎代总统。
- 3月31日 ①湘境护国军失利，退出沅州；四川护国军刘存厚部占南溪。
②蔡锷、陈宦商定川省停战一周。
③蔡锷致电梁启超，迫袁退位并望速济百万元。
④蔡锷致电陈宦，必须迫袁退位，望前线勿得冒进，免启冲突。

- 4月1日 ①袁世凯令国民会议与立法院议员选举，仍分别办理。
②袁世凯又用黎、徐、段三人名义向护国军提出取消独立、解散护国军等六项条件。
③前国会议员在上海以国会名义，通电外交团，反对袁世凯。
- 4月2日 ①蔡锷复电黎、徐、段，说袁威信已失，劝其引退。
②冯玉祥与蔡锷联合，谋倒袁拥冯（国璋）。
③代行立法院撤销国民总代表名义及其决定之君主国体案。
④冯国璋、陈宦电京，南方希望甚高，仅取消帝制不足以服其心，乞速作根本解决之计。
- 4月3日 唐继尧等致各省通电，提出：（一）袁氏即日退位，听候特别法庭裁判；（二）依照约法，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三）召集国会，重谋建设。
- 4月4日 ①梁启超抵南宁，陆荣廷自梧州来南宁相迎。
②康有为在《上海周报》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主张宣统复辟。
- 4月5日 停泊在广东省河的宝璧、江大等舰响应起义，并由徐勤所部攻城司令魏邦平统率，准备会同民军攻省城。
- 4月6日 ①广东将军龙济光被迫宣布独立。汤觉顿自广西往粤谈判。
②梁启超在南宁致电梁士诒、张国淦（总统府秘书长），斥袁专操权术，已失信天下。
- 4月7日 ①蔡锷、陈宦之代表在纳溪会商停战及总统去留问题。
②梁启超致电李烈钧，广东独立后，可专力规复中原。
- 4月8日 ①陆荣廷、梁启超自南宁赴梧州。
②广东民军不认龙济光为都督，各路民军同时而起。
- 4月9日 孙中山在东京集会声讨袁世凯，与会者有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及日本友人等。
- 4月10日 ①袁世凯任张勋兼署督理安徽军务，倪嗣冲为长江巡阅副使。
②中华革命军四川司令部成立，石青阳任司令。
- 4月11日 驻日公使陆宗輿商请日本外相石井援助袁世凯。
- 4月12日 ①龙济光制造“海珠事件”，广西代表汤觉顿、广东将

军府顾问谭学夔、广州警察厅厅长王广龄等被杀害，民军领袖徐勤侥幸逃脱。

②浙江宣布独立，浙江巡按使屈映光（袁世凯在浙江之侦探）为都督。

4月13日 陆荣廷、梁启超自南宁到梧州。

4月14日 ①广东巡按使张鸣岐到梧州，代龙济光向陆荣廷、梁启超为“海珠事件”辩解。梁启超致电广东总商会报界，声明对粤持“维持秩序，戮力北伐”为宗旨。

②岑春煊自日本归，本日过香港（一说19日由香港起程），秘密赴肇庆，李根源、温宗尧、周善培、杨永泰同行。

③蔡锷从永宁致电陈宦，促独立，又派代表陈光勋至成都接洽。

④杨虎、蒋中正奉陈其美命占领江阴炮台，宣布独立。

⑤袁世凯勉屈映光，加将军衔，命兼署督理浙江军务。

⑥黄兴自纽约电唐绍仪、伍廷芳、梁启超、汤化龙等，坚去袁逆，力阻调停。

4月16日 ①梁启超电复梁士诒，劝袁世凯勿怙权位。

②冯国璋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此乃北洋军阀公开劝袁退位之第一封电报）。

4月17日 革命党人蔡春山在安徽大通起事，失败。

4月18日 ①冯国璋、张勋提出（巧电）调停大纲八条：承认袁仍为总统，重开国会，暂遵元年约法，撤川湘前敌各军，大赦党人等。

②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等宣布袁世凯已失总统资格，应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

③革命党人何嘉禄攻占江苏吴江，宣布独立。

4月19日 ①广东代表张鸣岐与陆荣廷、梁启超商定协议五项：推岑春煊为两广都司令部司令；龙济光仍督粤；实行北伐；各地民军骚扰，俟岑春煊入粤后，设法抚绥。

4月20日 ①陕西民军李歧山等举事，攻富平，占三原。

②政事堂电各国公使，阻止各国承认南方政府。

③伍廷芳致书袁世凯劝退十条。

- 4月21日 袁世凯申令恢复内阁制。
- 4月22日 ①段祺瑞任国务卿（徐世昌因谋和不成，辞职）。
②黄兴自旧金山启程赴日本。
- 4月23日 段祺瑞兼陆军总长，陆徵祥为外交总长，王揖唐为内务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张国淦为教育总长，金邦平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大半由梁士诒决定），王士珍为参谋总长，庄蕴宽为审计院长。
- 4月24日 ①梁启超、陆荣廷由梧州抵肇庆，岑春煊、李根源、章士钊、温钦甫亦到肇庆。
②广东龙济光枪毙帮办广东军务、粤闽苏赣禁烟督办蔡乃煌。（蔡为袁世凯之忠实爪牙。）
③革命党人在江西玉丰、广丰宣布起义。
- 4月25日 ①革命党人居正聘日人坂本寿一为飞艇教官。
②河南革命党人在宝丰宣布独立。
- 4月26日 ①冯国璋电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劝袁散履尊荣，亟筹自全之策。
②苏军攻克江阴，肖光礼等败走。
③孙中山复函邓泽如，再揭龙济光“伪布独立”。
- 4月27日 ①唐继尧电复冯国璋，坚主袁世凯退位。
②湖南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宣布独立，自称湘南护国军总司令。
③孙中山偕廖仲恺、戴季陶由日本启程返上海。
- 4月28日 ①梁启超致电独立各省都督各总司令，商成立军务院，举唐继尧为抚军长，联诸镇迫袁退位。
②孙中山复函广东国民党部，坚持讨龙（济光）。
③奉天桓仁、庄河宣布独立。
④梁启超致电唐继尧转蔡锷，松坡“有认袁仍为总统之条，想属遥控”，“袁已力屈，万勿轻纵”。
- 4月30日 ①梁启超复冯国璋，盼力任调停。
②梁启超致独立各都督各总司令电，联冯、段，迫袁退位，以惩凶退位为媾和条件，“和平保障，惟恃武力”。
- 5月1日 ①两广都司令部成立于肇庆，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章士钊为秘书长，

温宗尧为外交局长，杨永泰为财政局长，钮永建为军事代表，谷钟秀为政治代表，蒋方震为作战计划主任。公布宣言，不分党派，一致讨袁。（孙中山电岑赞同其主张，并劝勿与龙济光部生衅。）

②冯国璋修正巧电八条，主留袁，严定国会议员资格，反对国民党人参加，不及时惩凶，修改民元约法等。旅沪人士唐绍仪、谭延闿、汤化龙、胡景伊、谷钟秀、张耀曾、唐文治、张其煌、吴景濂等通电驳斥。

5月2日 ①岑春煊、梁启超发表告爱国军人书。

②奉天将军张作霖通电主袁留任。

③梁启超致电唐继尧，促军务院早日成立。

④梁启超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不再继续停战，桂省征湘之兵应当猛进。

5月3日 ①梁启超电黎元洪及各都督各总司令，坚持袁世凯退位，由黎继任。

5月4日 ①湖南将军汤芑铭通电，主袁世凯辞职，由黎继任。

②康有为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主张复辟。

③革命党人在湖南湘乡独立，未成。

④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美洲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得日本之助，自青岛到潍县。攻击东城（袁军第五师张树元据西城），居正任总司令。（23日攻占潍县。）吴大洲攻占周村，宣布独立。

5月5日 ①梁启超偕日本领事太田及李根源、张鸣岐、黄孟曦赴广州，晤龙济光，促龙北伐。（梁等险遭杀害，逃回肇庆。）

②桂军攻入湖南宝庆。

③陈宦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④浙江屈映光去职，嘉湖镇守使吕公望被推为浙江都督。

⑤梁启超发表《辟复辟论》反对康有为之主张。

5月6日 ①冯国璋、张勋、倪嗣冲通电发起南京会议。

②袁世凯电陈宦，允退位，惟须先商善后办法。

③陆荣廷通电，实行北伐。桂军占湖南武冈。粤军占福

建永定。

④济南革命党人得日人之助，攻击将军署。

⑤蔡锷致冯国璋、陈宦电，第三次停战（5月7日—6月6日）。除滇、黔、川各军一律停战外，请前敌各军一律照办。

5月7日 ①蔡锷致陈宦电，乞转冯、段速筹组织（北京）新政府，不同意（独立）四省组织新政府，启南北分裂之渐。

②蔡锷致唐继尧、刘显世等电，不同意成立两广都司令部。

③唐继尧等宣布军务院组织条例。

④蔡锷致唐继尧、刘显世等电，“接任公所草各宣言书及军务院条例全文”，同意成立军务院。

5月8日 ①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于肇庆，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摄抚军长职权，陆荣廷、梁启超、龙济光、蔡锷、刘显世、李烈钧、陈炳焜为抚军，梁启超兼政务委员长，唐绍仪为外交专使，李根源为北伐联合军都参谋。（上海方面对梁之出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颇为不满。）本日发出致各国公使等通电，宣布成立军务院（梁启超拟），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

②孙中山在上海宣言，与各方协商一致讨袁，尊重约法，并通告汉口田桐、山东居正、香港朱执信，暂沿用五色旗，俾不致与滇黔等省有所猜疑。

③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占领山东安邱。

④改政事堂为国务院，改国务卿为总理。

⑤龙济光、梁启超联合通电，共同声明团结一致专心北伐。

5月9日 ①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表示反袁到底，维护共和及临时约法。

②陕北镇守使陈树藩在蒲城宣布成立，称陕西护国军总司令。

③蔡锷电复段祺瑞、王士珍：一、袁立即退位，由黎继任；二、如黎难胜任，可托辞辞卸，以国务总理摄政；三、撤退前敌军队，共商善后；四、以特别条件

规定选新总统。

④黄兴自美国抵东京，李书城同行。

5月10日 ①程潜就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时程在靖县）。

②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张学济占湖南乾城。

③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吕子义部占领山东高密。

5月11日 ①军务院第一号布告，宣布军务院成立在拥护国法，为独立各省之政府机关。俟国务院依法成立时，军务院立即撤废。（梁启超拟。）

②梁启超（自肇庆）致唐继尧电，岑春煊不肯兼摄抚军长职，乞唐俯肩大任。

③军务院第二号布告：讨袁，拥护国法，通告各省国会议员，速筹召开国会。附逆议员不得参加。（梁启超代拟。）

5月12日 ①梁启超致冯国璋电，坚持维护民元约法，袁退位后应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

②陈宦再电袁世凯，请即日宣告退位。

③李烈钧率张开儒、方声涛部至广东肇庆（拟入江西）。

④黄兴遥电，盼协力讨袁。

5月14日 ①梁启超代全体抚军拟复冯国璋电，坚持袁退兵息，始议善后。

②梁启超致蔡锷电，四川停战展期，“惟不必代两粤负责”。两粤仍取攻势，发展实力，造成南北均势，以造成“会商善后”的条件与保证。

③蔡锷致陈宦电，应视各地起义民军为护国军。

④山东民军薄子明占平度、即墨。

⑤督办湖南矿务郭人漳部矿警与汤芑铭部战于长沙，失利。

5月15日 ①袁世凯电冯国璋等切实讨论，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善办法。

②冯国璋召集十七省代表开会于南京（人数未到齐，未开幕）。

③梁启超应冯国璋邀请离肇庆赴上海商量解决大局方法。在肇庆致电各都督各总司令，重申护国军方针。

- ④革命党人以飞机一架袭击济南将军府。
- ⑤山东第三师师长张树元与革命军居正义和。
- ⑥陕西镇守使陈树藩率军向西安进发。
- 5月16日 ①蔡锷致刘显世、戴戡等电，湘省独立后，湘黔前线可相机进攻。
- ②陈树藩入西安（5月18日称都督）。
- ③济南革命党人攻击第五师及将军署未能得手，退向日本车站。
- ④袁世凯腰痛及枕骨痛，饮食锐减，不能成寐。
- 5月17日 ①袁世凯电冯国璋、张勋、倪嗣冲，盼切实研究善后办法，速定方针。
- ②蔡锷致唐继尧等电，军队伤亡过多、子弹不足，应抓紧停战期间进行整顿。
- ③黄兴致电唐绍仪、张謇等，请合力主持，逼袁退位。
- 5月中旬 到沪议员256人通电要求袁退位。唐绍仪、张謇劝袁退位。
- 5月18日 ①冯国璋召集的南京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到会者有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山西、福建、热河等十七省区代表20余人，讨论袁世凯去留，会上多主袁世凯退位。
- ②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死。
- 5月19日 ①山东将军靳云鹏电劝袁世凯退位。
- ②倪嗣冲到南京，坚主维持袁世凯之总统地位。
- ③北军旅长冯玉祥自叙府撤抵成都。
- 5月20日 ①梁启超抵达上海。
- ②冯国璋电劝袁世凯退位。
- ③桂军入衡州，倪毓棻所率皖军北退。
- ④陕西将军陆建章离西安东去。
- ⑤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吕公望、蔡锷、李烈钧、陈炳焜联名复电黄兴，竭诚欢迎指导。
- ⑥蔡锷电两广行营军务院岑春煊、梁启超等，赞成军

务院组成并荐戴戡为抚军。

⑦蔡锷致大洲驿殷承璪总参谋转刘云峰，调何海清支队赴叙，支援陈宦独立。

⑧蔡锷致刘显世、王文华电，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已在凤凰独立，自称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建议推熊希龄出任湘督。

5月21日 ①南京会议无结果，决定邀请独立各省派代表参加，续商总统问题。

②蔡锷电刘云峰、雷飙两梯团归陈宦指挥。

5月22日 ①四川将军陈宦被迫宣布独立，改称四川都督。

②梁启超在南京与冯国璋会谈，坚持非袁退位，无协商善后余地。（22日—24日梁与冯多次会谈，并电唐继尧等，桂、粤、湘、赣大军仍宜猛进。）

5月23日 ①孙中山电田桐、居正、朱执信等，“一切事宜务求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又致电岑春煊，表示共力进行讨袁。

②蔡锷致唐继尧、刘显世电，防曹锟反扑，“我军急宜整顿补充”。

③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攻击潍县第三师师长张树元，因日本军官之干涉，退至城外20里之庞家庄。

④袁世凯痛斥陈宦，令即开缺来京，筹商善后。以重庆镇守使周骏督理四川军务，曹锟督办四川防务，张敬尧帮办四川防务。

5月下旬 黄兴在日本联系借款日币三百万元，准备购械练军。

5月24日 ①袁世凯病重，未视事。

②蔡锷致陈宦电，赞陈独立之功，商将冯、伍、李三旅集中，用以击曹。

③袁世凯命重庆周骏为重武将军，速攻成都陈宦。

5月25日 ①张勋、倪嗣冲通电拥护袁世凯，否则以兵戎相见。（徐世昌曾电张、倪，谓民党煎迫，不如大政归还清室，袁仍居总理大臣之职，领握军权。）

②梁启超电蔡锷、唐继尧等，积极进军，迫袁退位。

③山东革命军邓天一、陈中孚等攻击济南将军署。（时

吴大洲、薄子明与居正失和，分称护国军山东都督及总司令。)廖仲恺奉孙中山委派到达青岛，慰问中华革命军东北军。

④革命党人占据福建连江，旋败退。

⑤任命王陵基(周骏部旅长)为重庆镇守使。

⑥蔡锷致大洲驿总参谋殷承璪电，陈宦无力解决川事，“仍须引为己任”。

⑦蔡锷致陆荣廷、梁启超等电，推梁启超为起义各省总代表。

5月26日 ①冯国璋电陆荣廷，谓副总统名义应随大总统资格同时消灭。(6月3日，陆驳之。)

②上海陆军学生数十人乘日轮赴山东，助居正。

③驻湖南岳州之安武军哗变。湖北巴东警备队哗变。

④蔡锷于永宁致妻书，大局定后，争权夺利，欲避之国外。

⑤蔡锷致大洲驿殷承璪总参谋电，攻渝一层，殊冒险着。渝城暂以黔军牵制，毋令遁走。

⑥陈树藩遣兵入西安，陕西将军陆建章辞职，陕西独立。

5月27日 ①唐继尧通电，力主袁世凯退位。(唐加派黄毓成部入川。)

②冯国璋再电独立各省，商停战。

5月28日 ①袁世凯病重，形容憔悴。

②张勋通电准备出兵，愿自任督师。

③北军第五师师长张怀芝攻占山东临淄。

④蔡锷离叙永，29日抵大洲驿，部署一切。

5月29日 ①湖南将军汤芑铭宣告独立，改称都督。

②袁世凯宣布《帝制议案始末》，把变更国体之责任推到各省公民身上。

5月30日 ①梁启超到上海后，本日始闻其父梁莲涧去世消息，立电军务院和各都督各总司令，请辞本兼各职。

②袁世凯以张怀芝为济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免靳云鹏)。

③陈宦向参事会辞职(6月16日决定退让)。

- ④任命刘湘为四川第一师（即第十五师）师长。
- 6月1日 ①革命党人杨子元在奉天西安县宣布独立。
②黄兴复电谭人凤，拥护孙中山发布第二次讨袁宣言，愿联合一致，进行讨袁。
- 6月2日 ①岑春煊、陆荣廷等通电：（一）袁不退位，决无调停可言；（二）黎元洪继任；（三）否则不停止军事行动；（四）拥护约法、保障国会。
②倪嗣冲到汉口，准备攻湘。
③蔡锷电刘显世等，战争结束后，蔡拟从事实业或军事教育，不闻政事。
- 6月3日 ①袁世凯病笃。（是日接汤芑铭独立电。）
②岑春煊、梁启超通电，痛陈袁退位利害。
③李烈钧部滇军自肇庆、清远北进韶州。
④孙中山复函黄兴，望其“静养两年”。
- 6月4日 ①袁世凯病重。
②熊希龄劝袁世凯速定退位之计。
- 6月5日 ①袁世凯猝晕，逾时始平（中午）。袁世凯召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口述遗令，遵照约法，以副总统继任。
②革命党人攻占奉天兴京。
- 6月6日 ①袁世凯死去，年58岁。
②英、日、法、俄、意、比公使访段祺瑞，表示希望黎元洪继任总统。
③国务院通电，遵袁世凯遗令依（新）约法以副总统代行职权。
- 6月7日 ①黎元洪就任大总统。
②张勋通电保境卫民，主拥宣统复辟。
③倪嗣冲以袁世凯卒，率军离岳州返安徽。
④陕西陈树藩宣布取消独立。
⑤李烈钧部张开儒师占韶州。
⑥蔡锷宣布周骏罪状，电刘显世、唐继尧急援军火。
⑦梁启超在上海电段祺瑞、冯国璋及各都督各总司令，请速奉黎元洪为大总统。
⑧梁启超电独立各省都督，主助段祺瑞收拾北方。

- ⑨梁士诒逃离北京。
- 6月8日 ①岑春煊电驳国务院援用“新”约法，由黎代总统职。
 ②梁启超电请黎元洪委任段祺瑞组织内阁。
 ③梁启超致电陆荣廷等，大憨已伏天诛，梁当居户守孝，将来维系大局，仍恃倡义各督主持。
 ④冯国璋召集之南京会议解散。
 ⑤四川陈宦取消独立。
 ⑥奉天革命党人占昌图。
- 6月9日 ①张勋召开七省代表徐州会议，议决优待清室，电劝各省取消独立，否则武力对待。
 ②孙中山电黎元洪，请恢复约法，尊重国会，屏除一切僭制妄作，从事建设。又电山东居正、朱执信等按兵不动，候与黎元洪协商解决。
 ③黄兴自日本电黎元洪，请恢复民元约法，召集国会，严惩祸首。
 ④蔡锷致北京各部院及各省电，袁死后，尤在收束战事，保固治安，拥护中央。蔡拟解甲归休。
 ⑤四川护国军败周骏，克内江（6月10日克资中）。
 ⑥广东龙济光取消独立。
- 6月10日 ①梁启超电独立各省：一、规复旧约法；二、速开国会；三、任段祺瑞组新内阁；四、裁判帝制祸首。同日致南京将军署电，将上述要点告冯国璋。
 ②唐继尧电黎元洪，要求恢复民元约法，召集民二解散之国会，惩办帝制祸首，撤军及召集军事会议，筹商善后。
 ③张勋电陆军部次长田中玉等，否认主张清室复辟。
 ④裁撤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
 ⑤特任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兼署巡按使。
 ⑥梁启超维持时局通电：奉戴黎元洪为总统，收拾北方，惟段是赖；袁朝退超夕隐，此后国事非棘人所忍与闻。
- 6月11日 ①安徽倪嗣冲捕杀党人赵政等十二人。
 ②梁启超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各军驻防维持现状，商

军务院撤废，提出议和方案六条：一、复旧约法；二、召集国会；三、惩治祸首；四、南省北军撤还；五、废将军巡按，一律改称都督；六、双方要人在南京或武昌开善后会议。

- 6月12日 ①奉军旅长张天喜退出湖南。
②梁启超致电南京将军署籍忠寅，必须恢复旧约法。“旧约法诚多缺点”，国会召开后，可修改。
- 6月13日 ①岑春煊、陆荣廷等电黎元洪：（一）总统系继任，非代行职权；（二）拥护民元约法；（三）恢复国会；（四）组织新内阁。
②孙中山分电山东民军（吴大洲、薄子明）、福建民军，停止军事行动。又电东京黄兴，询时局意见，“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体”。（次日黄兴复电赞同，并望主持一切。）
③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
④蔡锷进驻泸州。
- 6月14日 ①梁启超致唐继尧电，必须坚持六项要求。军务院于临时内阁成立后，即行取消。
②梁启超致南宁陈炳焜、陆荣廷电，段祺瑞已决复旧约法。我辈对中央措辞当严正，而勿露意气。
③蔡锷致泸州张敬尧电，袁倒后，将致力实业，不争名利。
④蔡锷电请黎元洪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改组正式内阁，召开军事会议，惩办帝制余孽。
- 6月15日 ①冯国璋通电赞成恢复民元约法，重开国会。（梁启超曾派范源廉说冯。）
②北军第二十师范国璋退出湖南。
- 6月16日 ①黎元洪下令各省停战。
②护国军魏邦平攻占广东江门。
③四川周骏自称蜀军总司令，进兵成都，迫陈宦去职，冯玉祥阻之。（周骏受段祺瑞嗾使。）
④梁启超复电段祺瑞，谢绝段之召用。
- 6月17日 黎元洪电孙中山，赞同其6月9日意见。请孙派代表北上商谈善后。（6月23日，孙复电黎，谓已派肖萱、叶

夏声前往会商一切。)

- 6月18日 唐继尧致黎元洪电：一、废除国会解散后一切法令；二、召集国会；三、北军撤退；四、召集军事特别会议处理善后，国务院成立，军务院即撤销。
- 6月19日 ①孙中山电黎元洪，请早恢复约法、国会。
②李烈钧部滇军张开儒师到广州韶关，逐走韶州护守使朱福全。
③梁启超致肇庆都司令部张佩严电，重申“袁朝倒超夕退，此志如山，不入公门”。
- 6月20日 ①黄兴复电黎元洪，重申恢复旧约法、旧国会之必要。
②张勋通电，反对惩办帝制祸首，以免南北仇衅相寻。
③章炳麟获释。
- 6月21日 ①黎元洪特任龙济光兼署广东巡按使。
②黎元洪复黄兴电，嘱派代表赴京商讨恢复旧国会等。
(黄派李出城赴京。)
③蔡锷致梁启超电，对国事拟不发表政见；川难定，仍拟退隐。
④梁启超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速派军事人员到沪筹商，为军事会议之预备。
- 6月22日 ①段祺瑞通电，反对恢复民元约法，仍以民三约法为行政标准。
②梁启超致肇庆都司令部李根源、章士钊电，国会可望恢复，我辈取何方针。
③蔡锷致黎元洪等电：周骏包围成都，限三日内缴械，陈宦迭电告急，除派军赴援外，请示方略。又致叙府自流井罗佩金电，进规隆昌，以断周骏之后。
- 6月23日 ①孙中山函劝段祺瑞规复旧约法，尊重国会。
②公祭袁世凯，由段祺瑞代表政府主祭。
- 6月24日 ①黎元洪特任蔡锷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巡按使，曹錕会办四川军务，王陵基为重庆镇守使，召陈宦、周骏来京。
②梁启超致蔡锷电，应退隐否，当三思。又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松坡病剧，正聘法医医治。
- 6月25日 ①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练

- 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宣布加入护国军，要求恢复民元约法、民二国会。
- ②蔡锷命罗佩金援成都陈宦，并请北京制止周骏进攻成都。半夜，陈宦悄然离开成都。（7月21日经重庆，22日抵宜昌东下。）
- ③梁启超、唐绍仪、温宗尧、王宠惠电请黎元洪罢斥龙济光。
- ④梁启超致天津熊希龄电：蔡锷病重，不能督川任事，以暂代接受为宜。
- ⑤梁启超致段祺瑞电，详陈拥护民元约法反对民三约法之法律根据，驳其6月22日电。
- 6月26日 ①梁启超致段祺瑞电：昨日海军宣言，与己无涉。
- ②孙中山电四川石青阳：按兵勿动，听候黎元洪解决。
- ③孙中山电黎元洪罢斥龙济光，指出龙“在粤三年，无恶不作”。
- 6月27日 梁启超复各都督各总司令电：南方各省要求约法、国会数端，目的将达，无再与北方协商必要，原推代表可作罢议；各省可直接与中央接洽善后。又军务院待约法规复国务院改组后，似立当宣告废除。居丧未逾百日，不肯出任南方代表。
- 6月28日 梁启超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建议以唐继尧巧电（6月18日）所主张径电中央，请以明令改组国务院，军务院即行撤废。
- 6月29日 ①申令仍遵行民元约法，并定于8月1日续行召集国会。（国会不承认召集令，决自行集合。）
- ②申令民国三年5月1日以后所有各项条约继续有效，法令一切仍旧。撤销关于立法院国民会议各法令。裁撤参政院及平政院所属之肃政厅。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废国务卿。
- ③蔡锷致梁启超电：喉病加剧，须静养。吾师负内外重望，不可脱然引避。
- 6月30日 ①准各部总长免职，特任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段祺

瑞为陆军总长。(唐未到前由陈锦涛兼署。)

②梁启超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内阁改组后，必力为维护，吾辈蓄力观变。

7月1日 ①梁启超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主军务院立即宣言废除，并拟电文，务乞公决。

②黎元洪电邀梁启超任总统府秘书长。(7月3日梁坚辞不就。)

③蔡锷自四川永宁抵泸州。

④梁启超致冯国璋电，建议龙济光督办云贵两广林矿。

7月3日 广东龙济光军攻击江北李烈钧军。桂军莫荣新攻占广东三水。

7月4日 ①梁启超致岑春煊电，述财政困难无法解决，又恐政局动乱，故军务院有撤销之必要。

②汤芑铭被迫离长沙，由湖南护国第一军总司令曾继梧代理都督(7月6日改推刘人熙代之)。

③山东革命军与北军停战。

④黄兴由日本门司启程回国(于8日抵沪)。

7月6日 ①改各省督理军务长官为督军，民政长官为省长。

②特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署省长；孟恩远为吉林督军，郭宗熙为省长；张怀芝为山东督军，孙发绪为省长；赵倜为河南督军，田文烈为省长；阎锡山为山西督军，沈铭昌为省长；冯国璋为江苏督军，齐耀琳为省长；张勋为安徽督军，倪嗣冲为省长；李纯为江西督军，戚扬为省长；李厚基为福建督军，胡瑞林为省长；吕公望为浙江督军兼署省长；王占元为湖北督军，范守佑为省长；陈宦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陈树藩为陕西督军兼署省长；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省长；陈炳焜为广西督军，罗佩金为省长；唐继尧为云南督军，任可澄为省长；刘显世为贵州督军，戴戡为省长；朱家宝为直隶

省长兼署督军；毕桂芳为黑龙江省长兼署督军；张广建为甘肃省长兼署督军；杨增新为新疆省长兼署督军。（陈宦未到任前陆荣廷兼署湖南督军，陆荣廷未到任前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

③派龙济光督办两广矿务，汤芑铭往广东查办滇桂军与粤军冲突事，授李烈钧勋二位和陆军上将衔，命即来京。

④护国军顾品珍败周骏，克简阳。

⑤李烈钧败龙济光部，占广东源潭。

⑥梁启超复黎元洪电，拒不出任秘书长，欲献身教育。

7月7日 ①周骏败四川护国军招讨右司令杨维于成都。

②梁启超致电蔡锷，望勿辞川督。

7月8日 黄兴抵上海。

7月10日 ①川滇护国军进入成都。

②陆荣廷由衡州回广西。

③留沪国会议员欢宴黄兴。黄兴演说，强调惩办祸首，伸张民权。

④梁启超致唐继尧、刘显世等电：“莫公虞电，拟正式阁成，始撤军院”，“然危机四伏，似不宜久留此空名”。

7月11日 蔡锷致梁启超电：病情恶化，请速解职，荐罗佩金护理川督。

7月12日 ①废止《惩办国贼条例》及《附乱自首特赦令》，所有本年7月2日前因政治犯罪被拘禁者，一律释放，其通缉各案一律撤销。

②特任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廉为教育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

③蔡锷通电声明未与闻推举段祺瑞为大总统事（张敬尧曾通电推段为大总统，以蔡领衔）。

④蔡锷连电请准予解除四川督军职。

7月13日 ①孙中山出席黄兴为准备北上两院议员举行的钱行宴

会，重申“共和国体”“主权在民”。章炳麟、唐绍仪等作陪。

②湖南省议会与各界会商，公举黄兴为湘督。次日程潜等致电黎元洪、段祺瑞，请加任命。同时，电请黄兴回湘。黄发表谈话：“当此人欲横流之日，暂不欲置身政界，转增多口。”荐松坡督湘。

7月14日 ①申令惩办国体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原有张镇芳、雷震春、段芝贵、袁乃宽等，后均免。顾、夏、薛均非首要。）

②唐继尧、岑春煊等以约法国会次第恢复，宣告撤销护国军军务院。

7月15日 ①梁启超通电参众两院、《国民公报》及西南刘显世、唐继尧等，追述众议院副议长陈国祥与蹇季常、王家襄等在策划护国战争中的功绩。

②孙中山出席驻沪粤籍议员茶话会，说国民要有权利“非尽铲除恶政治而去之”不可。

7月18日 滇桂军自广东三水进攻佛山，败龙济光部。

7月19日 ①蔡锷致唐继尧刘显世电：锷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捧身而退。一切善后，请川滇各将领负责办理。

②梁启超复大总统国务卿电，军务院撤销，请处理善后：一、拨发西南及独立各省欠饷；二、准蔡锷休沐；三、对李烈钧优加倚畀；四、对阵亡将校及中国银行总裁汤觉顿、陆军少将谭学夔、广东警察厅厅长王广龄等为国捐躯，宜优加表恤。

③特任罗佩金护理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给假一月）。

④特任陈炳焜兼署广西省长。

7月20日 ①罗佩金、刘存厚入成都，周骏退走。

②蔡锷送别陈宦。陈乘蜀亭轮东下。

③蔡锷致梁启超电，定于20号去成都就职。

7月24日 梁启超致各督军各总司令电（军务院撤，各方对梁责

备较多，梁再电解释）：中央举措，诚多不满人意。今日之局，与其对峙增猜，不若统一协议。现军务院已撤，彼疑我者已解，但愿国会早开，大局或可维持。

- 7月25日 孙中山通告中华革命党国内外各支分部，“袁贼自毙，黎大总统依法统就职”，“推翻专制，重建民国”目的已达，各省革命军停止军事行动。
- 7月29日 ①特任李根源为陕西省长。
②四川督军蔡锷自泸州到成都视事。
- 8月1日 ①国会重行开会。
②李烈钧电告中央，表示辞职。
- 8月2日 桂军败龙济光，进攻广州。
- 8月4日 ①孙中山电山东居正收束军事。
②阎锡山通电调解粤事，主责令李烈钧停战，并着龙济光裁编所部交卸。
- 8月5日 居正、吴大洲所派代表与山东将军张怀芝的代表共同商定，中华革命军与山东护国军改编。山东讨袁战事自此结束。
- 8月9日 ①特任刘显世暂行兼署贵州省长，戴戡改会办四川军务。
②蔡锷离成都东下。（北京政府已准罗佩金护理川督，戴戡护理省长。）
③曹錕率第三师自四川到宜昌。
- 8月11日 令龙济光、李烈钧勒束所部，即日停战。
- 8月14日 ①令各省省议会于10月1日由各省行政长官依法召集。
②陆荣廷到梧州，即赴广东，处理粤事。
- 8月15日 《晨钟报》在北京发刊。（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主编。1918年9月改名《晨报》。）
- 8月17日 李烈钧通电离营，在粤滇军由张开儒、方声涛师长统辖。
- 8月27日 蔡锷自四川抵上海晤梁启超。
- 9月9日 蔡锷写《盾鼻集》序。自上海赴日本就医。

- 10月7日 岑春煊、李根源等回广西。章太炎见南方无可与谋，遂出游南洋群岛。
- 10月10日 授孙中山大勋位，蔡锷、唐继尧、梁启超、岑春煊一勋位，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以一等大绶宝光嘉禾。
- ②举行国庆典礼。
- 10月16日 梁启超由沪赴港，筹划安葬父亲。
- 10月31日 黄兴在上海病故，年43岁。
- 11月8日 蔡锷卒于日本福岡医科大学病院，年35岁。
- 12月13日 孙中山致电黎元洪大总统和北京政府国务院，建议定云南起义日（即12月25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
- 12月21日 黎元洪下令，以云南护国纪念日为国家纪念日。

附录2 人物注释索引（按姓氏笔画排序）

人名	页次	人名	页次
2 画			
丁世峰	197		
3 画			
马 济	147	于右任	55
4 画			
邓 铿	53	邓泰中	76
方声涛	80	井勿幕	81
升 允	16	王伯群	66
王宠惠	185	王广龄	67
王和顺	166	王士珍	63
王文华	66	王揖唐	31
王占元	45	王芝祥	60
5 画			
冯国璋	41	冯相荣	165
冯玉祥	45	古德诺	46

龙建章	45	龙觐光	137
龙毓乾	148	石陶钧	68
田中玉	191	叶 荃	76

6 画

老 子	73	刘伯承	121
刘存厚	67	刘冠雄	193
刘师培	46	刘显潜	112
刘显世	64	刘 英	203
刘云峰	71	刘祖武	67
吕公望	201	吕志伊	55
齐燮元	110	齐耀琳	191
任可澄	77	孙宝琦	193
孙洪伊	216	孙 武	17
孙毓筠	46	汤化龙	7
汤觉顿	64	汤寿潜	207
汤芑铭	151	伍廷芳	17
伍祥桢	45	许崇智	160
许世英	216	朱 德	107
朱启钤	217	朱庆澜	225
朱 瑞	151	朱执信	53
庄蕴宽	179		

7 画

岑春煊	136	陈炳焜	134
陈炯明	56	陈其美	54
陈少白	3	陈树藩	202
陈廷策	72	陈 宦	45

但懋辛	83	谷钟秀	51
何国华	44	何海清	81
李炳之	45	李长泰	114
李 纯	151	李根源	60
李鸿祥	81	李烈钧	19
李鸣凤	202	李鸣钟	129
李燮和	46	李曰垓	83
陆建章	129	陆 领	160
陆荣廷	67	陆徵祥	152
麦孟华	3	沈汪度	67
宋教仁	18	汪大燮	216
吴大洲	206	吴贯因	136
吴景濂	60	吴禄贞	8
吴佩孚	110	严 复	42
杨 度	40	杨 虎	87
杨士琦	151	杨王鹏	204
杨永泰	51	杨源浚	70
杨 蓁	75	张国淦	179
张怀芝	206	张辉瓒	208
张 继	207	张 謇	7
张敬尧	113	张开儒	76
张鸣岐	173	张绍曾	8
张树元	206	张孝准	68
张 勋	16	张耀曾	138
张镇芳	217	张之江	129
张子贞	77	邹 鲁	158

8 画

范源廉	61	居 正	55
林葆懌	215	林长民	15
林 虎	158	罗佩金	76
欧渠甲	2	欧阳振声	51
青木宣纯	138	周 沆	82
周善培	101	周钟岳	65
周自齐	217		

9 画

柏文蔚	19	段祺瑞	41
段芝贵	188	宫崎寅藏	1
贺振雄	50	胡汉民	19
胡嗣瑗	99	胡 瑛	46
钮永建	56	姚雨平	159
荫 昌	191	赵凤昌	207
赵复祥	76	赵鹏飞	203
赵 倜	214	赵钟奇	147
祝鸿基	103		

10 画

顾品珍	81	莫擎宇	159
莫荣新	171	拿破仑	23
倪嗣冲	188	唐继尧	60
唐继虞	82	唐绍仪	185
徐佛苏	50	徐 勤	3
徐世昌	152	徐树铮	193

殷承璩	68	袁克定	40
袁世凯	9		

11 画

曹 锟	45	曹汝霖	31
黄 实	68	黄毓成	76
康有为	2	梁启超	1
梁士诒	47	庾恩旸	83
章士钊	138	章宗祥	193

12 画及以上

薄守德	206	蔡济民	203
蔡乃煌	166	程德全	17
程 潜	81	戴季陶	204
戴 戡	66	韩凤楼	66
韩建铎	60	韩文举	2
籍忠寅	72	蒋方震	227
蒋鸿遇	129	蒋雁行	191
蒋中正	204	靳云鹏	151
蓝天蔚	8	雷 飙	67
雷震春	217	黎元洪	17
廖仲恺	53	蒲殿俊	17
谭人凤	53	谭学夔	141
谭延闿	196	童葆暄	201
魏邦平	166	温宗尧	171
熊秉坤	203	熊范舆	72
熊其勋	107	熊克武	52
熊希龄	21		

后 记

1911年举世瞩目的辛亥革命爆发，迄今已整整100周年了。这场革命爆发的时间尽管距今已愈来愈遥远，但其重要意义与历史地位不仅未因此而被人们忽略，相反还越来越受到重视。百年以来，辛亥革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演变，乃至在亚洲与整个世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海内外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但在百年之后，以“百年”之眼光对辛亥革命重新加以审视和探讨，当会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获取许多新的认识，取得更多新成果。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原名历史研究所），是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的首批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国家级重点学科，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多年以来，研究所在首任所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现为本所名誉所长）的率领下，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果，荣获多项国家级与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受到国内外近代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与好评，由此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重镇之一。2009年，研究所又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和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专项重大项目“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的研究任务，此外还承担了多项有关辛亥革命的省部级课题。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研究所与出版社通力合作，决定倾全力推出这套30种的大型“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文库所收之书籍主要分为两大系列，一为学术研究系列，包括新出版的学术著作和部分以前出版经修订

的专著，还有曾任研究所所长的刘望龄教授的80万字遗稿《辛亥首义与时论思潮详录》；二为人物文集系列，包括新编和原已出版的两类。由于操作方面的困难，本研究所研究人员主持编写的近50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章开沅先生主持修订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以及另外几本相关学术著作，均未收录在本文库之内，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因此，这套文库虽然已达30余册，但仍不能体现近30年来研究所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的全部成果。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出版仍十分不易，除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以及特邀之校外学者全力以赴的共同努力之外，还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否则在时间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将很难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能够得以出版，应该感谢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的鼎力支持与鼓励。2009年，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经数次开会讨论之后，确定以“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为题，撰写一部多卷本学术著作，作为向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学术献礼。当年11月，我赴京参加社会科学司组织的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会议，专门向张东刚副司长介绍这一研究计划，希望得到社会科学司的支持，张东刚副司长对该选题当即给予充分肯定。不久之后，“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被列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除此之外，张东刚副司长当时还建议我们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将正在编撰的系列新著与资料，与先前已出版但受到国内外近代史学界关注的重要著作与史料书籍修订之后，汇集在一起共同出版，此乃出版“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最早动议。

随后，我将这一计划向章开沅先生作了汇报，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于是即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先生商议出版事宜。我校出版社的范军社长和段维总编辑都是颇具学术眼光的出版人，多年来一直十分支持研究所辛亥革命研究著述的出版。此次虽在出版社进行改制面临较大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两位出版社领导仍是一拍即合，决定克服重重困难承担出版“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任务。在确定出版这套文库而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之后，其间还曾出现过一些先前未曾预料到的变故，几乎使早先设想的计划难

以按时全部完成。此时，依然是范军社长与段维总编辑勇于担当，严定友副总编辑、冯会平主任以及出版社全体编辑共同努力，才使原定计划得以继续实施。因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对于这套文库的顺利出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首义之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也一直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到来之际，省市领导当然会更加重视。尤其是湖北省常务副省长李宪生先生，对我们研究所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计划与“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出版特别关注。研究所向湖北省政府专题报告研究设想与文库的出版计划，得到了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经费上的宝贵资助。

此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对这套文库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2010年，经过专家评审通过，“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列入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由此不仅提高了文库的出版档次，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出版社面临的经济压力。

这套文库最终能够顺利出版，使我近两年始终处于不安状态的一颗心得以平安踏实下来。两年来，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断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出现，有的问题甚至非常棘手，一度使人丧失了信心，所以我一直都担心这套文库不能如期顺利出版。个人为之付出的心血尚不足道，更为担心的是有负于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对不起我所在的研究所多年来在国内外享有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重镇的声誉。现在，这套文库虽然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终于顺利出版了，值得庆贺。在此需要感谢的单位与个人太多，难以一一列举，只能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最后，还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收入该文库的部分早期出版的学术著作，现虽经修订补充，但由于当时在注释的完整性要求上，与现今相比较并不十分严格，甚至可以说完全合乎学术规范。对于这种情况，各书作者尽量进行了补充，力图按照现在的规范要求，使注释达到完整的程度，但因客观条件所限，仍有少数注释没有达到这一要求，敬请读者谅解。

第二，现在重新修订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有些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结论已有所变化，有的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大多对此并没有作明显的改动。这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张来不及作更多的

修改，另一方面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从事相关学术探索的发展历程，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某个侧面具体地体现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断深入和不断进步。

第三，各书所收录的时人文章、演说词、诗词等各类文字作品，都具有史料性质与价值，其中也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与痕迹，用字用词习惯、数字用法与现今的著录和编校规范（如2010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1995年颁布的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有些不同，有的甚至存在某些“政治性”的问题，但为了尊重历史原貌，保持史料的完整性，便于学术研究，一般都未予以删改，请读者和研究者阅读和使用时要注意鉴别。

第四，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所谓辛亥人物也并非局限于革命志士，而是包含更为广泛的范围。对于那些中间流派的甚至是旧营垒人物的诗文，只要是在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或者对于史事与社会情况记载较为翔实而确有参考价值者，也在这套丛书收容之列。因为革命运动决非是革命党人的孤立行动，它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各种矛盾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所以也有必要研究其他各种营垒与各种类型的人物，才能对辛亥时期的历史获致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朱 英

2011年5月16日于武昌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辛亥革命时期的张謇与近代社会

商人精神的嬗变——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商人精神观念研究

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

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

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

梁启超与立宪政治

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

辛亥革命前后的官绅商学

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

辛亥革命时期苏州商会研究

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

清季宪政大辩论——《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研究

辛亥首义与时论思潮详录（二卷本）

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四卷本）

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

◆ 梁启超与护国战争

台湾近代三大诗人评传

上架建议：历史类

ISBN 978-7-5622-5359-4



9 787562 253594 >

定价：54.00元